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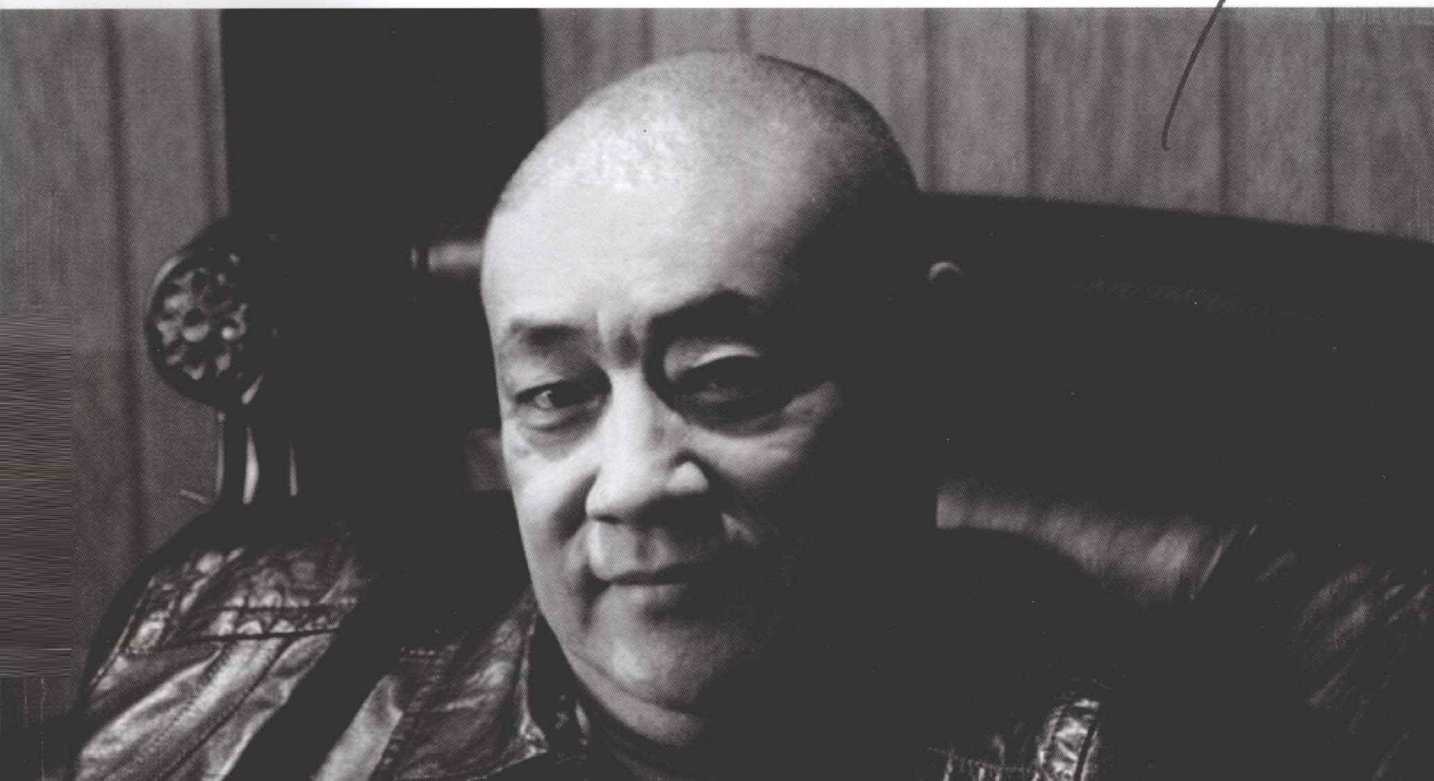


奋斗与思考

何新◎著

何新人生自述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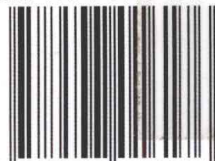
人生六十岁以后，就进入花甲之年。我这六十年来，人生经历和遭遇很特殊。也做过几件不平凡的事。中国当前的体制下，没有出现过我这样类型的人，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了。

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所欲泣、所欲骂——皆非关自我，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照世——为后世，为国家，为苍生。

我所著述不过是现代版的“盛世危言”，是向世人提供一种研究的线索，提供对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的一种新的观察视角而已。毕竟，对未来，我们这代人留下的并非答案，而仍是一系列待解决的问题。

上架建议 社科/人文

ISBN 978-7-5470-1617-6



9 787547 016176 >

定价：59.80元



奋斗与思考

何新◎著

何新人生自述

©何新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奋斗与思考 : 何新人生自述 / 何新著 .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1.8

ISBN 978-7-5470-1617-6

I . ① 奋… II . ① 何… III . ① 社会科学—文集 IV .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8468 号

出版发行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 沈阳市和平区一纬路 29 号 邮编 : 110003)

印刷者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 178mm × 250mm

字 数 : 510 千字

印 张 : 29

出版时间 :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 丁建新 庄平 陈丹

策划编辑 : 万晓春 王瑶

装帧设计 : 九品轩

ISBN 978-7-5470-1617-6

定 价 : 59.80 元

联系电话 : 024-23284090

传 真 : 024-23284521

E - m a i l :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 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 010-57612579

世界是美好的，值得为之奋斗……

——海明威

人生是荒谬的，意义在于选择。

——加缪

我不讲假话，但也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康德



古希腊智慧女神密纳发的象征不是一只吉祥鸟，不是喜鹊，而是一只猫头鹰。这个象征是意味深长的。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

何新

何新简历

1949年12月何新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原平阳县）钱库。4岁到北京，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1977年，他作为“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屯垦戍边”9年，当过农工、铸工、教师。1970年和1973年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及江青发表“攻击”言论而两次被打为“反革命”，挨过批斗、坐过牢。最戏剧化的经历是1970~1971年，何新在拘押受审中逃离北大荒，回到北京流浪一年。流浪期间，他在刚刚解禁的北京图书馆中潜心于阅读经典书籍。研读了大量历史、哲学、自然科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黑格尔的著作。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何新在黑龙江参加考试，被黑龙江大庆师范学院（大专）录取。入学仅三个月退学，作为返城知青回到北京。

1979年何新以大学肄业学历，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破格录用为汉语教员，讲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政经济文选。一年后，何新破格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科研组织局任学术秘书。

1981年何新受聘担任著名历史学家黎澍的学术助手。

1982年后，何新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被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1985），文学所副研究员（1988）及研究员（1991）。在人文思潮极其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何新以其卓越的才华，不断发表新锐理论和观点，成为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引人注目的先锋学者，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1991年3月，被中组部、中央统战部特别安排作为第七届特邀政协委员。

不久，何新奉调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被国家特殊安排为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政协委员，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1990年秋，何新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即将成为首相的宫泽喜一。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以两版半的巨大篇幅，全文发表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该文被《北京周报》译为七十多种语言介绍给世界。

1992年3月，何新应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会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就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和古巴经济问题，极其破例地与何新进行了长达9小时的交谈。卡斯特罗当面邀请何新担任经济顾问。

1993年日本富士电视台邀请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来华与何新会面，对两位世界级学者进行了联席采访。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远见卓识与敏锐的洞察力。正是在这次谈话中，何新首次谈到了未来存在国际

“恐怖主义”的活动土壤和可能发生“核游击战”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何新曾多次以学者身份出访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各国，进行讲学和从事文化学术交流，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会见过多国政要。

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各国重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以及国际上的美联社、《纽约时报》、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ABC电视台、NHK、美国之音、路透社、《泰晤士报》、《独立报》、《费加罗报》、《信使报》、安莎社等世界上几乎全部著名传媒。

自90年代中期以后，何新称病隐退而闭门研究和著述，几乎谢绝一切采访和讲演活动，深居简出，从媒体的视线中消失。其后十余年间，何新完成了《新战略论》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何新古经新考》十四卷（时事出版社，2000—2006）、《方法与逻辑：我的哲学思考》（时事出版社，2008）、《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2009）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在当代政治文化视野的深处，何新及其理论仍为国内外所关注的对象。

多年来，何新在理论和诸多学术领域中提出了许多富于挑战意义的新观点。他的许多政论送报国家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和重视。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层智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转录时有所修订。

序：往事沧桑

老来思淡泊。上年除夕的时候，作六十自述，同时立下三项志愿：

一、今后不出国，不出远门。

二、不接受采访，不讲学讲演。总之不做吸引眼球之事。

三、述而少作，专心整理旧学。

两会期间患流感，请假数日。拒绝了几起采访。年初曾收到两封英文电子邮件。一封是关于“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一封是关于美国控制全球人口的1974年总统200号文件。读完之后，一身冷汗。而一个陌生的字眼反复跳跃出现——“共济会”。

共济会是什么东西？我只记得，年轻时读《战争与和平》、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血字的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近年看丹·布朗的小说中曾见过这个词。读时不甚了了，后来也未求甚解。但在读了那个“2005年伦敦共济会高层会议纪要”后，我感到有必要搜寻有关共济会的详细资料。首先惊讶的是中文资料何等之少。更神秘的是，网上揭露共济会的文字，往往不久就会蒸发。^①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知识辞典》中查到了“共济会”的释名。2007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共济会为全球最大、历史最久的秘密组织，遍布英联邦（英属殖民地地区），为大英帝国扩张服务，至今还在活动。后来陆续找到了英文

^① 如某网博客中有两位较早编译共济会资料的网友“××”、“×××”，后来他们的文论都神秘地瞬间蒸发了。

的共济会网站，发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俄国 1917 革命都与共济会有关。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例如伏尔泰、莫扎特，也都与共济会或光明会有关。300 年来世界上确实存在有人要统治世界的阴谋。这个阴谋的总策源地是共济会之精英。

然而，在堂而皇之的世界历史书中，共济会却一直隐身无名。如此重要的一个全球性金融及政治组织，何以行藏如此诡秘？干了那么多大事，何以竟然功成而不居，大音而稀声，大象而无形，韬光养晦如此之深？于是，我停下手边的其他工作，这一年中的多数时间，是专注研究共济会问题。

必须感谢全球联通的互联网。因共济会组织的极度诡秘，几乎很难找到关于它的第一手资料。共济会公开的网站则充满虚言和自我修饰——称共济会是个“公开的慈善性组织”。如果没有全球性的信息网络，如果不是生活在无远弗届无密可隐的网络信息时代，共济会的内幕真相也许永远不会暴露。

3 月间，委托人在网易、新浪等网站建了博客，连续发表若干关于共济会的札记，目的就是抛砖引玉，求证和寻求反证。感谢一些不知名的网友，知道我在研究共济会问题，主动给我的网站和信箱中提供网址、信息、图片。兴华论坛上一位隐身的网友，还纠正了我引文中一些译文错误，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图片资料。

庄子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平生研究国际问题、经济、金融问题多年，老来惭愧。至今方知道三百年来世界之经济政治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后竟然隐藏着这么一只神秘的“共济会”之手。

随着资料搜集的丰富，研究也愈深入，共济会的真相乃逐渐呈露。我乃知道自 18 世纪以来罗斯切尔德世家财团与现代共济会的深秘关系。（其实，至少有两部世界名著曾描写过 19 世纪的罗斯切尔德银行，即巴尔扎克的《纽沁根银行》与左拉的《金钱》。）因之更了解到在美国与欧洲的经济与政治背后隐藏着一些历史渊源悠久的神秘团伙——共济会、骷髅会、光明会、锡安会以及晚近的彼得伯格俱乐部等幕后组织，它们竟然左右着一些国家乃至世界的事务（包括影响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改革）。^①

^① 参看本书 107 页。

在此之前，我一直出于印象地以为美国是清教徒为主的基督教国家。是一个政治制度依法独立运转的法制民主国家。惟当研究了共济会后，我才知道现代欧美政治宗教中仍然笼罩着远古密教的神光(所谓“露西法”之眼)，从而了解现代欧洲封建贵族王政与“民主”代议政体何以能并存(英、荷、瑞典、挪威等)。从关于共济会的文件中，我又了解到共济会精英减少地球人口以及遏制中国崛起的五大阴谋：疫苗阴谋、人工病毒阴谋、人民币汇率升值阴谋、转基因阴谋和碳排放阴谋。了解愈多，乃愈知如我等以及国人实际上对西方历史文化、政治文化及宗教文化之所知尚是如何之浅！

其实，不惟我等外国人如此。年内两位美国学人来访，晤谈中我言及“共济会”，彼等也不甚了了。到归国查证后乃写信给我云：“你所言道基本是真实的！”

在过去这一年中，我完成了三部新书：

编译了一本《统治世界》，揭露了共济会这个隐秘的国际金融世家组织的存在。

一本《汇率风暴》，揭露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阴谋的幕后真相。

最后是这本《奋斗与思考》^①，可以做为对本人60年的人生和30年政治经济思想及学术的一种回顾和总结。

与共和国同龄的我们这一代人，尽管曾多历磨难，但总体而言仍是幸运的一代。新中国建立的六十余年来，国家之大环境基本在和平中发展，天下承平久矣。近三十年来更欣逢改革开放创造“中国奇迹”，何其幸哉！

然而展望未来，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危机与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下几代人生存的环境与我们过去的环境相比，当更加严峻，更加冷酷。不能不承认，就此而言，西方共济会精英对地球环境、资源、人口与经济发展及竞争严峻性等中长期问题的前瞻性分析是十分深刻的。

历史绝不会直线式地一路发展。中国与世界在未来10至30年间必将发生现今难料的深刻变化。作为渺小的个人，我们无力影响

①香港版书名《命运与思考》，中港传媒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

历史，以至改变历史的宿命。个人才学有限。我所著述皆只能挂一漏万，不过是现代版的《盛世危言》——也仅是向世人提供一种研究的线索，提供对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的一种新的观察视角而已。

毕竟，对于未来，我们这代人所留下的并非答案，而仍是一系列待解的问题。是为序。

何 新

2010年12月20日记

2011年2月28日补记于京东滨园

目录

序：往事沧桑	001
上 卷	
何新六十自述	001
我看未来淡如清水	003
一、三有三无四非	003
二、我的人生很奇特	005
三、平生经历是五部书	005
四、学术上我是玩家	007
五、我曾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009
六、道术已为天下裂	010
七、中国文明再度遭遇危机	011
八、直面争议	012
九、看未来淡如清水	013
何新国学思想自述	015
总结我的国学和史学研究：追本溯源 古为今用	017
一、治学著述之目标	017
二、重新认知传统文化	017
三、在国学上有所建树	018
四、胡适鼓吹疑古史学的要害是主张文化殖民化	020
五、反对所谓中国封建制度“超长”论	021

六、中国古代为什么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制度	022
七、学术不辩不明	025
八、市场化败坏了当今教育	026
九、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	027
【附录】	028
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	028
何新政治经济思想自述	033
为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	035
一、我曾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035
二、关于“生产过剩”的辩论	037
三、“新自由主义”是乱国之术	039
四、美国购货，中国买单	040
五、解散垄断企业会使中国工业倒退回工场手工业 ...	041
六、人民币持续升值是高通货膨胀的诱因	042
七、内需主导在经济上是死路一条	043
八、以国家主义为本位还是接受本国经济的殖民化 ...	044
九、智能性计划市场经济是强国之路	045
十、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复兴农村	046
十一、削藩与治吏	047
十二、法治不等于法制	048
十三、中国须制订全球化的地缘战略体系	049
十四、新世界性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	050
结语	051
【附录】	052
美国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	052
朝圣山学社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056
论国家复兴的战略与谋略	058
上篇 关于经济金融战争的战略和谋略问题	058

一、战略研究关乎国之大政	058
二、美国用金融战略胜中国于无形	060
三、发生通货膨胀的四个原因	062
四、通货膨胀是关乎国家治乱的战略问题	063
五、战略研究不能忽视阴谋论	064
六、谋略博弈是软战争的主要内容	065
七、近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异常	066
八、有一种GDP增长叫“债务性虚拟增长”	067
下篇 关于中国的全球战略问题	068
九、需要修正对美国的某些误认	068
十、美国总统是给谁打工?	069
十一、共济会控制着美元和全球金融体系	071
十二、银行家权力大于首相	071
十三、共济会银行家要控制全世界	072
十四、谁把美国总统关进了笼子	074
十五、共济会影子政府控制着西方政治	075
十六、地中海动乱是针对中国布局的地缘战略	076
结语	077
【附录】	079
Peter Schiff在美国共济会金融家高级俱乐部的演讲： 中国人知道我们不会把钱还给他们!	079

中 卷

我的思维之路	083
我是离经叛道之徒	083
一、始启疑蒙	089
二、浪迹燕京	094
三、劳形苦智	100
四、穷通自转	106
五、弄潮中国社会科学院	115
六、大同与异化	123

七、与高层的互动.....	133
八、回顾90年代的一场政策辩论.....	141
九、横议食货.....	147
十、谏为苍生.....	155
十一、探讨中国经济复兴之路.....	165
十二、保守争衡.....	175
十三、狂狷济世.....	184
十四、穷理观命.....	186
十五、思齐政教.....	193
【附录】	205
我对兵团战友何新的印象.....	205

何新哲学自述..... 207

我对逻辑学的革新.....	209
一、探求唯实论与演化论的逻辑学.....	209
二、一种新型逻辑的构建.....	219
三、批判罗素的“逻辑斯蒂”.....	229
四、解决逻辑学中的悖论问题.....	243
五、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	253
【附录】	267
钱学森：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	267
钱学森关于“何新树”的三封信.....	268

下卷

往事杂忆..... 271

奇闻异事与奇谈怪论（六则）.....	273
忆吴冠中与80年代美学形式的革新.....	282

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悲壮..... 284

第一次谈话：“开放”与“封闭”.....	284
第二次谈话：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悲壮.....	290

第三次谈话：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294
未来展望	299
对世界未来的展望：与托夫勒谈21世纪.....	301
何新与宫泽喜一的谈话.....	317
【附录】	323
“北京密使”说服卡斯特罗搞改革秘辛.....	323
重塑中国远古文化	332
一、历史的追溯	332
二、文化的渊源	335
三、西亚南亚是早期文明的主要起源地.....	337
四、西亚文化与印度文化的融合.....	338
五、印度文化与中国早期文化的融合	339
诗与画	345
何新旧诗抄	347
沁园春	347
纪念堂	347
观看审判“四人帮”电视新闻有感	347
行浙东丽水石门涧	348
游雁荡山.....	348
满庭芳	348
凤凰台上忆吹箫	348
沁园春	349
沁园春	349
七律二首：湘 魂.....	349
读《心经》	350
沧海烟客：读何新著作有感（二首）	351
陈述元：读何新论陈寅恪后记.....	351
何新画存.....	353

江兆申论何新绘画	356
学术评论	357
祝东力：何新一人平衡了整个精英知识界.....	359
何新是中国思想界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	364
房宁：论何新.....	367
叶慧坚：何新思想与当代世界历史大格局.....	372
景戎华：何新的史学研究	381
20年论战：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歧	387
一、危机源于生产能力过剩	387
二、市场也是资源，市场空间是有限的	388
三、瓦解中国国有经济是西方夺取控制中国市场的阴谋... ..	390
四、批判萨伊定律	391
五、价格并非市场竞争决定，而是资本竞争决定.....	392
六、市场竞争必须由国家力量控制和管理.....	393
七、何新经济思想述要.....	394
盘点近二十年何新的魔鬼预言	400
何新致滁州学院倪阳教授：“何新研究” 应正名为“何新批判”	405
滁州学院开设《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课程	407
倪阳教授的回信	408
塞枫（旅美学者）：论何新	409
《人民日报》、《新华文摘》关于何新的报导	411
何新著作年表.....	427
有关何新的评论与研究.....	432
何新主要著作封面.....	433
海内外有关何新的部分评论集	448

何新六十自述



我看未来淡如清水

引论

2009年底，老何60岁生日时，对朋友讲了一番话。

老何说：“60岁是一个甲子。人生60岁后，就进入花甲之年。我这60年来，人生经历和遭遇很特殊，也做过几件不平凡的事。是非纷纭，可由后人评说。但中国的体制下，很难出现我这样类型的人，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了。所以有人说何新是异类之怪物。今天随便聊聊，讲点心里话，也算是对过去的人生，做个总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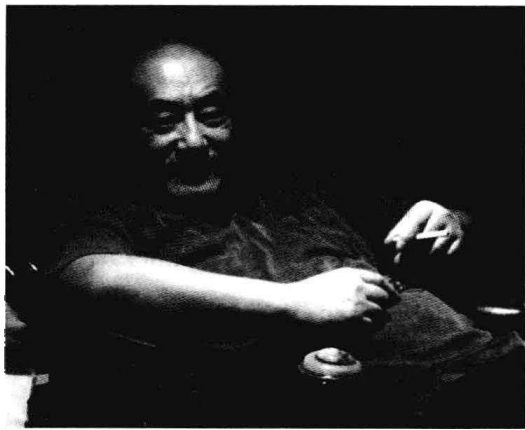
一、三有三无四非

我该退休了。只是我的组织关系在政协，退休的手续目前还未办。但是无所谓，随时接到通知就去签字。

我始终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职务。20年前，我从中国社科院调进政协时职称是“研究员”。到政协后因为政协是国家机关，所以公务员改革的时候好像被套了个什么级——但是什么级别并没有人正式告诉过我，我也从没去人事局问过。所以我一直

不知道自己什么职位、什么级别，什么头衔。我的确不在意这个。

国家对我安排不错。我曾连任第7届、8届、9届以及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上一届我虽未任委员（第10届），但待遇也没有什么变化。①



何新近照：老顽童

①第10届我未任委员，社会上或以为是政治因素。实际上我本来列名在第10届委员名单中，因某种技术性原因而临时生变。但11届我复出任委员，也是中央决定的。

政协实际没有设“专职”的委员。在政协，我的行政关系多年一直都是“挂”在老干部局。当初调我进去的时候，宋德敏秘书长与我谈工作，说：“中央领导同志安排你调来。你不用上班和开会，就在家做你的研究。”那是1991年，时光荏苒，一晃就是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中我没上过一天班，所以政协机关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别人。

这二十年间，我写了不少东西，完成了一批著作，在学术和文化上有所收获和贡献。但这几十年中，我从来没向国家伸手要过任何研究费、课题费或者任何补贴。我有理由要。当初政协领导曾有关照，有任何需要随时可以提出申请。但我不需要。我的研究及著述都是自负盈亏，一张纸、一枝铅笔都自己买。在国家的若干重大关头，我挺身而出，以言报国，对国家有所效力。如果何新不存在，当代史，至少是政治思想，未必是现在这样子。

我的薪水，政协财会部门会按月自动打到银行卡里，有人代我收，我从没有问过究竟发了多少。这钱全部交给不在一起住的家人。我自己另有稿费和版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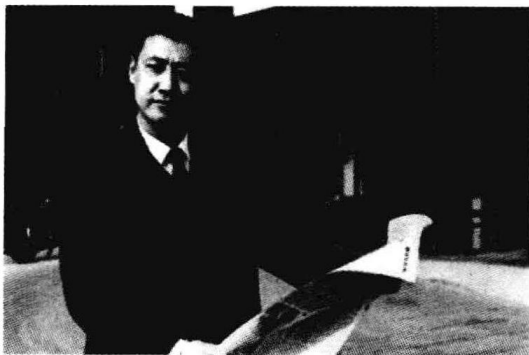
我多年来基本独居。我日常消费很低，除了吸烟看书，几乎没有嗜好。我的生活一向拉里邋遢，我不计较细节。过去除了有外事活动，我从不在乎外貌和衣着。但是我比较讲究美食。我善烹调，算得上一个有品味的食客，也曾大嘴吃遍天下。可惜现在老了，味觉食欲都不好，只能以清淡素食为主了。

有N多的人请我讲学，或开会、对话、做节目，或办学，或挂什么教授、顾问、董事、院长，或参与或主持什么学会之类，而我的态度是一律坚决拒绝，一个也不答应。我已经多年没有名片，不用手机，近些年来没兴趣认识生人，不喜欢交新朋友，更不介入任何学术或文人的圈子。

我大半生虽身居闹市，习性却是个江湖上闲散的人。我喜欢面对的是美丽的大自然，喜欢安静、孤独与寂静。

总而言之：我是个有务无职，有实无名，有事无业之人；这叫“三有三无”。非官人，也非学人，非坏人，也非完人，这叫“四非”。我少年时是一个草根，青年时是一介流民，晚年是一个精神领域的浪人，这叫“三一”。

人生有宿命，有定分。我毕生的事业在于思想。我十多岁时已经知道此生的命运就是不断学习与思考，为这个民族兴一代之学。所以我早年曾经励志自学（“文革”中的1967年），于今不断



何新（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纪思道摄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阅读学习近五十年，仍然日有新知而与时俱进。我一生都特立独行，志我所行，且行我所志。

我们1949年后这一代人，历经新中国建国、工业化、“文革”、改革和当今的后改革时代，虽然迭经动荡，但国家大局基本和平安定，还应当算是幸运的一代。而展望未来，面对世局纷纭，动变频仍，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却不能不深感困惑。无力回天，只能难得糊涂。^①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身在俗家，心则皈入空门。

二、我的人生很奇特

我以往的人生经历很奇特，不俗。

1966年“文革”开始，两年后我离家上山下乡，去了东北军垦农场。1978年我从大学退学回到北京，成为返城“知青”。后来进入社会科学院，后来成为政协委员。这几十年当中，我个人生涯中所经历的小风小浪以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风大浪都不少，遭遇的奇事、怪事、不可思议之事也不少。

计算起来，我平生数历生死边缘，几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爱恨情仇，流水落花，往事不胜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与际遇，绝非一般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我的文敌甚多。因为多年来我挑战学林，放言无忌，推倒一世之智勇。但我平生并无私敌。在私交上，我一向以义为先，与人为善，助人为乐。随手帮助过不少人。若以私谊而论，我的友朋遍天下。

我一生经历曲折，但是始终活得真实、坦率、明亮。我从未做过蝇营狗苟、欺世盗名、损人利己之事，平生做事霁月光风，无一不可对人言。回首往事——我少年时是浪子，青年时是游子，中年时是条汉子。

现在进入迟暮之年，我是基本足不出屋的呆子。

三、平生经历是五部书

我这一生又是个浪荡人，畸零人，笑眼观世，冷眼看人，桀骜不驯，玩世不恭。

^①郑板桥语：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糊涂更难。

我这辈子，活得算潇洒，透彻，也开心。

我平生交游广阔，友朋众多。无论三教九流，只要心中喜欢或投缘，就不会在意对方身份。如苏东坡所云：我上天可陪玉皇大帝，下地可伴田舍乞儿——眼中并无一个不好人。无等级无贵贱，只随任感受和自在。

少年时我习过武，拜师学过攒跤，也练过擒拿格斗。年轻时在东北兵团，和哈尔滨知青斗殴，我一人放倒过两三个人，所以在乡下时也没被人欺负过。当年是争强好胜的登徒子，现在是无所作为的衰老头。但我身上总有一股傲气加霸气。不怕事，很男人，所以当年很招女孩喜欢。

50岁以前，不好意思，经历了几次婚变，若干次恋爱。但那一不靠金钱，二不靠权势，三不靠骗人，只因为心心相印，彼此相处开心。

与我交往过的女性，有出身高门自命不凡的淑女，也有名扬一时的文化名媛。既曾红烛拥美人，也有过逾墙蹈穴的风流事。但基本上，倒没做过什么偷鸡摸狗不可告人的事情。

在男女问题上，自古男人皆好色——除非生理心态有毛病。情色是人生一关，也是难躲之劫，更是欢喜与烦恼之缘。谁也不必装。

我主张明月清风清清爽爽，爱就是爱，恨就是恨，一切摆在桌面上。两情相悦，只要有情有缘，有感觉就凑到一起，没感觉或者感觉不好了，就分手拜拜。爱就爱得透彻，散也散得明白！

我平生最大毛病是不拘形迹，放浪不羁，快口直言，口无遮拦。概括而戏言之，我少年时是《水浒传》，闯荡江湖；青年时是《红楼梦》，红袖簇拥。壮年时是《金



追求艺术与美的人生（葡萄牙里斯本）



瓶梅》，情迷意乱。中年时是《三国演义》，纵横捭阖。晚年是《西游记》，寻觅真经。五大奇书凝聚浓缩在我的感情和阅历中。若有时间娓娓道来细写一写，会是很为有趣的一部人生故事。

四、学术上我是玩家

我也是非常幸运之人，得天独厚，心有灵犀，读书皆能无师而自通。

我平生所最好是读书，自幼即无书不读，无所不学。在学术领域，举凡文、史、哲、

经、政，包括语言学、古文字学、逻辑学^①以及天文^②、地理^③、艺术、文学、诗歌、美学，考古、文物、书画古玩，甚至包括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我都多少有所涉猎，或曰深入浅出地“玩”过。

中学时候一度迷恋化学，以炭、硝、硫磺自制黑色火药炸瓶子，结果一块碎玻璃崩到脑门上，留下一块小疤直到如今。

老实说，这些学问中的任何一门，都本应投入一生去研究。但我则或凭兴之所至，或因研究中的问题所至，而随意涉猎之。初则浅尝，逐渐深入。

我平生著述上百种，有些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我的一些畅销书常见盗版。作为一个学人，只要能写出其中一两种，就已经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之言。然而我则始终文思泉涌，直到如今仍不枯竭。

目前，我想完成但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电脑中或案头上），还有十多种，待整理的学术札记有甚多卷。我不仅著作等身，跨越诸多领域；而且所设新说颇多，许多议论开一时先河，而后来蔚成风气。学问最高之境是融会贯通。我治学视野宽阔，更求汇通与贯通。

说实话，我对学术的态度并不甚认真，对权威也颇不尊重。立说有时难免会有疏漏，造成所谓“硬伤”。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的错处我自己知道。但精彩之处在于，我的疏漏竟是如此之少。被我挑战过的学界人士甚多，如果被他们抓住大



地中海一角（1997·里斯本）

①在逻辑方面，钱学森命名我提出的动态集合论为“何新树”。

②我在古历法学上有独到的发明和考证，著名天文学家陈久金先生有文评论过。

③中国引入“地缘政治学”这门英美偏门之学，还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最早研究并介绍给中央高层而引起重视。

的纰漏，早就一击毙命，但他们就是抓不到。他们所抓住的一些所谓纰漏，其实多数倒不是什么纰漏，而往往是他们自己的无知。

我治学不算认真，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是大家，实际上是一个玩家。所谓“玩者”，即游戏也。

其实我看人生，无论活得多么认真、在意、计较，不过都是规模、局面因人而异的一场大游戏。无论一时多么风光，总有一天会见终局。每个人到无常来时终会知道——人生是幻，诸境是幻，诸色是幻，诸情是幻。对逝者而言，生前一切努力、奋斗、挣扎，一切成败得失，亦终皆是幻。以幻设幻，人生不过一场大游戏耳！

人生也是一段行旅。学术，则为一苇之航，是渡越人生而求知求智的工具。我有幸不用拿学术来做挣钱谋生的饭碗，或者当做叩敲名利之途的敲门砖。

人生如梦，诸境是幻，而学术是竞智之艺，如此而已！在超越于实用工具的境界上，学术有赏心悦目、怡情遣兴之功效，是一种高境界的智力游戏——这就是“玩儿”。

年轻时有闲暇，我也玩过古玩。我略懂字画古玩的鉴定。80~90年代初文物古董很便宜，时常有机会捡到一些“漏”。所以那些年我攒下一点儿收藏，当时这东西叫“玩意儿”，现在严重了，被叫做什么“投资”。

我略通书画，有时自己偶尔也抹两笔——还是为了“玩儿”。中国画坛夙有南北分宗及“利（隶）家”与“逸家”之别。我喜欢南宗玩笔墨的逸家。逸者，出离，超越，不执着于一境也。

其实我的人生也追求“逸”——追求一种不须取悦于他人，也不受人拘束的自在人生。

我有宗教观念。我知道人智微渺而宇宙神秘。人外有天，天外有神明。我守持正信。



何新在纽约华侨家中鉴赏古画（1999）

① 2009年春我参禅去普陀山，入寺门见戒忍法师。他当即呼僧人送袈裟来。我说：“不冷，不必。”他说：“要披，披上你我原一样。”



但我只是抱持信仰而不受戒律的逃禅者，是不合格的居士，闲云野鹤，野逸之徒。^①

五、我曾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当今“大师”多。与诸多不学有术又有名的“大师”们比，我比较地安于无名，比较地追求真学问，比较地追求大学问。所以我绝非大师，毕生只是学徒。

我的学术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活学问，有用和能用的学问——经世致用之学，讨论经济的，政治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国际战略问题的。

还有一部分是死学问，骨董之学，阳春白雪、自娱自乐之学。

先谈前者。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多年来我曾处在时代辩论的中心。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几乎是身孤影单地与披靡一代的新自由主义阵营对抗近三十年。我从意识形态上批驳过他们。他们人马众多声势浩大，能得到国外资助，占据着某些主流媒体，还顶着什么“博士”、“海归”之类华丽的黑帽子。但在我面前，他们却仍然时时处于下风。

我经常指名道姓地点评他们，揭露他们（比如自称无姓氏的某“五常”君）。让他们那些华丽谎言现形，弄得主流们十分尴尬。他们无力反驳，只能假装没听到而不敢正面回应。我早就揭露西方那一套“民主”、“启蒙”、“人权”的普世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战略工具。我不是说“民主”，“启蒙”、“人权”本身不好或无意义，而是说西方用这些口号挑动国人做乱华灭华的工具。

去年，我的得意之笔是向国人揭露了隐藏在近代世界历史和西方经济政治制度之后，存在着一只叫作共济会（FREEMASONRY）的黄金手——一只操控着全球金融及政治的隐身的撒旦魔鬼之手。

我在1988年即呼唤民族复兴以及中华复兴，这是一面伟大的旗帜。近十年我针对自由主义的普世论，提出了“新国家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是底线，而回归社会主义的共富、公平与正义，我认为乃是解决当前严重经济、



何新在巴黎与学生们合影（1996）

政治及一切社会问题的必然。否则，未来社会难免面临分裂、对抗与动乱！

从哲学和宗教的意义，人生本质是幻。但从社会和民生的意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大众的利益是存在之实体，维系着亿万人之身家性命。不能不捍卫和维护。所以我做不到完全弃世而遁入空门。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再次有立功。三十年来，我已立言，用我的几十卷著述立了一座碑。这就是我此生全部存在价值及意义之所在。

六、道术已为天下裂

我平生真下了较多功夫的，是以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近二十卷的一部《何新国学经典新考》系列^①。

《诗》、《书》、《易》、《老》以及儒、道、墨、法，自五四以来即遭遇殊多误解和误读；现在更被一些既时髦又有勇气的半吊子文人墨客们歪讲邪讲，讲傻了，讲乱了，讲飞了！而在我的这一套书中，我以一种绝望般的冷静，自说自话，试图正本清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我的其他一些著作，比如《哲学思考》（两卷）、《思辨逻辑引论》之类，我不信有几人真看得懂。汇集而出版之，也纯是自说自话，自我娱乐而已。可是这种书居然发行还不错，出了三四种版本。可能有些书印出来，不过就是用来给人家装填书架的。

当今绝对不是读书问学的好时代。道术已为天下裂，异说纷纭，无所是非，出现什么胡说八道都不稀奇！当今流行的俗文化，叫做什么“读图时代”，什么“全娱乐时代”——许多东西都只是搞笑，忽悠，恶搞——真正到了魔道横行的“末（无）法”时期。

互联网更创生了一种解构一切的新文化，网络舆论能解构一切价值。互联网的造势舆论可以使小丑被包装成英雄，使伟人被解构成小丑。严肃的东西在网论中变形，神圣的东西被庸俗化，庄严的东西被打得粉碎。在这个时代，认真做学问，谈论真学问，是自读，是自虐，是一种愚憨。所以我的许多书，并非写给这一代人，而是留给未来者的。

对于中国之未来，我们这代人已无能为力。我们所留下的并非答案，而更多地是问题。至于后人能不能解决，只有天知道——歧路亡羊。后来的人，任重而道远啊！

^①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9年出第一版，次年出精装版。



哲学与思考（2008，时事出版社）

七、中国文明再度遭遇危机

当今这场所谓“市场转型”，方向道路已经迷乱。什么“华南虎、曹操墓”之类，始终难辩真伪，沦为骂谈与笑谈。将来会被历史钉在这一代文化记忆的耻辱柱上。

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市场转型”运动，是“文革”以来再一次的文化浩劫，也是人道及生态的浩劫！

无论自然生态还是文化生态破坏之严重无过于斯世，根源就在于泛市场化、泛私有化过程中内外邪恶势力对金钱的疯狂追逐！

但是，任何劫难终有结束的一天！十年浩劫以悲、喜剧终结。这场市场“转型”闹剧也已接近尾声，绝不会一百年不变！总有一天人们会回归庄严，会反省今日，会痛定思痛！

我中华民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卓越，令我们作为子孙无比自豪的民族。雄万山之上伟大、连绵的长城，是我们民族意志永恒、坚毅的象征。近年新的考古发现不断证明，中国本土的原生文明延续已垂万年以上。在孔子那个时代，华夏文明就已经有了数千年的灿烂传统。孔夫子创立的儒家并不是中华文明的原创者，而只是东周春秋那个阶段的总结者和传承者。

春秋时代是华夏文明遭遇重大危机的时代，当时夷狄猾夏，蛮戎乱华。帝京宗周遭戎狄入侵沦陷，中夏诸国都被内侵的游牧民族蛮狄夷戎所威胁，面临危亡灭种之祸。幸赖齐桓公、管仲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凝聚华夏，驱逐戎狄。所以孔子说：“微管

仲，吾其被发左衽乎”？当时华夏文明礼崩乐坏。幸赖孔子及其诸贤弟子们，存亡续绝，挽救和保存了一批文化经典，于是而有其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汉文明的复兴。

今日中国再度遭遇重大的文明危机。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和价值如洪水一样入侵渗透。今日华夏面临的西化、戎狄化威胁远胜有史以来的任何时代！华夏之所以为华夏的基本价值今日几乎荡然难存。但我仍然相信并且梦想——即使未来爆发世界大战以至天崩地裂，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总会存留若干种子，还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八、直面争议

对我一向有争议。但在当今对哪位人物、什么东西没有争议？有人说你何新的学历不高！就是不高。1977年高考恢复后，我因为超龄只考上黑龙江一所未流大学入学读了三个月不到。但是一年后退学回到北京，我却被破格招聘进入国家一流大学当了教师。而我教过的那些学生，本来与我是属于大学同届的——本应当是我同级的同学。

一年后胡乔木和梅益又破格把我调入中国社科院。进去后我被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学术机构科研组织局当学术秘书，上世纪80年代初叶，我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角。

有人说你在社科院既有便利，当时为什么不去投师弄个硕、博士之类的学位呢？可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学术界已经名声赫赫。学界当时那些达人，我大体都认识。谁能做我老师？谁敢做我老师？学历不高是我的荣耀！上天似乎就是要用我这种低学历而高成就者的存在，来嘲笑当今那些名不符实而高学历的糟糠之辈。

其实，我的学术履历非常正规而完整。1980～1990年在中国社科院的10年间，我已经循序渐进地先后由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攀升到正研究员。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提前晋级，经过所、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论议评定。每一次都有不小的争议，但最终都仍以高票表决通过。那是靠什么？不是靠贿赂，不是靠金钱，也不是靠关系。

80年代中国社科院还是人才济济，许多老一辈的学术耆老权威都还活着——学术界都知道当时在中国社科院晋升到高级职称有多难。当时之哲学所、历史所甚至有数位海归的洋博士，因评不上副研究员而喝药或跳楼自杀者！

而当年学历仅为“大专肄业”的何新被破格晋升高研的新闻作为特例，则登载



过《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①。自从80年代前后我在学术界出道到今天，遭遇过的高手如林。批过我的人不少，骂过我的人也许更多——可是哪个对手能在学术上把何新击倒在地？有人放言称早把何新批倒批臭一万次了。是吗？那就还需要第一万零一次——因为何新还是站在这里。

80年代我在学术界取得地位，并不是靠学历或关系，而是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政治风气好，社会风气好，学术风气也好。全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学术界才有何新！

十几年来，我孤独求败！我希望学术应该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现实令我失望。说老实话，在我所涉足过的每一个学术领域，我在国内都还没有遇到过值得认真较量的对手，更少遇到值得认真做对话的朋偶。时代学风不正，文风败坏，价值体系崩解。学界充斥着庸才、弄人、滥竽充数或者欺世盗名之徒。

可叹曾经知我、诲我、提携我、奖掖我，令我尊敬的一些长者、能者、德者，于今多已逝去了。当今文化表面富丽堂皇，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即目所见多是泡沫。真令人悲哉痛也！

九、看未来淡如清水

我对未来看得淡如清水。

这些年来，我看人生，看世事，愈来愈超逸，愈来愈淡泊，愈来愈冷漠。

我平生既经历过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过俗人不能想象的大幸——而今回看六十年人生，一切，宛如一场游戏，不过一场笑谈，两袖清风而已。

我身体外强中干，表面很好，其实是眼半瞎，脑半残，心半死（我心脏有个洞洞，动脉有一血管瘤）。惜命的人遇到这情况，也许早吓得半死，食不好睡不安，天天要泡医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检查发现至今，连复检都没去过。我完全相信死生有命。

国家安排我可享受高干医疗待遇。每年都会接到通知做一次副部级待遇的公费体检——可是多年来我一次没去查过。每年暑期我可携眷选择去国内的一处名胜地公费疗养，年年到时会有通知送来家中。但我给国家节省经费，十几年来也都没去过。我可以因公调车，但我多年没有用过公车。（仅这两项，近20年里我个人可能给国家节省费用数十万元。）

^① 参看本书书后“附录”。

年轻人不可仿效我。尤其不可学我的冷漠。冷漠如同慈善，也是需要本钱和资格的。否则不过只是一个笑话。人生事业，成败全在一个“热”字！其实我年轻时是狂热分子。只是现在老了，衰了，麻木了，才变成一杯淡而无味的冷开水。

死生有命，万法皆虚。我随时准备放下眼前一切，皈依涅槃。来时赤条条，去时无牵挂。

而今天但凡我还活着，那只有—种意愿就是，再多写点东西，利乐众生，利乐有情，娱乐自己，也揭露和刺激一些坏蛋们。

故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笑、所恨、所苦、所泣、所骂——皆非关自我，而是以大悲之心观世照世——为后世，为天下，为苍生！如此而已，夫复何求？！

劫波方至，天道回旋。善善恶恶，因果相随。命也夫，由之去，—切终归是过眼云烟而已。

上天给我的恩宠已经够多，只须永存—颗感恩和谦卑的心。这，就是我回首往事的人生感言。



风雪看苍茫



2009年10月1日何新应邀出席国庆观礼后在天安门前留影

上卷

VOLUME I

何新
国
学
思
想
自
述





总结我的国学和史学研究：追本溯源 古为今用

一、治学著述之目标

学者治学著述之目标无非有二，一曰求真知，二曰立学说。

求真知者，即寻求事理之本根，探明真相，深入本源，发现规律。这是研究求证之学。

而立学说则未必皆须有真知。歪理狡辩亦可具论成说。当今学风不良，求真知者少，而求立学说者多。故洋洋大观之宏论常见，而可寓目者不多。

我的学术，先求致真知，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求立学说。

我的学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古学，研究国学及古代经典的。

一部分是新学。这一部分是活学问——研究于国家、于民生有用和能用的学问，即前人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就是关于经济，政治，国计民生以及关乎国际形势和全球战略问题的大学术。

二、重新认知传统文化

几十年来我所真正属意的，真正爱好的，下了多年功夫的，是在国学研究上，成果即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①。

有人说“国学”这个词搞不清楚。究竟什么叫国学？所谓“国学”无非就是中国之学，华夏之学，祖国之学。中国之传统学术谓之“国学”，西方外来之学术谓之“西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的。晚清、“五四”以来即有此划分。有什么不清楚？

2001年我出版《何新古经新解》（七卷），引起一些人重读国学经典的兴趣。此前国学被视为保守落后的封建学术，恶称“旧学”，久已乏人问津，国学热此后而风生水起。这套书修订再版多次，至今已出了四种版本。

^① 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9年出版。

有人针对我的提倡，说“复活国学热是个阴谋”，即阻遏文化西化的阴谋。其实这是阳谋！我主张用振兴国学来抵制西方自由主义的风靡。让年轻人读得懂古书，了解我们华夏先人是何其渊博，何其深刻，何其先进，何其伟大，何其智慧！中国古代本土也有“民主”因子，士人也有“自由”之追求。其实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及路易14时代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风格”（所谓“中国风尚”），都是追求吸收中国元素的。^①五四以下的中国人自卑自贱，数典忘祖，于是风行而崇拜希腊、罗马、英国、美国的“先进”文化！（然而近日西方有人揭露，直到16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王室贵族还有以人肉设宴的野蛮风俗。）

我这套旧典新解，立意之旨在“奋扬^②古今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所立新异之说殊多，但多数于典有征，持之有故，经得起玩味与鉴赏。因为这一套书贯通上下，衔接古今。不少前人没搞懂、搞不通或者有误解之处，我往往从一种新的、独特的视角，重新予以解读。

这套书迄今先后已经出版过四次，印行十余万册。但我自己并不满意，故每出新版都一改再改，修订增删历百遍，可谓呕心沥血。从20世纪90年代初写作，到2010年修订出版最新一版^③，销磨时光前后历乎二十年。

但是仍未尽如我意，存在毛病仍不少。目前我还在仔细审读与修订。未来我还有计划再出一种最后的新版本作为封笔的定稿。

三、在国学上有所建树

1981年我给黎澍先生初做助手时，黎澍曾批评我“昧于经学”，这是当初激励我读经，研究“小学”及朴学的开始。^④

我读书领悟的速度快。古人有所谓“皓首穷经”之说，要读通一经，往往弄白了头发。但我借助于“五四”以来近世新经学的各种工具，借助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

① 法语 *rocaille* 一词常用以称谓岩洞，（也有一说即文艺复兴时代传到意大利的中国假山设计），和庭园中的贝壳螺钿细工，*travail de rocaille*（岩状工艺）为 *travail* 的同义语。洛可可即由“岩状工艺”和“贝壳工艺”引伸而来，指室内装饰、建筑到绘画、雕刻以至家具、陶瓷、染织、服装等各方面的一种流行艺术风格。洛可可的另一种解释初见于《法兰西大学院词典》，指为“路易十四至路易十五早期奇异的装饰、风格和设计”。有人将“洛可可”与意大利“巴洛克”相关连，把这种“奇异的”洛可可风格看作是巴洛克风格的晚期，即巴洛克的瓦解和颓废阶段。

② 宋陈亮语，原文是“推倒当世之智勇”。

③ 2010年精装版，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④ 清人称文字语义训诂之学为“小学”。



知识背景，以及戴、钱、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等清儒的经学考证学及训诂学成果，再借助于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黄侃、陆宗达等 20 世纪新史学及新文字学的解读方法，仅用三四年时间，即初步打通了阅读经史重要典籍的门槛，其后登堂入室，渐有心得。

我曾经通过乾嘉朴学——钱、戴、二王^①的著作去研习经学和训诂学。但是我的灵活运用以及所获得的新知，超过清人以至章、黄^②。我案头有一部《新说文解字》，还未最后定稿，可正本清源，纠正前人在文字训诂上的一些误读与误说。在这一领域中，我多有超越前人的新知。

例如《说文》开篇有“元”字，许慎说“元”即“大”字。殊不知“元、兀”本是同源同音字，乃即第一人称“我”（或“吾”）之本字。今闽南语自称“我”仍读为“元”。而“我”字之本来字义则是一种兵戈之器，并非人称之代词。

我曾考论证明龙的动物学原型真相是大型蜥蜴及鳄鱼，凤的动物学原型真相是大鸵鸟——这是我综合归纳文字学、语言学、动物学、考古学、图纹学、历史学以及地理学多方面材料和证据而后得出的结论。听起来似乎甚妄，但结论则坚实有力。因为铁证如山，颠扑不破。

再举个误读古书的例子。《史记》记述说孔子生而“圩顶”。古代就有人解释为：孔子头顶是畸形的，向下凹陷，中间有个大坑。如果孔子真生就这样一个头形，将是人类中独一无二的畸形怪异脑骨，孔子就成了奥特曼怪兽了。此说最早来自西汉末的《白虎通》，谓孔子头形：“中低而四旁高。”后来被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采信，以至千年以来以讹传讹。

其实“圩”是什么？水中堤岸曰“圩”，圩者，围堤也，土丘之隆起也（参看《康熙字典》）。所以孔子“圩顶”恰恰不是头顶凹陷如坑的怪物，而是头顶盖骨凸起如圩岸，故名丘。据骨相学说有此凸顶者常多智。但关于孔子头顶下凹如盆的谬说，却一直被一些孔学家不辨真伪地津津乐道至于今。^③

我曾经论证所谓“扶桑”的语源^④与日本列岛最大火山富士山（日语读为 *fujisang*）有关。古地质学证明，上古时期（据今 8 千至 1 万年前），日本列岛及朝鲜半岛与中国本土大陆之山东半岛有大陆桥相连。古日本北部的原住民阿伊努人（阿奴人、倭奴人）就是所谓倭（矮）人、夷人、“羽夷”人的来源。阿伊努人即古虾夷，

① 指钱大昕、戴震、王念孙、王引之。

② 章，章太炎。黄，黄侃。

③ 详考见何新《孔子年谱长编》，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④ 说详何新《扶桑语源与日本之起源》一文。何新认为，扶桑语源与扶摇、飘摇有关，本语即“飘”，即“暴”，又作“霁”，即龙卷风以及火山喷发形成之风暴。



何新与鳄鱼（1995）

胡夷、苦夷，可能是白种人与黄种人（委古音与夷通）的中间型人，二者共同的先型人种。

其实女娲炼石补天及洪水之神话正是源自史前人类关于地震、火山、海啸及海浸的灾难记忆。洪水陆沉神话，与地质第四纪冰川时代后期（距今约1万年前）海陆剧烈变迁的原始记忆有关。

传说大禹曾东狩日本，《尚书·尧典》之东隅所记“和氏”，正是日本“和”族得名之源。《诗经》之“韩奕”乃是韩国民族得名之源，韩国始建于周文王所封之燕北韩国，而“高（句）丽”即东夷之“勾芒”。^①日本民族、高丽民族本皆为华夏之属族以及襟带边裔之地。

我认为中国上古曾存在崇拜太阳神的系统天文宗教，而伏羲（曦神）、黄帝（光煌之神）、炎帝（雷电炎火之神）、祝融，原都是上古太阳神及火神、雷电神的名号，后来成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号。所有这些论断，对历史及现实，以及理解华夏文明在东亚文明之位置均至关重要！

《离骚》及《九歌》这两个书名，自汉代以来学者讲不通。而我考证，“离骚”就是“离操”，“操”本是上古诗歌之一体。而“九”乃“芄”也，“芄”者“郊”也，“郊”者，郊天之祭祀也。故“九歌”本为郊祭五方上帝十位天神之祀歌。这些发明皆发千古之覆。

四、胡适鼓吹疑古史学的要害是主张文化殖民化

五四运动鼓吹反孔推翻礼教，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进步有重大意义，但在文化上则有殊多误解与曲解。胡适、顾颉刚创《古史辩》派，以经验主义推翻中国古史系统，致使疑古之谬种流传久远，一直影响到今天。

^① 处据汉语古音学，来母、明母通，丽、芒古字相通。



西方将自己的传统追溯于《旧约》及希腊以至苏美尔、埃及神话。《圣经》中说耶稣被犹大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犹太密教则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耶稣并没有死，钉在十字架上的只是替身。耶稣有后裔，出卖耶稣的犹大并非叛徒而是圣人。共济会宗教就认为耶稣后裔一直被“锡安山隐修会”的修士和“圣殿骑士”们在法国秘密守护直到今天。^①连这样重大的历史



何新在富士山下（1990）

宗教问题西方人至今还没有弄清真相。但西方学术界却并无疑古之风潮，反而一直致力于将特洛伊、大西岛及《圣经》中的传说一一考实。

近世学人中，我不欣赏就是作为文化西化派领袖的胡适。此人之师傅杜威是19世纪美国共济会大师。胡适专对中国之历史大举“疑古”。其最为荒谬的就是不仅否认炎、黄、尧、舜、禹之存在，而且否认在《史记》及古史中谱牒有序、记述彬彬的夏王朝的存在，使华夏古史无端地被抹空了数千年。近世只知耳食之言的文人墨客关于儒、法、道墨许多流行说法都是胡扯，诸如什么商周是“巫教”时代（张光直）之类的流行谬说一直流传。欲坠其国，必诬其史！这些谬说无非是为中国文明自古落后论以及文化的全盘西化、殖民化开路。

五、反对所谓中国封建制度“超长”论

20世纪中国史学中最大谬误之一是引入一元论的历史模式，以欧洲的 feudalism 比附中国先秦的“封建”制度，殊不知二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于是引申出两大谬论，一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超长论，二是中国古代社会停滞不前论。据此不学无文的幼稚自由派高举文不对题的“反封建”大旗一直反到今天。

1981年我在中国史学会的天津讨论会上反对这种历史模式论，指出东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具有特殊性，发展具有自身的特色和特殊规律。历史没有什么普世模式、普世道路、普适规律，因此中国未来不必走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

^①参看《圣血与圣杯》，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 Licensed by Centruy, Copyright as per Proprietors' edition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by World Affairs Press。

1986年我在《读书》杂志撰文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的诸侯分封制度，完全不同、不可比附于后罗马帝国时代欧洲的feudalism。中国秦汉以后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制度是古代的先进政治制度，而且经历了自身漫长的系统性演变，农民在秦汉以后由国家农奴逐渐解放为自由小农。所以所谓“大一统”帝国长期停滞不前乃是悖于历史真相的谬说。这些新论和异论2001年后汇编集合，均收入《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一书。

总括而言之，我认为对中国古代所谓“封建史”，实际上有必要从文化和哲学上重新认识。“反封建”的口号，自五四时期在激进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思潮中提出，可以说已经成为20世纪文化中一种触碰不得的偶像。在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人们继承20世纪初的激进启蒙思潮，把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也统统归罪于中国历史中所谓“封建主义”的传统。殊不知，这个敌人是堂吉诃德矛下的风车骑士，是莫须有的。

中国历史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传统。根据激进主义的历史观念，一些人甚至以理想天国作为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指责它缺乏这个、那个（例如自由和民主）。结果，除了几次农民起义和三大发明，中国历史变成一部丑恶黑暗的原罪历史。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不见了，帝王都被涂抹成所谓“封建专制暴君”，一部极其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华民族奋斗与发展的历史，变成了使激进的知识精英提起来就愤恨、就耻辱、使许多人为之自卑自衰自读的所谓“厚黑”政治史，所谓“酱缸”文化史。

我认为，现实存在的问题应该还给现实。历史的问题则留给历史。作为生物的人类不必因自己的先祖曾经是病毒孢子或猿猴而烦恼。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也与历史上猿猴曾经有尾巴无关。

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古代历史吧！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历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历史，是我们民族的生命之源！^①

六、中国古代为什么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制度

研究欧洲共济会以及犹太金融集团的历史，可以解决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著名斯芬克司之谜——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早有市场经济而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制度。

早在先秦，中国已经形成规模可观的市场体系和制度。（参看《管子》及《史记·货殖列传》）在汉、唐、宋、元、明时代，中国的商业市场曾经是全世界最庞大

① 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没有发育出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货币金融经济的产物，而不是商业市场经济的产物。

中国自秦汉以下直到晚清，货币发行权（金属货币的铸造权）都牢牢掌控于国家手中。商人无铸币权，无法控制货币流通，也不能利用货币流通高息取利，因此无法积累形成巨大规模的流动性货币资产。这就使资本主义无法从贸易商业的原生资本形态，跃升到货币金融的纯粹资本形态。

在中国，即使商人积累了巨大的货币资产，这种货币资产也无法用于货币资本增殖的产业中，而主要转入消费形态，往往只能用于实物商品的积累（购买宝货及奢侈品），或投资于地产。

汉代以下一直有“限民名田”的土地制度及抑商政策，主要就是限制商人对土地资源的兼并。因此，中国古代虽有大规模的商业及市场经济，却不能发育出金融资本所主导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原因在此。

而欧洲则不同。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犹太精神，就是货币资本的精神。这是极为深刻的论点。^①

实际上，自罗马帝国后期，欧洲即形成了控制着社会金融资产的犹太人金融势力（包括犹太放贷人、银行家以及控制贵族财政的宫廷犹太人）。犹太学者马克斯·韦伯写有一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是犹太裔学者）。他所说的新教伦理，实际暗喻的就是犹太教的“塔木德”精神。（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派是吸收犹太教义的改宗基督教，所以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异端。）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犹太人由于宗教原因作为异教徒而被天主教社会所排斥，被边缘化。但天主教限制教民不许放贷取息——不允许基督教民从事金融活动。而在宗教迫害下不得不四处流动的犹太人，却世代以放贷取息为业，于是成为国际性流动金融资产的主人。中世纪犹太人主要靠放高利贷取息过活。

公元10世纪以后，犹太金融家为主体，而包括某些“改宗犹太人”（即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商业性银行。著名的美地奇银行是其代表，文艺复兴就是这个银行所资助和推动起来的。

犹太金融家与法国的圣殿骑士团（十字军）结盟。犹太金融集团很早以来即在

^① 有人认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这是误解。犹太人的识别标志，不是种族（犹太人与死敌阿拉伯人同出闪族），而是宗教即犹太教。马克思父系祖上虽是犹太人。但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已改信基督教，并娶了基督教女子。所以马克思家族作为基督徒并非犹太人。



在里斯本

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欧洲地区金币及代金币（期票、支票、债券）的流通。从此犹太金融集团逐步成为世界货币资本的主导者。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犹太金融集团下的主导下逐渐形成的。莎士比亚的名作《威尼斯商人》中所描写的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可以说是体现近代犹太精神的文学典型。

古代欧洲与中国在社会制度上存在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差异：

（1）在宏观层面上，欧洲宗教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主干，教权制约王权。

（2）在微观制度层面上，武士贵族的割据性庄园农奴制度（feudalism）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3）犹太金融势力通过高利贷经济控制着全欧洲的商业、运输业和各国王室财政。

18世纪以后出现的共济会、圣殿骑士团以及光照会等秘密组织，正是犹太金融资本与王室贵族联手操作控制权力的结盟平台。

从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看，在当时的欧洲，犹太金融资本流向哪里，哪里的资本主义就蓬勃发展起来。而当其撤出的时候，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衰退下去。从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其兴起与衰落都与犹太金融势力的进入与退出直接相关。



在17世纪后期(1688年),犹太金融资本随着荷兰亲王威廉(曾任荷兰执政)的“光荣革命”,由荷兰进入英国,于是英国崛起而成为“日不落”帝国。当荷兰和英国的犹太金融势力来到美洲大陆,美国资本主义也就神奇地在二百年内突然崛起了。

近代犹太金融势力的迁移和流动,是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兴衰及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真正原因。所以,并不是19世纪的产业革命造就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先有货币资本主义制度才有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要从这一新的观察角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以及犹太金融势力以及共济会的历史作用问题。同时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早就存在商业市场资本主义,却不能转型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七、学术不辩不明

当年我是好事之徒,不怕争论。

一些年来我在学术上遭遇的高手如林。批斗过我的人也不少,可笑他们扳不倒我。

学术论争,有来有往。你可以批,我也可以驳,道理越辩越明!迄今为止,那些学术上批过我的人,还少有与我辩论往复两个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80年代直接间接批评过我的宿儒耆旧吕叔湘、袁珂那样值得尊重的老先生,来来往往(他批,我辩)也不过仅一个回合而已。

陕西大学有个某教授,就一个“德”字的释义,与我在《人文杂志》上往复讨论,但是也不过三个往复,他就无意再辩,高挂免战牌了。80年代有位史学博士王某,在堂堂的《历史研究》杂志上以头版头条撰文批判何新的《诸神的起源》。他有一个发明,就是指摘我书中有多处所谓的“硬伤”,来势颇为汹汹。我只好认真对待,反复考证,逐项回应。我的答复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我引用史料证明,这位博士所提出的诸多异议,并非我的什么“硬伤”,而是由于他自己读书太少,所以不知道我的新论点其实皆有出处。我复文的标题“是何新的硬伤还是博士的无知?”^①这当然是嘲弄他。可笑交手只这一个回合,本来我还准备了诸多资料,战意犹酣;而博士先生却偃旗息鼓退下不见踪影了!

现在这部《诸神的起源》,日、韩都有译本(此书文字古涩极不好翻译)。中国台

^①此文在《历史研究》刊出时题目被修改。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湾有个木铎出版社有未经我授权的盗版本。大陆二十年来，则已经反复印刷，出了十几种版本。每隔几年就印一版，因为总有读者要读。那些反对我的人可有哪本书有这样的影响？

八、市场化败坏了当今教育

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师也不收弟子。著书非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①

1988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副研究员后，就有资格招收研究生。多年来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投书报名欲投我门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难为教也。80年代有几位年轻人曾从我门下游学，后来也成了某种名人或达人，但行径作为多令人失望。恶徒伤心！此后再也不收弟子。

全面理解我的学术，需要多方面多学科的学术准备和基本知识，而当今能达到我要求的年轻人几乎很少。

市场化改革腐蚀败坏了当今的教育制度。目前的教育改革亦如医疗改革，愈演愈乱！今日之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一样，完全变成了商业操作的市场。这种“市场化经营”在初等、中等教育中尤为严重（大学因为别有创收之路，倒较少从学生身上打主意）。教育关乎民族之未来，本应当是国家社会贴钱办的事业——怎么能纵任其“市场化”，让人道沦为商道，殿堂成为市场，师尊沦为商人和市侩？！

我研究过现在的小学生教材，发现小学、中学教材编写极不合理。不是循序渐进，学以致用，而是体统混乱，误人子弟！现在小学生要学的内容，超过我们当年读同级小学时学习内容的十倍。小学三四年级已经在学“文革”前初中、高中数学的某些内容，包括概率、几何、统计等等。

语文教材的编纂体例更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语文教育不是教人识字、读书、写文章，而是要学生终日死记硬背。一些语文测试题，荒谬绝伦。例如见到一个语文测试竟有这样的题目：“（一）7（ | ）8”写一成语（横七竖八）——岂非儿戏与胡闹？！除非死记硬背老师制订的标准答案，否则连文豪都过不了关。

再加上英语考级和“奥数”竞赛，从小学起，就设定一套又一套虚假无实，多数终身无用的虚幻知识体系逼迫孩子们去学。这种教材和教育剥夺了每个孩子宝贵

^① 龚自珍诗语：著书都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



的童年和少年。现在的小学生、中学生好可怜！他们被压得透不过气，几乎没有业余时间和自由活动的空间——除非放弃学业，放弃考试竞争。小孩子迫于竞考的压力，从小就要去上各种辅教班，购买各种课外辅教教材，做各种模拟试题，一遍又一遍！然而一旦进入大学后，反而无课可学，压力很轻，可以终日游荡。

当今体制下培养之学生，一切皆为竞争应试入名校谋学历，竞分数而弃实学。折磨而且浪费小孩子的生命、头脑和时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实际能力比起我们那几代人至少低十倍。考试失败者则自暴自弃，在未来社会难有立足之地。

因此，当今文科学成不通文墨，理科学成不务实技者，比比皆是。娱乐化与动漫化侵袭当代文化。此种文化氛围下所育成之青年自然弱智而无脑。

青年乃国家之未来。面对当今不良教育体制，实在有必要再次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九、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

我时常见到一些猥琐的不肖文人抄窃我写的东西。包括我偶然讲过一点只言片语，都有人捡起来借题发挥。好笑的是，某些骂我颇多的“清流”文人却是偷偷读我而窃取抄袭我最多的（都是被不相识的网友所揭露）。现眼以后还要强辩，狼狈尴尬之态，观之好笑。当今文人无德，学风堕落，早已斯文扫地。哪还有什么“清流”？一片浊水污泥而已。

现在中国又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现象，用人以学历出身设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中正制和世袭门阀的贵族制度。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平民社会。有才则举，主要不是靠关系或世袭。全社会礼贤下士，重才德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惟贤是举，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会风尚好，学风也好。

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毕生只是东北畎亩上的一个农工。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何新，没有20世纪80年代那种学术开明的氛围也没有何新。

【附录】

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

按：下文收入《何新史学论著集：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2003年时事出版社出版）。此文论不长，但从根基上颠覆了18世纪以来西方主流史学界流行、中国史学界盲目跟风的那种历史理念，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一个长期停滞不前，数千年没有任何质变和进步的“超稳定”系统的滥说。

（一）

多年来有一种广为流行的历史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有说者或云，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一个所谓“超稳定的政治控制系统”。且以伪科学的形式，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数据模式化的处理。

关于中国历史的停滞不前，是一种由来久远的说法。毛泽东（1940年代）亦尝曾经认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此观点似出自范文澜。）然而此说法之源头实出自17～18世纪从欧洲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中国时也引述了这种说法。他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谈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如今日的情状。但是它从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参看《历史哲学》中译本第161页，三联旧版）

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发表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即近二百年前。那时西方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所知不过皮毛而已，产生这种印象并不足怪。但令人惊异的是，至今许多人，包括一些“精英”人物，每“批判”中国历史仍抱持这样一种看法，以至据此而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历史持一种轻蔑与鄙夷。这真是中国历史学的莫大悲哀。因为这一观点既不符合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事实，也表明我们的历史哲学是多么地缺乏进步！



(二)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历程，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律与特性，而与欧洲为中心的西方社会历史非常不同。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奴婢制度（直到清代仍有家奴制度），但是至今没有发现确切的历史资料或者考古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经历过所谓“奴隶制社会形态”，即郭沫若所描述的那种类同于古希腊罗马模式的“奴隶制社会”。实际上，夏商周三代既非如郭沫若所描述的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野蛮奴隶制度”，也非如张光直所描述的盛行“巫术”的准野蛮文化。

中国实行“封建”政治制度的时代是在西周。但周代世官世禄的“封建”宗法制度，与欧洲以教皇、骑士、封地为特征的 Feudalism（封建主义）是极其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殊不可等同而语。至于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的发展道路更具有自身鲜明的独特性，与西方历史发展方式和道路截然不同。

不澄清以上诸点，对中国古代历史就很难形成理性的认识和理解。

(三)

尽管中国历史的发展现象错综复杂，脉络极为纷繁。但从一种宏观的观点去俯瞰，忽略掉历史进程中那些复杂的色彩和枝节，我们却可以把握到一个总体性的进化之流。这个进程体现出人性走向自由，社会走向民主，制度走向进步的很难逆转的一维性流程。

使治史者常会感到惊讶的一点是，中国历史上陷入长期动荡的那些时代，恰恰又是中国社会在制度形态上发生重大变异和演进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之际以及宋元、明清之际，特别是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

这一现象似乎印证了《资本论》的一个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推进，何按）作用。”^①

(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自夏商周以后曾存在过10个统一大帝国——秦、西汉、

^①《资本论》第1卷782页，人民出版社。

东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近年来网络史学流行的中国古代“帝国论”系由老何此论发端）。从第一帝国秦到第十帝国清，绝不是重复着同一的政治经济制度（所谓的“封建制度”），重复着同一的社会文化形态。实际上，自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大体言之，就经济基础论，中国的秦汉时代是国家农奴制的社会。农民对国家承担着沉重的无偿徭役义务。汉代的农民被牢固地绑锁在国家分派给他从事耕作的土地上。以至可以随同田地一同被转让、赠与或赏赐，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人身依附性政治和经济关系。国家政权用强有力的暴力手段（严刑苛法）维持着这种关系和制度。

魏晋时代门阀士族兴起。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国家农奴制蜕变为农民依附于豪门或豪强的领主农奴制度。东汉末年曹操废除两汉口赋、算赋之征，徭役渐有所减轻。

通过南北朝到唐中叶的社会变革，豪门强宗的领主农奴制被打破了。隋唐的均田制，实际是一种国家土地租佃制度。农民以丁口为单位，通过“屯田”、“均田”、“更名田”等形式从国家的手中分得自己的一块“份地”（有露田、桑田、口分田、世业田等名目），向国家缴纳实物形态为主的租税，即“租庸调”，而徭役则大为减轻。

汉代一个农夫一生中（自20岁到70岁），必须为国家远征服两年以上的无偿官役，成丁男女每年还必须在本郡县服一个月以上“更卒”之役。而在隋唐租庸调法下，每丁口一年服役减少到仅为20日。这表明，通过均田制和租庸调的新法，农民由对国家或贵族领主承担着沉重徭役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身份逐步获得解放，转变为耕作份地的人身具有半自由性质的国家佃农。

唐代中叶以后，均田制瓦解，大地主庄园制度发展起来。五代、北宋后，庄园经济成为土地的主要占有形式。殆到明清时期，庶民地主的私有土地制度在社会中乃得占据绝对优势。因之，农民也由均田制下的国家佃农，向耕种私营地主土地的自由佃农身份转化，小农所纳之田租由向国家缴纳，转为向私营地主交纳。

因此，到宋、元、明时代，农民主体乃由隶属国家耕作官田的国家佃农，逐渐演变为耕作于私人庄田的佃户，成为人身身份渐得自由、已经不承担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租佃者。

在明末，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盛清的康熙、雍正时代实施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后，真正的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经济，到这时才大规模发



展起来。商业资本和土地贩卖成为“通家”之事，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促进地租和赋税的商品化。地主经济和国家财政对于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小农经济也被卷入到市场中来。

宋代以来对商业发展的种种政治限制乃逐渐松弛和废除，商业资本及货币资本逐渐渗透入经济发达地区（如江南）农村。因此，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已开始具备向早期市场经济演变的可能。

在所谓“盛世”的康、雍、乾时代，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主体的中国农民已基本摆脱对国家及田主的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多数农户成为自身拥有小块土地的“自由自耕农”，成为“自己耕作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语）。

然而必须指出，这种占有及耕作着小块田地、人身自由的“自由自耕农”，绝对不是在秦汉时代或隋唐时代曾经存在过的——中国的农民通过两千年的不断抗争和一系列制度演变，才最终完成了由身份不自由的依附性农奴到“自由自耕农”的身份解放和转变。

（五）

由于历史和社会政治的复杂性，自康、雍年间启动而展开的“摊丁入亩”赋税改革，一直拖到晚清的光绪以后才最终完成。

“摊丁入亩”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丁役一直是古代国家和土地贵族领主用以束缚农民、强化其人身依附关系的主要手段。虽然从隋、唐前期输庸代役开始，徭役制度已发生动摇。至明中叶以下，随着社会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丁役制度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而统一折银征收，部分地把丁役以货币计征摊入田租，才在制度上推进了丁口力役制度的改革进程。

清入关后，康熙、雍正两朝所推行的“摊丁入亩”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促使地赋和丁役完全合而为一。“摊丁入亩”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同时取消了明代缙绅（官僚）地主家口优免丁银的特权，均平赋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无地贫民的负担。这是清帝国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清皇朝以少数民族统治多

数的汉族而能建立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开明举措。当时许多记载称自实施摊丁入亩后，“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非所乐”，“独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室”，故农民得以乐业。这是有史料和事实为根据的。

史称“自摊丁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一切杂办丁徭尽为除豁，民只知有田赋一项，而吏胥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剔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同时由于赋税足额，也增加了国家的货币性财政收入，直接促进了雍正、乾隆时期“帝国”盛世的形成和持续。

当时人称“自后丁徭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此真旷古未有之善政也”。此外，“摊丁入亩”使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丁银，也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生产力上，战国秦汉之际农民人均耕地在百亩左右，收成仅足以活四口之家。明后期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均耕地仅为6.5亩，清初顺、康时期人均耕地仅为5.5亩，到嘉庆时期则不到2.4亩，但已足以养活七口之家。加之明代华侨从南洋传入甘薯、玉米等新的农作物种，在高度集约耕作的条件下，粮食亩产大大增长。于是在乾隆以后中国人口快速地增加到9位数，这表明农业生产力和技术都取得了重大进步。

康、雍、乾三代之所以确实堪称为盛世，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盖在于此。

上卷

VOLUME I

何新政治经济思想自述





为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

一、我曾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我学术的第二部分，属于“经世致用”之学，涉及经济学、经济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问题。

199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集录以及1997年出版《论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9年出版三卷本《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等三卷）^①，还有在海外出版的《为中国声辩——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汇集了我的这方面的主要论著。



《新战略论三卷》封面（1999）

《致中南海密札》封面（1997）

我认为近年来，自西方输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泛市场拜物教，误导了经济改革的方向。在经济改革方向的问题上，我与占据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泛市场主义具有根本性的分歧。三十年来，我一直与作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相对峙。在学术和政治上，我数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言，也曾犯颜上书而有逆鳞之举。

1988年夏季，我在《经济学周报》上撰写系列文论，批评“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闯关论。我警言曰：“美、日不会乐见中国之强盛”，预言“戈尔巴乔夫必会失败，

^①《新战略论》三卷：“经济编”、“政治文化编”、“国际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苏联将因民族问题解体”。

是年10月我在国内《经济学周报》及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系列政论《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等，警言“激进物价改革以及休克疗法”将引致国内发生动乱。”



此系列文论发表后为各国政要所关注，亦警示到高层。其影响之深，则为不久之事变所证实。我后来之所以得到参政、议政之机会，而能备位于谏议之列，盖以此为始。

1990年，东欧及苏联先后解体，“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学人福山撰书称“民主”化乃未来不可逆之历史潮流——“历史已经终结。”所谓“终结”的意思，就是从此历史将是西方化、“自由化”以及仿美式“民主”之时代。

[何按：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云：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则战胜了共产主义原则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则。当代人类政治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自由民主原则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带来的问题。因此，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则，今后人类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政治的原则不再有发展，因而在政治上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

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伪民主是美国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国是其既定目标”。我一个人当时持此论而对抗一个世界。

其后发生两次伊战、阿富汗战争、“9·11”事件，以及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显

示普世价值不可期，历史并无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资本主义仍需国家主义的政策介入。

美国在 2007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窘相毕露，终于露底而显示其经济强大之真正原因，并非由于“开放、无限制的自由市场”，而是由于其主导着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发行权，以及累积了天文数字的大规模国家债务、财政赤字和对外债务。自由市场经济并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之美妙天堂。这一真相的揭破，对于我们反省未来中国改革之目标及方向，意义至关重大！



《纽约时报》对何新的采访报导（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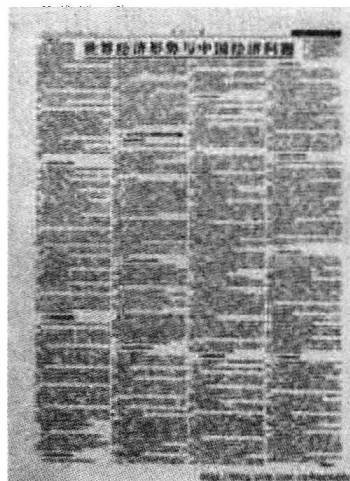
2010 年我出版《反主流经济学》（上、下册），书中汇聚我历年来与主流派关于经济学政策之论战文章。在一些关系重大经济方针的问题上，我多次发出尖锐响亮的声音报警和揭露，从而有所迟滞了西方试图以私有化和放任化快速解体我国国民经济，使之殖民地化、依附化的阴谋。

二、关于“生产过剩”的辩论

我非职业经济学家，至多只是半个业余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亦



何新在多国驻华记者对话会上



人民日报发表何新长篇文章《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1990年12月）

有所建树。

1990年12月,《人民日报》以显著版面全文刊登我数万言《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此文曾经被译成七十多种文字,传播全球。

非统运动主席、不结盟国家论坛领袖尼雷尔读此文后,大为动容,托人转信给我,代表非洲及第三世界表示支持及感谢。卡斯特罗读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后,邀我访问古巴。我在古巴介绍中国改革历程,建议他效仿中国模式推动古巴的经济改革。

在人民日报的长文中,我提出当时国内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此论当时“雷倒”主流经济学人,因为他们多年信奉的是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短缺”和“瓶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自古巴回国后,中央有关领导约见我。我建言中国经济方针宜变“内需主导”为“外向出口”为主导,限产压库,从而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此后中国经济方针转变,以各项政策大力鼓励出口,于是外汇储备渐得积累,中国商品扩及全世界,1991年后出现了出口带动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之加入WTO后,国际资金技术大量进入中国,以及全球市场需求之拉动,中国经济呈现了持续近二十年的空前繁荣。

今天“产能过剩”已成主流经济学界普遍认可的口头禅。以至连美国人也接受了这个前古典时代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最近巴菲特去见奥巴马,即忧心忡忡大谈美国房地产“产能过剩”和大量空房闲置问题。美国“主流”们似乎忘记了那位诺



贝尔奖得主，被主流奉为祖师爷之一的萨缪尔森曾在他的《经济学》中声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彻底解决了19世纪的‘生产过剩’这个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伪命题。”



与美国副国务卿库柏共进午餐（1992）

三、“新自由主义”是乱国之术

从1988年开始，我在经济学上一直与“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主流经济学”这个词在国内是我首倡，是一讽刺，指的是包括伦敦剑桥学派（马歇尔）、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等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此学派之形成当以1947年冷战开始时，由共济会组织的瑞士朝圣山经济学会议为标志。^①

90年代初，我从实践经济政策的角度，抨击新自由主义自80年代后期即开始引导和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我与他们论争、抗衡了二十多年。目前他们虽然仍是“主流”，但由于近年国企改革中的大规模下岗以及私有化政策失败，特别是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及货币政策引导出了恶性通胀等严重后果；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现在有点臭了！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改革目标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

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以美国作为一种样板，因为据说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全球最发达最完善的市场经济。事实真是这样吗？

美国国债目前已突破15万亿美元，若再加计隐蔽性负债，据美国财政部承认，美国总的内外负债实际可能达到上百万亿美元。这笔巨款，是美国2010年GDP（16万亿美元左右）的5~6倍。

其实，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如果能得到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贷给资本流入，那么不管它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这个国家都会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

^① 朝圣山学社是共济会大师哈耶克（犹太人）发起成立的一个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学术团体，成立于1947年4月。新自由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市场制度。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该学社处在西方经济智囊团和意识形态活动的焦点位置。

但是，问题在于怎样偿还呢？美国人欠债有国家霸权和美元的强权做后盾，可以耍出种种赖债、讹诈的伎俩。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行吗？换成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如果背负这样的负债，早就宣告破产了。

所以，美国的豪富、挥霍、奢靡以至高新科技、强大国防，并非靠“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靠“效率”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强大与繁荣，是靠霸权下的金融欺诈和掠夺，是利用各种“庞氏”骗局向全世界集资敛财，圈来全世界的钱支撑起来的。

但是，美国这样庞大规模的负债经济，每年要支付的利息是天文数字。美国财政现在已经入不敷出，难以承受这种高额债务和利息，所以不断爆发金融危机，藉以逃债、赖债和缓债。

美国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所谓金融泡沫是什么？无非就是债务。美国支付不起利息，于是派索罗斯、巴菲特、高盛等金融投机大鳄到处去设套圈钱，包括利用汇率魔术赖债。美国的高额负债是当今国际关系不安定的总根源！

这样一种靠债务圈钱式的市场经济，难道是中国经济改革所要效法的先进样板吗？美国的这种债务式市场经济，中国能学？能玩吗？

我认为“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共济会经济术士输入中国的乱国之术！吸血之术！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在政策上祸国殃民！今日中国的种种乱象，皆与上述经济理念和改革目标的错误有关。

有人说我是“阴谋论”的代表。但是，纵览一部世界史，阴谋无所不在。不懂阴谋就不懂政治，不懂外交，就全然无知于世界历史。不懂阴谋，甚至也不会懂商业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

反对别人揭露阴谋，本身就是愚人脑封人口的一种阴谋。

四、美国购货，中国买单

美国巧妙地对中美经贸关系设局，利用中国人的善良和轻信，竟然使一种不用花钱的进口贸易，由神话而变成了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奇妙现实。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美国商人购买中国商品，购物的美元来自美联储；

——中国商人把货物供给美国，美元进入中国被中国银行收走；

——中国银行将人民币作为购物货款支付给中国出口商人（这就是买单费）；

——美国用销售长期国债以及房屋贷款、黑石投资等名义，从中国银行及相关机构（外储局以及中投公司等）手中，把中国得到的美元以长期借贷等方式，巧妙



地收回到美联储手中，并且可以肯定基本上无意再归还；

——结果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美国其实等于没有付钱，而一直是中国银行在为美国人做实际性的买单。

所以尽管美元大量超发，汇率不断贬值，但是美国自己却没有发生高通胀；而人民币尽管不断升值，但是中国目前却发生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近惊闻某著名主流经济学家说：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国际资源类商品涨价而自外输入的——叫做“输入型通胀”。那么很奇怪，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进口依赖比中国高得多，为什么没有像中国这样发生严重的通胀呢？难道他们有特别的秘方使本国经济不受这种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吗？

其实真正的答案很简单：中国物价上涨而美国物价基本不涨，因为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其实是接近白拿而不用付钱的。这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形成的一种奇特的市场交换关系。

本来这是极简单的常识：如果在生活现实中，你可以不断向一个商人借钱买他的商品，而你欠他的钱又基本不必归还——那么这些商品就等于是白送你的。

这样一种荒谬的交换模式，使得中国市场上钱（人民币）愈来愈多而商品愈来愈少，价格怎能不上涨呢？美国市场上，白来的商品愈来愈多，进口却都用白条（债券）支付——物价又怎么会上涨呢？

这后面难道没有一系列金融阴谋吗？

五、解散垄断企业会使中国工业倒退回工场手工业

主流经济学家近年大力鼓吹让国家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把竞争领域让利于民营资本和外资。鼓吹大型国企是垄断企业，应当尽早拆散。

一些年间，许多国企被解体、侵吞、私有化，致使千百万人下岗失业。这种改制，是违背传统的。

如果反垄断，首先最应反的是国际大资本的垄断，例如罗氏企业对制药业的垄断，孟山都企业对国际农产品（如大豆、玉米以至农药、种子）的垄断。

看看发达国家的那些大企业，看看当今所谓世界 500 强，哪一个不是本行业中的大型垄断企业？力拓、福特一类企业难道不是跨国的大型垄断企业？为什么美国经济鸚鵡们不主张拆散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全球性金融资本垄断组织，却大力鼓吹拆散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

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由分散的小私有制，走向银行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大型垄断组织的历史。没有垄断，就没有超额利润。正是垄断组织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

垄断组织早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中哪有什么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现代企业经济模式是伴随着垄断组织的发展而形成的。大型垄断组织通过收购、并购等方式兼并重组，这个过程本身就含有优胜劣汰的意义。

国际共济会的大老板如罗斯切尔德银行，就是一个在全球从事收购、并购的超级垄断性金融集团。

只有大型垄断企业才有实力维持短期内不盈利的科研部门，将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把科研成果逐步转化为生产力。

在中国，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基础，是六十年中国工业化的结晶和成果。现在一些共济会经济学家鼓吹要把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彻底分化、瓦解、解体。目的无非是让罗斯切尔德一类跨国金融集团进来并购。其用心险不可测！

在摧毁中国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后，最后中国企业只剩下那些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私有中小企业，中国产业对国际上那些跨国大垄断企业将完全失去竞争力。中国经济将倒退到三百年前的工场手工业水准，中国六十年的工业革命成果将在一夜间全盘丧失！

六、人民币持续升值是高通货膨胀的诱因

关于汇率升值问题，某些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特谈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因此应该“升值”。可悲的是，许多经济学人，却居然不知道“汇率”是“汇率”，“币值”是“币值”，这是两回事。

货币可以购物，但货币也可以买钱，即交换其他货币。汇率是什么？是币价。以币买币，其值曰“汇率”。币值是什么？是物价，以币购物，其价曰“币值”。

名义汇率可以人为地操纵使之升值和贬值。但是真实币值则反映货币总量（需求）与商品总量（供给）的比例，难以人为操纵其升降。因此，“汇率升值”不可与“货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国家和民众！

如果你投资购买一种股票，这支股连续六年一直升值——那就可以让你大赚一笔利润。同样道理，如果你用美元购买人民币，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升值，那么这也就是在给你赠送美元。因此，利用汇率升值做外汇期货可以直接套汇赚



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一种基本常识，而许多中国经济学人竟昧然无知于此。

由于中国的外汇管理和强制结汇制度，人民币汇率快速上升，势必大量吸引套利热钱的涌入。外汇占款人民币大量增发，银行日子虽然会好过，但通货膨胀则随之必然会发生。

七、内需主导在经济上是死路一条

近期以来，“内需主导论”甚嚣尘上。倡言此论者，首先完全无知于近代资本主义之发展历史及规律。

自15世纪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世界市场的开拓史。没有一个工业国，能依靠内需经济发展起来。

为什么必然如此？这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规律使然。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始终无法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能力之扩张程度，永远会快于国内资源供给能力和国内市场需求之发展程度。

因而，产业在发展中会周期性地遭遇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以及资金供给不足——遂必定会引发周期性发作之经济危机。

要解决这种经济危机，使得工业强国必须向外看——必须全力拓展世界市场，开拓新的资源来源和市场需求。因此一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唯有成为外向化的全球竞争型经济，方能持久而可持续地生存发展。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下，始终存在着一种两极化的体制：一极是金融资本及产业发达之主导型国家，另一极是依附于发达工业国之市场、资源供给型国家。后者依附经济强国作为其周边市场。

这类国家就是从属于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之“第三世界”。它们在取得政治独立前，原本是发达工业国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后，则仍因为无法摆脱经济生存之依附性，而成为非传统类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当今之拉美、菲律宾、非洲，以及依附欧盟之东欧诸国）。

中国今天之地位介于次发达国与第三世界之间。

总括某些海归学者所鼓吹之所谓“内需主导”方针的基本思路就是：

1. 限制出口，消耗外汇储备大进口——从而帮助发达国家开拓中国的内需市场。
2. 无限制印刷人民币，不在乎国内通货膨胀问题。以房地产经济作为产业龙头

扩振内需，不惜消耗一切国内资源于其上。

众所周知，中国之国情是人口过剩，国内资源近乎穷竭，农民贫困少货币——何来广阔之内需市场？

一旦出口产业能力萎缩，外汇耗光，那时中国就不再有能力购买外部能源及资源。要大量进口，就不能不大规模举债。中国将变成对外负债的纯进口国。

因为若不大量进口能源、资源及粮食、消费品，因内部民生压力巨大，国家势必陷入穷困、内乱之境。而这正是美国共济会经济术士对中国输出内需主导论的目的。

房地产经济也是内需主导论的产物。房地产过度开发，造成一些地区出现所谓“鬼城”，浪费了许多可以用来改善国计民生的大量资源。如果必须用内需拉动经济，本也应当以国防军工科技研发为主导。

内需主导方针，是最有助于从内部瓦解中国经济，帮助美国不战而胜的方针。

某海归学人有一句泄露天机的名言：“只有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才会是民主的政府。”“内需主导论”及“通货膨胀无害论，”终极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政府成为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

由此可见，这种“内需主导论”，不仅是画饼充饥的虚妄之论，而且是穷国之论、乱国之论！

八、以国家主义为本位还是接受本国经济的殖民化

在上世纪 80 ~ 90 年代，我提出过一系列策论和建议。我向国家所建言的是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强国之道——就是所谓“新国家主义”^①。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不属于左派。但我是务实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好国家主义者。

我所谓新国家主义，实际是研究了毛泽东和中共在 1940 ~ 1945 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主张。这种主张集中于毛泽东四十年代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新国家主义就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国家力量控制下的市场资本主义。

20 世纪 40 年代到 50 年代（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思想，明显地不同于 1957 年以后特别是 1966 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那时毛思想的核心内容正是新国家主义、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斯大林的集权社会主义）。

^①新国家主义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毛泽东 1945 年在中共七大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论述过“新三民主义”——新民族主义，新民主主义、新民生主义。所谓新民族主义，就是新国家主义的另一种称谓。“New Nationalism”。



可惜 1957 年后毛泽东的想法改变了。他要求大大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于是发动大跃进运动,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被““左倾””路线所支配的时代。

九、智能性计划市场经济是强国之路

近些年来,高盛、大摩等国际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领域畅行无忌,为所欲为,蚕食鲸吞!

2010 年 11 月 12 日的黑色星期五,若干家国内外金融大鳄于一个操作日卷走 5 千亿美元的股票市值。当今中国银行业及金融业几乎无秘密可言,中国金融市场被一些内外金融大鳄搅得昏天黑地!

在金融领域,我呼吁国家应及早建立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际共济会金融组织(主要是国际投行及风投基金)的监控。限制其对中国金融领域的渗透和操控,警惕其雇佣的鸚鵡经济学人对我国金融政策的舆论诱导和暗箱操控。

我呼吁强化对于进入中国攫金的国际金融大鳄的警惕和监管,逐步斩断已经伸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金融撒旦之手!

主流经济学一直在诋毁计划经济。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资源产业一直实施有计划地管理。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不向欧美发达国家的管理模式学习呢?

我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未来也应建立受控制、有计划的新型智能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放任内外资本大鳄横行无忌的无政府市场经济。

我主张重建国家计划委员会,运用大规模计算机的智能数据处理技术,全面统筹全国资金、财政及资源、市场和生产力,制订科学有序的全局性远期性国家发展计划。

我主张重点产业有必要“国进私退”——以国家重大目标为主导,有计划、有战略地优先发展国防、高新科技及基础资源产业。这些部门绝对不应当放任其私有化、市场化以至被外资控制。

我反对一切放任市场,反对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反对银行脱离国家监督的独立化、商业化和金融私有化。反对把一切产业和事业推向市场,特别反对把教育、医疗和科学技术全部交付自由市场。

反对唯利是图——一切以赢利、牟利、拜金及利润为主导,反对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反对让外来金融资本主导中国的国民经济,使中国沦为依附于跨国金融资本的新殖民地经济。

在社会财富上，我主张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经济、遏制私家富豪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霸占和垄断。我反对横行无忌、富可敌国的世袭权门经济和豪门经济。我主张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废止目前对外资、外企的特殊优惠政策。



在巴黎某政治沙龙（1999）

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
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经实践证

明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未来应当革除其弊端。在财政上我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全国一盘棋，削肥补瘦，统筹安排。反对听任地方坐大，各地分灶吃饭，以至苦乐不均——有些地区民穷财匮，百姓衣不蔽体；而有些城市里仅栽花种草年耗数十亿。我认为国家主导的统一宏观财政及金融调控计划是不可或缺的！

在社会分配上，国家应当实施第二次分配，以国家权力之手实施社会资源控制和公共产品的有计划配置。由国家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

十、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复兴农村

最近媒体报导：一端是京沪等大城市菜价飞涨，市民抱怨，商品短缺。另一端是生产过剩（不是所谓“产能过剩”），农民种的菜卖不出去，以至菜烂在地里。

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是由于当前中国实施的是放任不管的原始市场经济，是那种最恶劣的原始无政府市场经济。

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不仅有国家补贴农业的政策，而且有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农业服务组织。协调农产品产销，形成了农产品有计划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市场一体化模式。这种模式，日本、以色列有，甚至台湾地区都有。美国更有农场主的合作保护联盟。只有中国对农业和农民完全放任自流，而让农民和农业完全靠天吃饭，听天由命。

中国现在的农业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高度依赖能源及化肥、农药，电力抽灌，成为“石油”农业。二是农业组织解体，农村倒退为分散原始的小自耕农经济。上世纪90年代后的新农民子女已多数不会种田。新中国建国以后构建的国家水利排



灌系统被割裂和瓦解，致使连年水旱，灾荒频发。

中国人近年正在遭受来自美国的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的隐性毒害。讲一句危言耸听的话：由于转基因食品的主粮化，未来华夏民族的确有发生人种畸变，甚至绝代、灭种和亡种族的危险！

如果哪一天，世界形势万一突然有变，海外对华石油供应出现问题，或者中国外汇来源匮乏了，那么中国现在的农业，还能养活十多亿中国人么？！

当今农者弃业，粮有近忧！若今后几年再因沿海出口经济衰退而卷起一个返乡农民的大失业潮，天下岂能得安宁乎？！

重建农业的经济合作组织，把农村和农民通过市场体系重新组织起来，这是未来农村振兴的切实道路。

十一、削藩与治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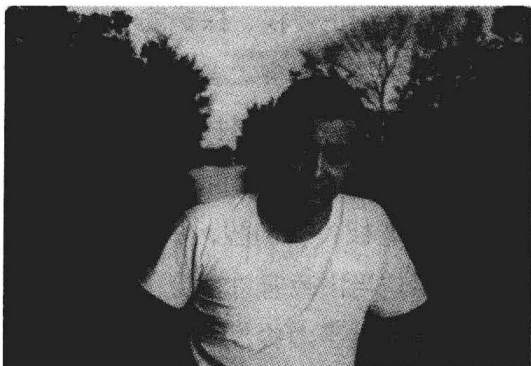
从中国历史看，基层官吏与百姓的激烈冲突，往往是引发社会动乱的直接导火索。我认为当前的民主改革应首先从整顿吏治着手。从严治“吏”。对基层“胥吏”实行察举巡视，从严约束地方官员。特别严控地、县、乡三级胥吏，不允许其横行于下层，鱼肉百姓。

国家应当制定严格制度，废除公务员的终身制以及变相的世袭制度。“吏政”坏于制度。一种好的“吏制”应当是择优选拔，让能力、操行、品德、民望较好的官员得到提拔。要保证下情通畅，民意上达，要让百姓舒心通气地过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层恶吏肆意欺侮、蹂躏。

目前的问题是国家对中下层地方官吏缺乏直接制衡和监控的机制，中央权力管不到他们。那些地方官吏除了直属的顶头上司，根本不在乎什么中央。对中央的法规政策，不仅经常阳奉阴违，甚至敢于公然抗命。

于是地方坐大，出现了一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有些地方官吏为所欲为，横行无忌——今天想阅兵就阅兵，明天想游街就游街，后天想进京抓人就进京抓人。

对下面这些地方官吏无所制约，必然导致官民矛盾激化，民情激愤。中央有令不行，



在古巴游沼泽地

有禁不止。这是近年社会不安定群体事件频发的乱象之根源，亟须改革、整顿和治理。

中国历史情况正好相反。唐宋以下，虽然是皇权至上，皇帝专制，上层高度不民主，但越到下面的社会基层，对中下级别官员的监查、管束和控制反而越严格。绝对不允许基层官员知情不报，越位横行。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这是因为唐宋以后的统治者总结了历史经验，懂得如果放任地方官吏胡来，最容易激起民怨直接引发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

十二、法治不等于法制

自由派高呼要法治，却似乎不懂得所谓“法治”并不是什么现代概念——法治无非是据法而治，酷法而治，这是古代法家的主张。

法治不同于“法制”。法治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行政问题。法制问题，则是制度问题，以法律制度制约行政的问题。所以法制是一个近代的法学概念，也就是所谓“程序正义”。其根本意义是宪法体现主权，宪法作为总法约束其他一切实定法。宪法精神制约国家的全部法规制度和政策，违宪就是叛国。在宪法制度面前一切人平等。这是近代和现代的法制理念。

公民民主应通过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得到保障。各级法院对维护国家法制有重大责任。司法有责任依法受理一切违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案件，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检查及司法系统应当相对独立于地方行政而垂直隶属于中央，这样司法系统才可能成为中央政府依法监控地方的一种重要法律工具。

法院不应当设定诸多禁区，不应该这不予受理，那不予受理，使得升斗小民受土豪、豪强包括官僚欺侮后无门投告，有法难伸冤。这必然酝酿社会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纠正侵权、保护弱者。

民若举，法必究。各级法院有责任受理审理涉及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的一切社会案件——不管是民诉还是公诉，告官员还是告老板，只要有违法事情就应当允许百姓进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级上诉，直诉到最高法院。

例如老板欠薪问题，根本不应当是一个行政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这事情不应当由政府总理管，而应当由人民法院管！

法院直辖于中央，中央就可解通过法律系统纠察，解决地方违法问题。

扩大法院的职权，就可以减少信访的问题，从而让有裁决权的法院，取代无任



何实权的信访部门。法院权责加大，信访自然减少。

二十年前一位领导约我谈话时谈到反腐败问题，当时中国官场腐败并不严重。我认为不应使反腐成为政治斗争重点。但我也建议，民若举，官必究。而现在的腐败，已成痼疾。即使上网揭贴举报，天下皆知，也常常无人管，不被追究。不仅不究，而且层层回护，官官相护，致使腐败蔓延。规模越来越大，再不管，任其发展，必亡天下！

我反对中国学西方的伪“民主”政治模式，但我主张好政治需要民主——人民有对社会事务评论和批评的权利（言论有自由），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对社会管理者的选择权，特别是对贪官污吏的弹劾、罢免之权。

十三、中国须制订全球化的地缘战略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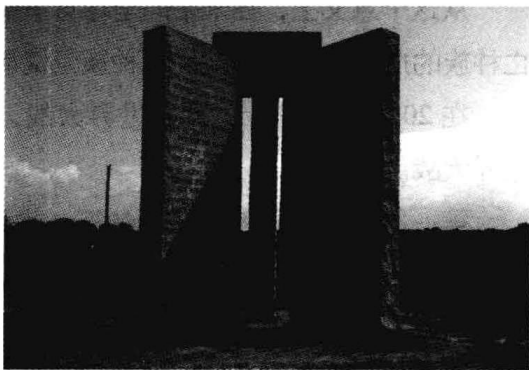
在国际问题上，我多年所主张的是以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全球战略思想。20世纪90年代初，我已经认识到——解决中国资源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谋求向外发展。而令美国人、西方人所最恐惧的也正是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内部的所有问题和压力，只有全力推进向外发展的路线，才有希望解决。

为此中国必须形成有全球视野的新战略。

如果一国的外交变成一种总是屈服于外部压力的媚外外交，这是耻辱。一个大国的外交不应无远见、无目标、无方向，更不应无智慧，无勇气，无感情，无信用，无义气，无担当。外交部门不该只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维持会。

一味事大，媚强，贪财，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可交朋友；国际关系中，这样的国家，谁会理睬你？结果是，在国际上寡恩无友，丢弃了许多老朋友和第三世界。

为中华民族的久远生存，中国必须有勇气正视和面对日益紧迫的内外危机。摆脱事美外交的思路，走独立自主的全球路线。加快建立有威慑力的核防御和对抗体系——这是遏制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决定性条件。在国际上，中国应当交些穷朋友。应当审时度势，制订有远见的新亚非拉战



共济会立的一座巨石碑耸立在美国乔治亚州埃尔伯特县一座荒丘上。（地理位置：纬度：34°13'55.74"，经度：82°53'39.54"西。）四块巨石有八个正面，分别铭刻八种文字：英文、俄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印度文、中文、西班牙文、斯瓦西里文。碑文内容（中文）是：把地球人口控制在五亿以下。

略。当前非洲是一个空白。经营非洲，在非洲租地屯田，移民开拓，收购资源，发展农业，是可取的选择。

十四、新世界性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

我的观察和预感是：21世纪的前三十年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人类当前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全球性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愈来愈紧迫。每个国家都无法长期自我隔绝，置身事外。

新中国建立时，1950年，地球上只有20多亿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世界上30多亿人。2000年世界已近60亿人，今年将接近70亿人。目前全球每年增长1亿多人，到2050年前后，地球人口预计将突破90—100亿人。

空气、水、能源、土地——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目前都已经接近人类消费的极限。西方未来学的研究表明，地球资源最大承载极限是100亿人左右，地球上无法承载超过100亿而且继续不断递增的人口。

但是，中国精英阶层对人类前途与日益逼近的生存危机茫昧无知，不思应对。他们天真地以为，历史始终是线性发展的——明天、后天仍会是今天状态与结构的延续。他们不懂什么是“突变”或“灾变”。但西方的精英则早已预察到人类终极危机的迫近，并且早已在筹谋并且操作着应对和自救之策。

冷战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要义是鼓吹由西方列强对人类文明进行重塑。而文明冲突的实质也是种族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失败的民族和国家，将面临亡国、亡文化、亡种族的危险！会成为被优势种族无情屠灭的“垃圾人种”！

在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一次世界性的冷战争，实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题，是第一代工业国为划分世界势力范围而战。第二次大战仍继续一战的主题，但在欧洲战场上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主题——净化种族，于是导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种族大清洗——消灭犹太人。

二战后，发生了冷战。自由派精英不懂“冷战”的真实历史涵义，以为那只是美苏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上，这只是表象。冷战的实质是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冷战的失败者不仅是苏联，也是所有的不发达国家。



如果核防御和对抗体系的平衡被打破，那么未来 30 年间必定会爆发新的全球性战争——新的次世界大战。近年美国导弹防御技术的最新发展，打破了冷战时代的互相毁灭平衡结构，使得单方面的核打击正在成为可能。因此，未来发生全球核战的危险日益上升。

2005 年伦敦共济会所讨论的“盎格鲁·萨克逊计划”^①已经设计了一套对地球上有色人种进行清洗的战争方案。这个文件，是 1995 年彼德伯格俱乐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精神的扩展。^②国际共济会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共济会国家统治下的“千年帝国”——建立所谓“世界新秩序”。其前提是要减少地球上的垃圾人类，对之进行清除和隔离。有色人种将是西方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进行种族清洗的主要对象。

美国对华战略的近期目标是遏制中国，把中国龙困锁在国内。远期目标是期待中国内乱，自我爆破而分裂。如果中国将来发生大型内乱。美国在谋求分裂中国的同时，近年也在挑动中印之战，南海之战，以至中俄之战——让对手打垮对手。

结语

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变革之中。1944 年的中共“七大”纲领中提出了这样的建国理想——“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使中国摆脱百年战乱和半殖民地地位，实现了独立与统一。30 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初步的繁荣富强。

但是由于改革方向的迷失，今天的中国问题丛生。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与世界未来面临巨大变局，处在大变动的前夜。中国今天处在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我四十余年来的全部思考和著述活动，所追求的始终就是一个目标——追求中国的强盛，憧憬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现在讲的许多话说在当前，仍然是逆多数而反潮流。

展望前景，许多因素不容乐观，但是总要抱有希望。尽管问题远远多于答案，但我们寄希望于未来！

^①关于该计划，可参看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第 200 号”，收入何新著《统治世界》，中国图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②同上。

【附录】

美国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

[按语：何新认为，美国有一个解决世界问题的时间表，次序是：

(一) 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二) 朝鲜、中国；(三) 俄罗斯。

何新先生的这篇采访发表于2002年3月20日《香港商报》。

问：何新先生，您曾说，您认为美国似乎有一个解决全球问题的时间表？

答：对。

问：您的看法是什么？

答：我认为美国当前针对阿富汗以及即将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只是美国意图重新安排世界的时间表上的第一步。

问：第二步呢？

答：世人皆知，美国、英国高度重视伊斯兰地区，是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考虑的，特别与石油政治有关。而后其打击目标将转向东亚的儒教地区，首先是朝鲜以及中国。美国之所以特别关注朝鲜问题，实际与其关注台湾问题一样，因为它们是指向中国的战略前沿区域。

问：但布什总统在公开谈话中一直认为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答：这只是外交辞令。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总统在“9·11”后明确说过：凡不是美国朋友者都是敌人。我认为美国对华既有一个短期的安抚政策，还有一个长期不变的根本性战略目标：这就是必须遏制中国走向强大。克林顿任总统时采取的办法是实施接触性遏制，即软遏制。而布什总统时代的政策则似乎更倾向于硬遏制，即武力遏制。

问：在中国之后呢？

答：然后会轮到俄罗斯。我认为美国对俄罗斯联邦未来的战略长期目标是早已胸有成竹的，这就是：孤立它，隔绝它，弱化它，拆解它，最终必须粉碎它。无论俄联邦对美国实行什么政策，这一目标都要达到。但在时间表上，解决俄罗斯问题则是排在中国问题之后。

问：解决这些国家之后，天下会太平吗？

答：如果上述目标顺利达到，那么美国其后的矛头会转向修理那几个对它一直怀有异心的不稳定盟国，法国、德国以及日本。



问：难道美国以后不要盟国了吗？

答：美国心目中真正的铁杆盟国只有两个——英国和以色列。其他所谓盟国，都只不过是仆从或暂时加以利用的工具。请注意布什总统当今所确定的关于美国敌人的定义：“任何持有或谋求对美国具有威胁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都是敌人。”这个定义的潜台词是：只有美国有权拥有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他任何已拥有或谋求拥有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不论是现在的敌人，潜在的对手或目前的盟国，都是对美国有潜在威胁力的国家。看来，美国未来准备对全世界实施秦始皇的政策。

问：秦始皇？

答：公元前 221 年，中国的秦始皇下令销毁民间的所有兵器以及可用以制造兵器的金属。其实秦始皇也是反恐怖主义的一位旗手。为防止恐怖主义袭击（如荆轲刺秦以及博浪椎一类），秦始皇在结束对六国的战争之后，立即将“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鼎”并铸成“金人十二”。

问：你所描绘的似乎是一幅十分令人惊怖的未来景象。那么你认为未来真的有发生核战争的可能吗？

答：我在 1991 年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交谈时，已设想在 21 世纪可能发生“核游击战”。最近几年我多次警告人们，当今世界愈来愈逼近走向核战争。不久前，美国披露了国防部的秘密核打击报告。这在全球已成为热点话题，但对我来说不是新闻。3 月 13 日，布什总统在白宫新闻会上，又宣布美国将实施新的核战争政策。他明确地宣示：对任何国家，包括无核国家，进行核攻击是“美国必要的选择之一”。虽然鲍威尔后来又否认这一点，但这只是反映了美国统治层内部的一种战术性争论。而从美国近年采取的全面整军备战政策看，在美国所认为必要的时间和地点对任何对手发动突发性核袭击，已绝非一种不可设想的神话。

问：你认为，美国准备核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统治全球吗？

答：不。我认为美国与 19 世纪的古典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它并不想统治现在这样一个地球。如果根据 1995 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全球精英会议的精神，美国理想中的明日世界，是一个只有现在地球人口 20% 的世界。

1/5 “精英”对 4/5 “无赖”的战争？

问：上次您曾谈到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这次会议似乎未在媒体上见诸报道？

答：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但至今在媒体很少见诸评论。原因是它是高度保密的。据说，只有 3 名特选的媒体记者被允许旁听旧金山会议所有工作小组的讨论，所以一般传媒似乎都不了解关于此会的内情。

问：请您谈谈您所知道的情况。

答：1995年9月27日至10月1日由美国出资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邀集当今世界的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界领袖和科学家，其中包括乔治·布什（当时他还不是美国总统）、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布热津斯基以及索罗兹、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大名鼎鼎的全球热点人物，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举行高层圆桌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引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问题。这个会议认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业已到来。这个时代将是非工业文明的时代。工业时代与它的大规模福利（社会保障）制度一起，已成为经济史的短暂瞬间即将不复存在（奈斯比特语），欧洲模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已经过时。

问：关于后工业时代这个话题，人们早些年已不断地从传媒中听到过。

答：是的。但如果没有认真研究过关于旧金山这次会议的精神，你是绝不会理解所谓“崭新的文明”、“后工业时代”等语词的真正涵义的。

问：请问这个会议对此是如何解释的？

答：旧金山会议的与会者把未来简化“20比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的新概念。

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据与会者透露，到会的全球精英们认为，在21世纪，仅启用全球人口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因为目前全世界的价值，主要部分仅是由地球人类中的1/5所生产。换句话说，其余的80%或4/5地球人口，都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人类废物。“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因此他们认为，地球上“只有20%的人有权积极地参与生活、挣钱和消费（此外再加上1%或2%的丰厚遗产继承人）。”（以上均引自该会纪要，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汉斯·马丁·彼得先生提供。）

问：那么其余的人呢？

答：参与这个会议的精英们似乎认为，人类中多余的80%人口属于垃圾人口，对于仅占20%的有价值人口，它们是巨大的麻烦，同时会制造极大的安全问题。这些垃圾人口多数分布在目前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中的这些垃圾人口成为产生“无赖国家”的根源。一旦这些“无赖国家”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会成为反对地球精英的“邪恶轴心”。

问：那么如何解决呢？

答：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方案。一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穷困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这就是所谓“喂奶”（entertainment&tits）的路线。布热津斯基说，“未来人类社会是1/5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须让其余4/5的废料人口被排挤出局并依靠喂奶过日子”。



问：如果其余 80% 人不愿接受这个方案，或者如果说，1/5 的精英已不愿意再对那无用的 4/5 人渣实施喂奶呢？

答：那么就产生另一个方案，就是逐步设法用“高技术”手段消灭他们。被特准参加此会的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汉斯·彼得·马丁这样描述这个会议，说它对未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是：你将成为地球之宴的就餐者还是将成为食剩的垃圾？

问：太可怕了。这难道是真的吗？

答：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政策，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是如何看待现实和未来的。因为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两点：一是应对现实中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引领和塑造现实使之达到所期待的的未来目标。在后一意义上，远期政策实际就是导向未来的国家战略。这次旧金山会议之所以极其重要，其根本意义即在于此。

问：近年人们常谈所谓“后现代”、“后工业文明”、“全球化”，但似乎没有人考虑你所阐述的这一层意义。

答：近二百年以来，英美的统治精英一直深受三种社会哲学的影响。一是马尔萨斯主义，认为地球资源和环境无法承载隔代而倍增的人口。二是应用于人类的达尔文主义，主张大自然的天律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三是尼采鼓吹“超人”对“群畜”人渣宣战的精英主义。

所以出席这个会议的精英认为，当今地球所负载的无用而劣质的人口垃圾是太多了。当代所面临的全球环境以及不可再生资源问题，使人口危机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必须用战争和瘟疫（生物武器）来消灭他们（新马尔萨斯主义）。由于现代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仅由 20% 的优秀人口和优秀文明（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代表）所创造。所以必须设法消灭和淘汰那些无能力创造新价值的“群畜”（新尼采主义）。

人们应当注意到，在客观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干净”核子技术，遗传基因武器技术以及生物武器技术已经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高科技手段。也就是说，现在已可以使用较“人道”的方式（而不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焚尸炉），非血腥地、大规模地消灭劣质人口和文明。必须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才会真正理解美国何以对任何其他国家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此敏感，同时自己则大规模地加速研制发展这一类新式武器。

尼采说：就我的本性来说，我是好战的！攻击，这就是我的本能。与人为敌，这是我的天性。（参看商务版尼采《权力意志》第 18 页）

布什总统上台以来，对世界不断提出尖锐刺耳的挑战。有人称之为“单极主义”，有人称之为“牛仔斗士”。其实都不确切——布什主义就是尼采主义。

问：尼采哲学近年在国内也很流行。

答：我们国内一些精英总是很乐于对国外流行的东西像鹦鹉一样学舌。但仅仅

是作为鸚鵡，因为鸚鵡并不理解它所叙述的那些语句的真实意义。

“让超人降生，消灭这些群畜！”“铲除衰退的种族！”是尼采在 1889 年写作的《权力意志》中发出的呼唤。我设想，这个淘汰劣质种族和人口的武力和文化的复合进程，也许会在 21 世纪即本世纪之内成为人类最终所将面临的一种严峻生存现实。

何新说：阿弥陀佛！但愿我的以上这些预言仅仅只是何新胡思乱想出的一种纸上怪论。

（补注：据悉：1995 年的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就是这一年国际共济会、彼得伯格俱乐部的秘密高峰会议。关于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的资料，来源于德国《明镜》周刊的汉斯·佩特·马丁（Hans-Peter Martin）。我查了德文资料，汉斯·佩特·马丁（Hans-Peter Martin）博士出生于奥地利，自 1986 年起就任德国《明镜》周刊编辑，还曾是驻南非记者。他与哈阿尔德·舒曼（Harald Schumann）合著《全球化陷阱》一书。该书出版一年内即被译为 22 种语言，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该书也有中译本，且在网就可以查到并免费下载。下载地址：<http://read.shu.lu.net/zzjj/qqxj/qqxj.htm>）

朝圣山学社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80 ~ 90 年代风靡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neo-liberalism）深刻影响了 80 年代后期的中国经济改革思想。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也由此而出。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究竟是从何而来？原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制作具有直接的金融共济会背景——来自 1947 年由美国共济会和英国共济会出资组织的一个会议以及一个会社——朝圣山学社。朝圣山学社的发起、出资、成立和命名都与共济会、光明会及属下的人文基金会直接紧密相关。

朝圣山学社于 1947 年 4 月 10 日创立，首任会长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是由西方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其他古典自由主义支持者组成的国际性组织。该组织长期严守秘密，冷战胜利后，近年才逐渐有所曝光，但活动仍然很低调。该会精英荟萃，始终以向全球输出和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为宗旨，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主要起源地。

朝圣山学社是共济会委托共济会、光明会成员哈耶克发起成立的学术团体，其资金由共济会属下的福特基金会捐赠。

犹太人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30 年代迁居英国加入英国籍。哈耶克在 1920 年代



在美国读书时加入光照会（共济会内的核心秘密组织）。会议于1947年4月在瑞士的共济会圣地朝圣山举行，此山在中世纪是著名的圣殿骑士团的驻蹕地。

创立之初，该组织试图标榜学术性而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社。后因共济会大师法兰克·奈特对使用两个“罗马天主教贵族”的名字来命名学社表示不满。哈耶克的教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要哈耶克改用一個明显具有共济会色彩的宗教性名称——朝圣山学社。

表面上作为一个学术团体，此学社成立后即成为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设计者，处在西方经济智囊团和意识形态活动的焦点位置。

朝圣山学社的目标是致力于“促进致力于加强自由社会的原则和实践，研究市场经济体的运作以及优缺点的志趣相投的学者们的交流”。学社约定此后每年9月持续有规律的集会。现任会长为迪帕克·拉尔。

创会时到会学者39位，大部分为经济学家，亦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引人注目的是还有一批企业家和王室贵族。会上主要讨论冷战和铁幕下的时局，古典自由主义的命运，以及如何应对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挑战。

创会时被邀请者（全部是共济会成员）包括：亨利·西蒙（后成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导师），美籍前费边社成员著名媒体人沃尔特·李普曼，维也纳亚里士多德学会会长卡尔·波普尔，奥地利学派祖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约翰·克拉彭爵士（英格兰银行高级官员，1940—6年担任英国皇家协会主席），奥托·冯·哈布斯堡—哈布斯堡家族末代皇储，马克斯·冯·图勒恩和塔克西—有着400年历史的图勒恩和塔克西家族的巴伐利亚分支的领袖。

历代朝圣山学社社员中有很多人身居要职。其中包括：西德总理路德维格·艾哈德、意大利总统鲁伊奇·伊诺第、美国联储历任主席亚瑟·伯恩斯、格林斯潘等，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英国外交部长杰弗里·豪、意大利国防部长安东尼奥·马提诺、智利财政部长卡洛斯·卡瑟斯、新西兰财政部长鲁斯·理察森和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

八位学社社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迪格勒、莫里斯·阿莱斯、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和弗农·史密斯。罗纳德·里根1980年竞选顾问团的76位经济顾问有22位是朝圣山学社社员。

论国家复兴的战略与谋略

北京“世界大趋势”学术会议的讲稿^①

(2011年2月27日)

前言

谢谢主持者的邀请。但是对不起，我心脏不好，不能激动。开会讲话就容易激动，身体受不了。所以不能出席会议。但我愿意提供以下一个书面发言，可以请主持人代我念一下。

我的看法一向是属于异类的。这里我还是想讲点务实之略，讲点不太和谐的异论。主要针对当前国内外一些现实问题，借你们这个场合谈点纯属个人性的看法。

下面所谈的，也可能全部都是谬论。那么也请包涵，仅供各位参考，思考，批判。

这个讲话分成两部分，一是关于经济金融战争的战略观察问题；二是关于中国的全球战略国际关系博弈的观察问题。

上篇 关于经济金融战争的战略和谋略问题

一、战略研究关乎国之大政

这个会是探讨发展战略的。“战略”这个词现在是时髦词，到处用。

但究竟什么是战略？战略之“战”并不是指狭义的战争，实际是虚拟战争。

所谓“战”，是指一种博弈或者对抗。战争也是对抗，但对抗不见得是战争。下棋，博弈也是一种对抗。对抗有硬战争，也有软战争。至于什么是“略”？“略”这个字的本义，田野之路曰“略”。引申之义，战略之略，就是理路，谋略。

^① 此次会议由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会等单位举办，2011年2月27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何新未出席，提供了此篇书面发言。



战略制订总是要在先，要未雨绸缪，制订在对战未发生之前。作为面对未来的设想、模型、策划，为指导未来战争或对抗的大思路或总理路，就叫“战略”。所以战略学实际是未来之学。

好的战略应制订于对抗、博弈发生前，包涵了预设和预测。这种预设和预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前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可以用类比逻辑的方法建模预测。

好的棋手必熟知棋谱。棋谱就是前人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太阳之下并无新事。熟知棋谱，临盘就无所谓新局或变局。因此好棋手总能应付裕如。那么在博弈或对抗中就不会临阵无措而仓卒应变。临阵被动的应变之术只是战术，是被动之策。而战略设计则有选择空间，有发展空间，有预留空间，所以是主动之道。

有战略，才有指导战争的总方略。一个完整、系统的战略模型至少应包括四部分：

(1) 总体目标，即战略目标（所谓目标，就是到底想要什么）。

(2) 总体理路，即战略的总指导方针。

(3) 实施方法。所谓方法就是谋略。

(4) 应变之略，应当估计到种种阻力、挫折，评估失败的后果，并且准备出应对的预案。

对于第四点特别要说两句。作战略的预设和预测，必须包括正和反两面，不仅考虑向好发展的一种可能，也须考虑局势不利发展的另一种可能，都要有估计，有预测，早有因应之道。不能总是一厢情愿，认为将来一定会比现在好。这就像开车一样，如果事先预计到道路前途坎坷，有翻车的可能，有因应之道，那反而翻不了车。

谋略就是方法。谋略中包括阳谋与阴谋两方面。公开的，可示于人的是阳谋；隐蔽而不可示人的，是阴谋。研究战略，不能不研究阴谋。阴谋含有诡谲性，权变性，狡诈性。政治家不可不懂阴谋。不懂谋略就不懂政治，不懂阴谋就不懂历史。凯撒大帝如果预先想到布鲁图斯、西塞罗会对他搞阴谋，这个大英雄哪会那么悲惨地曝尸在罗马元老院？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一部政治斗争史就是谋略与阴谋相“PK”的历史。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的题首语。常道者，阳谋也；非常道者，阴谋也。所谓计谋、权谋、阳谋、阴谋，一切谋略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设计的方法。一切谋略的根本目标就是保存自己，克胜对手，消灭敌人，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

（数学上的博弈论或对策论，就是战略及谋略对抗的数学模型。）

立足于可信的预测，才会形成各种配套的应变之略。在应付实战的复杂局面时，才能临变不惊，处变不惊，应付裕如，稳操胜算。所以战略学，就是《孙子兵法》第一章所谓“庙算”。

庙算这个“庙”字本来是指宗社、社庙。《左传》说：“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古人认为，国家最大之事，一是宗教祭祀，一是国防与战争。都要放在神圣之所，放在庙堂之上进行。在庙堂中讨论战略，这就是所谓“庙算”。

后来民间把“庙”这个字俗化了，变成了所谓“神机妙算”。

《孙子兵法》写于2000年前。它的重心是研究战略斗争——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伐兵者，下之下也”。谋就是战略，交就是国际关系。一部《孙子兵法》不是求战之书，而是避战之书。“兵者，凶道，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是中国古人制订的关于战略学的伟大古代兵法，而且至今还不过时。

二、美国用金融战略胜中国于无形

《孙子兵法》认为，庙算胜是谓上胜。临敌而战胜之则在其下。这话的意思是：战略的至高境界，不是临敌击破之。战而破敌，不是上算之胜。而制敌于无形，胜敌于无形，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所谓神机妙算，才是兵法的至高之境，用兵的至圣之境。

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可能吗？让我来举一个发生在眼前的实例。

大家知道，美国现在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

美国每年买走中国的大量商品，付给中国许多美元。但结果呢？美国把这些美元巧妙地几乎都拿回去了。

美国巧妙地利用中国的强制结汇制度——我国这个制度本来是为了保护外汇储备资源而建立的。按这个制度，美国买中国货，付给中国商家美元。但这美元商家拿不到，被银行截下来，聚集起来，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银行按汇率再把人民币支付给中国的出口商家。

也就是说，中国商家卖给美国的货是由中国的银行用人民币替美国人买了单。而美国人把外汇美元交给了中国的银行，变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但后面发生的事就比较有意思了。美国把中国人所赚到的这些美元变着法儿地大部分都“借”回去了。所以美国人买中国商品实际等于并没有付钱——虽然名义



上欠了中国许多债，但实际上等于并没有花钱。

那么这些债又是怎么借的呢？

第一是美国让中国买它的大量国债；第二是派人游说，说美国政府做了担保，要为美国人盖房子筹款，向中国借美元当房贷。

总之，美国巧妙地用借债的方法，把它买中国商品支付给中国的美元中的相当一大部分拿回去了。

然后美国就制造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大叫要“救市”。先是让它的美元贬值，同时又压迫人民币升值——其实这两者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总之，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使美国欠中国的债务在名义上虽然不变，但在实体货币内涵上却大大地缩水。因为美国欠中国的债都是用美元结算，当美元贬值或人民币升值，则这些债券内涵的人民币当量也自然要大幅度缩减。并且，这绝不是某些人所说仅为账面上的虚拟缩减，而是可以在国际货币离岸市场上直接兑现的实体货币缩减。

再就是美国让那两家借了中国大量钱的美国房地产公司破产。这样就把它欠中国的巨额房债变成两家破产公司的呆账和烂账。虽然账还挂在那里——中国外汇局说帐面并没有损失，而且过去还有利息收到。其实呢？问题很大！因为这笔债究竟将来怎么还？什么时候还？还能不能还？都是大有悬念的，也是大有玄机的！

那么美国从中国拿走的那些商品，价值上万亿美金的商品，就通过这种巧妙地赖账之术，几乎变成了中国白送的。空手套白狼，因为美国实际是并没有花钱！因为它付给中国的美元已经作为“国债”或“房贷”拿回手里了！

表面看起来，这一切都是由于 2008 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偶发性事件！但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这其实从开始就是一个“局”呢？如果这是美国金融学家精心设计的一种巧妙高明的金融博弈呢？

那么实际上究竟是不是呢？有很多迹象、很多证据表明确实是。例如各位可以读一读美国富豪希夫（Peter Schiff，希夫家族是美国共济会的核心家族之一，是华尔街的创始家族之一）2009 年 4 月在美国金融家高级俱乐部的演讲（网上有英文视频）。希夫明确地说美国不会把欠的钱还给中国人。

大家看，现在尽管国际市场上金价、银价、铜价、铁价，以及石油、粮食价格都在大涨，美国又加印了那么多新票子，但美国本身市场上却是波澜不惊，几乎没

有发生什么通货膨胀。

为什么别的国家物价都在大涨，以至有的地方甚至政局变乱，而美国却能够风平浪静？因为美国事先早有种种避险的安排！因为支付给中国的大量美元货币已经回笼了！因为它拿走的中国许多商品是不用付钱的！

那么，这是不是一种金融谋略的巧妙胜算呢？

无论你愿意承认还是不愿意承认，这都可以看做当代国际金融博弈中利用对手的失智而制对手于无形，胜对手于无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个经典范例。

三、发生通货膨胀的四个原因

中国为什么要把巨大的外汇储备借给美国？因为中国挣到了许多美元花不出去，拿在手里又烫手，所以才借钱给美国。其实这也可能是美国精心设计的一种谋略。

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中国想买的东西。但美国制造了重重关卡，就是让中国买不到想买的东西，比如有助于提高中国竞争力的东西，比如高科技产品。美国只是以高利息为诱饵诱导中国人大量地买它的债券。

现在的局面是欠钱的美国人很主动，借给美国钱的中国人却很被动。中国现在要追着美国，求人家承诺——保证我们借出去的钱仍然是安全的。美国政府每次给予了承诺，我们居然还要感谢它！这是个笑话！

外汇局现在仍在说，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有误判和失误。但是它承认，现在中国国内用外汇兑付的人民币过多，数量高达 20 万亿人民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大，所以中国当前发生了通货膨胀。

中国当前的通胀局面是严重的。其实两年前我多次讲过中国应警惕未来可能爆发严重通胀，讲过人民币连年升值后果必是严重通货膨胀！但是当时中国经济热火朝天，所以没人相信。^①去年下半年一些主流经济学人还在讲中国不会发生通胀，现在也不能不承认通胀已经发生了。那么，发生严重通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最近有说法认为：中国发生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外贸顺差过大。但是，外贸连年都有顺差，已经十几年了。而物价从 1995 ~ 2007 年的十几年间基本是稳定的。物

^①见何新著《汇率风暴——中美货币战争内幕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 年出版，以及《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2008 年出版。



价大幅跃升只是这两年以来的事，把通胀主要归因于贸易顺差讲得通吗？

当前中国发生通胀的原因实际来自以下的四个方面：

1. 与前面讲的外汇储备资源流失有关。外汇占款人民币竟达 20 万亿，大量商品外流。外贸不是什么顺差问题，而是等于白白送人家了。

债券不等于美元。本来有流动性的外储美元，变成大量的美债后就被锁定了，在相当时期内，这些钱失去流动性，也就是被套住了。

理论上中国可以把部分美债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变现。但由于中国手里持有的债券数量太大，若大额抛售变现，必将引起全球金融体系的震动，会促成美元新一轮的贬值，以至触发新的金融危机。由此还会导致中美两国的政治危机。

所以，实际上中国手里持有的多数美债是难以兑现的，大部分是被锁定、套死了，数量愈大，流动性愈差。

2. 自从 2007 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国内为扩大内需保增长率，投资力度加大，致使货币发行量过大。中央投入 4 万亿，地方自筹据说高达 10 ~ 12 万亿。这十几万亿的货币在两三年间投入市场，这是造成通胀的第二原因。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负债严重，如传闻广州政府亚运会负债 2000 亿，铁道部高铁负债 1.3 万亿。如果这一类内债遭遇还债高峰，致使银行不得不加印新票子，那么国内的通胀局面还会进一步加剧。

3. 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与近年农业问题有关。各地片面强调加速城市化，大搞房地产经济，致使许多农地转入房地产开发，农民不种菜不种粮，而国库中粮食库存储备又不足，难以用来平抑粮价。这是造成近年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

4. 国际因素，就是所谓输入性因素也存在。国际油价、粮价、金、银、铜、铁的价格，都被国际对冲基金大肆炒作，致使价格大幅飙升，也在拉动国内物价上升。

四、通货膨胀是关乎国家治乱的战略问题

目前发生的通胀不是短期现象。今明两年物价仍有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以致有必要认真考虑：民生消费品物价是否也会出现像近年房价那样的失控局面？

未来食品以至百姓日用品是否会因某些不可预料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突然性的价格失控，导致物价恶性化地大幅暴升？

最使人困惑的是，面对粮价期货已经在飞涨的局势，最近有关部门竟发令禁止国有粮企下乡收粮。也就是只允许外资和私企去收粮——给中外粮商机会，让他们

借粮荒之年囤积居奇，进一步推高粮价。为什么这样做？完全不可理解。

如果粮食、蔬、肉等百姓生活必需品在今后的半年或者一两年间上涨到目前的四、五倍以至十倍的话，国内局面究竟会怎么样？民心与社会会发生什么情况和变化？

对此，国家应该有所预料，并且应有预案。考虑到今年的气候因素，考虑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化，考虑到国际对冲基金正在国内外期货市场上大肆炒作——那么上述情况未来绝非不可能。

近年来统计局的公信力和诚信度受到公众的严重质疑。在所有的统计中，唯有通胀数字不是单纯统计学和数学模型的问题，而是一个密切关联着市场事实和百姓感受的问题。物价上涨，特别是民生基本商品的价格上涨，关联着千家万户。

所谓通胀承受力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地说着玩的事情——有些经济学专家谈论这个问题过于轻松，好像就是在说着玩儿！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上，恶性通货膨胀曾经屡次引发社会动乱以至政权改易。从历史看，通货膨胀从来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是关乎治国大政的问题，关乎政权治乱，关乎生死存亡的一个沉重政治问题。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最近地中海周边一些国家的情况全世界都看到了。并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民生问题直接引发了民变。面对未来可能继续发展的通胀形势，国家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对策都应当有所调整。应当研究制订必要的应急应变之策。以至包括管制物价，统购统销，实行票券限量以保证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品供应等应急方案，都有必要提上日程，以免将来一旦有变时措手不及！

五、战略研究不能忽视阴谋论

国家战略是国家大事。中国目前这方面研究比较薄弱。现在也许有不少战术家，但少有有远见、经得起发展检验的总体战略思维。有很多东西顶着“战略”之名，其实算不上什么“战略”，无非就是少数人某种主观想搞的策划而已。

如果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国防及军事战略，总体战略研究薄弱，而且脱离实际，那就缺乏预见和长程控制的能力，一旦临变就势必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总有“想不到”或者“没想到”，总是不能不被一些潜在的对手牵着鼻子走。有时还让人家涮你没商量，临变不能应付自如。

战略是围绕既定总目标而设计的总路线，谋略是实施战略目标的操作。现代国



际战争，多数情况是冷战，是不见刀光剑影的无形战争，虚拟战争。

冷战，不见烟火，但不意味着不激烈。我上面讲的金融战就是个例子。战略对抗，谋略博弈是软战争的主要内容。

冷战就是比战略，斗谋略，也包括斗阴谋诡计之术。近年有一种舆论，就是指责所谓“阴谋论”。“阴谋论”变成了一个帽子。好像在世界上，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博弈中，一切透明，没有较量，没有对抗，没有什么利害之争。斗争都是“阴谋论者”人为炮制出来的幻想。

其实这一招术很厉害，它是封嘴锁脑的招术。不仅堵人之嘴，愚人之脑还可以让人变成白痴。因为你怕人家指责自己“阴谋论”，就不敢揣测对方搞阴谋，结果是被对手涮你一个没商量。

在任何对抗性竞争中，以至在商业市场的博弈中，只有善于识破对手阴谋方能取得胜算。连下一盘象棋都如此，不要说国际关系了。古人说：“兵者，诡道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就是讲要识破对手阴谋而有应变之道。

在中国，近年可以看到一些迹象：用物价、腐败和拆迁及住房危机，把问题引向政治体制，引向多党化和直选政府，然后煽动变乱和颜色革命。这后面显然是有谋略的。房地产经济膨胀，带来了GDP数字快速地虚拟增长，使中国现在号称“世界第二”了。但是，让房地产业大量吸金，推动通胀，就使国家难以把资金有计划地投入加强国家基础工业，用于科研创新和加强国防。又以“转变结构”为诱导，抑制中国沿海低端出口企业，让众多失业、无业人口失去谋生之路。用强制拆迁激化社会矛盾，把农村变成房地产大工地，使农民弃本不种田，吃粮靠进口，然后炒高粮价，把大量资金吸入股市从事投机，使中国经济空心化。用热钱促人民币升值，在股市洗钱，准备将来把国际炒家囤积的人民币抛出，让人民币币值崩溃。这后面有一整套忽悠之术和阴谋。

叶晓文先生最近有一篇文章，说中国已被忽悠为“世界第二”（主要靠房地产经济）。但中国不当“二愣子”，也不是“二傻子”。此文精彩，人民日报发表后震动海内外。其实西方用GDP忽悠中国成了什么老二，就是一种请君入瓮的阴谋。

六、谋略博弈是软战争的主要内容

国家的软实力，首先是战略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实力。在当代国际博弈中，软战争主要是战略竞争和文化竞争。

互联网战，是潜在对手针对中国的软战争的一部分。各位都知道最近美国要压缩“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已经对华进行了数十年软战争。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停？因为听广播的人少了，美国要把更多资金转向网络战争。当今网络的软战争中遍布陷阱。不仅谣言满天飞，种种阴谋也满天飞。想了解什么是阴谋，就上网去看看。

金融博弈，也是当今软战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领域，就是所谓“货币战争”“汇率战争”。

21 世纪的新帝国主义，已不同于 19 世纪、20 世纪那种明火执杖攻城掠地的旧式殖民主义。现在不需要攻城掠地。破人之国，亡人之政，只要玩金融技术就行。

据我观察，在金融领域、国际金融资本当前对中国进行的软战争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在汇率价格的博弈方面，二是在期货、证券市场的金融衍生品价格博弈方面，三是让被新自由主义洗了脑的学人说客，用各种欺人之论来误导中国的经济政策。

七、近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异常

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表面数量很大。但是这些钱有两部分内涵，一是赚来的钱，二是借来的钱。自 2005 年汇改以来，中国外储增长速度异常。请看以下几个网上公布的官方数字：

2005 ~ 2010 中国外储增长数字

2005 年 0.8189

2006 年 1.0660

2007 年 1.3340

2008 年 1.9460

2009 年 2.3392

2010 年 2.8473

(单位：万亿美元)

短短五年，外储由 8000 亿美元迅速跃升到目前的近 3 万亿美元，直翻了三倍多。这种增长速度是异常的。难道中国的出口总量比五年前也增长了三倍吗？那么中国的 GNP 是否也翻了几倍呢？

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实体商品贸易顺差所积累的美元数量究竟占多少？长期投资的美元数量又是多少？短期资金流入（热钱）的美元数量究竟有多少？外储内涵的结构、比例到底是如何？这些数字外储局没有详细公布过。不理解为什么要



保密。

其实，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中国在买他的债，中国的银行也有他的股份。它设在中国的大摩、高盛、美林等投行来干嘛的？就是来玩金融的。它们对自己弄进来多少美元，每年利用人民币升值赚走多少钱一清二楚！但是我们中国人，包括领导人，包括人大、政协，对此清楚吗？

关于外储结构情况的这些数字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数字，意义远大于 GDP 的数字！（其实，GDP 的增长，有相当部分也是从这里来的！）这几年中国实体经济并不景气，失业、无业人数很多，但社会上似乎到处并不缺钱。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有外汇兑换款 20 万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动着。

八、有一种 GDP 增长叫“债务性虚拟增长”

中国目前有近 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局说进入中国的热钱并不多，只有 3 千亿 ~ 4 千亿。但是只靠中国出口那些小商品就能换来 3 万亿美元吗？五年之间中国出口生产能力能增长三倍吗？所以我怀疑，这些外汇美元中的大部分，还是那些风投基金以及国际投行弄进来炒人民币升值的美元热钱居多。

如果外储中的新增美元并非主要来自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并不是靠中国人卖鞋子、卖裤子挣来的，那就只能是国外的风投基金、对冲基金用各种名目投送进中国来的。

有报道说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已在中国香港设了办公室，准备了上千亿美金，要送进中国。高盛、大摩、花旗、美林等风投、对冲基金送进中国这么多美元是为什么？是赠给中国人的吗？是美国人要帮助中国搞建设吗？当然不是，是要利用人民币升值为牟取汇率差价而进来套利的。

这种热钱投资实际都是债务。

有一种经济 GDP 的增长叫“债务性虚拟增长”。目前美国经济就是这种类型。拉美国国家经济早已是如此类型。欧盟近年出问题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类型。国家负债累累（所以有所谓“主权债务危机”），但表面经济却很好看——只要有外部滚滚流入的热钱花，消费性 GDP 就可以不断增长，甚至还会连创新高。

近年中国是否也发生了靠热钱流入而带来的 GDP 虚拟繁荣？人们不知道，因为看不到关于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与内涵的真实数字，就无法了解中国外储结构中真实的国家负债情况。

但是美国人欠债，有各种办法（巧妙的金融骗术和阴谋）赖债不还。中国也玩得起这种货币魔术吗？如果我们也玩麦道夫式的吸金术——不断吸引国际热钱，一方面用新钱偿付旧债（美元利息），另一方面利用热钱兑付的人民币推动国内 GDP 的虚拟增长（而且主要将其投入股市及房地产），那么一旦热钱来得少了，或者美元大量外逃了，中国金融就有突然崩溃的危险！现在不是没有这种迹象！

靠热钱、债务维持虚拟增长，绝非长久之道，只会遗患于未来！

（注：2月26日央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易纲表示：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

易纲说：“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他分析说，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

而且还应考虑到的问题是：中国所持美国国债已高达1.2万亿美元，房债约5000亿美元以上，总计约近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外汇储备2.8万亿中的绝大部分在美国掌控中。如果一旦国际有事或发生中美对峙——则这笔巨款即可能被冻结甚至没收，化为乌有。购买美债难道仅仅是经济问题吗？

下篇 关于中国的全球战略问题

九、需要修正对美国的某些误认

正确的战略设计，首先要立足于正确的内外形势判断。

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方案，基本仍是来自三十年前的认知和设计。包括对市场的认知，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认知，那时都很初级幼稚。这种认知和设想，在今天激烈变化的世局中，难道没有过时吗？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包括我本人）集体性地对美国、对西方资本主义，从制度到国家本质都存在幼稚的误解、误认和误判。

多年来，我们对资本主义存在误认！

马克思主义一直说美国民主是虚伪的，形式的，骗人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后来这话成了意识形态的套话，早就没有人听也没有人信了。

但是在研究了共济会与美国政治制度的关系以后会知道，美国民主确实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个资产阶级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也不是指那些小老板、小企业主、



小商人——其实美国没有什么小老板、小企业主、小商人所组成的资产阶级，美国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垄断性的、世袭的金融巨头集团，它的组织就是共济会。

什么是“共济会”？近代共济会从18世纪就是欧美的犹太银行家与政客和贵族结为秘盟联合统治国家的一个隐身的秘密组织。

美国全部金融和产业完全控制在几大家族手里，就是罗斯切尔德、洛克菲勒、摩根、高盛等十几家垄断巨头的世袭家族。领导美国的资产阶级其实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实体，他们隐身在共济会第33层的金字塔顶端上。

我们都知道近代资本主义从文艺复兴起步，也都知道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但是，恐怕在座很少人知道，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由一个“美地奇银行”家族资助的。这些艺术家的艺术创作都是这个银行家族提供的资金。实际上，从美地奇银行到罗斯切尔德、摩根、洛克菲勒，近代资本主义一直是由一个银行家群体领导和推动着的。^①

十、美国总统是给谁打工？

美国总统权力的确不大，只是打工者，是所谓的“公仆”。那么总统在给谁打工？是给美国人民打工，“为人民服务”吗？当然不是！

美国总统的老板就是共济会中的银行家和富豪们。美联储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它是隶属于共济会成员们的私人银行。美元是美联储发行的。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全部美元，每一分钱都是向美联储借的。所以，美国政府花的钱（包括总统酬金）并不是纳税人的钱，而是共济会、美联储的钱。美国的税收就是政府向美联储借款的抵押品。

人们知道，美国政府欠了数十万亿（甚至有资料说接近100万亿）美元的巨额国债。这么多钱究竟是欠谁的？

这笔债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外债——外债中欠中国和日本的最多，但总



批判共济会的国际漫画

^①有关详细历史资料，参阅何新著《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

计也不过只是几万亿美元而已。

那么美国政府最大的债主是谁？就是美联储。目前，美国政府欠美联储大约 40 万亿以上的美元，近乎天文数字！

现在常听到“纳税人”这个词。然而美国人民作为纳税人，他们的税是纳给谁？纳给政府和国家吗？不是！政府其实只是代收者。政府欠了美联储巨额债务，要人民用税收偿还。一辈子还不清，就要世代代还下去。纽约时代广场上立着一个美国债务钟，就是用这个钟提醒美国人——你们每个人都欠下了一笔重债！

所以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国家，国民福利一直是西方国家中最差的，因为美国政府没钱搞全民福利。

海归学人陈志武说过一句名言：“只有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才会成为民主政府。”这是典型的共济会金融家的观点！美国政府不能不听美联储共济会的话，因为它是债主。共济会选择的议员坐在国会里——美国政治当然是由议会民主决定的。

美国政府财政早已濒临破产，但美国共济会并没有破产。连政府都是共济会的捞钱工具——它又怎么会破产？

美国全部的对外战略及政策方针是外交委员会设计的。但是请注意，外交委员会并不是国家机构，它也是私人投资建立的机构。美国外交委员会被认为是一个影子国务院。

外委会的创始人和投资者是 20 世纪初的美国共济会（发起人是罗斯切尔德家族的亚柯比·希夫）。美国所有的金融大亨，重要的政界精英，几乎都在外委会里任职。美国政府没有外交部，国务院只是一个执行共济会的外交政策的机构。美国也没有新闻自由。绝不是报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外交委员会也控制着美国的媒体宣传，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宣传部。

中国这几年用了不少钱搞外宣，但难以影响西方主流媒体的倾向。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西方主流媒体并不是自由媒体，它不掌控在政府手里。西方主流媒体无不控制在共济会后面的金融大老板手里。例如著名的全球媒体并购大王、犹太传媒大亨默多克，他收购媒体的钱就是共济会的钱。他本人也是共济会高层会员。近年，默多克对中国的影视业和媒体非常感兴趣，一直在设法入股或试图收购。因为控制住这些媒体，也就能控制对中国社会舆论的导向。

共济会的美国对外有一整套外交工具，包括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论坛），包括 CIA，包括世界银行。



十一、共济会控制着美元和全球金融体系

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是属于共济会的，其全部股东都是共济会的世代成员家族，其中多数是犹太裔富豪。美联储从金融上监管和支配着美国的经济制度和金融运行。

由于美元支配着世界，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共济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金融垄断体系。简单说，所有花美元的人，用的都是共济会的钱。

近年有人提出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取代美元的问题，这是十分幼稚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共济会已经控制了全球大部分战略资源。美元是与全球石油垄断集团欧佩克组织直接挂钩的。换句话说，美元是唯一的“石油货币”——根据共济会与欧佩克石油生产国组织的协定，美元是世界各国从欧佩克购买石油的唯一货币结算手段。

因此，无论美元怎样被美联储滥发，只要欧佩克接受（事实上欧佩克往往以石油提价对冲美元贬值），任何国家就不可能放弃收购美元，除非他们不想购买石油。

共济会运动不是一国现象，近代共济会从创立之初就是一个国际化的组织和政治运动。印在美元上的著名口号是——“Novus Ordo Seclorum” / A New Order of the Ages——“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自 18 世纪以来就是共济会的核心口号。

十二、银行家权力大于首相

我从对共济会的研究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有组织、有战略和有谋略的金融运动。在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下，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近代的一系列经济运动、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后面一直存在着有组织的银行势力、金融势力在推动。

19 世纪英国共济会的首领（Master）南森·罗斯切尔德说过一句名言：“只要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就不在乎谁在当首相！”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金融业的忽视——中国人以往只注重生产力，却忽视了推动生产力发展，必须要靠金融力量，中国忽视了银行

以及银行家的力量和作用。

外储局只是一个副部级机构，在近年内却掌控了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发行流通 20 万亿人民币的巨大货币权力，以致导致了目前的严重通胀——20 万亿人民币这个数字接近一年中国 GDP 的总和。这件事还不令人震惊吗？

由此可见，外管局的货币权力实际超过了国家领导人。

中国当前发生的严重通胀问题，出在金融业、外汇管理制度上。由此，我们才会深刻地理解罗斯切尔德当年所讲的那个话！

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包装上市，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已经国际化，跨国化，吸收了大量的国际资金。实际上共济会所属的国际金融系统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的金融领域之中。

十三、共济会银行家要控制全世界

共济会是有严密组织而且有明确的全球性战略目标的。共济会是近代历史中一双看得见的手。

共济会在中世纪是很隐秘的。它在 18 ~ 19 世纪高调推动了法国革命，后来又在美国推动独立运动。美国的开国元勋弗兰克林、华盛顿等人都是共济会的 Master，大掌门。

但 19 世纪以后，由于共济会多次在世界上制造金融危机、在美国搞私刑，与黑手党有联系，因此 19 世纪末美国共济会遭到舆论的强烈抨击，而后逐渐隐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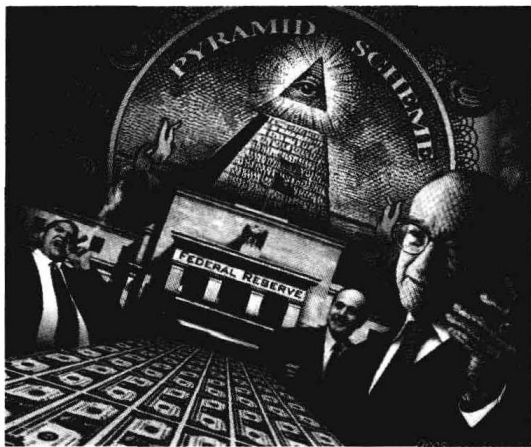
隐形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由于共济会通过金融资本逐步掌控了西方几乎全部主流媒体，所以共济会现在只让公众和世界知道它想让人知道的消息，不想让人知道的消息，人们就难以知道。20 世纪以后的现代共济会作了相当程度的“隐身”、“美容”、“整形”、“化妆”。

20 世纪初共济会高级会员（第 33 级）埃·胡佛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长达 50 年（1923 ~ 1972）。他当年在美国是一位实际控制权力比任何一任总统都大的人。胡佛扫荡了美国国内一切不利于共济会的言论。所以后来，连多数美国人都忘记或不知道共济会的存在了。只是近年以来，由于国际互联网的无界性，共济会才重新现身显露。

共济会对中国早有影响。1927 年 2 月上海荷兰银行的买办虞洽卿和江浙财团银



行家陈光甫带着银票，到九江庐山密会当时的北伐军司令蒋介石，达成合作密约。上海国际财团和江浙财团共同承诺从金融上支援蒋政权，于是发生了“4·12”政变。荷兰银行是国际金融共济会（罗斯切尔德系）的成员。



批判共济会的国外漫画

共济会主要是一个金融家族集团，其核心家族具有世袭性，与欧洲王室贵族及高层政治家有紧密的联盟关系。所以共济会是欧美经济中最强大的垄断性势力，是欧美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石，这也是“自由民主”无法撼动西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

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未来还会不会有第三次？我们无法预言。但19世纪美国有一位将军，也是当时美国共济会的掌门人之一，叫派克将军，他早就从战略上为美国和英国共济会设计了三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大战的目标是搞垮沙俄。

——第二次大战的目标是建立以色列国。

——第三次大战的目标是完成世界统一，就是现在所讲的全球化。

要建立全球统一政府，全球统一货币，建立支配全球金融体系的世界银行。

现代共济会——彼德伯格俱乐部引导着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共济会就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国际金融资产党。

在国际关系中，中国人现在不强调意识形态了，不搞意识形态本位了。但美国外交和经济中，意识形态涵义一直很重。因为美国数百年来有一整套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核心目标就是共济会的新纪元运动、全球化运动。

他们要控制全世界全人类的目标，几百年来始终都没有改变过。

十四、谁把美国总统关进了笼子

小布什曾说：“我作为总统权力有限。因为我的权力被关在笼子里。”这成了一句宣传美国民主的名言。美国总统确实权力很小。但究竟是谁才能把总统的权力关进笼子了？是人民吗？是民意吗？当然不是！是共济会后面的金融老板们。

稍有政治常识者都会明白，所谓抽象的“人民”，意味着一个乌合之众的群体。拿破仑说过一句名言：“人民，作为数字的‘0’什么都不是。只有前面加上数字（即领袖），人民才成为有意义的数字。”

美国有人画过一张漫画，一群小羊跟着一只老羊，老羊嘴中叼着一张报纸。报纸上写着：我来教他们选谁做总统。

国家机器不是慈善机构。只要国家权力存在，只能是国家领导人民，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真正让他的“人民”来主持国政。

在美国，总统的确不是老大。在英国，国王或女王也不是老大。

美国的权力之上的确还有老大——这个老大就是金权，金钱的权力。而金权的掌门者是银行家、老板们，而金融家的组织就是共济会。

近代共济会的核心体系相当稳定。共济会中的金权家族是世袭性的，是封闭性的。罗斯切尔德家族、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这些金权家族二百年来世代垄断控制着全球的银行、资本，包括黄金、石油在内的自然资源。任凭总统更迭，掌权者变换——金钱的权力家族代代世袭，高度稳定。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却不存在这样稳定的核心组织。所以凡轻信而接受了那种抽象民主政治神话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政治分权后，立即呈现分崩离析的乱象。所谓的“民意”立即会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的帮主、黑势力所操纵——台湾是这种伪民主乱象的样板。

所以，百年来凡模仿西方形式民主制度的发展中社会，无不陷入崩解、动荡、混乱，如菲律宾、非洲、南美诸国，社会成为一团散沙。

对共济会的揭秘，使人们有必要回头重新思考 300 年以来的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



十五、共济会影子政府控制着西方政治

共济会要统治世界——不是要把自由、民主、富裕、繁荣给予世界，而是要建立一个金字塔式的统治制度，让 20% 的共济会精英统治 80% 的愚民。

共济会认为，当今全球问题的根源在于全球人口过剩。现在地球人口接近 70 亿，就要达到 100 亿了，已经接近地球的负载极限了。

1995 年在旧金山（三藩市）费尔蒙特饭店召开的国际共济会最高层（即彼得伯格俱乐部）会议认为，地球上 95% 的人类属于不创造价值的多余人口，是“垃圾人类”。他们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压缩共济会精英的生存空间。对这些过剩人口，有必要通过疫苗、人工病毒、基因工程和战争方式逐步控制和消除。

为此，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就制订了关于控制全球人口的“总统 200 号”文件。因此，新的全球战争的危险在加剧。

对于潜在敌国，共济会的惯技是一手促社会矛盾激化，一手促群体反抗，以“民主、自由”之梦为诱饵，从而造成对手国家的内乱与分裂。

下图是美国国家为纪念乔治·华盛顿建立的共济会纪念馆。



美国乔治·华盛顿共济会国家纪念馆

下图是共济会的布道坛场的绘画图案。



乔治·华盛顿曾经穿用的共济会法裙

十六、地中海动乱是针对中国布局的地缘战略

今年以来在北非以及地中海周边国家发生的一系列动乱，不是偶然的。这一轮国际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国际油价节节上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通胀压力。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这种变局背后的地缘战略涵义。这一系列变局，实际是两次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后，围绕中近东石油资源发生的新一轮地缘战略版图重组。

近十几年来，中国在这些国家围绕石油资源做了许多商业投资，目前还没有大的收获。但是随着一些政权的改易，中国的布局将被破局或出局。

这一轮战略重组的最后目标是伊朗。苏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伊朗都是中国重要的石油合作伙伴，而且对中国一向比较友好。这次骚乱和政局改变，会沉重打击中国在北非及近东自主获取石油资源的努力。

美国 CIA 借突尼斯变乱开始，目前正把动乱扩大到中东石油主产区周边的第二类石油国家。无论其真实意图如何，其结果都会阻碍和制止中国寻求国际油源多元化以及参与中近东产油区的努力。所以，这是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地缘战略问题。

世界上的石油市场从 19 世纪末期以来，一直控制在英美共济会金融家手里。现代的以色列国，正是共济会中的犹太金融家投资建立的。共济会建立以色列这个



国家是有深远战略目的的——就是为了通过以色列而直接控制中东产油地区。

近两年来，国内网络论坛上时见一些枪手针对中石油、中石化所谓“垄断”的咒骂性言论不断，有不搞垮这两大国企誓不罢休之势！

但是，难道欧佩克不是控制全球石油输出数量和价格的跨国垄断组织吗？“壳牌”石油不是国际性的石油垄断组织吗？全世界石油，一直就是被共济会跨国资本所垄断的。

中国地大、人多，但物不博。现在中国的铜矿没了，铁矿不多了，石油资源近乎穷竭，以至水、空气资源都有危机，只有劳动力严重过剩。

为了国家安定、民族生存，中国人未来必须向全球寻求补充资源，必须开拓以中国利益为目标的全球化——拓展中国的生存空间，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空间、市场空间。这是一个全球地缘战略的问题。中国的外交、军事都应当与这个目标联系起来。

知道中国要这样做，美国一直在进行阻击。从进军阿富汗，到分裂苏丹，到今年的地中海南岸政变，到下一步攻击伊朗，这些举措无一不具有深刻的地缘战略含义。

美国人骗走中国的外汇，还在嘲笑中国人，说中国人对外只会搞“行贿外交”，说中国人是国际腐败的根源（华尔街日报）。的确，没有强大国家意志力量和军事力量支持的海外开拓，也只能搞行贿外交。但是即使花了许多钱，人家也不会感谢你！

结语

新中国是依靠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包涵两种涵义：一是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涵义。一是消灭阶级、解放人类的共产主义涵义。共产主义理想要建立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差别，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是一个无止境的“无限”目标。

无限性目标难以实现。“文革”运动失败与此有关。而让国家复兴强大是一种现实的理想。所以国家主义是底线，其涵义包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文化特性以及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和金融安全——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生存、发展的战略底线。

毛泽东 1958 年以后的“左倾”路线，以搞共产运动的无限目标取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有限目标。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回到了实事求是的务实路线，把共产主义的无限目标转变到国家复兴、现代化、国强民富的路线——这是伟大的战略转变。

改革开放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今天需要反思和总结这个过程上的失误，根据当前新的现实，需要重新调整国家未来发展的总体战略。

1. 首先应继续维护国家基本制度的安全。世界上只有好或不好的制度，没有

什么理想制度、完美制度。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目标不应是建立美国共济会控制下的那种民主——一旦搞美式民主，天下必乱，国家必分裂。

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改良，就是让现行制度改得更有利于民生幸福和社会安定。有利于国家生存、民族发展、人民幸福的制度就是好制度，放弃现在的国体和制度只能放弃执政权。

2. 应废弃对各地政府及官员以 GDP 作为标准的考核方式，而用务实的民生目标作为标准，评估其政绩。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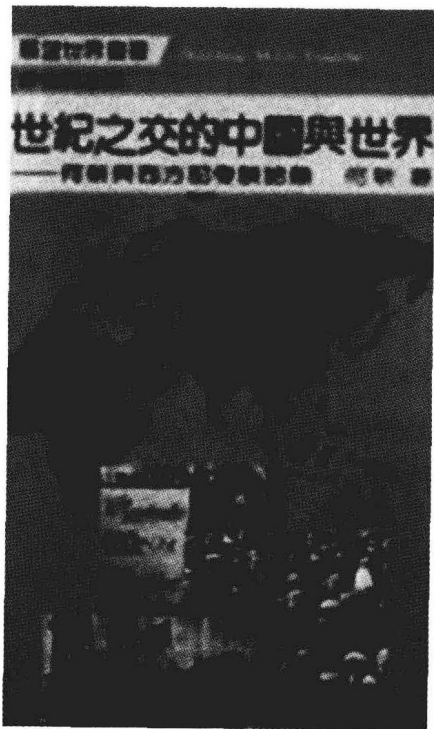
- (1) 社会稳定，上访减少；
- (2) 测试民众对当地政府和官员的满意度；
- (3) 社会安全无重大事故；
- (4) 物价稳定，社会安宁；
- (5) 坚决制止暴力拆迁；
- (6) 有序逐步清理官员特别是中下层官员腐败问题；
- (7) 停止派官员赴美、英接受共济会民主自由思想的培训；
- (8) 主流媒体停止鼓吹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宣传。

这虽然是一些涉及具体政策的战术性问题，但它关系到国家基本制度的健全和社会安定，归根结底也是关乎国家未来长治久安的战略问题。

3. 为了国家安全富强，中国必须向外看，参与全球性竞争。不仅应参与国际竞争，必要时也要敢于与潜在对手对抗。为此必须制订一整套能够应对未来各种变局和危机的新国家战略、新全球战略。从而准备与国际上的任何潜在对手展开全方位的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成绩伟大，中国发展进步快得惊人！但当前国内外面临许多新的情况，新的形势。新问题很多，未来十年所面临问题会更多！

变局纷繁，需要通过战略学、历史学和博弈论的研究，全面思考而制订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与谋略。



《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一书封面



【附录】



Peter Schiff在美国共济会金融家高级俱乐部的演讲

Peter Schiff在美国共济会金融家高级俱乐部的演讲：

中国人知道我们不会把钱还给他们！

（演讲时间：2009年4月）

几周前，希拉里·克林顿访华（2009年2月），其目的是请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她说：“我们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台下笑】。而实际上她想告诉中国人的是：“你们应该让你们的公民把钱拿出来，借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钱交给我们的公民，让他们用你们的钱购买你们生产的产品，与此同时你们的公民可以获得工作。”这就是希拉里想达成的交易。

中国人完全应该这样告诉希拉里：“不不不，你知道吗？我们有个更好的主意。【台下大笑】为什么不把那些钱留给我们自己的公民，让他们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还能保全所有的产品。”希拉里想说的是：“我们得到了东西，而你们得到了工作。”

但让别人享受产出的工作算什么性质的工作呢？这不是工作，是奴役【全场大笑】

你知道，昨天中国领导人公开表示对借给我们的钱“有些”担忧【台下大笑】，说“有可能”我们美国还不了。其实我想他们不应该只是“有些”担忧——这只是公开说法。想象一下他们私下会怎么看？其实他们一定知道我们不会归还这笔钱，不可能给中国人还这笔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全场大笑】

想象一下，如果某一天总统奥巴马，对着数亿美国民众，发表一次这样的电视演说，他说：

“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我非常不幸地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美国政府决定对美国普通民众大幅加税；那些仍然没有失业的人，将为此支付更高的个人所

得税；政府将全面削减社会福利，仍然没有实施的各种福利措施将彻底取消；我原先制定的所有计划，包括全民教育、医疗保障、自主能源，所有这些计划将被无限期搁置。因为中国人要我们现在立即还钱！【台下长时间狂笑】

我们借得实在是太多了，全世界妇孺皆知【台下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所以美国人现在必须勒紧裤腰带给中国人还钱！【台下大笑】

各位认为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吗？

我们应该对中国人说的是：“你们是食利者，是放高利贷者！我们需要修改游戏规则【笑】，我们要打破债务枷锁！你们明知我们还不了，还蓄意借给我们那么多钱！【台下大笑】这并不是我们的错！”

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他们无法参与我们的政治选举，我们为什么要在意中国人怎么想？华盛顿难道会得罪美国的选民，去取悦那些非选民？

中国人很清楚，我们不可能还他们钱，这和伯尼·麦道夫的骗局是同一个道理。

别人借我们钱，我们是怎么还的？——再去借新债。麦道夫早期的客户确实能把钱要回来，为什么？因为麦道夫仍然在吸收新钱，骗那些还不知道这是庞氏骗局的人入会。

美国财政部在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国债到期了怎么办？——再把它设法打包卖给其他人。需要支付利息怎么办？——照借不误。如果有一天没有人愿意再买我们的国债了怎么办，那当然美国就只能违约，和麦道夫一样。违约只有两条途径，要么直接宣布不还，要么多印钞票（让美元贬值）来还。这就是这些债务唯一可能的两种结局。

反正它们是不可能被偿还的。中国人当然知道这一切!!!（大笑）

Peter Schiff 演讲视频位址：

<http://video.google.com/videoplay?docid=3915119166991168859#>

英文版原文网址：<http://mises.org/story/3493>

彼得·D·希夫，资深的华尔街基金投资家，尤以对股市、商品、黄金和美元表现的准确预测见长。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希尔森雷曼公司，1996年出任美国欧洲太平洋投资公司总裁（Euro Pacific Capital CEO）。

希夫的观点经常为各大新闻媒体所引用，如《华尔街日报》、《巴伦周刊》、《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定期做客CNBC电视台、彭博电视台和福克斯新闻台。他编有投资时事通讯《环球投资人》，并主持每周一次的《透视华尔街》广播节目。他的经济和市场评论经常见诸包括 www.europac.net 等在内的各大投资网站。本文是他在美国共济会俱乐部对金融投资家的一次演讲。

注：第一代希夫家族是华尔街的创始人，是南森－罗斯切尔德1870年派到美国的金融代表，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都是第一代希夫扶植起来的。

中卷

VOLUME II

我的思维之路





我的思维之路

(采访时间：1999—2000年)

编者按：何新先生近日在《我看未来淡如清水》中说：“我平生数历生死边缘，几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胜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我的这种相当个性化的人生，竟然发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中，可以说是异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我是离经叛道之徒

记者：外间有传闻说您身体不好，感谢您仍接受我的采访。

何新：谢谢！我心脏是有点儿问题。早年在东北时我患过心脏病，后来表面上痊愈了，其实只是医学上所谓“代偿”。现在年纪大了，旧病有所复发。医生曾建议我做一种心脏手术，但我想把手里的事做完再说。

人生很短暂，而思想则是永恒的。我已很久不见记者。但我看了你们的采访提纲，这次接受你的访谈，是因为我也想通过这次对话检讨和反思一下，谈谈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

五十而知天命（按：本篇采访时是1999年，何新先生50岁）。我的前半生，经历了一般人所难以遭逢的一些风风雨雨。我得罪了一些人，其中有政治家，但主要是某些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些人所制造的神话，例如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殍”的神话，什么“民主政治”的神话，以及“疑古”、“骂古”、“反古”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知识分子们很没有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极力把我妖魔化。

不信，你可以点击一下“蝮蝮”（google，谷歌）的搜索网页找“何新”——首页跳出来的标题是“何新自杀大快人心”（作者是海外一个自称热爱“自由民主”的网路枪手“任不寐”）。好几年了，这个造谣诽谤的标题始终在那里被挂顶，由此可以看出“蝮蝮”（谷歌）这个号称“资讯客观中立”的搜索网本身的政治倾向性。

其实有时，我的确会有那么一点悲凉。三十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只是读书、思考、写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惹得一些家伙这么仇恨我？无非就是因为我的理念、思想、言论，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老聃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知命者云，“察知渊鱼者不祥”。民谚也说，泄天机者遭天谴。而我平生有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的确砸了一些家伙骗人的饭碗。好在我留下了一批已出版的著作，还有一些未出版和待出版的手稿。而我感到骄傲的是，在学术上我的成就，在许多方面的确是超越学术界前人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学术状况很不好，浅薄、龌龊、庸俗、虚假。所以我时常很孤独。但是何须与时流论短长？一切，且都留给后人去研究和评说吧。

人生有宿命，有前缘，也有因果。“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善恶终究必都有报。命运最终必定是公正的。

二

记者：请问您的身体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对不起，冒昧了。

何新：哈，告诉你吧。我有一根动脉鼓了个包，去年（1998年）夏天在阜外医院查出来的。刚开始医生怀疑是动脉瘤。我有一位好朋友是国际知名的大医生。他知道这个消息，人在美国，难过几夜睡不着觉。但经过后来再检查，发现那鼓包并不是瘤，是动脉血流压力过大造成的，有点象自行车外胎气压不匀鼓起来了一样。但是随时有爆裂的危险，而且一旦动脉破裂是很难救治的。所以我的主治医生建议我动心脏手术。那年夏天，我接受有关方面的安排住进阜外医院准备动手术。但我后来从医院跑了出来。没有去做那个手术。我想，还是以后再说吧。

我的全集已分类编好，必须亲自校对完。因为过去的版本不是我本人校的，错别字很多，将来会贻笑于后人的。我相信，我写的书，10年、20年、30年后还会有人看。我的那本《诸神的起源》，当时出来被几个“博士”骂，现在经过20年了，已出了8种版本，日本、韩国也有几种译本。此外，还有几本重要的书没有完成。所以我考虑还是维持现状为好，我暂时不进医院。我相信天命——很多东西，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记者：您这么讲，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很多人是关心您的。

何新：（笑）谢谢！其实呢我活得很好，很开心。得，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

一个真正的哲人，绝对不会怕死。不了解死亡，不敢直面死亡，就不会了解什么是生命。

没有无限制的自由，没有无终结的发展，没有不在时间中消逝的存在，没有不死亡的生命。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过：“死亡，是最可怕的东西。但精神的生命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担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存续的生活。”

真正强大的精神力量绝不畏惧死亡，而是敢于面对和超越死亡。古人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我平生无德无功，但是恐怕没有人能否认我已立言。有一不朽足也。

我这个人，冷板凳坐惯了，安于寂寞，甘于寂寞，快乐于寂寞。古往今来，凡能作出大学问的，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要不是熬得住十几年寂寞，不可能写成这么多著作。我的全集在此，完成这十几卷文集，我已经给自己立了一座碑。

三

记者：最近我们看到一本名叫《新周刊》的杂志，1998年12月号一期，出了一本特刊《1978～1998，20年中国备忘》。编者在思想界推举三个人，认为是20年来影响重大的人物，最后一名是何新。其文中说，“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对此您有何评论？

何新：其他且不论，但我想这句话是对的，如果中国学术界评选80～90年代期间最具争议的人，那么肯定舍鄙人莫属。

记者：那么围绕您的争议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何新：哈哈——一切！几乎一切方面，学历、能力、学问、水准、成就、人品、道德、行为、举止，等等，无一不是问题。而且不错，我一向确实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并且，目空一切，说大人则藐视之。（笑）所以在学术界，从进入的第一天到今天，三十年来我一直没有融进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异端分子。

我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是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的，然而从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就在大闹天宫。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笑）

其实，如果说我就是学术界的孙悟空的话，那么我最后绝不会皈依那些假佛爷而去陪着他们作一个什么“斗战胜佛”的——那是一部《西游记》中最大的败笔。（笑）

四

记者：那么，您与当今学术界主流的最大分歧究竟是什么？

何新：我记得有一次曾经说过——我不知道在当今这个铜臭熏天的泛市场氛围下，中国现在还能有什么真正的学术？

二十多年以来，我与那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或者观念上，不如说是在历史观、政治观、价值观、基本的是非观以至人生观上，完全不同，完全离异，完全对抗。

这种对抗特别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民主主义者，是中华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普世价值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在美学问题上我是古典主义者而不是新潮主义者。

多年来，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几乎完全孤立无援。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以至谩骂，不仅在国内，也包括在海外。但是，我从来没有向那些自以为是什么精英的人渣们低头过。（笑）所以最近美国的那个“博讯网”竟然会放出这种“何新被自杀”的消息。令我读后不禁喷饭一餐，这些自由派精英恐怕得了恐何的癥病，造谣达到这么无聊的程度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经常以个人的微弱之声对抗整个主流世界。那些精英们说，何新已经不存在。因为他们早把何新打倒在地一万次了。而我则说：对不起，还要劳驾请你们再打第一万零一次——因为老何仍然在这里！

我对事物常常持有与多数主流精英包括一些大人物们不同而新异的观点。因此而触犯一些人，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或者学术尊严。因此而一路走来争议始终不断。十几年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记者：您快乐吗？

何新：非常快乐。其中一乐就是与那些精英们较力，而后撕下他们当圣冠戴在头顶的那种文采斑斓的纸糊面具，或者扒下他们的裤子露出那种难看的东西。

苏东坡有一首词说：“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这词很适合我的心境。

五

记者：有一本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的京华出版社今年初出版的《中国高层智囊/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十个人》，里面也介绍了您。您是否读过这本书？



何新：我知道这本书。

记者：您有何评论，关于您，这本书中的报导是否正确？

何新：不正确。但应感谢作者还是很善意地介绍了我。就是，关于我的某些经历，作者了解不够确切。此外，他在书中把我和某些当红的主流经济学者并列，那些人见到我的名字会非常不喜欢。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出身于哈佛或剑桥，而我的出身则是绿林大学。道不同，不为相谋，我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呵！

记者：最近，香港李泽楷由于斯坦福的学历问题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您的大学学历第一不是名校，第二是大学学业没有读完。那么，您对此是否也有点自卑？

何新：（笑）笑话！我在学术领域是如此成功——为什么要自卑？我不懂什么叫“自卑”，其实，我对我的低学历反倒充满自豪。

记者：香港的高级工商岗位基本上是由哈佛、剑桥等名校的博士垄断的。中国现在也宣导从国外引进人才的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何新：人才不等于高学历，尤其不等于洋学历。近年那种洋高学历崇拜，在我看来是殖民地人们对宗主文化的崇拜与依附心态的延伸，这种殖民地文化心态本身是很可悲的。

实际上，类似的问题及争论，在历史上古已有之。秦始皇下“逐客令”，怀疑一切外来者都是间谍，那固然是一种政策偏颇；但燕昭王千金买骏骨，为外国游士建黄金台招贤，燕国最终也还是亡国。

李斯《谏逐客书》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这是好话。实事求是，唯贤是举，这才是真正的用人之道。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了这样的用人之道。没有他当时倡导“破格用人”，我可能至今还是黑龙江边陲的一个农夫。

六

记者：您的生平经历表明，您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我很想了解您的整体思想发展历程，了解您对一些重大问题比较全面和真实的想法。

何新：全面？那肯定不可能。我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曲折而复杂，我不仅是一个问题人物，而且在现实中也是一个充满缺陷的人物。在所谓主流思潮的圣坛上，我早就被打得粉碎。（笑）所谓“传奇性”，可能是有一点，因为我确实经历过一些寻常所难以遭遇的奇特事件。

作为老朋友，这次对你，我准备多谈一点。谈，也是为了做一些必要的辟谣和

澄清。多年来，海外的一些报刊、出版物，刊登过关于我的很多诽谤谣言或者不实之词。例如香港有个出版社（叫什么“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出过一本什么《中南海新智囊》，把何新的照片印在封面上——听说那本书还卖了不少，很畅销。那本书也流入内地，我见过有地下的盗版。那书关于何新的传略可以说通篇都是胡说八道。这些家伙，他们一边骂我，一边拿我来骗读者的钱。

记者：这本港书与国内那本《中国高层智囊》是不是一回事？

何新：不是。国内那本也多半是传闻之词，但多多少少还靠一点谱，香港这本则百分之百地纯属造谣诬蔑。比如香港这本书中竟然还为我杜撰了一个名叫“方娴”的太太——据说这位女士“在国务院任职，收入不菲”。哈哈，我的女性朋友不少，就是还不认识有一位女士叫方娴的。我倒很有兴趣与他们指派给我的这位新太太见个面（笑）。

记者：顺便也想问一句，如果您不认为是隐私的话。关于您的个人生活，外面的确有不同版本的传闻。

何新：我也知道。我年轻时，放浪不羁，玩世不恭，不修细行。这也是我平生不能从政的原因。我曾结过两次婚，又离了两次，责任都在我。

记者：您有忏悔吗？¹

何新：（笑）不，我不忏悔。“我是哲人狄俄尼琐斯（酒神）的门徒。我宁可做一个登徒子，也不愿作一个圣徒。”（尼采语）我不隐晦，年轻时本人是好色之徒，常常抵不住情感的诱惑，特别是美色的诱惑。我曾经犯下男人们最容易犯的过错——偷吃禁果。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您还在乎香港书中的那些说法？

何新：其实不在乎。只是感到这种下作传媒，像绿豆蝇一样令人恶心而已。过去我曾对记者说过要用法律手段追究他们造谣，把这些港怂吓了一跳。（笑）但是这需要时间和精力对付他们，还要请律师，很麻烦。实际上，这些港媒背后大都有某种神秘的政治背景。

记者：请您放心。我这篇采访中会力求准确和真实地记录下您，写一个真实的何新。我很想比较全面地了解您的生平。您能对自己的平生经历和思想作一个简明的回顾吗？

何新：谢谢，可以试试。我也想通过与你们合作的这个机会，努力而且真实地剖析一下自我。我一定尽可能坦诚地打开我的内心，只要不对他人构成伤害，我这次力求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①

^① 本文是乌有之乡网从何新著作《思考》第一卷中摘录的。《思考》一书出版于2000年，时事出版社。此次发表有删节修订。



一、始启疑蒙

记者：可以谈谈您的家庭情况吗？

何新：可以。

记者：您父亲是高干吗？

何新：我的父亲何炳然先生已于1995年过世。他生前是一位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级别是行政14级（13级以上才算高干），不算高干。

记者：您是北京人吗？

何新：不，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四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

记者：您的父亲何时参加革命？

何新：抗战时期，他在大学（重庆的前中央大学）时代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1949年在华北加入新华社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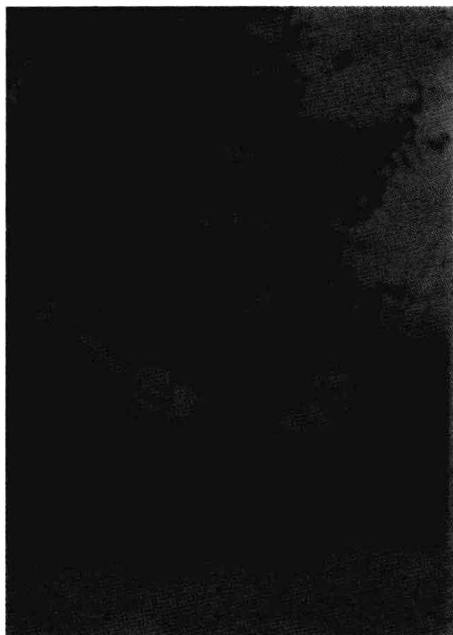
记者：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了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平经历。我想进一步了解您的一些独特思想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

何新：那是在“文革”时代就已形成的。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你还能研究和写作吗？

何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普遍关心政治，毛泽东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因此，当时虽然我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也经常阅读社会上的各种传单、小报、大字报，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动向。

可以说，从1967年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政治方向已开始萌生初发性的怀疑，特别是对指导这个运动的理论基础产生怀疑。“怀疑会产生哲学”（亚里士多德），那时我已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考方向——“怀疑一切”。（马克思认为这是他所喜爱的一句拉丁格言。）我认为自己不能无条件地盲目信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宣传，我决心系统地读书，学哲学，而且要读一切可能找到的禁书。



三岁的何新（1952年在浙江温州）

今天人们谈论“文革”，往往说那是一次造神运动，宗教迷信运动。但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文革”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包括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

记者：您在“文革”期间能从哪里搞到书读呢？

何新：“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烧了一些书，也封存了很多书。初期的时候（在1966年8月那个红色疯狂的夏天），我也参加过烧书的运动，但1966年的政治寒冬使一些人开始得到清醒。

1967年初，中央高层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其后全国在政治上陷入了半瘫痪的动乱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学，机关停止办公，到处都在大造其反，天下大乱。有些地方还真枪实弹地搞起了武斗，整个社会秩序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这个时候想读书，根本没地方去借。借不到，我们的办法是利用当时风行的“偷”。我们学校一些爱读书的小伙伴瞄准了学校和一些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是中国最冷清的部门，全部被封了大门，完全没人管理。有一天夜里，我和几个同学溜到学校的图书馆，把窗户撬开到里边去找书，连干了一个星期。搞过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又去搞别的学校，收获极丰。一书包、一书包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历史的名著，许多书都是当时正被点名批判、被禁读的书。

正是从这个时期（1967年那个早春）开始，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当时我搞了好多红红绿绿的传单纸，那是写大字报用的，学校免费供应，我把它们裁成小页，用线订起来作笔记本。

记者：以您当时的文化基础，阅读那些外国著作，您不感到有困难吗？

何新：当然困难。首先那些洋人的复杂译名就让中国人感到困难。但我找到了窍门，例如读洋人的名字，我只记住其中最具有特征的一两个字，而忽略其全名。阅读的过程，是一种发现和探索的精神历险，非常有意思。而且愈是去读那种人们不让你读的东西，这种刺激就愈强。当时听到什么“禁书”的书名，就想方设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类就是这种心理。

记者：您从这种阅读中获得了什么？

何新：怀疑。我首先学到的是怀疑。我最初的一个发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多道理和当时“文革”派的理论是并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



但那时我读了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墓前的讲话。恩格斯竟然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首先人要吃饭，要生存。为了吃饭，人类必须进行物质的生产活动，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它的改变方造成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因此经济活动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恩格斯认为这个道理是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一项意义最重大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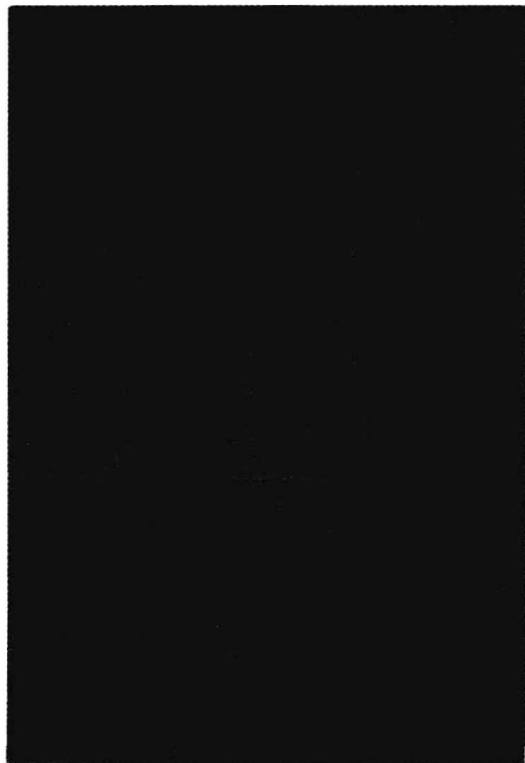
当时我也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一书，这位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创始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乃是经济史观，即“经济决定论”。我注意到，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物质的）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①我当时所引发的一种联想是，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否也应包括毛泽东的思想呢？而这种主张物质因素、经济因素居于第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与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即认为精神和政治决定一切，可以说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同的。

记者：的确存在矛盾。

何新：很显然。一方面是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经济、吃饭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是唯心主义——主张精神，上层建筑，政治及意识形态活动是第一位的。究竟哪个道理对呢？

当时我们都很穷，也经常挨饿，当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倾向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认为吃饭问题、经济问题应当被摆在第一位——至少我们在欲念上喜欢这种主张。而当时报纸上那种理论，认为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这种道理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我意识到，假如继续按这个方向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反革命。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你怀疑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就会犯下反革命的政治罪行，很危险。类似的思想矛盾和问题



面对十字架

^①《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38卷，15页引。

还有很多。当我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抉择——如果继续思考下去，我相信我早晚一定会成为反革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哈姆雷特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思考。（笑）

记者：（笑）那您怎么办？

何新：我想首先必须保护自己。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对我读的东西，我所思考的东西，努力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讲。本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我一度也很活跃，但读书与思考使我走向孤寂。

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1967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隔离起来。当时很多的家庭都如此，我们楼里住的多数干部不是成了叛徒就是反革命。这种扫荡一切的大背景，必然使得我们这些子女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产生怀疑。

1967年初到1968年中，我避开运动的旋涡，我在学校（北京24中学）4楼东侧找到一间阁楼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从事了将近一年，非常专注地阅读和学习。

记者：您阅读过哪些书呢？

何新：我记得，那时候读过的书有《史记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及通信集，文学著作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卢梭、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等法国启蒙学者、人道主义者的著作。这里有许多书是当时不能读的书，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坏书。但正是这些书，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得到了彻底的洗礼和启蒙。

记者：当时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书？

何新：我当时酷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我也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古典的和浪漫的爱情。我欣赏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厚重，斯汤达作品中的力量，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深刻。我特别喜欢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正是巴尔扎克的那些《人间喜剧》，使我对人生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抄录了他的许多警句。我开始懂得如何通过私利与情欲的观点去观察人生。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以一种充满神秘主义的宗教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

记者：您这一阶段的读书持续了多久？



何新：到1968年6月中学生被安排上山下乡而告一段落，那时我被学校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屯垦戍边”。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时还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多书。除了一部分我父亲家里的藏书，大部分是在那一年中我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书，其中有许多书是当时的政治性“禁书”。例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夫人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桑塔亚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等。

那时瞻望未来的前途，可以说当时每个人头上的天空都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内心中却抱持着一种信念，我深信天会变，地会变，时代也会变。这种信念来自我当时已学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

辩证法认为：宇宙中没有不变的事物，宇宙、自然和社会，常变常新，这个世界上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同时我深信思想的光芒，智慧和知识的光芒，必定可以照亮我未来的全部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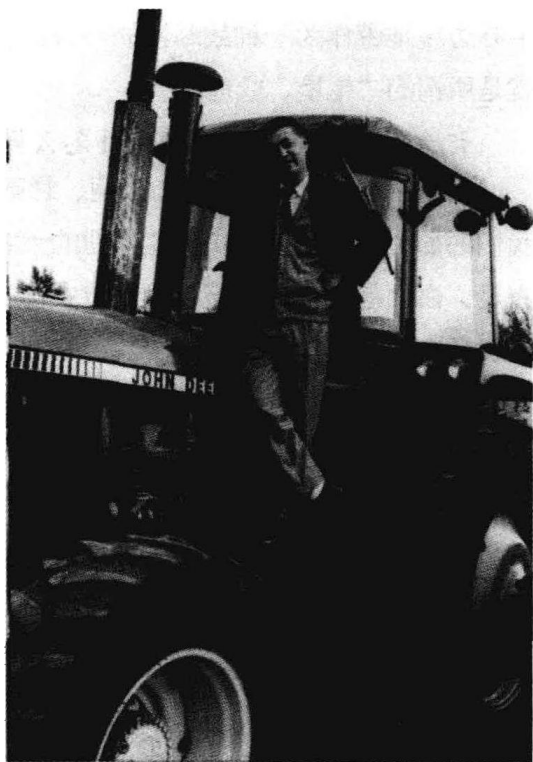
记者：您上山下乡的地点在哪里？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建立以前，这个地方的行政区域属于黑龙江省友谊县。

记者：我没有下过乡，我不太懂，所谓的生产建设兵团是一种什么组织？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1968年6月经毛泽东特别批准而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是一种军事与农业合一的特殊体制，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复员和转业军人，二是担任团以上领导的现役军人，三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其中有一部分经过严格审查（出身好、思想正统）的知青被组编为持有枪械的准武装部队成员。建设兵团这种体制具有准军事组织的特点，对青年人的思想和政治控制极其严格。

建设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从事机械化的大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是在东北部的



回到黑龙江友谊农场

中苏边境地带作为一种战略性的后备力量，在中苏战争时配合正规军抗击苏军，这就是所谓的“屯垦、戍边”。

记者：你们那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艰苦不艰苦？

何新：比起山西、内蒙、云南、甘肃那些更苦的地方，应该说黑龙江是个天堂。我们的那个农场是完全机械化作业的大农场，主要作物是大豆和小麦。因此，食油充足，白面是主粮。我所在的友谊农场，前身是“一五”时期由苏联援建的一个样板农场，经济基础特别好。

记者：在那里，你还能继续读书吗？

何新：很困难。我刚去的时候，被分配到农业连队，农忙时一天在田地里艰苦劳动12~14小时，累极了，几乎没有假日，晚上又没有电灯。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当时仍然坚持每天晚上下班后读几个小时的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读。直到第二年，我被调到县城里的团部农机厂当工人，宿舍中才有了电灯。工厂的劳动制度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0小时以上），条件比在乡下时好了很多。

但是，到工厂不久，我就成了反革命，我的书就读不成了。（笑）

二、浪迹燕京

记者：您是怎么成为反革命的呢？

何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不久，1968年夏，毛泽东召见四大红卫兵领袖，废黜了他们，正式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接着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人们本来认为“文革”可以就此谢幕了。但没想到九大以后还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着一个运动，令人厌倦之极。

1970年初，中央又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所谓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五·一六”（“五·一六兵团”，“文革”时期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反对周恩来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这个运动也席卷到农村。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发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

这批知识青年都很年轻。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记者：您也被揪出来了吗？

何新：不，这个运动开始并没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搞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来的。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看到他们挨揍，看到一些严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

记者：为什么？

何新：我当时已经深受俄罗斯和法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至少应当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这么残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泽东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为什么那些当地人不执行呢？

因此我就给团领导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4月。当线索开始追查到我的时候，我被人们孤立起来，周围的人们都不理我了，我感受到一种排挤和歧视。



何新（1969）

我们同来的十几个知识青年，本来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这些青年本来都是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去儿上班、下班，彼此关系很亲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招呼，

却没人来叫我了,而且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讲话。原来,工作队给“积极分子”们都打招呼了。我这时就感觉到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我那时每天都有一种灾难随时将要临头的预感,诚惶诚恐。

记者：您在被揪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精神准备？

何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终结的恐怖不如一个恐怖的终结”。（见《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每天都在等灾难临头，那感受是让人压抑而要发疯。但当事情真的临头，不过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凌晨3点钟，全厂集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为什么3点钟开会呢？那时是“抓革命，促生产”，3点钟起床搞“运动”，早上7点钟还要正常上班干活。当我要进礼堂的时候，人家挡住了我，不让我与班组一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领到最后一排。我想，今天就要出事。那个会场的气氛是很威严的，如临大敌，调了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戒备森严地持枪守卫会场，那个会议的横标是“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

开会后，团运动工作队长给大家讲话，这位工作队长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还任我们团的副参谋长。这人讲起话来很有气势，而且有煽动力，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些讲词。他说：“有人指责我们不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必须是好人。你是阶级敌人，你这里是劳改队，你让我怎么团结大多数？你问我为什么揪出来这么多牛鬼蛇神？你这里就有这么多，我不揪行吗？”（这些话他是针对着我那封信讲的）讲话十分雄辩。

他又说，“毛主席在纪念鲁迅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每个人要像鲁迅那样做一棵独立撑持的大树，不要做向两边“坑”（倾）倒的小草！同志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你们究竟是要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还是做向两旁“坑”（倾）倒的小草呢？！”

他讲到这里就是一声大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其中最后一位正是鄙人。于是，我与其他几个也被他点名的人，被全副武装的武装连战士从座位上揪着脖领子拎起来，拉到会场前面。然后有人就念大批判稿，我们挨斗的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台下是我所在那个“工业营”的全体职工，大约有五百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

记者：你挨揍了吗？

何新：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



没有透光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记者：您是怎样熬过来的？

何新：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马克思，是歪曲马克思主义。

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读了我写的交代材料，他还真的去查书，去核对。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和他们辩论。

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辩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的人，反倒出了名。

记者：对您的审查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新：到1970年5月，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由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情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当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属于一类战备药品，医院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

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但是针灸难以根治存在严重感染的炎症。

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一两个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 120 斤降到不足 90 斤。

记者：这的确是一段很惨痛的经历。

何新：更惨痛的还在后来。拖到 7、8 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 100 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真的差点送命。

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肌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听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 40 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

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日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记者：这时，您的心脏病治好了吗？

何新：没有，但神奇地减轻了许多。此前我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维维，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叫阿红，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在我出了事被监管后，维维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又听医生讲我已经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就写信表示和我分手。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知道我生了重病，就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

这一年（1970）的国庆日前，我从佳木斯医院溜出来，蹭火车逃回北京。所谓蹭火车，就是不买票用各种办法溜上火车。因为我身边没有几元钱，根本买不起车票。溜上火车后，就设法躲在火车座位下，爬到行李架上、缩进厕所里或者过道上，反正要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一路捉迷藏。中间还换了好几次车。经历千辛万苦，最后才回到北京。

回北京后，我先住在阿红家，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



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然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还有一个奇迹是，我近年曾反复体检，除了半个心脏较常人具有代偿性的扩大外，医生说看不出我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瓣膜损害迹象。在被认为是绝症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

到北京后我就想，我得继续学习我在兵团没完的东西。

记者：您所说的没完的东西是指什么？

何新：那就是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痴迷思考，我当时非常认真执着地把这看作是自身的一种使命、一种职责。想一想，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以我当时的身份，一个遭到放逐的乡下人，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青，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却认为自己竟有责任做这样重大的事情，关注以至批判性地思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你说荒唐不荒唐？

记者：不可思议！

何新：但是，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召开了9届2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文革”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揪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一事件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表明毛泽东所发动的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至此开始遭受重大挫折。

会后，毛泽东发出号召，要人们认真看书学习，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毛泽东这时鼓励人们直接读马列原著，他还亲自开了一个书单，号召人们读一批书。在此之前，我在兵团的一条罪状就是不读毛著而读马列经典著作。因为林彪讲过，马克思主义里面，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够了，反对人们读马列原著，认为对马列的书看多了反而会变得糊涂。

记者：其实，糊涂就是产生怀疑嘛。

何新：这个时候，毛泽东说唯读他那几本小书不行，号召人们读马列的原著。于是北京图书馆就把马列的书，《马恩全集》、以及与马列有关的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等等，都拿出来陈列上架，开放给人们读了。当时北图的制度是，进入阅览室必须要有北京地区的工作证。

我的女朋友小艾为我找了一个北京工人的工作证，把相片换了一张。我拿着这个假的工作证，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早上去，晚上回，像上班一样。早上北图一开馆大概9点钟我就到了，中午才出来六部口附近有一个“韶山餐馆”，现在改名叫朝鲜冷面馆了，那时还只是一个小豆浆店。我在店里花一毛多钱吃顿午饭——6分钱买一个烧饼，8分钱可以买碗豆腐汤。吃完了下午又回去看书。

就这样我在北京图书馆读了大半年的书，除了节假日以外，每天坚持去，几乎风雨不误。这期间还有一些小小插曲，与两位德高望重的大人物有关，他们都曾在我遭遇危难的这一年中帮助过我。

三、劳形苦智

记者：这两位大人物是谁？

何新：一位是杨斯德将军，另一位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杨将军是什么人？

何新：杨将军是传奇人物。淮海战役中策反了蒋介石的一个军，是一位1955年授衔的少将。他在“文革”前的职务是军队总政的联络部长，他的大儿子杨伯宁与我是中学的同学和好朋友（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中国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全家移居美国了）。

我那一年流浪京华时，曾在他家寄居了几个月。当时杨将军受到严重的政治冲击，被免去部长的职务，赋闲在家中养病。我在他家住时，经常与他聊天，聊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也聊我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历史问题的看法。

虽然我当时还非常幼稚，但我敢于思考这些问题已经使他感到很惊奇。老将军当时被停职在家中，也很苦闷，每天他只能读书和种花。他推荐和介绍我阅读了许多书籍，包括《反杜林论》和《资本论》，那是我第一次读这两部书。正是通过这两本书，使我在哲学和经济学上得到了启蒙。那时老将军常和我就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交谈。

还有一位老人是著名的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

记者：赵朴初先生？

何新：是的。我今天在这里要向老人家公开表示一个歉意。1970年秋，我和我的女朋友阿红曾拜访赵朴初先生（阿红家族与赵朴老是世交）。赵老当时也赋闲闲居，在家中读书自娱，主要读有关自然科学史的书。我向他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等几册罕见的书。

但那一年中我生活颠沛流离，不幸后来竟将那几部书丢失了，一直没有归还。结果就不敢再去见赵老，而这几本书也都是赵老当时非常心爱的书，曾经一再叮咛我看完要还回来。可是我辜负了老人。事隔多年，想起赵老当时的慈祥，至今深感惭愧。



记者：那么这一年您一直都住在这位女朋友家？生活怎样维持呢？

何新：我年轻时感情生活很不稳定。那年春天，阿红离京回云南后，我继续留在北京。

当时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艾。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那时她父母都在干校。但今年春节过后，她父母回来，我就不能在那里住下去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小山后的一排地下防空洞里。那时我经常备着一件帆布雨衣，一个草帘子，夜晚就躲在防空洞里打地铺。怕被巡逻的民兵抓到，有时一夜得更换几次防空洞，今天钻这个洞，明天钻那个洞，一听有人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藏起来，就这样躲躲闪闪地在地下坚持了几个月。

记者：简直难以置信。

何新：是的，但这是真实的。最难忘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和秋夜。夏天比较好办，难熬的是那些寒夜，睡在防空洞中，夜晚经常被冻醒，浑身哆嗦，你会觉得当天的黑夜特别漫长。

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白天我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生活嘛，每天小艾给我送一顿晚饭。她工资很少，一个月才挣38块钱，但她自己只花18块钱，省出20块钱来支持我的生活。中午饭也是在北图附近吃，那时没有什么盒饭速食，要吃得便宜只有烧饼豆腐汤。晚饭也靠小艾，通常是她从工厂食堂买过来带给我。

记者：关于您这个女朋友，能讲讲她的情况吗？

何新：小艾的父母都是国家建委的领导干部，她是北京首钢附属的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女工。她当时非常爱我，爱到痴热的程度。但是后来这种信仰发生了崩溃，我们的爱情也就破灭了。

我直到现在对北京玉渊潭公园仍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后来都拆除了。但是那个松树林还在，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长椅也还在，有时我仍然会去那里走一走，坐一坐，尽管早已“物是人非事事休”。

当年我常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小艾，有时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里，一面看书，一面等待。真的很奇怪，本来在几个月前还是病得要死，在京城那一段流浪的日子每天受冻受饿的，虽然人很瘦，但居然就是不再生病，也真邪门。

记者：这种流浪式的生活似乎很刺激。

何新：还有一件事是令我难忘的。那一年夏天，我竟然有机会又搞到了一大批想看的书。离玉渊潭不远，翠微路2号有一个大院，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留守处就在这个院子的一座楼里，这座楼的底层有一个被封存的图书馆。

有一天夜里，我设法从窗户上溜了进去，发现有很多都正是我特别想读的书，我就设法把它们搬出来，其中有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还有《资治通鉴》。结果有一天，我的活动被人家发现了，我被他抓到派出所，民警问我为什么偷书，我告诉他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所长就审看了我的读书笔记，看了以后，他竟然跟我神聊起来，由世界历史、马列主义，一直聊到当前的“文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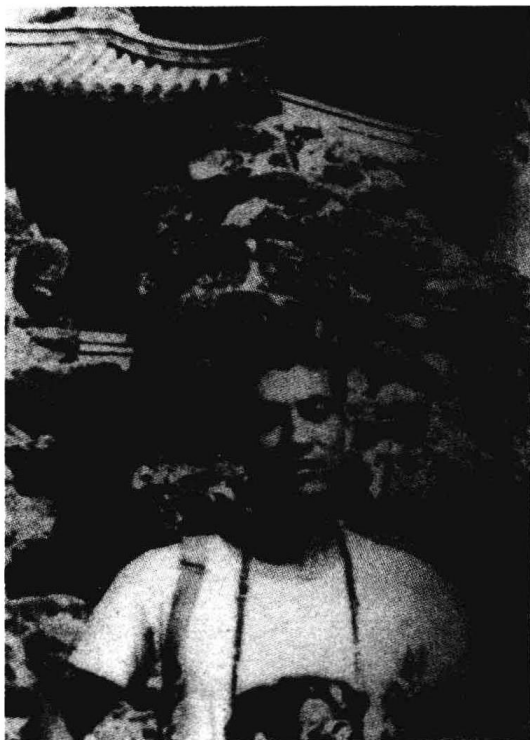
这是当时少见的一个有头脑的好民警，他认为偷点书读也不算什么大事，结果竟然把我给放了。但是两个多月后，由于我长期在玉渊潭、钓鱼台国宾馆一带出入，行踪诡秘可疑，终于引起警方的注意和跟踪。特别是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9·13”事件，北京政治形势极度紧张。

9月中旬，我在流浪中又一次被捕，这一次是正式被捕，以流浪罪而被市公安局收审。我先被关在永定门外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审查一个多月，后来又转到功德林监狱的大牢里关了大概一星期。那是高墙坚壁的真正国立监狱，关我的是一间只能容留一个人的小号。

但是，除了流浪和偷书，警方实在审查不出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警方决定将我遣送回东北兵团。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在北京整整一年的流浪读书生涯。

记者：小艾呢？你与她的关系后来如何发展？

何新：完蛋了。我们的爱情关系，在经历这一次暴风雨后彻底破灭。警方、她所在的工厂当局、她的父母，都找小艾谈话，告诉她何新不仅是一个流窜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而且还是一个骗子、一个贼，警方从她家中把我寄放在那里的一部分书籍和笔记本全部抄走。



何新（1970年）



小艾肯定承受到极其巨大的精神和政治压力。她的家人把她隔绝起来，不许她见我。（我在收容所中曾托人带信给她。）最终她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彻底崩溃了。回到兵团不久，我后来收到她的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彻底决绝。那一年可以说是我青春时代的一次滑铁卢之战。我是被警方铐着手铐，押送着离开京城的。

记者：为什么要这样押送？

何新：在北京站，我与其他几十名知识青年一起被押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第65次列车，那些青年多数是犯了罪的知识青年，有偷东西的、有抢劫的，重犯的手还被铐在车厢里的桌子腿上。

到哈尔滨后警方把我押下车，我被转送到黑龙江省收容所。但在这里，我找到一个机会溜了出来。在哈尔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自己扒火车就又回到了兵团。这是1971年的11月间，而恰在一年前，我离开佳木斯回北京，到这时正好是一年。

记者：您那时的体会和心情如何？当时您有所懊悔吗？

何新：你要知道那时代的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无从失去什么，又会后悔什么呢？

记者：爱情呢？您失去了所爱……

何新：那种爱情是无根的，本来就不属于我。

记者：你和小艾最初不是很相爱吗？

何新：但是，“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阶级制度极其封闭而严格的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出身不好者被视同贱民。

当时我父亲是反动知识分子，母亲是漏划地主，我出身不好。而我在恋爱时对小艾隐瞒了我的这种家庭背景，这在她的家人看来乃是一桩不可饶恕的大罪。

小艾在给她的绝交信中也说，她一切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原谅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她的欺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门第不相匹配的爱情，只能是一种偶然漂来的奢侈品、寄生物。

记者：这话似乎很冷酷。

何新：是的。但是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生存现实就是这么冷酷。当我在北京流浪时，没有户口，没有金钱，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生活的立足点；唯一有的是青春，是梦想，是一种对于理想及信念的执着追求。然而这些在当时又具有什么价值呢？我是谁？最多不过是一个流浪京城的青年冒险家而已！

小艾对我的爱是十分天真的，她在当时那样一种近乎无望的境遇中，曾经十分无私地支撑了我，并且给我以感情的慰藉，我为此对她感念终身！但是，虽然她甚至可以接受我曾经是反革命，在现实中是一个流浪汉，但她却无法接受我的出身背景不是来自与她相匹配的没有政治问题的家庭出身，在当时就是印在人身上的一个



何新在玉渊潭湖畔（1970）

“红字”。冷酷的社会现实最终使她抛弃我。事实上她的处理也是对的，是完全合乎理智的。

那时我最爱读的一本小说就是斯汤达的《红与黑》，我觉得自己的情况和感情经历颇有一点像于连·索黑尔。当时曾深深地打动我的，是于连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时的最后告白，他说：

“先生们，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的恩惠。我毫无幻想，死亡正等待着我，而且它是公正的。我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扼，可是碰上运气，粗受教育，却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上流社会少年群中。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于连呼唤：“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只有伪善，至少也是欺诈。就连最伟大、最有德性的人也不例外。喂，人绝不可相信人。”

这些话当时似乎也是我的内心之声。

记者：支援你如此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这也是多年来人们对你始终感到难以理解的一点。在精神和政治上，你究竟要什么、为什么？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何新：在精神上我所一直追求的就是明道与济世，我毕生最大梦想的是华夏民族及其文明的复兴！（其实，东方复兴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就是我在80年代提出来的，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

我当然知道，作为孤独的个人，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但是回顾往事，我还是非常自豪。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曾行我所志，并且始终如一地志我所行。矢志不移，毕生不渝，至今也没有改变过！

记者：你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何新：可以这样说。只是我现在比年轻时代悲观得多。

在1971那一年中我备受折磨和困窘，可以说已经输得精光；但是意志上倍受磨炼，在精神上收获极大！当我坐在北京永定门外收容所和功德林监狱的小号中静候审查的那些孤寂时刻，回首以往一年间的往事，我曾写了这样一首《沁园春》——

浪迹云踪，天涯漂泊，四海为家。披塞外霜雪，北荒云月，瀛海夜渡，岑岛观霞。风雨消磨，艰辛历练，笑闹青春好年华。凭栏处，看无边碧浪，来去淘沙。

而今整装又发，不吃苦毕竟志难达。逞英雄怀抱，驰骋宇宙，人生百岁，漫作虚花。往事轻弹，无限来者，更向高峰迈步伐。莫等闲，把辞章填过，再作搏杀。（1971年9月）

当时我形同乞丐，却竟然还有这样一种诗情画意，而且豪气如此。（笑）岂不可笑哉？

记者：您回到兵团后情况怎么样？

何新：当然是糟透了。我已一年多没有工资，身上一文不名，吃饭都要借钱。一年多漂流在外，行李都不见了，眼看就要过冬了，连条棉被都没有。因为在一年前，我是作为坏分子在未解除监管的情况下从医院逃走的，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案底，北京市公安局给农场保卫处转来了关于我的收审材料。

但幸运的是，这个时候“一打三反”运动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而告结束了。“9·13”事件后，周恩来发动人们批判极“左”路线，赢得了对“文革”运动不满的那些人们的支持。这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现役军人撤走，兵团恢复原来国营农场的建制，重新起用一批原农场的老干部担任领导。

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倍受迫害，因此与那些粗暴的军人在作风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上台后比较讲政策。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兵团整死了好多知识青年，整个兵团大概有几百人被整死或者自杀，或者成为精神病。许多受冤者的亲属上访上告中央，国务院派工作组来调查，认为这个运动搞“扩大化”了。因此当我回到这农场的时候，政治气氛已比较宽松，机械厂让我回去当翻砂车间的工人。

当时工人中有一句话，“车钳铣，没法比。要翻砂，就回家。”在工厂的各种工种中，翻砂铸造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计。不仅如此，有一段时间还让我到砖场去烧砖，当窑工。当窑工之苦，是你不能想象的。

砖窑里烧完砖后仍有40~50度的余热，而烧砖不能在冬天烧，只能在夏天烧，因为在冬天砖的泥坯会被冻裂，夏天外边空气30多度，窑里残热40、50度，而且乌烟瘴气，空气中弥漫着红砖的粉末。我的工作是从窑里推车往外运砖，那真是苦

不堪言。

但干这活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天只需要干三四个小时。这一点让我特开心，因为有了许多闲暇时间可以让我用来读书。

记者：你当时还有书读？

何新：我从北京被押回农场的时候，大部分的书都被警方没收了。但我随身的一个小书包，里面还剩下几本书，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一本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本是马、恩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一本黑格尔著、贺麟翻译的《小逻辑》。这三本书当时令我入迷，是让我每天冥思苦想的主要精神食粮。这三本书，我一直保存和苦读了许多年。

这三本书中蕴涵的若干理念塑造了我一生的基本哲学观念。我从这三部书中悟出了很多道理。

记者：哪些道理？

何新：可以这么说——《哲学笔记》和《小逻辑》教导我掌握了哲学方法；《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塑造了我的社会历史观念；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1915年列宁在瑞士伯尔尼流亡时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所作的一些笔记，表明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思想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是，列宁的研究工作没有做完，在读这部笔记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试图把列宁这部曾考虑要写而没完成的书写出来——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关于辩证逻辑学的新体系。

这一设想当时颇令我为之着迷。那时我白天干活，晚上就读书，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思考和写东西。

四、穷通自转

记者：在上一次谈话中，您曾谈到，您1972-1973年间在哲学、逻辑学方面的研究被政治问题中断了，为什么？

何新：“9·13”事件后，周恩来乘批林之势发动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实际揭开了一场新的政治斗争的序幕。所谓批极“左”思潮，针对的是“文革”路线；批无政府主义，则针对着造反派势力。这是周恩来所代表的老干部势力趁着林彪军事集团的失败，试图扭转“文化大革命”政治方向的一次重要尝试。然而，此举引起江青一派所代表的“文革”新兴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击。

1973年春，《人民日报》、《文汇报》、《红旗》杂志等中央报刊开始连续发表批



判孔子和儒家的文章。这些文章表面上在批孔、批儒家，实际上在批“周公”，影射着阻碍“新兴法家”进行变革的“复辟势力”。批林批孔运动的这一实质，其政治涵义是十分明显的。

我当时虽然僻处边陲的小镇，但通过报刊也窥察到这场新的政治斗争的动向。我发现报上那些文章以及当时上面印发下来的一些小册子，以“儒法斗争”为纲重新包装中国历史的种种说法，几乎完全是一派胡言。

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场批儒颂法的运动，其实是“文革”派反击周恩来（周公）所代表的老干部派的一场政治斗争。批孔子林彪的“克己复礼”是假，批周恩来“克己复礼”以阻止其恢复和重建被“文革”所破坏的社会秩序的努力是真。而就我个人来说，家庭与个人自“文革”以来深受冲击，内心早已对“文革”深怀不满，当时我的思想感情非常本能地投注到周恩来代表的老干部派即“复旧派”的身上。

因此，在1974年初，我撰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是《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唯物史观》，副标题是“为什么儒法斗争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投寄给上海《文汇报》。

记者：这个副标题很有意思，您的文章内容是什么？

何新：题目虽然很精彩，但内容其实还比较幼稚（笑）。我当时大概是想给《文汇报》的编者们上课（笑）。这篇文章我写得很长，至少有两三万字之多，其实大部分内容是长篇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语录，中间连缀以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

当时毛泽东正号召人们“认真看书学习，弄清真假马克思主义”，我也引用这个说法。我的文章的结论是，《文汇报》所宣扬关于儒法斗争的理论是唯心史观，是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欺人之谈。这篇文章我抄写了许多份，分别投寄给《文汇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我那时非常幼稚，竟然期待着《文汇报》会把我的文章登出来，哪怕是作为批判的靶子登出来也罢。

记者：结果呢？

何新：结果当然不会登出来。其他报刊并没有理睬我，但是《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寄回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而且附有编辑部的一封信。这封信说：

“此文观点有严重政治错误，请审查此人政治背景和活动目的。”这样一个评语，在当时等于是对我又一次宣判政治死刑。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掀起新高潮，于是我第二次又被揪出来，成为活靶子，与主张克己复礼搞复辟的千古罪人孔老二、周

公一起接受大会小会的批判。

但是这时期的批判已经文明多了，不揪上台，不用低头认罪，只轮流去厂里的各个车间——当时叫“批林批孔的战场”去现场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听工人们念批判稿而已。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句，当时我所在的那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刘从占是一位被打倒后又得到起用的农场老干部，他阻止了当时一些人对我做任何过激处理的动议，暗中给了我许多保护。最令人感到幽默的是，这位老人居然在党委会上提出——何新懂历史，让他给工人讲一讲儒法是啥回事。我到了会上，给大家大讲了一通《三国演义》——因为曹操、诸葛亮都是法家嘛——讲得工人们兴奋不已。（笑）



何新（后排左一）在黑龙江友谊机械厂（1974）

后来我被安排监督劳动，厂里给我调换了一个新工作，让我到炼铁炉前当大炉工。给我干的是最重的一件活儿，每天抡22磅的大锤砸铸铁块，每个铸铁锭重百十公斤，要抡圆大锤把它砸成三段，以便熔铸。一天干六七小时，砸开的铁块可以堆成一座小山，然后自己一个人用独轮推车把它们推到100米外的炼铁炉前，装满了铁锭的车足有千斤重。这活儿又苦又累，完全在露天干，风吹日晒，干一天活儿下来，浑身骨头就像散了架，晚上肌肉疼得睡不着觉。但干了一年后，却把我的身体锻炼得铁打似的壮。



许多人看我的外表不像个文人，殊不知就是年轻时在这样的环境中苦练出来的。我们工厂有四百多工人，我当时举重、掰腕子都在全厂居前三名之列，是公认的大力士之一，而且因为我早年练过武，会几手拳脚，所以尽管我的身份是坏分子一类，厂里的工人们很多人佩服我，对我却很不坏。

那时我还是每天只要找到时间就读书，只要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怪人——身份是屡受批教的坏分子，破衣烂衫，腰上缠着一根烂麻绳，干着最脏最苦的活，但腰带上却别着一本外国哲学名著或马列著作。那时我周围的许多人（特别是女工），都认为我这个人是有“魔症”，就是疯子、精神病。

记者：（笑）在那个年代，您的表现是有点不正常。

何新：1975年邓小平复出，社会政治环境又有所宽松。鲁迅的书、《红楼梦》、《水浒传》，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书在书店里已有得卖了。我当时一个月基本工资是32块钱，吃饭穿衣大概要用20块钱，剩下的钱全用来买书。

记者：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有一段经历是重要的，但也使人会感到不解和好奇。您没有读完大学，但是您却成为了大学教师，凭什么？

何新：1977年，我参加大学高考。1977年考试，1978年进校门，但是三个月后我就退学了。

记者：当时，对你们这一代老知青来说，在1978年能考上大学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您为什么要退学呢？

何新：在上大学之前，我在东北友谊农场中是一名“知青”。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尽管是处在那样的年代中，我并没有荒度我的青春，我一直在自学各种知识，同时写了很多东西。

记者：这与您退学有什么关系呢？

何新：那时我写的东西中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问题的，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发出这个邀请的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朱波和章士嵘两位先生。

记者：他们有慧眼啊。

何新：然而，福兮祸所伏。其结果是我为此而被我所在的大学除名，最终是我不得不从这所大学退学。

记者：您那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何新：我那篇逻辑论文的中心论题，是认为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体系进行改革。你可能知道，约两千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逻辑体系。康德说：“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门已被完成的科学。”

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认为应当据此改革旧的逻辑理论体系。

记者：这是很奇特也很大胆的想法。您的论文是否发表出来了？

何新：在当时还不可能。事实上，这些论文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发表出来。我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后，我把它寄给当时正在宣导研究“思维科学”的钱学森先生。钱先生读后颇为赞赏，给我写了回信，并且将我所描述的概念演化的系统树（历史演化概念系统）称作“何新树”。但还有大部分研究成果，我到现在也还未来得及做系统的整理和发表。

记者：那么，你接到邀请后，去开会了吗？

何新：收到《哲学研究》的邀请信后，我欣喜若狂，就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你知道，这机会对一个大学生是太难得了。但没想到学校说，你是刚入学的学生，你的任务是学习，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这对我是当头一棒。但是我坚持要去，校方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你就退学。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机会难得，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不管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结果，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会议。这是1978年初的事，这个会是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举行的，我记得当时这个会的主持人中有于光远和李宝恒先生。

记者：这个会上您被重视了？

何新：事实上，我在这个会上的处境是极其尴尬的，因为我并不是作为正式的会议代表，而只是一个应邀的列席者。在与会之前，我本来是抱有一种能够使我那一套新逻辑理论受到重视的期待的，我期望《哲学研究》杂志将会发表我的论文。但是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记者：为什么？

何新：《哲学研究》编辑部觉得我的逻辑观点虽然新颖，但却难以发表，主要原因是两方面。第一，因为我的身份太缺少权威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而且这时学校的长途电话也追过来了，学校指责我旷课，要求动员我回去。第二，哲学所的主流学派是罗素、金岳霖（罗素的中国大弟子）的逻辑斯蒂即逻辑实证主义，



何新在中央财经学院任教



何新（1978）

会上的主流学者根本不承认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具有学术地位。

在这次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一些逻辑学界前辈，例如莫绍揆先生等。但是总的来说我的处境是难堪的，在会上我得不到正式发言的机会，而且人微言轻，就是讲任何话，也不会引起重视。

回校后，学校认为我是害群之马，我自行外出开会是违纪旷课。校方要我选择：要么接受纪律处分，要么主动退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退学。所以我在大学里实际只呆了三四个月，而且这三四个月里有半个月是在北京开会。大学肄业，这就是我的学历。

记者：好惨啊，退学后您怎么办呢？

何新：退学后我又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非常尴尬，很不光彩。

记者：那是当然。

何新：但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农场知识青年已经掀起了返城运动的大潮。我本来就有心脏病，马上到医院去搞了一个允许病退返城的证明，于是我在1978年末回到了北京。

记者：您回到北京后就应该是失业了，您如何谋生呢？

何新：对，我回城后成了当时所谓“待业青年”。但是很幸运，我有一位好父亲。在“文革”期间我写过很多东西，异端的东西，甚至反动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唯一读者是我父亲。父亲在学术界交游广阔，人脉极广。有时他把我的东西给他的一些好朋友看，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宁可教授在“文化革命”前就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机会。一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即中央财经大学），这是一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学校，1978年被国家批准恢复和重新组建。当时大学师资非常缺乏，宁可教授竟把我作为一个具备中文和历史师资条件的人才推荐给中财院。当时大的社会背景是邓小平提倡作伯乐发现人才、重用人才，社会上有这个风气。邓小平鼓励大家当伯乐，鼓励破格用人。而幸运的是，在以后几年里我不断遇到了几位伯乐，其中另一位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汉语教研室的主任闵庚尧先生。宁可教授推荐我后，闵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对我表示欣赏。他就推荐给教务处，组织几个教授书面考核我，然后让我试讲，大家都觉得我可以。于是学校的人事处同意决定破格录用我。

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破例的。因为我的个人档案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仅仅是一个大学三个月即退学的大学生，而我所面临的新工作乃是给我本来同属一届的大学生们授课，讲解古代汉语和古代经济论文。但是我在内心中非常自信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因为在此前，在兵团生活的最后一年，我曾担任过当地师范学校的哲学和中文教师。

中财院的行政方面，学校领导层中，对我能否胜任以及是否有资格做这份工作一度有争议。当时多亏闵先生为我力争，最后人事处同意暂时办一个招聘临时工的手续，先予试用。结果，我担任了古汉语和写作课，还有古代财经文选这几门课的代课教员。然而我当时的身份仍然是个临时工，这一年我正好30周岁。

记者：“三十而立”，你的学生们怎么看？

何新：学生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奇特来历。女生都喜欢我，男生则有些抵制我。不要忘记，我本来是和他们同一届应考和入学的大学生（笑）。我被嫉妒。但最终大多数学生们还是接受我，而且尊敬我。女孩子们对我尤其友善。（笑）

我那时正年轻，风度翩翩，许多女同学晚上主动到我的宿舍来聊天，用现在的说法也许是想跟我“泡”。（笑）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我在批改她的第一篇作文时就发现她具有出色的想象和文字表达能力。那女学生当时学的是会计专业，我劝她改行，建议她尝试写小说，我认为她将可以成为一位好作家，后来也是我将她的处女作推荐给《北京文学》杂志。当时她对自己似乎还并没有信心，但是后来这位女士真的成了著名的女作家，最近已出版了全集。

但是，我与一些女同学的交往引起了校方的注意，特别是引起了一些男同学的猜忌，一些流言开始传播。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同意调我去工作，于是我就请求调动。校方也耽心继续留我在这里会发生绯闻。结果，因祸又得福，在1981



年初新的学期开始时，我离开了这所大学而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记者：这也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什么时候？

何新：那大概是1981年春。因为我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东西，父亲的一位朋友就向中国社科院的主要领导人（胡乔木院长和梅益秘书长）特别推荐我，那时是刚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处在恢复性组建中，非常缺乏人才。

记者：您当时以什么资格而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呢？听说是经院长胡乔木特批的？

何新：当我刚调进社会科学院的时候，身份还不是干部编制，实际身份只是一个临时工。那时在人事制度上，工人和干部的界限是很大的。此前虽然我已经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担任教师，但是我的身份是工人，而且还是未转为正式员工的临时工。根据当时国家规定，临时工必须要工作满三年后才能转为正式职工；又必须有非常特殊优异的表现，才能由工人身份提升为干部。因此，当时以我这种身份，一步就调入社会科学院的中枢机构成为国家干部，必须经过院长办公会的特批。我进入社科院的单位是院部直属机构科研组局，所以关于我的情况都是直接报告给胡乔木院长和梅益秘书长，在院长办公会上我得到了特批，然后由人事局办理一系列手续。

我调进社科院以后转为正式干部。由一个没有高等学历的临时工而直接转成国家正式干部，这在当时是属于非常破格的。

记者：那是不是也靠私人关系呢？

何新：关系只是引荐的线索，当时国家人事制度审批极其严格，要通过层层把关，没有可能绕过去。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好，干部任用审核制度极其严格，一个人若无出色业绩，绝对不可能被提升。

记者：那就表明您的确具有特殊的业绩表现。

何新：是的。我当时在学术上的确已有一些重要表现，有一些业绩。

在那一年当中，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报刊上开始发表了一系列东西。

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理论务虚会”后，在中国正在兴起思想解放的浪潮。我在过去的“文革”年代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叛思想、异端思想可以说适逢其时，际会风云，于是顷刻喷发而出，一发不可收。这些东西发表后，我在学术界、在知识界中开始获得了一些知名度，这是我能被破格吸纳到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基础。

记者：人们还是会感到有些奇怪。从您的经历看，您并没有受到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和训练，您是如何……

何新：我应当说，上帝对我是十分厚爱的。在1978～1981年的这几年里，我惊人地幸运。这种幸运甚至使一些厄运也不断转化为幸运和机会。

例如我从大学的退学，例如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遇。实际上，如果没有在中财院发生的那些绯闻，学校是不会轻易同意让我调走。但是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没有错过这些幸运的机会，又与我此前的多年积累、多年磨炼、多年奋斗有直接关系。正是过去的长期努力，为后来遭遇的那些转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不过争议也是难免的。即使到今天，对我的学术成就还是有很多争议，也许将会一直存在下去。（笑）不过这没关系！

记者：为什么？

何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断裂的时代。美雨欧风，西风东渐，风雨飘摇，人心不古，“道术已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理性批判·导言》）这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况意识形态和学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而关联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当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社会的前进方向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多种选择，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们对事物会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呢？王安石有一首论史诗，他曾感慨地说：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黜黜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所谓世俗乱真，糟粕粹美，我想许多在历史上做过事的人都会有相类似的感慨吧！

记者：有争议并不一定是坏事。创新的学术，总是会引起争议，争议愈大，影响也愈大。

何新：陈寅恪曾指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



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际，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我虽非其所谓“贤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而迎合环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①，我反省平生，确信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五、弄潮中国社会科学院

记者：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还存在很多禁区。为什么您敢于写并发表一些大胆的东西？

何新：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东西，跟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学习、思考和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思想和政治准备过程。

最重要的是，在70年代中期，即1970～1975年前后，我已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到70年代中期，我深信“文革”出了问题。我当时曾多次写信上书试图与毛泽东对话。当然，毛泽东不可能看到这些信件，官僚机构封锁着他取得资讯的管道。这些信件最终往往被退回到它们的出发地，被我那个农场的政治部门拆阅。而正是由于这些信件，在“文革”中我成为屡教不改的有“反动”思想的“异类分子”。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杂志很少，普通人发表东西很难。您的稿件为什么发表率始终比较高呢？

何新：我的东西之所以在当时能迅速得到发表，并且得到较为强烈的读者回应，可能是因为我在文章中所表达的一些新锐观念，实际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杂志编者的心声。我在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往往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先锋性，所以发表以后往往能在思想界产生震动。

记者：您当时在哪些领域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何新：例如，今日那些小字辈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不知道，其实我是国内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鼻祖之一。我早在1980年就在《读书》杂志发表《为“自由”声辩——

^①《陈寅恪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58页。

读弥尔顿“论自由”》。

我于“文革”后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哲学、美学，后来是在历史和政治思想领域都发表过一系列具有冲击性的论文。

例如1979年底，香港的《抖擞》杂志发表了 my 《试论审美的艺术观》一文。《抖擞》杂志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学术性杂志，它的编者主动将它向内地的一些科研文化机构赠阅和散发，当时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能接触到外部资讯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影响较大。

在这篇论文中，我明确提出艺术美的本质取决于形式，而不取决于与政治主题有关的思想内容。这在当时的美学中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挑战性观点。这个观点很快在国内的艺术界得到回应。著名画家吴冠中看过此文后曾写信给我说：“你讲得好，只要是真理——哪怕它铜墙铁壁，哪怕他皇亲国戚！”

1981~1982年前后，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在栗宪庭君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我关于形式美问题的一系列论文。在栗君推动下，《美术》杂志展开了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直接推动了后来80年代中期造型艺术中形式解放的潮流。栗宪庭也是在读了我在《抖擞》杂志发表的文章后，经吴冠中的推荐主动来找我约稿的。

栗君后来一度主持过《中国美术报》，被认为是80年代新美术思潮的推动者之一。

又例如在80年代初曾经成为意识形态焦点问题的关于“人性异化”的讨论，我也是比较早地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的论者之一。

记者：80年代初您刚刚调进中国社科院吧，怎么一下就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呢？

何新：我调进科研局的时候，局长是鲍正鹄。这是一位见多识广、目下无尘的学者型领导人。鲍老曾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读书甚多，阅人也甚多。说老实话，我调进来后，他没把我放进眼里。调我进来，主要是上面的推荐，而他对我写的东西基本不屑一顾。最佳评论也只是三个字：还聪明。

倒是梅益秘书长对我的期望较大。他和我谈话，认为我经过实践磨炼，又有理论素养，应该比“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强。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想调进科研局，局领导都不要，却接纳了我。但是，我后来的表现，未免让他大为失望。

记者：为什么？

何新：因为我“不务正业”。我不能认真对待和完成科研局分配给我的本职工作。



记者：您当时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何新：在科研局我是被分配在“哲学片”，负责与哲学、文学、宗教等研究所的学术联络工作。后来局里又安排我主管和建立一套关于全院科研课题的学术档案。

记者：这个工作应该很重要。

何新：当时没有电脑，其实是要让我编一套卡片。但是我根本没有认真做这个工作。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只是忙着干自己的事——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读书、思考和写作。虽然人是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思想却在天上乱飞。

记者：科研组织局在中国社科院中是一种什么机构？

何新：科研组织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中枢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机会直接接触高层资讯，包括直接联系某些中央领导。同时它还掌握着全国各省社科院以至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学术资讯和动态。

正是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大量的新鲜资讯特别是国外资讯，阅读到大量中央秘密档案和一批机要档案。这个局自身有一个数量虽不很大，但藏书品类颇为齐全丰富、品位和品质很高的图书馆。这里还订阅了大量外文以及港台报刊，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报刊杂志有数百种之多。资讯多到每天看不过来。这个期间，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讯和资料，每天几乎都沉浸于痴迷不倦地阅读和做札记。

记者：您自己如何评价您在科研局这一阶段的工作？

何新：我在这里工作的那一年间，对我的思想发展异常重要，不仅我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了极大地提高。

当时我在北京还没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办公室里，睡在临时拼接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我每天都在不倦地阅读和写作。

如果说黑龙江的农场是我的大学，那么实际上我的博士后阶段是在科研局完成的。

科研局的几位领导都是资格老、级别不低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宿耆俊彦。这个局中除了我一个人级别低微，别人都是处长或局长。这些老同志对我很客气也很宽容——就是那种前辈，对待后生他未必喜欢你、但是尚能包容你的那样一种长者的宽容。

他们并不公开责怪我上班只忙着干自己的事。一年后局里为我办理了转干和提职务的手续，但同时鲍局长让人事处长正式通知我：局里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留在科研局工作，建议我自行联系单位调动。因此，我仅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就必须

打起背包走路了。

记者：那您离开了吗？

何新：这时我又一次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三位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尹达和黎澍都正在寻找学术助手。尹达想在历史所新建成立一个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室，同意调我去。侯外庐正在重修他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也表示欢迎我去参加工作。黎澍则准备在他分管的近代史研究所建立一个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室，也表示欢迎我去。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联络，表示有意聘我去作助手。

最初我想投奔的是侯外庐先生。因为作为史学界元老，他的声望极高。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具有幽默性的事。

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庐的主要助手之一（当时是新成立的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到科研局找局长鲍正鹄，表示想调我去协助侯外庐参加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据说，鲍局长闻言从座位上跳起而对他双手作揖拱拜说：“谢谢，谢谢！你们是伯乐，快把这匹千里马弄走。”（此事是林英先生后来亲口告诉我的。）此言一出，令林英极为尴尬，他莫测高深。接着他们又听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以至有人说署名“何新”的那些文章作者并不是这个何新。结果侯外庐先生就无意再调我了。最后，还是黎澍先生调我去作了他的学术助手。

记者：那么黎澍先生为什么这么欣赏您？您作他助手时，黎澍担任什么职位？

何新：黎澍是一位资历很老的中共老干部。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共，20世纪40年代一直在重庆、香港，在周恩来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下作文化工作。早在“文革”前，黎澍就已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我跟随他时，他的身份显赫，同时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主编、《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同时兼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在史学界声望卓著。^①

记者：这对您应当是一个好机会。

何新：可惜我并没有善用这种机会（笑）。

^①黎澍，历史学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新闻总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历史研究》杂志主编，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的嫉妒。为黎澍做助手，这个位置是当时许多高学历、学术辈分令我望尘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约见我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我工作，我都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我劝你小心，你要谨慎！”这一番告诫算得上是老人家的苦口婆心。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桀骜不驯的个性使我很快就把包围在他老人家周边的一群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笑）

记者：您当时也就三十出头吧？

何新：1979 是我的而立之年，两年后我 31 岁。

记者：有幸跟随像黎澍这样一位身份、资历、声望地位这么高的权威学者，是一种难得的机遇。但您怎么就把老人家搞翻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何新：1982 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会议地点在天津。

会议邀请黎澍，但黎澍没有出席。他派我以助理的身份出席，临行前叮嘱我说：“亚细亚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 30 年代以来一直没有人搞得清楚。你去参加会，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都会当成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要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记者：“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意思？

何新：亚细亚就是亚洲。所谓亚洲生产方式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东方独特的古代制度的问题。为参加这个会，我事前做了一些理论准备。我花很多时间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我注意到，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

记者：这个观点看来很重要。

何新：是的，它强调了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也就是今天所谓“中国特色”，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记者：您在会上发表看法了吗？

何新：这个会的气氛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沉闷。到会的学者主要是刚刚经历了“文革”、还未完全醒来的老一代史学界权威人物。许多人在“文革”时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思想仍停滞在斯大林《联共布党史》中关于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社会公

式上——那个公式认为社会制度有一个普遍的发展规律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当时的多数与会者都把这个公式当作不可动摇的预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规律。

记者：我们在上大学时，教科书里也是这样教的。

何新：但我对这个问题却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五大阶段的所谓发展规律仅仅是一种虚拟的意识形态假设。我意识到，从理论上推翻这个公式，对于当时邓小平、胡耀邦领导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具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应该打破。我也很想利用这个会议的讲台在诸位史学界元老面前崭露一下头角。

因此，我把行前黎澍对我的叮嘱完全丢在一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当会议的主席林甘泉先生（曾担任郭沫若的秘书、历史研究所所长）客气地介绍我是受黎澍委托与会，问我黎澍同志方面对于会议有什么意见时，我就不客气地放了一炮，做了一次长篇发言。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甚为大胆而好笑。我记得我那次讲话一开头就说：“听了几天会，听各位的发言，仿佛雾里看花，总觉得隔了一层。”这种目空一切的说法自然会把所有的与会者得罪个遍。

接着我讲，我的看法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命题的实质，就是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特殊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我说我认为：抽象于欧洲历史的社会五阶段规律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例如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希腊罗马那种普遍使用奴隶作为生产工具的社会制度。

我表示，我认为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不仅不适用于中国，而且应当予以推翻。这个论点当时就语惊四座，引来了一片嘘声，可以说是震撼了到会的所有的学者。

我记得当时的会场气氛严肃、凝重、安静，气氛静得甚至有些吓人。

你要知道，关于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性的问题，在当时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我猜想当时许多出席者可能会觉得是听到了反动的言论。

记者：为什么？

何新：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在苏联共产国际中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争论。在30年代以侯外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为一方，以魏特夫（德国人）、中国的刘仁静为另一方，发生了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

那些主张中国社会形态具有亚细亚特殊性的学者被郭沫若、吕振羽一派的学者所压倒，以至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的观点被认为是反对中国革命，反对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被定性为“托派”的观点。

新中国建国以后，郭沫若、范文澜一派观点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正统主流理论和教科书范本，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则成为一个理论禁区。在郭、范这一体系的教科书中，中国历史根据“原始公社→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形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阶段公式而进行塑造，任何背离这一模式的观点都会被扣上反动历史观的帽子。

因此，我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表的观点自然是耸人听闻。我的这篇发言稿后来写成了论文，几经波折，后来终于发表在1982年的《晋阳学刊》上。

记者：当时在会上，人们有什么反应？大家如何评价您的发言？

何新：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林甘泉先生，会议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15分钟为限。到时间后主持人按铃提醒。我过去还从来没有在这种大型学术会上公开发言的经验，心情非常激动，在讲话时完全忘记了时间。林先生试图以按铃制止我的发言，据说当时林先生按了十多次铃，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辩。（笑）

记者：会后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何新：当时整个会场对我的发言的整体反应是鸦雀无声，似乎人们都被我的反动言论所惊呆了。

那天散会后，许多过去不认识我的人纷纷打听这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到底什么来历？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何以发言竟然如此狂妄胆大！当他们知道我是黎澍的助手后，一片嘘声，纷纷摇头。就有许多人给黎澍打电话、写信批我是胡说八道。会后还有许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状，说我在会上发表了反动言论——这在当时仍然是政治上的一条恐怖大罪。

记者：那么您回北京后一定被黎澍骂了吧？

何新：比挨骂要惨。散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叫去谈话，他非常严厉地批评我。

我记得，当时正是初春，那一天北京大风扬尘，刮起沙尘暴，天气非常阴郁。但是，我们谈话的气氛比这沙尘暴天气更阴郁。

黎澍说，这两天来这里告状的人踏破了他家的门。他说，他很见过一些狂妄的人，但居然狂妄到像你这样的程度，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说：“你并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简直狂得没有边际！”他还说：“我看你一定要走沈元走过的那条死路。”

记者：谁是沈元？

何新：在“文革”以前，黎澍曾有一个也被他非常器重的助手，姓沈名元，据说此人非常有才，也有学识。

但此人家庭出身不好，1957年有不良言论，结果在北大读书时就划成了右派。毕业后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敢用他，在街道上做临时工为生。后来他写了一篇研究太平天国的论文投稿给《历史研究》，当时黎澍任主编，见此文后颇为欣赏，就顶着编辑部内的不同意见将其发表出来。

后来，黎澍又把此人从街道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自己的学术助手。

但是1966年“文革”降临了，对这个右派分子的重用被造反派定为黎澍的一条大罪，黎澍为此吃了很多苦头。沈元在运动中也被批斗，他写了日记，表达对“文革”和毛路线的不满。他这些日记也被造反派发现，他试图逃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结果被抓起来。最后此人被专政机关定为思想极端反动分子，而于1970年枪毙了。我刚到黎澍身边工作的时候，老人就给我讲了关于沈元的故事，言外有告诫之意，暗示要我警惕。

记者：这也是老人的好意嘛。

何新：但是，我在“文革”的十年里，其实人头也已经好几次应该落地了，无非如此而已。所以尽管黎澍当时讲得很重，我却漫不经心，这种轻狂的态度大大地激怒了他。那天老人家真是动了大怒，他敲着桌子责问我：“你狂，你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他这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贯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

当时对于经学，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的确所知尚少。二十四史中我当时只通读过《史记》和《资治通鉴》，对经学则连门都还不能入。而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会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受到斥责后的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主动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记者：黎澍先生同意了？

何新：他没有答复我，但是把这封信转给了近代史所人事处。人事处本来对我这么一个学历、资历均十分浅薄的年轻人给黎老做助手，就有不同意见。因此，姓刘的处长立即把我找去训话，勒令要我三个月内自行联系调动工作，如无单位接收，即予除名（开除）。



记者：您惨了。

何新：但是我又遇到了好人。著名的中共党史、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和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们认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处做调停。黎澍对此也不反对，显示了这位老人的厚道和宽容。

这样，我的工作由黎澍设在中央党校内的办公室而转到设在王府井东厂胡同的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但是一年后，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由于有大量异端言论而被看做是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近代史所呆不下去了。

1984年，温济泽把我调到研究生院任该院学报的编辑。1985年刘再复担任文学所所长招兵买马，把我调到了文学研究所。1991年，我由文学所调到全国政协担任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工作了整整十年。

记者：现在黎澍先生已经故世。您如何评论黎澍？

何新：黎澍先生是好人，是厚道人，是思想开明的人。是一位提携后辈，而且政治思想十分解放的长者。我跟随他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资历在我的履历中仍十分难忘而重要。老人家当年告诫我的一些话，时间愈久，愈令我刻骨铭心。特别是所谓遭受“群妒”，我后来是深尝其滋味。我跟随黎澍时恃才傲物，眼空无物。然而少不更事，涉世太浅，过于年轻气盛。（笑）

在我的一生中，我永远感念曾在我遭遇困顿的时期提携扶助过我的那些师长和友人——钱学森、宁可、闵庚尧、黎澍、丁守和及刘志琴等先生，还有待我如谆谆长者的社科院的两位老院长——胡乔木、胡绳，以及在我每一次院内工作调动时都开绿灯给我帮助的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先生。也包括当年曾帮助过我，但后来因政见有异而分道扬镳的李泽厚、刘再复先生。

六、大同与异化

记者：1983年您是因为什么文章而被列名“精神污染”的？是因为那个“亚细亚”问题的论文吗？



何新与胡绳、王恩茂同志

何新：“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清污”运动中是被列为重点清理的“宣传自由化”的理论异端之一。除我的那篇文章外，当时还有一本书在史学理论界引起震动，作者是意大利共产党人翁·梅洛蒂（U. Melotti），书名是《马克思与第三世界》。

这本书是前辈学者吴大钲教授组织人翻译的，吴先生为此书写了序。吴先生在书序中说：

“本书作者谈到人类社会发展史究竟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是‘单线的’，还是实际上是‘多线的’？除了西欧的一些国家曾经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兴起了封建社会，再由封建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外，其余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在历史上自动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发展图式的框框，我看是十分必要的。”

他还指出：

“中国和俄国比，有更广阔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背景，这种专制主义的余毒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这本书以及这些论点，在“清污”时被列为史学界宣扬“自由化”的重要观点。我的那篇论文由于持有与此相似的观点，也被近代史所列名“清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异化的问题。

记者：“异化”问题在当时也曾引起轩然大波。

何新：1980年当我入手研究异化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在国内思想界还没有形成热点，当时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寥寥可数。

记者：异化问题是如何引起您的关注的？

何新：当时有两种与时代相关的契机。第一是在刚经历过“文化革命”的巨大创痛之后，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开始进行对文化革命的反思。第二是1979年底《马恩全集》第42卷出版，在这本著作中，第一次以中文全文出版了马克思的名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马克思这一部名著中，论述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异化以及通过共产主义回归于彻底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我1980～1981年在科研局工作期间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这部手稿，同时也接触到东欧与西方理论界关于异化理论的研究资料，我把我的心得写成了一篇《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思想》论文。



这篇文章于1980年初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上，重新引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话题。

此文一年后正式发表在《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在我的论文发表之后，“异化”问题越来越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后来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有名的论者中，包括现在在外国的高尔泰和王若水等人。

记者：这个十分抽象的哲学问题，为什么在当时竟会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呢？

何新：其实直到今天，异化问题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金钱对于人性的异化在当今比早期资本主义的时代远为严重得多。

青年马克思的这部《经济学哲学手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曾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存在主义的主题，即关于人类生存的荒谬感，就与人性的异化问题密切相关。

在50年代后期，西欧的存在主义哲学通过卢卡奇等人的著作传播到东欧。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东欧马克思主义中形成了一种非主流的新学派（“修正主义”）。有人开始以“异化”来描述社会主义体制中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以异化理论批判斯大林主义，一些作家、艺术家则提出了向人道主义（人性）的共产主义回归的诉求。

这种诉求在东欧，后来也在苏联60~80年代的文学艺术和知识界中得到了不断增强的回应，成为一种冲击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潮。正是这种始源于文艺界的异端思潮，形成了苏联东欧社会中寻求体制改革的强烈呼声和舆论压力。

记者：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异化这个概念？异化理论与共产主义思潮有什么关系？

何新：异化本来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术语，意指自我对于主体的疏离，即自我本质/人格的二重化、变态化。

马克思说：“黑格尔从实体的异化出发。”“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外在化看作消灭物件，看作人类本质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多次使用“异化”这个术语，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在金钱和资本的支配下发生扭曲和变态。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赤贫者是资本主义异化的极端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性的自我疏离，因此也是异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因素。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异化，使人回复到人性的自然本质（自然主义）——“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性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使人回到真正人的生活这种自然的人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因此，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身中介的人道主义。”

记者：这种以人性复归和人道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似乎有所不同。

何新：你说得对。正是这种差别引发了五六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初思潮。1957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起非斯大林化运动，在秘密报告中尖锐抨击斯大林时代的官僚体制。随之发生匈牙利事件，异化问题成为东欧哲学家批判苏欧体制的重要话题，东欧一些哲学家如卢卡奇用这一话题讽喻官僚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扭曲和人性变态。而这个话题以及人道主义的话题，在60～70年代的中国则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理论和政治禁区。

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所谓“伤痕”文学出现，随之出现“反思”文学。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理论上反思和批判“文革”，人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被引人注目地重新提了出来。同时，西方“战后的废墟文学”，特别是与存在主义有关的“荒诞派”作品等现代派艺术，与存在主义哲学也一起传播进来。

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模仿这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戏剧家中如高行健，小说家中如王蒙、张辛欣及后来的徐星、刘索拉等），接受并开始传播存在主义思潮。最近高行健在香港发表演说，主张“文学远离政治”，了解他的人会说他是欺人之谈。其实，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是很难分离的。高某本身的文学创作过程，与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更是紧密相关。没有他的弃国出走，没有他以“异化”主题对中国制度和社会的长期讽刺与攻讦，他怎么可能得到西方授予的“文学奖”呢？

又例如王蒙的《蝴蝶》，使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完全是一部以“异化”为主题的中国式现代派作品。还有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描述生存与爱情的荒谬性，抒写女性的自闭心理与无助无望的孤独感，这也是极其切近于哲学存在主义的主题。记得她当年曾亲口对我说过，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波伏瓦（萨特夫人）对她的创作影响极大。

在这个时期，我与刘心武、张洁、王蒙、张辛欣、刘宾雁等许多作家有许多联



系,与其中一些人还有相当深的接触和友谊,在思想上互相影响。张辛欣的名篇《疯狂的君子兰》就是我当年曾经和她深入探讨过的关于异化的一个主题,后来她写成小说了。

在此期间,我不仅写作了一批美学论文,还写了一批小说评论。特别是对王蒙的作品,我连续写过几篇颇有反响的评论。我将他的《夜的眼》等小说归类于西方类型的“意识流”小说。我对王蒙小说的评论当时在报刊上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这些争论后来被收入王蒙本人编的关于《夜的眼》及其争鸣的文集中)。我当时的许多评论文章发表后被各种报刊广为转载,包括当时影响很大的《新华文摘》。这些文章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也引起了一些政治家的注意。

记者:那么,异化这样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为什么会在政治上引起轩然大波呢?

何新:1981~1982年,“异化”问题在理论界越来越引起热烈的讨论,在文艺中成为一种非常热门的主题。除小说外,电影中出现了《太阳和人》(导演彭宁),那是一部控诉“文革”时代人性异化而颇具哲理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与东欧和苏联发生的情况相似,这种讨论很快就越过“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代,而深入到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以及其目标与理想的实质性讨论。

一些具有离异体制倾向的知识分子不仅以理念的共产主义批判现实的共产主义,而且有人开始以发达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人性方面(表层的政治民主,对个人自由包括自由表达的相对肯定,发达的科技与生产力等),来批判处在物质短缺(“贫穷、个性被制度束缚、极权制度”)阶段的、现实中的“粗陋贫穷的社会主义”(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而恰在此时,在整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以波兰为先驱,出现了“团结工会”等反体制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运动。

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中的这种种新现象,引起了高层政治家们(政治局)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两种反应。

一方面是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试图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进而维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在哲学、文艺和政治经济思想中涌动的寻求突破旧体制的新锐思潮得到另一些政治家的庇护和支持。

1983年,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工作班子撰写批判“异化”理论,批评宣扬非阶级化的“向人道主义回归”的长篇论文。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开展在思想和文艺领域中“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然而,实际上这个运动只搞了很短的时间(两三个月)就自动中止了。

记者：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您当时处于什么立场？

何新：当时我刚刚被解除作为黎澍助手的职务，正停职接受待调。我所在的近代史所领导本来就对我很不满意。当清污运动山雨欲来的时候，我前期所发表过的那些文章立即就被一些人抓住，被点名上报为这个研究所“散布精神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之一。

清污运动开始时来势很猛。当时上面做了部署，对思想理论、文艺中鼓吹“自由化”的东西进行全面清理。中国社会科学院也组织了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对院内人员几年来所发表的论文进行清理。

我的一系列论文和文艺美学评论文章，包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关于异化问题的论文，关于美学形式主义的论文等，都被列入具有较严重“污染”倾向的论文而被近代史所列入待清理和批判的名单。

记者：那么您挨整了吗？

何新：没有。事实上这个运动只经过很短暂的时间就不了了之了。

记者：您曾说过，你是经过胡乔木同意而破格调进中国社科院的。那么您是否认识胡乔木和邓力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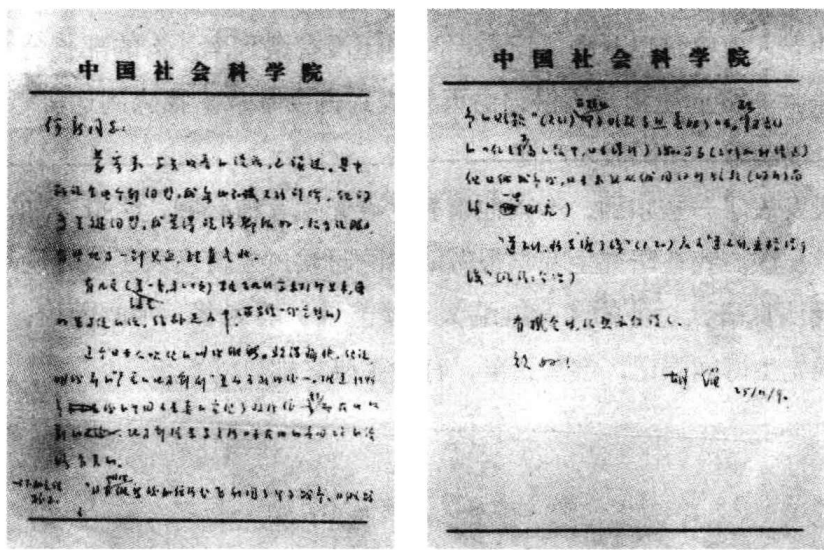
何新：不仅认识，而且可以说非常熟悉。他们两位也是我非常敬重的政治人物。

记者：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左”的政治代表——而你80年代的思想明显“右倾”，甚至属于自由化的阵营。这是很矛盾的？也许他们不了解您？

何新：我认为他们了解。胡乔木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是副院长，也是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都读过我的文论。早在80年代初，当我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就在多次会议上见过他们。后来，我当黎澍助手时，有人把我直接引介给他们。

尽管他们肯定也听闻到关于我这个人如何狂放不羁的许多传闻，但是作为科学院的领导，他们一直比较看重我，认为我有才能。还有后来担任院长的胡绳先生，对我的成长也一直给予过非常深厚的关怀和扶助。

1988年，我还没有可以向邓小平、陈云同志进言的管道，胡绳让他的秘书为我提供了直接的管道。



胡绳致何新信函（1990年）

记者：有一个问题仍令我感到困惑不解。您的政治思想中，特别是您前期发表的那些论点，都具有明显的异端或者说“自由化”倾向。在“清污”的时候，您不是已被列入搞“精神污染”的名单了吗？他们怎么能容忍您？

何新：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精神、政治和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人们的思想已不再是统一的、纯一的、清一色的。与“文革”的时代已不相同，思想和艺术的自由空间已经相当宽松地存在。

还应当指出，关于我在“清污”时被列入名单，确有其事。但是，这只是近代史所搞的，报上去以后上面并没有回应。甚至从来没有人就此问题找我谈过话，指责或批评我写的那些东西。胡乔木、邓力群也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这些文章。

记者：您见过胡乔木吗？

何新：见过多次。给我的印象，乔木是一位十分温和、不多讲话的人。钱钟书曾对人说过，与胡乔木同座，如沐和（春）风，我有同感。许多人说他很“左”，我却常感到他思想深处其实并不左。

“89事件”后，有一次在他家中吃饭，他问我是否了解李泽厚、刘再复、严家其等人的近况，我讲了些在外刊看到的关于他们在国外的传闻。老人沉吟良久，说：“这几个人都是有才能的，走弯了路。”实际上，正是在胡乔木主政中国社科院期间，在他的直接提携下，一批知识分子（我熟悉的如赵复三、钱钟书、刘再复等），都被他委以重用，由“文革”时代的蹭蹬蹉跎而声名鹊起，担任了重要的学术领导职务。

记者：您和钱钟书先生不是也很熟悉吗？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五四”以后新文化所养育出的一代学术界耆宿精英中许多人都还健在。当时的社科院仍是群贤毕集，群星灿烂，如夏鼐、顾颉刚、胡厚宣、侯外庐、吕叔湘等等。在这一辈人中，钱先生并不算是最出类拔萃的。他被擢拔为副院长，与胡乔木的个人鼎力推荐有直接关系。我想，胡乔木此举除了看重他的学问，也是想倚重他作为清流名士的清望。

就我所知，钱先生虽然自负清高，但对于胡乔木也是始终非常敬重的。我有他们两人涉及我的书信和批文为证。

记者：您认为胡乔木究竟是学者还是政治家？

何新：我个人认为，胡乔木与其说是一位政治家，不如说更像一位学者。胡乔木学识渊博，举止彬彬儒雅。他老人家也给我写过信和批示，甚至句斟字酌地批改过我的文学和美学论文，用铅笔在清样上写的边注，将我的每一个笔误、错别字或者有疑问之处一一标示出来，一丝不苟，用心之细密令人不能不叹服。

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在他临终前数日他家人曾经来电约我去医院看望他。但当时我恰好正患很重的流感，怕到医院会传染给他老人家，使他病上加病，就说等过一星期病好后再去。没想到接到这个电话后不久老人就突然去世了。死生契阔，遗音绝响。令人感慨系之！

记者：您熟悉邓力群吗？

何新：也很熟悉。

记者：您对他印象如何？

何新：我很钦佩他。我认为邓力群是一位坚定的、罕见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有一位高级领导人曾对我说，他听邓小平讲过一句话，说邓力群这个人骨头很硬。我认为这是知人之言。

“文革”后期的 1975 年，邓小平委托胡乔木、邓力群主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准备与“四人帮”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不久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胡、邓也再度挨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被迫写了检查，而邓力群则拒写，就是一字不写。

我从来声明，我本人在意识形态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也不是什么“左”派。我只是国家主义者、中华民族主义者。我认为每个人有权利信仰不同，信念不同，追求不同，但只要能始终如一，这种对节操的坚守就令人敬重。我见到的邓力群就是这样一位信仰始终如一而具有内在信念和操守的人。

据我所知凡是了解他生平的人，无不对他深怀敬重。

记者：您后来的政治思想转变（转向政治保守主义），是不是与他们对您的

影响有关？或者，是不是一种投机呢？

何新：不。我的思想确实发生过一系列转变。但我的转变是基于我自身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与他人对我的影响无关。我这个人是很固执的。如果讲政治投机的话，那么在80年代中后期，我应当投自由派之机，因为当时那种思潮才是最时髦，并且拥有强有力背景和资源的主流思潮。

十几年来，我曾反复自问，我所求索和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说到底，无非是四点——祖国、理性、公正和正义。祖国存在，客观真理存在，这两点毋庸置疑。但是，社会公正和正义并不总是存在。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更值得为之而奋斗！

我从来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但是我始终看重的是国家利益，我是爱国者，我也非常关注社会公正和公平性的问题。

在许多年里，我曾经苦苦求索，研究历史上和世界上的各种学派、各种哲学、各种学说。在70年代末，我曾醉心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语言释义学、结构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和多元论等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思潮。

我曾经深感兴趣于胡适的实证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鄙夷和冷漠。在经济学上，我也曾相信凯恩斯和萨缪尔森，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一套经济理论已经过时。

但是最终，在政治经济学上我回归于马克思的学说。因为我发现马克思《资本论》剖析资本主义本质的基本原理、方法，颠扑不破，经得起一百多年来历史的反复销磨和检验。我认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念所体现的对于社会公正和人类正义的理想追求，始终是值得尊重的，即使它的确是一种乌托邦也罢。

记者：您相信共产主义真的可以实现吗？

何新：其实不可能实现，但它至少还是值得追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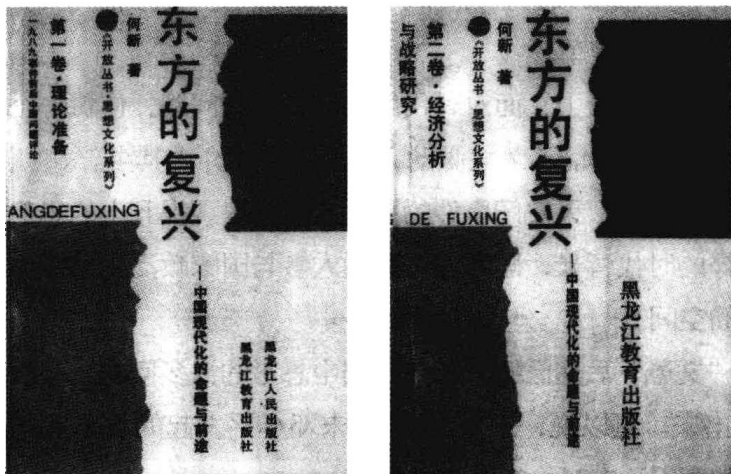
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曾经这样表述共产主义的理念：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亦即不能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

在这里（共产主义制度中），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



产出自身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革的绝对运动之中。”



《东方的复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1993）

共产主义追求人类发展的全面性，追求社会的正义和公平，主张资源和财富的普遍共用，而不是弱肉强食，让多数人成为少数人、少数强势利益集团所剥夺、所蹂躏，让资源被利益集团所垄断，从而使人性被异化。能使个性得到全面地解放和发展的共产主义，难道不值得作为一种终极的社会理想而被追求吗？

也许，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理想的、体现社会公正的终极形态。但正因为它是一种“终极”，是一种“绝对”，正如数学中的“无限”，它是不可能达到的。社会文明是否会有其终极形态？这种终极形态是否必然是共产主义？（也许共产主义就是物理学中那种“熵”的概念，即热平衡的状态？）毋庸讳言，我对此，至今也还在思考中。

七、与高层的互动

记者：您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学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呢？

何新：是时代因素使然。老实说，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的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试图向毛主席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文革”结束后，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震荡。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

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

当年往事历历在目。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这种不断面临重大选择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为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舞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

于是，从“文革”后期已经不断在我脑中思考的许多问题，我决定以多种形式陆续将它们写出来。可以说，正是70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

记者：您的政治言论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高层注意的？

何新：80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你只要检索一下那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资讯报》等报刊就知道了。

这些从全国出版物中摘选重要文论的报刊，当时经常转载摘录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理论观点。1985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

它们引起了政治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做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

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其后（1988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

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和赵紫阳等领导人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



政治界的关注。1990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记者：请问全国政协有多少专职的委员？

何新：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工资关系放在政协。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十年前我担任政协委员时，才四十出头，是当时唯一比较年轻的关系放在政协的委员。



何新与李先念同志

记者：您所说的关于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

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较自由放任的性格与作风。我是一个狂狷之士。由于我过去写过很多政论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议，有人认为我会以此作为仕进之阶。

应该说，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开了。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

记者：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

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

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

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

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

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

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



(上海)云间水庄(2002)



在北京的50国中外记者采访会上答问(1991)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析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

好在我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已经存留在历史中了。就让后人去评说吧！^①

记者：您和高层其他领导人有直接联系吗？

何新：是的。当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写的东西都是同时复印七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鹏）、李（先念）、王（任重）。1993年后，老人家们陆续去世了，我一般就

^①参看《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只送报江、李了。

给邓小平送材料，当时既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管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中。我记得最后一次送文件是在1994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过问大政，我才停送。

很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高层对我的意见或建议的评论。我常常只是从后来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政策方向的调整中，去观察我的意见和建议的作用。事实上，我给中央写调研报告或形势分析从来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很少揣摩上面对此已有什么精神状态，也很少顾忌他们爱听或不爱听。不能说我完全无所顾忌，但的确是比较不顾忌的，我比同时期体制内的任何知识分子更勇敢地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向中央领导人割切直言。这有我的书放在那里可以作证。

当然，我思考的方向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的。至于后来上面的政策与我的意见不合，我也不会太介意。

我的地位不过是“从大夫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该讲的我已经讲了，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言责了。

记者：对您所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有何印象？

何新：我通过切身接触体验到，跟随过毛打天下的老一代领导人，确实极其伟大，1949年开国时的中国共产党，集中了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政治精英，是人杰中的人杰！我在与老革命家的接触中，知道了何以共产党能得天下。

记者：如果由您对自己做评说的话，您如何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给予一个定位呢？学者——政客，或者介于二者之间？

何新：不，都不恰当。你知道罗丹有一件作品？“the thinker”。那是一个低着头作痛苦状的深思者、思考者。

黑格尔讲过一件轶事，他说：有人为斯宾诺莎的一幅画像作了如下的题辞：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①

真正的哲人永远会受到世俗的谴责，也经常会是忧郁的，我也是一个忧郁的受谴责者。

记者：虽然您认为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承认，甚至会认为你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异端。像陈云、王震作为主流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们怎么能接受你的那一套非正统理论呢？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第4卷，97页。

何新：这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其高明之点。他们知道时代在变，意识形态也需要变，面对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必须形成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注意到了我的理论。

的确，我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还会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

多年来我一直是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的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近代西方学术汇合融通，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

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二十年来的探索和心血。这种努力，我在80年末已经开始做。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才能消解以至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

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一些所谓“主流精英”，也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事实上，我经常戏弄他们。

记者：您对当前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怎么看？

何新：“和谐社会”的理想承前启后，好。“小康”不是一个高明字眼，“小康”这个词出自《礼记·礼运》，孔子当时使用这个字并不是褒义。大同是大一统，天下为公。小康是小国寡民，小而康，私天下。小平同志当年提出“小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战术目标，是过渡状态，而非终极性的战略目标。我研究邓小平的著作，我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终目标仍是追求于“大同”的。

“以人为本”当然比以“金钱”为本为好，是一种纠正。如果“以人为本”是指“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那就更会得人心，“人”的概念毕竟还是太抽象了。

记者：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请问，现在您如何看待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何新：虽然我在“文革”期间成为“反革命分子”，挨过整，但我始终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至今仍是，永远会是！有人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认为，毛泽东所具有的超人魅力，所实现的历史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是空



前绝后的!

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介书生，两手空空，以短短 28 年的时间，组织起一个百万人的党，数百万人的军队，在最落后原始的物质条件下，以最粗陋的武器，战胜国内军阀和国际列强，竟所向无敌，纵横天下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无上领袖；又以战略指挥和精神力量，运筹帷幄之中，遥控千里之外，击败二次大战中曾战胜日本并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为首的十四国军队，最终竟迫使美国总统折节就教，来中南海向之顶礼朝拜。这种种作为，不是神迹难道是凡夫俗子之所可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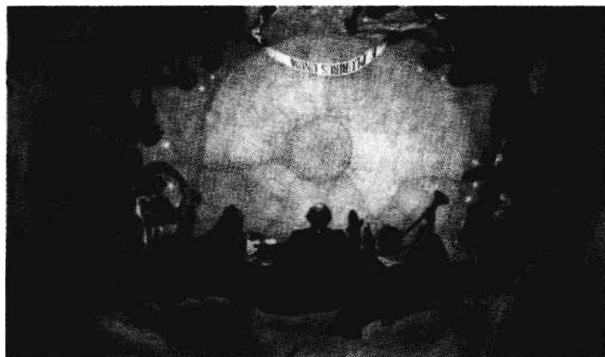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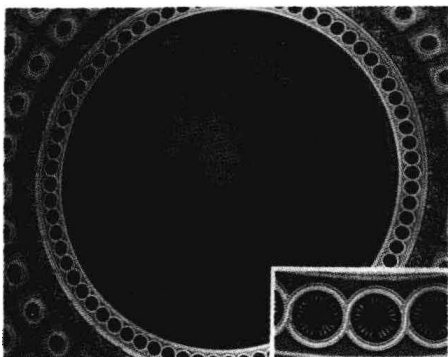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毛泽东是平民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农民的英雄，穷人的英雄，被压迫者的英雄。毛泽东是一个奇迹，其实，即使毛泽东不是神国家也应当把他尊作神！法国人的神是拿破仑，美国人的神是华盛顿、林肯，而毛泽东比这一切洋人们的开国英雄都伟大！一个没有值得崇拜的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遗忘了他们的伟大英雄的民族也是可悲的！历史会有反复，历史会有否定，但还会有否定之否定。水落石出，天开云散，中国人还是会崇拜毛泽东。

记者：人们会说这种崇拜是帝王崇拜，是封建主义。

何新：许多人指责中国现代政治中有封建性尾巴，主张不断反封建。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就没有封建尾巴吗？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的女皇制度，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不是封建尾巴？难道妨碍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了吗？条条道路通向罗马，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不是只有美国模式的道路。英国人崇拜女皇，日本人崇拜天皇，法国人崇拜拿破仑，美国人崇拜华盛顿。毛泽东是现代中国之父，为什么我们不能崇拜毛泽东？

[补注：有必要谈谈美国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艺术。其实，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也会造神。丹·布朗（Dan Brown）在“The lost symbol”中指出：美国国会大厦中的华盛顿神像就是 19 世纪美国造神运动的产物。

布朗说：“这幅画名为 Apotheosia of Washington, apo 意思是‘成为’，theo 意思是‘神’，apotheosis 一词就是‘转化为神圣’的意思——华盛顿成为了上帝。这种从人到神的转变被称为‘神化’，不管你是否理解，这一论说——人转变为神——就是国会这个圆形大厅符号的核心。”]



美国国会大厦：华盛顿变成神圣

20世纪90年代初我访问过日本。在某些方面，我不喜欢日本人。我实地见到过日本右翼组织的集会和街头游行，那是很令人恐怖的群众运动！我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确实正在某种意义上复活。

但我认为，日本作为民族是令人钦佩的民族。他们令人钦佩之点是他们的坚忍、团结、向心力和向前看的精神。这是一个有耻辱感的民族，因而是一个非常自尊的民族。

二次大战中遭遇失败，遭遇原子弹轰炸，这是日本前政府、日本天皇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给日本人带来的空前浩劫，其后果不会小于“文化革命”对中国的浩劫。

但在日本没有人抱怨天皇、批判日本的政治制度，甚至连辩论也没有。他们不懂得什么“反思”。他们继续接受天皇制度——这个最古老封建皇权政治的象征，仍然以其作为圣物。他们埋头苦干，学习先进的东西，但决不轻易丢弃一切属于自身文化传统中的任何东西、任何象征物，包括封建神社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结果，经历了战后的苦难，40年的时间，这个民族重新站了起来，并且成为全球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

记者：有人议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

何新：（笑）我不轻信那些传言。但即使它们不是捕风捉影之谈，那些八卦也不值一谈！对于伟人的一生一些轶闻不过是花絮。须知伟人也是活生生的肉身之人。对那些以此讥评伟人的人，我常会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看到别人眼中的一根刺，看不到你们自己的眼中有一柱梁。”



何新与邵华拜谒毛泽东纪念堂（1991）

记者：中国人本来崇拜毛泽东，但是“文化革命”……

何新：我在70年代已经从政治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是在今天，我却认为对“文化革命”应当作历史的分析。我认为毛泽东60～70年代的思想，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具有重大的飞跃和发展。这方面至今人们研究得非常不够。

毛泽东是传奇性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是一个超越历史的存在，永恒的存在！他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极其丰富的战略性遗产，这种遗产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20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人。

八、回顾90年代的一场政策辩论

记者：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李鹏总理的“幕僚”。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何新：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是，在90年代，我的确曾就当时一些重大经济及国际问题，向李鹏总理报告过我个人的一些不同意见。

记者：您在当时，曾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李鹏总理提出过建议？

何新：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记者：（笑）会有人不赞同你的这种说法。

何新：但是历史事实和有关资料、文献俱在。你可以根据我下面提示的线索回去查阅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记得，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当时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总的需求过大，而生产方面则经济供给不足。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经济过热”论。这种“过热论”的理论根据，实际是80年代在中国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理论。^①

实际上，在1988年的经济改革问题辩论中，我本来是最早公开批评经济过热和激进改革政策的人之一。我的批评当年曾发表在1988年的《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的《明报月刊》上。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认识到：现时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所谓“过热”只是表象而非实质，真正的问题是发生了严重的“生产过剩”。

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供给过剩，而市场货币需求不足，也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我的这种见解与当时官方的正统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普遍看法也完全相反。

记者：“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不是一个理论提法的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重大差别吗？

何新：这两种理论所关联的经济政策涵义非常不同。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理论的观点，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导致政府在财政上实施赤字政策，同时货币发行量过大，

^①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曾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世界经济计量学协会主席，是美国、英国和瑞典等国科学院或经济学会的国外院士或名誉会员。科尔内以其《短缺经济学》闻名，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短缺经济”因此书成为80年代经济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短缺经济学”（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New York, Oxford, 1980年英文版）的中文版，是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最热门书，对处于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科尔内也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管理部门的座上宾。



以致许多供给部门出现“瓶颈”，市场商品不足，物价迅速上涨；从而陷入经济危机。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报中央的几个内部材料，那是1988年前后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当时总理的一封信。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货币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形势所提出的就是上面的这种看法。他们都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供给不足，所以才会发生经济过热。他们认为在价格改革后物价放开后，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根本性建议，是主张必须加速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与后来俄罗斯实施的“哈佛改革方案”以及萨克斯“休克”疗法内容基本相同）。而当时中国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完全呼应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大力地鼓吹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即一步到位的市场改革论。

当时中国银行中已经有比较高额度的民间社会储蓄。为此，那些美国专家就警告中国政府，说这些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一群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被提款从而冲进市场，就会导致商品抢购风潮，使物价更加高速上涨，则通货膨胀就会更加严重。

据此，美国专家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一些具体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形势恶化，准备应付抢购风。

（2）必须多进口物资、少出口商品。

（3）提高银行利率，以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加速对于国企的制度改造，转轨为私有制。

（5）加速结束外汇管制，尽快放开人民币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

据说这是西方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类似的这一套建议，在1989-1990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最后一点外），都被国家在政策上采纳，或者准备采纳了。

记者：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实际是很有道理的，难道当时您认为不应该实施这种意见吗？

何新：是！在1989—1990年间，我重新研究了《资本论》，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我获得了一些新的想法。

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就是企业资金相互拖欠，银行贷款无法回收。而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现象的发生机制，往往与企业产品的

销售困难有关。

我发现，正是由于众多企业所生产的产成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极其严重，才导致生产资金收不回来。于是而形成了企业间的债务链，即“三角债”，并且还不了银行债务。由此我意识到，这个所谓的“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换句话说：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真正原因，正是由于企业生产的产成品转入库存后发生大量积压，才导致了市场资金的回流困难——这其实就是古典经济学所讲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还应当补充说一下，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一部书，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名著《经济学》。萨氏认为：所谓“生产过剩”，完全是一种过时的古典概念。他说西方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经济政策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世界经济中再也不会发生所谓“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了。

但是我意识到，1988～199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形势，虽然表面是发生过热和通货膨胀，原因恰恰不是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问题实际是由于“生产过剩”所造成的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

由于那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形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旧体制；遂导致多数国有企业在直接面对市场后发生销售困难。所以，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严重“短缺”，是所谓“经济过热”。但是如果看一看财政部所统计的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数字就会知道，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产成品积压，一系列商品库存一直在不断高攀上升。而正是产成品的销售困难，导致企业之间资金周转困难，“货币稀缺”，导致还债困难。于是发生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即“三角债”。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恰恰就是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所讲的表现“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类型的危机，恰恰不能采取那些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政策建议。也就是说：绝对不应继续囤积物资。不应让银行实施高利率吸储的政策。不应扩大商品（消费品）进口，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大量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国内企业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针对这个必须保护国内市场的问题，我当时还给国务院领导专门写了几篇论述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文章。我在那些文中独创性地表述了一个“市场有限界规律”，



以此来反对作为主流经济学重要理论基石的“市场无限界”规律，即著名的“萨伊”定律。^①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在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中明确地提了出来。

在该文中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无疑是对当时国内外的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正面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片愤怒、反对和讨伐之声。大家都说：何新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完全缺乏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的无知滑稽之谈（笑）。中国是这么穷的一个国家，怎么还会有生产过剩？实际上，中国的那些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实质是一个金融概念，与物质的“穷”和“富”的问题并没有关联。结果我当时遭受了一场大围剿，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记者：那么当时国务院领导方面对此有什么回应？

何新：李鹏总理知道我的看法后，很表重视。他委派秘书与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对此的意见和有关政策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面谈。

记者：那么，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新：既然认识到问题是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过热”和“短缺”上，根据这种新的认知，我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 (1) 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畅快回流，从而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 (2) 降低银行利率，释放居民储蓄，鼓励居民消费，从而启动市场。
- (3) 抑制消费品进口，积极鼓励国内产品出口，给予出口企业鼓励政策；从而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 (4) 从严控制和限制新增生产专案的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可以说完全是针锋相对的。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总理，也呈报给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先念等最高领导人，进一步说明和论证关于“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等问题。这些文论，有的发表在《内部文稿》等内参上，后来收入《何新政治经济论集》

^①萨伊定律认为，市场调节使供求自动平衡，因此，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

(白皮书,内部版)。其中大部分后来编入公开出版的三卷的《新战略论》一书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耐人寻味的是,我当时的意见虽然是那么地孤立,或者说那么地“边缘”,但最终居然被李鹏总理基本都听进去了。

你可以看到,在以后的几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全放弃了所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套话。

正是根据中国经济中存在“生产过剩”这一新的思路,国务院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举措,例如:

- 提出“限产压库”(限制生产降低库存)的措施;
- 在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银行存款利率(实施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
- 实行了双休放长假的制度(目的显然也是压减生产和刺激居民消费);
- 提出大力遏制重复建设的举措,大规模压缩新开项目新建工厂等等。

特别是后来,国务院又采取了出口退税等一系列大力鼓励企业出口的外向化战略和政策,从而全面拓展了国内产品的出口市场。

所有这些疏滞通流的政策措施,结果证明是有效的。而这一整套新政策的基础,完全是基于对中国内部生产力确已存在严重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当时,这些疏滞通流的政策措施,明显地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2~1993年前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经摆脱。

现在回顾起来,正是从那时以后,国家一直大力采取鼓励出口和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战略,因此中国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而后来在中国加入IMF国际贸易体系后更加迅速地融入了贸易全球化的进程,遂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覆盖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结果,中国获得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由一个资本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跃升为资本输出的经济强国,出现了持续十几年不断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然而试问:如果在1990~1991年的转型之际,国家经济政策选择了另一种方案(即美国专家们所提出的那一套方案:体制内折腾,以内需为主导,开放货币体制,实施休克疗法),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什么又会是什么样子?必定是通货膨胀,政府赤字负债累累,国家动乱,土崩瓦解而成为类似南美菲律宾的那种依附性“后殖民地”经济了吧?^①

^①此文收入《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2008)、《反主流经济学》(2010)二书。



九、横议食货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经济学的？

何新：70年代，1974年前后。

记者：那么，当时您用的教科书仍然是苏联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何新：是的。起初我读国内一些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又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发现那一套东西究竟在讲什么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懂，远远脱离经济现实。可以说，这类书我从来没有读得懂，就像我后来也读不懂马歇尔、萨缪尔森的那套玩意儿一样。

记者：怎么会读不懂。

何新：读不懂，不是说我读不懂那种书上的文字。问题在于你尽管读了那种书，你会发现你仍然搞不懂社会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你会发现书上的理论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现实是两张皮，贴不到一起。

当然，起初我不敢认为书上的那些理论是扯淡，而只怪自己水准低。因此就想更多地读些书，弄懂现实中的经济究竟是怎样运行的，这样就愈读愈多。有比较而后有鉴别，头脑就渐渐清晰起来。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

何新：我对经济学的研究，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70年代。那时我的导师是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王亚南译），以及恩格斯和考茨基作为《资本论》第4卷编纂的三册《剩余价值理论》，当时我读过的引我入门的启蒙读物还有几种《政治经济学概论》之类。

第二阶段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一系列手稿（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①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笔记的中译本在国内陆续得到全文出版。我用了许多年时间，反复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这几部作为《资本论》手稿的未完成著作。

我们知道整个《资本论》实际都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现在形态的《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流通）、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都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别人整理编纂的。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生前未出版的原始手稿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比已出版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卷50卷。

的《资本论》更为重要的著作。极为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第二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32卷译文与《全集》第一版有极其重大的不同,可惜目前新版尚未全部出齐。

但是,马克思过于偏爱黑格尔式的“叙述方法”,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许多重要规律的表述是晦涩的、绕圈子的,因此与黑格尔一样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迷宫。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那么一个啰啰嗦嗦和说了又说的作家,而他的理论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论证上所处的那么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丝毫信心地指出,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版)

只有少数人真正读得懂他,这其中有列宁。而列宁则在《哲学笔记》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①实际上就我所读过的苏联与中国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而言,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没有一本书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了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思想。

要注意,庸俗经济学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庸俗解释斯密的;一种是庸俗解释马克思的。改革前那种政治经济学就可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一派的庸俗经济学。

第三阶段是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我开始研究和阅读有关西方现代宏观及微观经济学的著作,包括来自各个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当代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这期间我研读过的书包括萨缪尔森、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琼斯、斯拉法、哈罗德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著作。

在这个时期我也曾考虑过作为一种中性的、超意识形态、超越集团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的纯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ic)存在的可能性这一问题,最终我发现它不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为了研究经济学的思想史,

^①列宁《哲学笔记》第151页,1993年新版。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我发现并研究了与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持反论的李斯特主义。我注意到这一派经济学对德国、美国等后进国家在 19 世纪晚期的崛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国富论》是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的手边书一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手边书是李斯特的书。这是一种引导美国和德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具有极大政策实用意义（近代关税理论的奠基者）的经济学。但是，我同时惊讶地注意到，李斯特学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属于被有意抹杀和遗忘的一族。在德国，李斯特被看作一位民族英雄；但在英、美主流学派的经济史中，

李斯特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

记者：您认为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德国的民族英雄？

何新：20 世纪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约·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称李斯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弗里德希·李斯特（1789 ~ 1846）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上和感情上都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这是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而这正是德国国家统一的萌芽。这种同盟对德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能被那些幸运的国家的人们所理解的。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家生存的权利和国家的野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李斯特像所有那些从事漫长的艰苦斗争从而名垂史册的人们一样，是一个民族英雄。即使作为科学经济学家，李斯特也具有伟大的素质之一，即关于国家形势的伟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本身虽不是科学成就，却是取得某种科学成就（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先决条件。^①

熊彼特的祖国是奥地利，他是作为一个德语民族的学者而讲了这样赞颂的话。他所说的“那幸运的国家”就是指英、美、法国。但是，在英美多种主流经济学家撰写的经济学说史中却根本找不到李斯特的名字，就好像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存在过。毫无疑问，英美政治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知道李斯特的名字，更不希望人们研究他的理论，尤其害怕这些国家采纳李斯特所建议实施的民族主义产业政策。

^①《经济分析史》，1960 商务印书馆版，第 2 卷，195 页。

但另一方面，我却惊讶地发现，在沥除了空想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之后，20世纪30年代苏联和50年代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民族工业的催生和保护体制，与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所宣导的民族主义工业体制，同时与德国、美国19世纪的民族工业保护体制，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点。换句话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除了通常被指责的“空想主义”以外，还另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及必然性。这种现实性，正是苏联、中国能够实施快速的工业化革命并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我形成了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第四阶段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这个阶段我深深地卷入了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关于国家现实经济方针政策的研究和政策辩论。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发表属于我个人的一些独特的经济观点。1987~1988年，我是当时国内最早在专业报刊《经济学周报》上公开撰文挑战“休克疗法”，指出某些智囊们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会引发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知识分子。我也是最早提出“诸侯经济”和当代黑社会的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正因为如此，这些批评引起了包括邓小平、陈云，也包括当时领导人的注意。这些观点后来收入《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等书中。

这就是我研究和思考经济问题的大致过程。

记者：尽管您出版了许多关于经济政治问题的著作，尽管人们知道您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高层决策。但是，学术界仍然很难承认您是正宗的经济学家（不仅因为您师出无门），也有人始终怀疑您对于经济问题发表议论的资格。

何新：（笑）应该说这是一种学术霸权。但是，霸不成。他们有言论自由，我也有言论自由。我不会介意一些人承认不承认，我追求的是另一种承认——被历史所承认。

资格就是一种限制，各种专业、行业之间都有一种俱乐部（行会）式的组织，存在着一些圈内人制订的游戏规则，突破了这种游戏规则闯入者总是不受欢迎的。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他指出，“所有的时代都提供了令人发笑的事例，说明科学界是如何反对标新立异者的。”（《经济分析史》，商务版，第1卷，130页）

其实我本来也无意闯入。然而，经济理论问题太重大了！它并不是一种职业或游戏，它关系到国家的宏观决策，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



计与安全。198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就经济问题发表过言论。但是当一些智囊提出高速通货膨胀无害论，提出关于全面推进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以及抛出了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引导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方向发生了问题，我意识到国家可能终将面临由于经济秩序崩溃而陷入的动乱和分裂，因此我不得不发表我的经济观点和批评。我的批评引起了反弹，反弹又引发了辩论，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我只是这样才闯入了某些专业人士所设置和试图加以垄断的经济学这块领域的。最大的一场辩论发生在1990年底，就是《人民日报》以头版要闻及三版半的地位全文发表了我与日本S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长篇谈话录之后，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回应。（见文后附录）

记者：您刚才谈到1990年围绕您的经济观点而发生的一场大辩论，我在1990年也曾读过您与日本教授的那篇谈话录。这个谈话录当时在海内外不仅产生了轰动，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将这篇谈话录引发的轰动效应称作“何新旋风”。《人民日报》是党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以三版半的篇幅，发表这样一篇谈话录，是十分不寻常的。

何新：其实，《人民日报》决定发表此文前我曾向编辑部建议，为避免此文造成过大的轰动，希望将此文分为若干篇，采取连载的形式陆续发出。但是高狄社长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就是要轰动一下。结果，一次性全文刊出了，也果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把我放到了火上去烤（笑）。

记者：现在已时隔多年，你可以谈谈关于这篇文章发表的整个背景情况吗？

何新：矢吹晋是日本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90年来中国访问，一位日本友人介绍我和他认识。矢吹晋不懂中文，当时为我们的交谈担任翻译的是日本共同通讯社驻华记者部的一位负责人。在矢吹晋下榻的北京长富宫酒店咖啡座中，我们就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以及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记者：您的谈话录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矢吹晋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称这个谈话录是伪造的，他甚至否认发生过这样一次谈话。

何新：（笑）那天谈话在现场的包括我带的记录人，还有担任翻译的共同社记者，一共有四个人。证据是很坚实、充足的。

记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否认？



1992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

何新：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谈话发表后对矢先生的处境造成了不利。他在与我交谈时，尽管总是他提出问题我回答，但他常常处在一种很被动的地位，因为我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常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很震惊，经常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能惊讶地说“哦”。（与我交谈过的许多西方记者，包括一些极著名的记者，都曾遭遇过这种情况。）他不可能接受我的观点，但对我的论点又难以作出强有力的现场反驳。而他在日本是一位颇有地位和名气的右翼学者，又是中国问题专家，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对他很不利。据说在这个谈话录发表之后，他一度甚至受到面临在大学中被解职的压力。要知道，在日本学术界，右翼民族主义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强大的主流。对由于这个谈话录的发表而给矢吹晋先生造成的困难，我个人一直深感遗憾。

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被发表的谈话录，确实经过我的加工和修整。因为这个谈话记录不是录音记录，而是根据当时我的工作人现场做的不完整的笔录，事后我作了若干重大的补充和修订。我做修订的原则是，对对方的提问和观点，尽量保持原貌，只对我的回答做补充和修整。

记者：我认为这件事您处理得不妥。不管对方观点如何，您不该不经他同意而公开发表一个不忠实的记录。

何新：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做，那么我的做法当然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有一个误会。失误点是发生在新闻单位对这篇文件的处理上。



矢吹晋在与我交谈时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及改革的一些问题，是当时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已形成比较系统的一系列崭新的思路和想法。因此在这次交谈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谈话录立即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以后，我立即将它直接送报给了中央最高层邓小平、陈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王震、丁关根等领导同志。

这个谈话录我最初并未考虑要公开发表。但是这个谈话录在内部流传开来，先是《北京周报》的负责人耿先生找我约稿，接着《人民日报》高狄社长也派理论部主任孙友仁找我约稿。他们索取这个谈话录看后，都希望发表。我对他们说，这个记录已不是原始记录，希望发表时不要使用“矢吹晋”的原名，而改称不定格的“S教授”。人民日报采纳了我的意见；但《北京周报》编辑部认为，有真实对话者对外宣传会更有力量，因此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未特别告知我，就直接以“与矢吹晋的谈话录”为题迅速地译成七十多国文字予以全文发表。由于《北京周报》也有日文版，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立即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随之引起了矢吹晋先生强烈的抗议。而港台一些媒体则趁势鼓噪起哄，对我进行从人身攻击到观点批驳的强大声讨，引发了一场席卷海外传媒的喧然大波。

记者：当时海外媒体确实曾爆炒此事，对您的舆论压力应该是很大的。您当时感受如何？

何新：当时有人可能希望可以借此风波一下子把我搞臭、搞垮。但我只是觉得颇为好笑，有看热闹之感。冷眼看他们如何借题发挥，大炒特炒。多年来，看我在海外的一些对手，我总感觉他们有些弱智，他们竟认为我会犯那样低级的错误。（笑）

记者：现在已过去了10年。如果您重读这个谈话录，您对它评价如何？

何新：我惊讶当时交谈中曾谈到的一些问题，现在居然仍未过时。

记者：重读一遍，确实还是很有意思。

何新：请注意，在国内外当时所有的经济文献中，我的这篇东西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是破天荒的！要理解这一观点在当时所造成的冲击力，应该考虑当时存在的以一些背景情况——

第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生产过剩”是一个过时的、无意义的概念，应该予以丢弃（他们试图用“短期波动”置换这个概念）。

第二，当时国内正流行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形态属于“短缺经济类型”。

第三，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讲，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也就是供给不足。

第四，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一直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目标就是必须无限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讲过很多次）。

第五，关于以过剩产品向海外市场积极输出这一建议，与当时国务院得到的来自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正好相反。当时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发生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因此建议中国政府囤积物资、提高存款利率，防止民间储蓄老虎出笼冲击市场。

中国早期经济政策，自从计划经济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具有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天然影响，即相信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会自然带来无限的需求（萨伊定律）。而自我提出“生产过剩”问题，也就随之引出了实施“需求管理”的问题。所以其他不谈，这篇谈话录中仅仅提出这种新观点，就已足以产生巨大的冲击波以及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还有文中谈到的关于下岗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当前现实问题。

记者：现在，关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生产力过剩以及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何新：但当年这篇谈话录最初发表时，多少经济学人愤怒地指斥我这一观点是荒谬和无知呵！因此对我的观点，有的后来被听进去了，有些就没有被听进去。

记者：您现在对中国经济还是这种观点吗？

何新：不。我认为我们已必须面对新的现实。毕竟已经隔了10年，中国的现实，当代世界的现实，都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面对WTO，面对“全球化”，面对国有体制可能逐渐加速被消解、溶化于国际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进程，更进一步说，面对中国可能最终再度陷入由这一经济进程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我认为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思考。我想知道的答案是——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去？世界会向何处去？

近几年来，我再度向中央就经济问题多次进言，提出我个人的独立见解、批评和意见。我认为当代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有责任也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

记者：您对经济形势问题的看法，是否看负面的东西太多？因此而难以被人们普遍认同。

何新：可能是。我个人的悲剧也在于此。古希腊智慧女神密纳发的象征不是一只吉祥鸟，不是喜鹊，而是一只猫头鹰。这个象征是意味深长的。而黑格尔说，密



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

我们所面对的是 21 世纪。回顾 20 世纪的整个历史，在前 90 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世界革命；在后 10 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反”革命，即回归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新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运动。

历史使人发笑。每一代人都会具有一种自我永恒的幻觉，现在是小布什一类说我们必胜。其实这不过是历史之流行进中产生的虚幻的政治意识形态泡沫。人类是多么缺乏自我嘲讽的历史感呵！但是，上帝总是会嘲弄人的。

十、谏为苍生

记者：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过去一些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有哪些，主要失误又有哪些？

何新：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今天所已取得的进步，说老实话，早已大大超过十几年前人们对于改革成就的预期，也超过我个人的预料。这两年国外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实，较早地讲崩溃的——是我。我在 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写的东西，经常有杞人之忧，喜欢预言崩溃，“危言耸听”。

但是这么多年，中国总的局面还是比过去好得多，进步得多。当然问题也增多了，问题与进步的速度成正比。尽管始终问题如山，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并没有崩溃，短期内也不可能崩溃。这么大的国家，侈言崩溃，谈何容易？

今天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路还远没有走完，许多问题的辩论仍在进行中。恐怕没有什么人看不到，巨大的危机正隐伏在进步和发展之后。但是，我想以后是应当多分析具体问题。这是我对自已这些年来议政之言的一种反思。

其实政策与历史，本无绝对错误可言。任何路线，任何政策，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因此也总会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只是利谁害谁，有多数与少数之别而已。问题也只是承受利害者孰多孰少而已。但是，不利多数人，则不利全局；不利长远，则不利根本。所谓错误的政策，无非如此而已。

从历史看，人类总是倾向于犯尽一切错误，才能逐渐找到正确的方向。缺乏经验的统治集团总是趋向于利用权力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直到走向反面，才会有所有改变。在此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记者：那么您也在等待“戈多”吗？对不起，说句笑话。还是想知道您对

当前问题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政府近一些年在改革中的主要失误是哪些？

何新：我认为最重大的失误，主要是发生在2000年以后，各地政府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私有化。通过这种改革，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济。

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大规模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

可惜现在问题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抢光、偷光！国企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员沦为失业者，而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只是绝望。

过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再也不是“隐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还有不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

许多人没有了饭碗，一家人没有机会，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

记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在向完善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何新：这是一种非常冷血的说法。事实是，中国将会长久地承受由于近年国企大面积破产解体之后所带来的严重失业之痛。

与过去所谓“国企低效率”相比，这种长痛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几千万失业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连带影响的是几亿人，比30年代西方的大萧条严重。

西方市场经济下也有失业，但是没有“失业大军”。事实上，“失业大军”这个名词是令任何西方政府听了都会感到恐怖的一个名词。公然制造失业大军的政策，也是足以让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西方任何一届政府垮台的政策。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失业者不会坠入赤贫绝望之境，防止他们铤而走险，从而避免将社会导入动乱之途。而中国那些鼓动这种“改革”政策的经济学家，真是对历史既无知又胆大！

所以我认为，疯狂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毁灭中国！他们公然鼓吹为了“现代化”和所谓“效率”，不惜“牺牲几代人”！他们是冷血动物，而且惊人地肆



无忌惮。

记者：以您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确实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扰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背景下，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这纯粹是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英国经济学家道顿说：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 J. B. 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卢卡斯也指出：

“凯恩斯《通货》一开始就断言，均衡理论是无法得到的，失业不能解释成个人选择的结果，以及工资不按照古典理论预计的方式去运动被看成是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①

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使一代经济学家摆脱了均衡理论的条条框框。

^①参阅《凯恩斯选集》第13卷，420～421页。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

道顿指出：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①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准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记者：我读过您2001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给国务院领导的那封信，您的那封信写得非常直率。

何新：我当时是抱着为民请命的想法写这封信的。我当时不自量力，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的这股潮流。我失败了。我后来的个人际遇与此事不无关系。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人们回顾今天的历史，这封信会成为一个历史性档案。

当时我写信时，心中涌动着一股悲怆之情。此前我曾去过黑龙江等一些地区，在许多地方看到政府门口静坐着由于下岗、生活无着而上访请愿的近乎绝望的灰色人群。

当时我看到有媒体上披露，有的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下岗失业而生活绝望，全

^① 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商务版，258页。



家集体自杀，包括老人和幼儿，惨不忍睹！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 21 世纪，尤其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因此，我带着刻骨铭心之痛写此信，我在心理上是有准备承受打击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维系着亿万人的生存。1961 年，刘少奇因河南发生饿死人事件去看毛泽东，他当时曾激动地说，“这是要上书（即载入史册）的。”这些年间残酷的私有化下岗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后果，早晚也是要上书的！

2002 年，我出版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我在书首列出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一种是新国家主义的思路。我写此书，在理论上就是要痛斥新自由主义那一套祸国殃民的改革主张。

其实，凡认真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在现实政策上，此书是有针对性的，我写此书实际是要表述一种批判。我批的当然不仅仅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

记者：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改现在已到了攻坚的最后阶段，一个十字路口，向前走，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后退，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死路。

何新：此类理论正是近几年来误国之谈的标本。什么叫完善市场经济？墨西哥算不算？论人口，主要也是白种人，欧洲文化渊源，与美国只是一条线之隔，它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究竟什么叫“完善”的好经济？我认为，只有能安国利民的经济才是“完善”的好经济。否则，乱国害民的经济，祸国殃民的经济，不管可以讲得如何天花乱坠，明智的统治者都应当坚决摒弃之！

我从不反对改革。我从来主张仅从理念、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评价改革；我认为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依据事实，依据政策的后果，依据实践。

人们谈论前苏联失败的原因，讲了各种原因。其实我认为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一小撮知识分子主导下发生了政治意识形态崩溃，这是前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最主要原因。

强大的苏联帝国，毁灭于少数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大崩溃。强大的苏联经济体系也毁之于一小撮经济学家在哈佛制作出来的“500 天计划”。现在人们看到了，这 500 天哈佛私有化计划造成的后果，是使苏联在经济上至少倒退了 50 年。

中国当前确实也处在十字路口。近五年来私有化运动的后果已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广泛层面上逐渐浮现，中国的社会形势、安全形势和国际环境当前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再往前继续沿这个方向攻关攻下去，我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前景。

对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解释，也才能找到恰当的对策。我个人认为，对今天中国隐伏着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之尖锐，做严重估计并不过分。

我认为当前国有制的转制应当立即终止。如果讲德政，这是最大的德政，会大得人心的，尤其会得千万下层人民之心。中国当前的国力是能够解决国企问题的，只看政府想不想解决。

记者：您在2000年3月曾发表过一篇谈《十年后的中国》的采访。您当时曾说，今后的十年对于中国也许是腾飞的十年，也许是一切积累问题总爆发的十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被引爆出来。现在已经过了五年，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何新：2000年3月中新社一位记者来采访我，我向他谈了一些看法。这篇采访后来全文发表在当年第4期和第5期的《广角镜》上。在这个采访中，我比较系统地反思了那几年“新政”下的经济路线。我当时在文中谈到的问题，是我当时已憋了很久的话。

例如我尖锐地谈到了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被破坏的问题。我说，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下的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殆乎完全崩溃。

当今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以致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有某种类型的免费义务公立教育和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只有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使国立学校和医院市场化，使私立学校和医院贵族化，使穷人看不起病，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贵族庄园和贵族子弟学校。

但是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漠视，竟要靠私人筹款和社会捐资（什么“希望工程”），而原有的国立学校和医院竟变成了可以大赚其钱的市场。

我看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拍的一些纪录片，我看到，连非洲尼日尔那种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总统还在关注要让每一个穷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个穷人都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

而中国贫苦群众的这种权利却正在被市场化进程所剥夺——通过高学费的壁垒，穷人的孩子将被抛弃！

平民得到医疗卫生救治的基本保障（公费、半公费医疗）也被从根本上破坏了。不要说毛泽东，我相信就是邓公如果活在今天，他也不会同意这样干！

记者：您的这个采访，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大陆的许多朋友也许看不到



这篇文章。请问您当时这篇谈话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何新：我当时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首先抨击了当时热得烫人的“新经济”（“知识经济”），我说那是一个“大泡沫”、大骗局，并且断言泡沫即将破灭。

第二，我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危险并不是强敌外患，而是指导改革的整体思路出了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有问题，我说中国人不能老是被美国人和西方提供的经济改革模式所诱导，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

第三，我说当前中国经济中应当最被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增长率，而是失业问题，这将是今后将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社会发生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高楼大厦、长桥快路黯然失色，使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失去意义。

很奇怪，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关系经济景气评价的最重要数位，但这个数位在中国居然不被列入统计。

第四，我说我认为，近些年搞的税制改革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引入了一套基本悖离中国国情的分税体制。这个税收体系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体系，它是一个主要针对生产型企业的高税率制度，任何生产企业按此制度纳税，最终都会逼得破产，所以设法逃避早已成为各类企业不成文的约定。

我说中国的税收本来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

再加上种种不公平待遇，这也正是国企垮台的原因之一。但是其实，当年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还不够，因此并没有谈透彻。

记者：那您现在可以深入讲讲。您当时为什么如此关注财税改革问题？

何新：所谓税改，根本是财改，因为税赋是财政的来源。90年代的这次税改给予地方很大的财税独立自主权，各地与中央分灶吃饭，各挣各的钱，有钱吃肥肉，没钱就饿着。

实际上，种种地方保护、地方自治、地方割据已经孕育在这种分税改革中了。在此次税改之后，国家对地方财税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各地的地方主义大大地得到加强。

你看今天的中国，富的城市车水马龙，每年种花养草可以花掉上百个亿；而众多贫穷的地方，不仅教育没钱，公用事业没钱，连基层小公务员的工资都不能如期发放。国家、中央面对如此严重的区域性差距，竟视若无睹，束手无策！

其实办法很简单，国家从富裕地区多征一些消费税、多调一些钱过来，不就可以帮助那些穷地方吗？不是不能办，而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少干预”的主张不让中央政府这样办。

这种不平衡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严重的区域性两极分化。穷的地方穷死，富的地方富死。沿海富裕地区与内陆贫困地区的对比是如此强烈，让人简直难以相信这是属于同一个国家。一面是经济发达世界，另一面是极不发达世界。

这些年来，一是国家放任市场自流，不做干预；二是任凭私有化泛滥——这两大问题就是当今中国的万恶之源！

记者：中国目前的区域性差距，的确是比较明显的。

何新：这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不良体制和政策所造成的。其实总根子就在这个财税改革里。

税改之后，地方保护主义和省区经济割据由此坐大，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削弱，地方苛捐杂税丛生。为了扩大地方税收，每个省争办能给自己创利的产业。比如造汽车赚钱，各地就争先恐后一拥而上造汽车。因为烟草是巨额利润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结果各个省争办自己的小烟厂，形成国内烟草市场的恶性竞争。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市场，对外地产品实施或明或暗的种种关门和封杀政策。

正是由于税制改革、分税制的实行，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层层地方保护，可带来短期利润的生产部门大量重复建设，加剧了中国生产力的过剩。

国家曾多次发起打击假冒伪劣品的“市场规范”运动（所谓“3·15”）。但是为什么市场上假冒伪劣品愈打愈多？如今几乎是遍地有假，几乎无货不假。哪个超市敢说自己完全没有假货？原因究竟何在？

殊不知，各省、各地区对假冒伪劣明打暗保，边打边保，决不打死。对伪劣品生产，许多地方睁眼闭眼，因为它们是地方财税的重要来源，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官员考绩以及官员收入。

有些基层乡镇，财税主要来源靠的就是当地的假冒伪劣产业，当地当然要实行对假冒伪劣品生产的保护政策。各种滥罚乱收费等恶政也都由这种新税制而来。

另一方面，沉重税率压死了国企。而对外资企业则给以种种优惠不平等的税收和引资政策，以不公平待遇为民族工业戴上沉重的枷锁。



“仅以增值税为例，西方的发达国家用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固定资产，而且 16% 的税率已经算得很高，不发达国家使用收入型增值税。而我国使用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生产型增值税，据说只有少数极不发达国家用这个。我们的税改到底是向西方学习，还是向极不发达的那些国家学习？”

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 30% 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 10%）。

（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 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资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并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当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援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

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也就是说，您认为假冒伪劣等现象的产生实际是源于制度问题？

何新：当然有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新制度学派”。他们的教义，是鼓吹自由私有化市场制度可以导致经济繁荣。其实私有制度哪里是什么“新制度”？

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几千年全世界一直实行着私有制，这是历史上最最陈旧的制度。全部私有制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类几千年互相争斗残杀的血腥史。真正的新制度学派是经济学中的马克思学派，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革命论。马克思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制度革新经济学！

近年来的私有化、自由化势必导致尖锐社会矛盾。因为富可敌国的一个新阶级已经兴起，而且正在积极谋求对于政治的主导权。官员阶层中许多人也沦为为大款爷们操刀执印的“服务者”。腐败之所以深入政治结构的骨髓深部，根源就在于此。

自由派说什么只有“民主化”才能根除腐败问题，纯粹是胡扯！国家再放任不管，越民主越腐败！不要忘记，当年那个民主的古希腊，就是毁在彻底的政治腐败手里。

的确，腐败正在导致社会政治组织和控制系统的瓦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正在涣散着人心。前景非常危险！

记者：您是一直反对对国企转制和实施下岗政策的。但是，国企现状如此，

不改革恐怕还是不行。否则，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呢？

何新：某些国企，确实存在着产业组织形式落后的问题。但根本上，并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所谓国企低效的问题，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假问题。

有一个著名的希腊诡辩命题。要是有人问你：“你现在还打不打你的父亲？”你怎么回答？“打”，还是“不打”？这个命题的恶意是预先设定的，问题被建立在一个虚假前提上——你曾经打过你的父亲！关于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的问题，实际也正是这样一个假问题。新制度学派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做一种误导，就是说似乎只有国企有问题，那些更加落后的私企、民企，难道就没有自身的组织、管理的落后问题吗？就没有低效益问题吗？就没有破产问题吗？

我就不信中国私企中那种封建家族式管理组织，居然比国企中的党委领导制更先进、更科学、更现代！美国近年连续破产的一系列大型企业，包括安然、美国航空等，它们不是被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正是“产权明晰”、“机制良好”的“现代企业制度”吗？为什么也一个接一个地也破产了呢？

我认为，导致 80 年代以来国企大面积生存困难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计划体制下的供求链打破后国企原有的市场流通链条的破坏；二是支援企业从事远期运作的资金周转的金融链条被政府的“断血断奶”政策强制切断了。所以国企体系是被经济学家们的傻主意谋杀的。

过去说国企效率低，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所谓的“三铁”，即由企业自身承担的社会保障，恐怕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把一切善后问题都甩给社会，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沉重吧！

记者：我理解您的意思。反思，也就是说，您认为应当对近五年来的进程进行反思。

何新：不是五年。我认为，今天应当反思 20 年改革所已走过的路，应当肯定那些成果和成就，同时修正那些错误和失误。不能沿着错误的方向“攻坚”到底，中国不能走美国资本主义的路，中国也不应该产生摩根、洛克菲勒、盖茨那种大资本家、大富豪。这话其实是邓小平讲的！

邓小平在 1983 年 9 月 24 日曾说，“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中国的经济资源、国民经济的主体必须牢固地掌控在国家手中。有人攻击我一直阻碍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自由民主化浪潮的“千古罪人”。我不否认，我一直反对针对国企的大规模产权改革和失业政策的。但这究竟对国家民族的功劳还是罪过，那就任由后人去评说。

1989年8月，我曾去胡绳同志家中拜访。记得当时谈及时事，胡老有一句话震撼了我。他很感慨地对我说，“我此生生于忧患，希望晚年不会死于动荡。”这句话我一直忘不了。

没想到，一晃已快二十年，现在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胡老毕竟是幸运的，他走时还是一个太平之世。

拿破仑曾说，“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某些摇唇鼓舌的经济学家们也会毁掉改革、搞垮中国。继续按他们鼓吹的那种方向把改革“深化”下去，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所将面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局面真的很难说啊！

十一、探讨中国经济复兴之路

记者：有一个重要问题。以你的看法，美国向中国输入了一整套瓦解、摧毁、蚕食以至鲸吞中国经济资源的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实施了。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选择的机会要比过去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何新：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全部历史，会发现那并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由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历史的过程是辩证的。

我所谓辩证，包涵三层语义。第一是辩论，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第三是事物最终总是向反面转化。理解历史发展的这种辩证性，我们看待历史就会比较宽容，也会比较宽松，知道进步是积累的，心不要太急。坏的东西有时反而引出好的结果，而所谓善良的主观愿望有时反而会把人引向地狱（列宁语）。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图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事实上还是被一次次地挫败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现代历史中的美国是一个极尽聪明的国家。在20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从20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就充满一种一心向全世界推销美国价值的理想主义。从19世纪的马汉开始，这个国家的战略家精心算计，一心

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统治全世界的意图。

但是，美国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国人的一种宿命论（乐天知命）和悲观主义。他们不知道，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自身是有其规律的。

20世纪50年代，他们重新武装日本，以资本输入和市场开放政策扶植东亚小龙，目的是为中国树立对立面，困锁中国；结果没有能阻挡中国的强大，反而为自己扶植出了一个潜在的日本对手和“东亚发展模式”。今天他们又在干同类的蠢事，例如为从西部困锁中国而扶植印度。

20世纪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引骗中国人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造成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乱，最终使中国被分解成碎块后纳入美国霸权控制下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改革前由于全面管死的极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启动因素，激发出一种新的巨大经济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所谓“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像俄罗斯领导人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第一次是在1988～1990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改革被迫延缓。

对此，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代表人物张五常曾表达过这样一种遗憾：

“1991年12月罗奈尔得·科斯接受诺贝尔奖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密尔顿（弗里德曼）。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援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国家）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张五常还说：“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这一点密尔顿（弗里德曼）也同意。”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尝试在80年代末即遭到



了失败。

因此到了 90 年代，他们把新的重点放到了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在 90 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记者：但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容否认的。

何新：的确，由于中国在国有制经济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是，“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荒谬”（列宁）。改革前，中国旧时代经济的问题主要不是由于计划经济或经济的计划性，而是统制性。

很多经济学人至今不清楚统制经济（即全面管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计划经济不是统制经济。邓小平说市场可以有计划，计划可以有市场，二者不矛盾，这是深刻之论。

在 20 年来的经济改革中，中国没有全盘听信那些邪恶经济术士的诱导，对国民经济进行彻底的自我摧毁，而是慎重地、试探性地在国有制基础上引进市场机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实质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混合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秘密所在。

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还缺乏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但在雏型上有所近似于第二次大战后德国所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法国、还有西欧、北欧一些国家那种混合经济。

法国经济学家米·阿尔贝尔说：“大欧洲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们能融合于一，必会成为 21 世纪的法宝之一。”^①

法国经济学家米·阿尔贝尔称混合经济为“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而区别于“美国模式”（American way of life）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所有形制形式上，实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国家控制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经济命脉；而在民生经济上，鼓励在多元所有制基础上实现“来自竞争的繁荣”。我认为这种“混合经济”体制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制度原因。

但是，我们的经济改革，在任何时候不能被置于一种社会不稳定的基础上。在

^①《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

这个意义上，稳定确实压倒一切。

记者：批评您的人常说，您只会批评，只会说不；却拿不出建设性的方案。

何新：其实我早就提出了我的一系列看法。

记者：那么，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您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经济么？

何新：所谓新国家主义经济，并不是我的发明，它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项重大发明，它的另一个名称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可惜共产党后来把它丢弃了。

记者：是吗？有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吗？

何新：请你读《毛泽东文集》第6卷，1953年毛泽东对这种资本主义曾做过极精辟的论述。毛说，“中国现在（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经济联系着，是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毛又说，“因此，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

记者：这么说，毛泽东当年也赞同中国搞资本主义。

何新：这里应当注意毛泽东的三个限制语。

1. 由政府，即在国家管理下搞资本主义（而不是搞无政府资本主义）；
2. 这是与国营经济相联系的资本主义；
3. 这是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

这三个限制语确立了“一种新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我简称为“新国家主义”的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恰恰也正是适合当今中国国情能将今日中国引出面临的所有困境的经济形态。

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对此问题的考虑已相当缜密。他认为，国家应拿去资本家利润中的四分之三使之用于工人的“社会保障”（即所说“福利费”）、国家所得税及再投资基金。

^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282页。



可惜毛泽东在 50 年代中期改变了他的上述设想。更可惜毛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今几乎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深入研究，无论左派右派，都只知道大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记者：那么，您是否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您所谓新国家主义的要义？

何新：可以。如果只用一句话，那就是——国家必须管理国民经济。

其实自古以来，一个国家机器，它的统治职能主要就是两方面。在政治方面是维护国家主权，也就是维护统治权；在经济方面就是调节和整合国民经济。因为经济一乱，政治统治也就必然随



亚当·斯密

之瓦解，这是极其简单的统治道理。人们不知道，当某些外部势力通过中国的经济学家告诉中国国家管理者——请你交出你的经济管理权。那么其下一步，也就意味着交出你的政治统治权。

事实上，美国、英国、日本、欧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国民经济，而只做什么市场经济的“裁判员”！一个放任市场自流没人管的经济必定是世界上最坏的经济，必定会成为弱肉强食、任由经济强者肆意掠夺弱者的野兽经济。

记者：这主要是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

何新：所以李斯特当年曾对德国人（俾斯麦）说，亚当·斯密理论祸国殃民！

李斯特还说，亚氏的《国富论》，那只是帮助英国人富国的理论，而对德国人则是国穷论！

我后来研究才知道，亚当·斯密是一位受 18 世纪共济会银行家资助和豢养的经济学家。他鼓吹“看不见的手”正是为现实中银行家操控市场那只隐蔽之手服务的，也是为大英帝国操控世界市场创造“自由经济”的环境服务的。而斯密在临死前忏悔他的理论，遗嘱要烧毁他的全部著作。

德国历史学派以国民经济的机体与人的机体相比拟。他们问，难道能够不要神经中枢的控制系统，让人的各种机体自由竞争吗？让肝、心、肺、胃等机体失去神经中枢系统的调节控制，在人体内进行自由竞争，让胳膊和大腿去竞争，看谁具有最强的生存优势？这不是机体的自我残杀吗？

这样竞争，一个人还能活下去吗？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无论其所有制如何，无论它是国有经济、私营经济或外资经济，都只能从属和统合于这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为实现这个国家本身的国家目标和最大国家利益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它们之间的谋利和任何逐利活动，它们之间的任何互相竞争，都必须从属于这一国家目标并被控制和制约在这一范畴之内。这本来是小儿科的道理，而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竟无人知晓。他们所鼓吹的不要政府介入的自由竞争，就是让中国国民经济机体内的各个脏器自我残杀，互相残杀，一直杀到让中国死！

记者：那么您提出新国家主义，实际正是要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整合功能？

何新：新国家主义，就是要重新强调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应当承担决定性的主导责任，坚决反对让“看不见的手”去操纵经济，反对让国民经济放任自流，反对国家从经济生活中全面退出，尤其要求国家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必须抑强扶弱，替天行道！国家尤其不能退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命脉，特别是金融、交通、通讯、能源、国防等产业。

在民需产品上，虽然可以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让多种所有制自由竞争；但在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国防军工产业上，国家决不能以利润为至上目标，不能搞“利润挂帅”，而要不惜补贴（全世界都是这样做），谋求使国家强大的长期目标、远期战略目标，以其他获利产业之利来补战略产业之亏，不能因这些产业短期无利而拱手让外人来搞。这些重要经济领域必须由国家做主导，有计划、有目标地发展。

记者：那么新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

何新：根本不同点，就是新国家主义仍然只是“新式的资本主义”。我认为兼容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西欧“混合经济”体制，其实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比较成熟的积累和分配模式，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中，国家应牢牢保持对于国民经济运动进行控制的主导权，这是国家强大、社会安定的根本性基石！在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家也应逐步重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加强对于民营、私有及外资企业的管理，限制资本世袭传递，决不允许经济中形成世袭阶级种姓制度！

此外，国家从政治上应当高度重视当前中国社会中阶级分化已经客观形成的现实，国家应当高度重视近年来社会阶级矛盾（通过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趋激化的形势。

毛泽东说，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此话其实也正是对统治者的一种



历史告诫——在全部人类历史中，至今尚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无视民心民意，可以单纯用暴力机器长期压制社会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国家机器只为少数人服务，只为经济强势阶级服务，而最终能够不被推翻！前苏联政治体制垮台的更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统治者、官僚集团早已成为脱离多数民众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权阶级。

有鉴于此，明智的国家政权应当作为国内阶级关系的调和者与仲裁者，而不是单一的暴力压制者。国家应当寻求积极公正的社会政策，调节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抑制阶级斗争。

记者：那么，根据您的方案，您认为中国当前形势下的最优先对策是什么？

何新：当前应当立即停止极其不得民心的“国企改革”，应当立案审查改制中出现并已引起公愤和民变的那些重大腐败案件，关注改制中的严重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家应谋求逐步重建国有体制在重要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国家应牢牢把握对于金融、财政的控制权。

国家应进一步改革目前的财税体制，使之适合中国国情，达到既有利于扩充国家财源，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又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目标。应当设法把已分散的财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国家手中，也就是说，重建中央的大财政，积极调节地方财税收入，改革现行税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国家掌控大的财权，以主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应当着手制订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包括就业安排计划，农业现代化计划，能源战略的长期计划，以至国家内外有事的应急经济计划和周边有事时的转入战时体制计划。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贫苦者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绝不可能实施放任自由主义的发展方针。否则，中国必将频繁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直到最终陷入内乱。

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正是那些极力地向中国输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的真正目的。

记者：那么，难道您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么？

何新：在一定的意义上，我有这种主张。不要一提“计划”，就想到五六十年代那种原始状态的“计划经济”，即一切商品都发票证的“计划经济”。

记者：计划经济已经被经济学家们搞得很臭，您竟然想给它翻案？

何新：一提起“计划经济”，有人就引导人们去回顾五六十年代的票证限量经济，

其实这也是一种恶意的误导。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认为这又是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例如有人提出要建立“票证”博物馆，以使人不忘“计划”年代。

其实，建这样一个馆倒未必不是好事。它正可以见证五六十年代中国全体人民为国家工业化所付出的个人消费牺牲，可以见证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咬紧牙关，饿着肚子，全民艰苦奋斗、谋求祖国强盛的！这是那一代中国人的光荣，而不是耻辱！

记者：许多经济学家会大骂起来，会说——短缺，短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短缺！“短缺经济学”的实质，就是认为“短缺”是源于经济计划制度的主观性，造成瓶颈供给，因此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

何新：官僚主义的计划造成短期的瓶颈短缺，那只是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而如果断定计划经济就必然造成短缺，那就是颠倒本末之论。

其实，“短缺”不是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产生计划经济的原因。什么叫短缺？所谓“短缺”，无非就是穷而已。建国初期，当时中国太穷。所以为了使人人有饭吃，才不得不发粮票；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发布票。以免像旧中国那样，只让少数人撑死，而让多数人饿死！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自己都承认，这种两极分化正是自由市场存强汰弱机制进行所谓“择优”选择的必然结果。其实，鬼知道那些“优”是否真的是“优”。比如近年新生成的一些大富豪，究竟是不是“优”？并非计划必然导致短缺，而正是为了解决短缺下的公正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党不得不选择“计划”。

正是由于商品和物资短缺，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政府才不得不考虑对有限资源进行计划配置。这个原理是普遍有效的。比如，假定明天中国又发生了石油短缺，政府也还是不得不考虑对谁优先供应，不得不考虑计划分配的问题。

所以，计划制度恰恰是短缺的产物，而不是产生短缺的原因。换句话说，计划管理正是解决资源不足、谋求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有效办法。所以我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短缺描述为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这本身又是自由主义经济学预设的一个陷阱。

计划经济就是这样被搞臭的。

记者：你的这种解释，会引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会说你是主张重新回复计划经济。

何新：我不认为主张回复“计划”会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名，我头上的罪名反正已经很多，不在乎再多增加一个。但是邓小平曾说，计划是手段，市场也是手段。这是精辟之论。



计划经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类型，它主要是在资源或物资短缺时进行计划配置，这种计划经济又叫“管制计划”或“统制计划”。

还有一种高级类型的计划管理，事实上，现代欧美发达的超级资本主义，包括美国，现今都在运用强大的国家资讯工具有计划也有具体步骤地由国家调控着金融和产业的运行和周期。世界七大发达国首脑为什么定期开会？无非是为了沟通资讯，制订共同战略，以协调七个发达国的经济，从而实现对世界金融和市场的控制。

现在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只依靠“看不见的手”，只听任市场自发调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呢？

记者：我认为那种宏观意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作为经济组织制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有所区别的。

何新：其实呢，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中也有作为经济组织制度的计划体制。

记者：真的吗？

何新：当然。例如沃尔玛大型物流体制，就是微观市场中实施统购包销计划管理的一种样本。位居世界 500 强之首位的“沃尔玛”集团，表面看只是一个产销一体化的物流配送体制，实际上它是一种新型的计划管理的市场体制。沃尔玛体系是根据零售市场（超市）上的直接商品需求，通过对生产部门的订货管理，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和销售的一种现代市场组织制度。

它通过中央电脑系统对产、供、销三大环节实行一体化管理，这实际上正是一种新资讯技术控制下的计划市场模式的托拉斯形态。人们可以注意到，20 世纪中期以后，困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已不是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原始型危机，而是集中在金融流通领域的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

为什么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能够比较有效地抑制了“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我认为，就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中期以后大量地建立了类似“沃尔玛”体系、“家乐福”体系一类的大型超市组织，通过产、供、销一体化的计划管理，使曾困扰西方资本主义百年以上的“生产过剩”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现在，改革前中国国民经济中原有的产供销有计划组织土崩瓦解，各省、各区域以短期利润为主导展开市场竞争，于是争先恐后大上项目，导致汽车产业、烟草产业等短期高利润产业被重复建设，严重过剩。

但是同时，“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跨国计划市场组织则进入了中国，正在对中国的市场体系进行渗透，并据其需要对中国的各类产业进行有计划的选择、

重组和淘汰。其涵义具有全球性的经济战略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而我们的精英们对此则茫然无知，还在闭眼大骂“计划经济”！

记者：如果按您的这种说法，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搞经济改革呢？经改的目标不就是要彻底破掉“计划”体制和建立“市场”体制吗？

何新：应当破掉的只是改革前那种僵化的、不合理的、官僚主义的计划体制。我们曾批判斯大林主义体制下的计划经济，因为那的确是一种建立于落后生产力基础和不完备的资讯手段上、僵化的官僚主义体制。（其实这个体制对于30年代苏联的快速工业化是有功劳的，就像20世纪50、60、70年代中国的计划体制对于中国当时的快速工业化也具有巨大的奠基性功劳一样。但这个问题我们在此暂时不必讨论。）正是现代的大规模资讯技术，已经为有计划按比例地调节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革命性手段。

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极不平衡，众多生产领域呈现严重过剩。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恰恰缺少一套协调发展的总体计划和全球战略，国家应当以现代资讯手段重新统筹规划国民经济的全局和未来发展。应当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国民经济中的尖端高科技产业部门优先发展，特别是国防产业、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资讯通讯产业。

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问题，研究中国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国际空间这个问题，从而制订一套既有近期目标又有远期目标的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和计划，分步实施，中国才可能在若干年后成长为一个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

我认为，不借助于现代资讯技术下的计划手段，仅凭所谓“看不见的手”和无序化的“自由市场竞争”，要管理现代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制订一套长期性的国家计划，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场发展经济，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将永远处于处处被动，受制于人，被别人牵着走的态势，甚至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看不见的手”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记者：您的意思是，无论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最终都离不开计划管理？

何新：我认为，计划经济肯定是比自由市场更高级的体制，它是人类经济体制未来的必然趋势。要想解决和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必须重新掌控和主导国内市场。要想掌控和主导国内市场，国家有必要投入大资本来营建中国的“沃尔玛”式现代



产供销一体化体系。

记者：您的设想非常深远。那么，关于中国的区域性差异问题您认为如何解决，能解决么？

何新：当然可能。我认为国家可以考虑，区别各区域不同情况，由国家牵头制订各区域不同的发展计划，并且给予不同的开发投资和税收政策。

例如，针对西部区域的开发提出优惠投资政策，以特殊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内外民间资金进行西部开发。包括减免地方税收（由中央财政对地方减免投资税后造成的缺口给予补贴），鼓励投资和移民；利用级差地租，无偿或低价提供和转让投资土地，有计划地把一些劳动密集产业、农牧产品加工业逐渐转移到西部，让西部成为向中亚、西亚国际市场拓展的桥头堡。

对于国家的东南部地区，国家已确定重点发展金融业、高技术 and 出口产业，这是正确的。关于东北区域开发，应充分利用东北现有的重化工业基础，主要不是依靠增加投资，而是由国家给予重化工产品大单订货，来带动产业恢复和发展，解决东北地区极为严重的就业问题（例如以大规模的国防订货扶持东北、西南的军工、重工产业。）

这些政策之制订和实施，都不能靠单一由利润导向的自由市场，而要有战略设计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和实施方案，要依靠国家的扶植和导向政策。依靠国家有计划的安排和调控，是能逐步解决严重的国民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和房地产问题的。例如可以通过银行把房地产收归国有，转成廉租和合理价格销售的民居房。

但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办法，则是不能解决长远问题的。

十二、保守争衡

记者：通过前几回的访谈，我们对您的个人经历已有较深入的了解，那的确是十分独特。人们知道，您治学范围非常广泛，视野也十分开阔。但是，人们还会想了解您的治学历程，也就是您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您能否只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您的思想的发展历程？

何新：回顾我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寻求破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寻求立的时期。

破，就是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这个阶段从1967～1987年，约略为20年；立，就是在面对文化虚无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废墟上，探索维系、延伸中华文明生存

发展的新价值体系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寻找连通华夏传统思想与现代革命、华夏传统思想与外来文明，使之衔接连续的桥梁。

记者：从您出版的著作看，您的涉猎几乎涉及人文学术的各个学科。在这些学科中，究竟什么是您治学的主干呢？

何新：我是《伊索寓言》中那个蝙蝠，因此既被走兽界也被飞禽界所驱逐。（笑）

我治学的过程，在70年代，主线是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哲学史、宏观中国史与世界史，1980年进社科院后，我得以接触各种西方现代思潮，一度对存在主义、语言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解释学这类新玩意（当时所谓“新方法”）颇为迷醉，同时也特别注意西方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

1982年秋，我曾出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中，我在当时首先提出应当进行“文化反思”的命题。但是在那前后黎澍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读懂了十三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

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由此而有了我90年代的两部重要著作《东方的复兴》（1988～1990），《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我十分鄙视那种主张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中国文化的所谓“自由主义者”。至于一些人指责我的“保守主义”、“反动倒退复辟”等等，只令我感到自豪。

记者：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认为你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安排你的几位老一代领导人，通常也被认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这些说法？

何新：我知道。当今存在两种力量、两种舆论、两股趋势。一种是力促天下乱，这股力量来头不小。外部有国际根源，内部则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困难、问题，以及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这些问题中，包括国家政策的某些重大失误。

当前社会最尖锐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及数千万人的下岗，二是政治腐败，三是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无业、无机会的人口，四是尖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当今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无非是由于这四大问题。不错，若这四大病症一齐发作，是足以导致社会动乱的。

我个人对此常常深感痛苦。为什么呢？十几年来，在我写给高层的信中，在我的书中，曾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警惕。我曾不断呼吁和告诫，我希望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避免这四大问题的发生，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地发生。

但是，回天无力，这些情况还是发生了。它们是否不可避免的？当然不是。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不可选择，就不会有美政之誉和失政之讥了。

今天面对这四大问题，还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变乱，就是一些内外势力所鼓吹和期待的，以“加速改革”的名义而推翻这个制度，粉碎这个国家，所谓“经改”不成转而“政改”。

但是如果“政改”不成而失败呢？一些人鼓吹模仿美式“民主”以改造中国。但如果竟是画虎不成反成犬，没有改成美国的模样，倒改成菲律宾、印尼、南美那些国家的“民主”模样呢？——在外夷的扶持下产生新的儿皇帝（“总统”？）。

在乱中会有人得利，也会有人向火中取栗。那些今日流窜于外的“民运”、“法轮同修”即可以趁乱夺取政治经济资源，成为统治者。但是老百姓会如何，国家会如何？难道不是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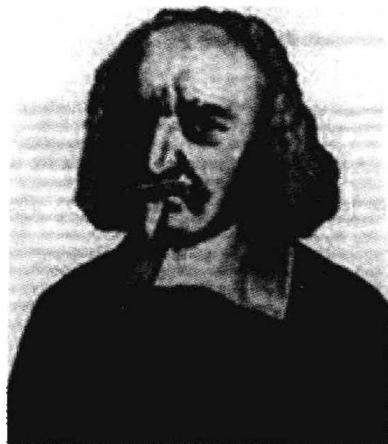
霍布斯说，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利维坦》）今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霍布斯是什么人？

何新：此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太重要了！他是现代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奠基人。今日士人喜侈谈民主，心目中所谓民主，无非是美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的伪形式民主。还有的人所主张的民主，实际是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之乱局，有利于小盗窃利，大盗窃国也。
民主的真正妙谛，绝非某些人所幻想的那种“无限自由”。卢梭说：“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艺术，使人类找到一种法，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构建之前，有霍布斯、洛克、哈利法克斯、休谟、卢梭、孟德斯鸠等大师，以自然法、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公民责任、三权



霍布斯

分立等为论题，做过百年以上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探讨，又在社会改革中对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反复修正和调整，直到19~20世纪，才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而中国那些所谓“民主派”和“新自由主义”，除了西方理论的皮相学舌，有谁对民主问题真正做过研究和深思？西方势力利用中国士人的这种无知，极力鼓动无政府状态，目的是欲削弱中国的力量，达到分化治之，从而遏制中华的战略目标。

像英国这样的君权世袭国家也有资格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政体？他们向中国人灌输伪自由主义、伪民主主义，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乱，要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中国土崩瓦解。

记者：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中国的腐败已刻不容缓，腐败的根源是制度腐败，因此彻底根治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

何新：如果谈“彻底”和“根本”，那么我认为他们挖根挖得还不够深透。腐败的真正根源还并非在制度，而是在于人性，在于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

你看一看一些人推荐给我们作为“理想模式”的西方政治制度中——近则有小布什窃票当总统，克林顿夫妇盗窃白宫礼品，大搬其家，稍远则有法国高官卷入售舰回扣案，日本众多大臣议员背后有政治献金丑闻，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有受贿丑闻……等等。

政治腐败是弥漫于全世界的，包括具有那么美妙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你说这不是根源于人性是什么？所以这些朋友挖根挖得还不够，彻底根治腐败必须改造人性才行。

其次，若谈制度改革，我认为有两层涵义必须分析。制度有大制度和小制度，有国家的根本体制和具体的法规制度，许多人现在所谈的制度改革常常混淆这两个层面而笼统谈之。

对国家大法和根本体制进行变革，这将意味着发动颠覆国家现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大动荡、大动乱，这种运动能搞吗？

至于具体法规和制度的改良改革，除弊兴利，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随时应该进行；但是我认为，这也需要一些整体的规划，需要做政治理论的基础研究。

政治体制（民主体制或威权体制）与政治腐败没有必然关系。威权体制是一种集中权力的体制，民主体制是一种制衡权力的体制，腐败与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必然关联。在两种体制下，都可能发生政治腐败。认为当前中国只有转换政治体制才能避免腐败这种理论的背后，暗藏着促动国家走向动乱的意识形态陷阱。

腐败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现象。在社会的转型期，由于政治制度和价



值观念的弛解，腐败常常作为伴生物而出现。

记者：那么根据您的看法，腐败主要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与制度并无重大关联？

何新：在中国古代的君主政体下，同样有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的时代。但是，民主政治体制下同样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后期、罗马贵族民主制度时期、英国 17 ~ 18 世纪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美国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时代，虽然也是所谓“民主”或“法治”的体制，但均是著名的政治严重腐败的时代。

只要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以及狄更斯、德莱赛等人的名著，就会知道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体制转型后的政治腐败远比改革前严重得多。还有当代的印度、南美、菲律宾等所谓“不发达”的“民主”国家，政治腐败也都极其严重。

历史似乎表明，威权体制与多元分权体制（所谓民主制），应当是前者更有威慑于抑制腐败，特别是对于经济资源难以普遍共用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流行的所谓“只有政治体制转轨（改革）才能根除腐败”之说，我认为没有历史根据之论。

记者：那么以您的观点，搞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奠定理论基础？

何新：当然。据我的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从 16 世纪马基雅弗利以来，至少形成了三大流派。

一派是法国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学者所代表的浪漫（理想）民主主义，一派是英国霍布斯、洛克所代表的政治保守（现实）主义，还有一派是 17 世纪英国“掘地派”，如温斯坦莱（G. Winstanley）所代表的平等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

卢梭等启蒙哲学家的民主浪漫主义使得 1789 ~ 1793 年的法兰西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以致拿破仑在卢梭墓前曾感叹——卢梭一枝笔的力量超过我的大炮。

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保守主义引导英国走向良性有序的政治改革，为英国争取了百年安定，百年繁荣，直到上升成为“日不落帝国”。

我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当务之急首先不是盲目鼓吹政治改革，而是必须作深入的理论研讨。不仅要研究卢梭式的民主浪漫主义，也要研究霍布斯、洛克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他们的主权论、民法论、自然法论。

记者：霍布斯的主要政治主张是什么？

何新：霍布斯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利维坦》(Leviathan)。

记者：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何新：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书，意在呼唤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关于国家主义的专著。

霍布斯说：

“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都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①

他认为：

“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义务——绝对服从。主权者或国家的职责有三——一是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对内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三是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致富。”

霍布斯说，无论国家和教会，其权力都不是来源于上帝，宗教决没有理由掌握独立于国家之外，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反之，宗教只能依附于国家，它同道德一样，只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国家容许和赞同的信仰才能成为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为了国家统治的利益，为向人们灌输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才有存在的价值。

霍布斯对社会契约论的回答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第19章）这就是说，没有权威的社会契约并不是导致民主，而是导致无政府状态。

在有些人眼中，英国是资本主义法治民主的老牌典范国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

^①第17章《国家的产生》。



这种君主立宪制的法治民主的理论基石是奠定于霍布斯、洛克的国家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理论之上的。

近年在中国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实际是一种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西方格外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其真意是欲利用这一种思潮贯彻其拆解中国国家制度的战略目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是有根源的，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起来摧毁了国家机器，也摧毁了公众对于国家权威的崇拜。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就很难存在。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不一定崇拜总统，但是崇拜国家，敬畏国家机器，尊重法律制度的有效权威。这种对于国家权威的蔑视，可以认为正是一种““文革””的后遗症。包括轻言“政治改革”，实际往往是颠覆现存体制和制度的同义语。

我们不必去讨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究竟好不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对这种民主制度，包括其理论基础，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存在严重的误解。那么回顾一下英国保守主义者霍布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自然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法制主义是一种保守而不是一种革命主义。

至于卢梭，也不应当只注重他的浪漫主义，他也同样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面。卢梭说过：

“道德中最伟大的奇迹从来是由爱国主义造就的。这一美好而强烈的感情赋予自尊的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它在所有的激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概。”

卢梭也认为社会秩序高于一切，他所理解的民主原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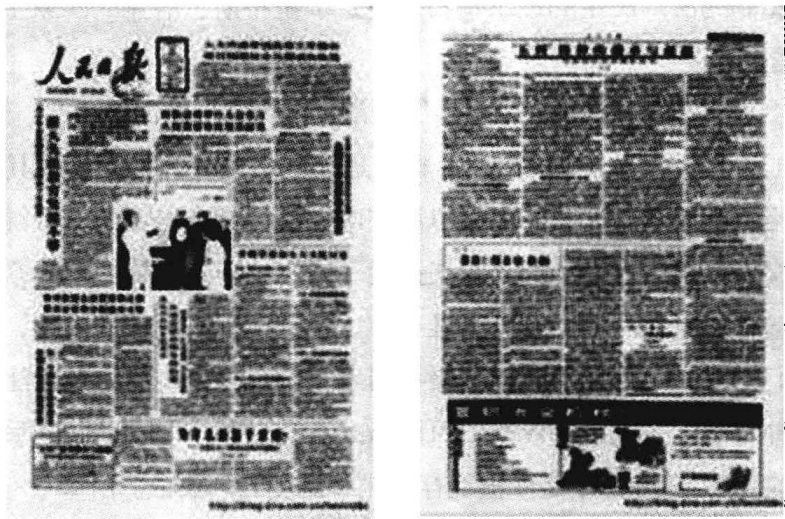
“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人权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民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以及自己的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我们以统一共同体的资格接受每个成员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认为国家主权的目标高于全球化：

“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为人。我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国家——应当这样看，他们所谓热爱全世界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窃取自己的特权。”

记者：然而政治保守毕竟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

何新：我看未必。英国的两大政党其一叫“保守党”。美国主流政治（共和党）中有一个保守的“传统基金会”。西方也并不以保守为耻嘛。



1989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何新《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二十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这是人所共见的。但是也发生和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现在我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下去，也许是万丈深渊，也许是康庄大道。难道不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反思一下？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需要调整政策修正失误，需要对继续改革的方向深化认识和重新认识。

我使用“保守”这个词，也是针对曾导致苏联崩溃、东欧瘫痪的那种“休克疗法”。这种“休克疗法”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发明的，曾被推荐给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领导者和“社会精英”。这个“休克疗法”一度曾红得发紫，被认为是推进各国改革速成其效的灵丹妙药，而今在全世界则臭名昭著。

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

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近二十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



大传统。你所提到的几位老一辈革命家,我个人始终对他们怀着深深的知遇和感念之情,不仅是由于他们对我个人的知遇,也是由于我尊重他们本身是缔造这个共和国的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和化身。

记者: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何新: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焦点。

记者:既然如此,难道你认为这两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吗?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为其必要,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小心中国的内外对手利用这种必要性而将我们导入陷阱。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存在这种陷阱吗?

何新:的确存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帅徐达患重病,朱元璋嫌其权位过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只蒸鹅,而徐达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鹅,徐达见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鹅后疽乃大溃(崩溃)而死。

记者: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国近二十年来一直处在不平衡的高速发展中,在国际上也是“位高权重”啊,因此也有人甚忌之,他们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蒸鹅。然而天佑我中华,幸亏中国人没有照方通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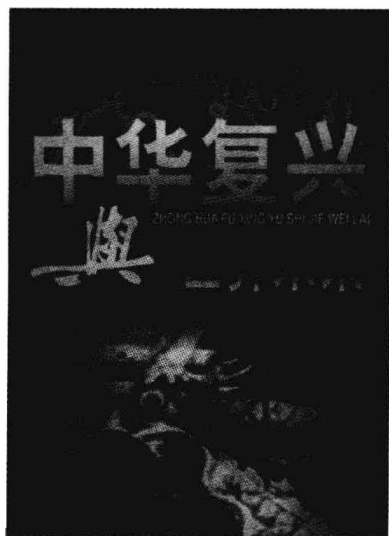
记者:您的意思是国外有些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就是这种“蒸鹅”。

何新:对。比如一些经济学人向中国人灌输的彻底打碎国家垄断,彻底解散国企,“人间正道私有化”,为中国国民经济解困和施救治的单方,就是这种食之疽必大崩的鹅。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荀子语)。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



《中华复兴》(上、下册), 1995, 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

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有理由对未来具有信心！

十三、狂狷济世

记者：您既有颇为深厚的政治资源，为何不出来谋就一个实际的政治职务呢？

何新：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有自知之明的。

1990年中央领导想将我调离中国社科院。为我的工作安排问题，中央统战部部长丁关根同志曾专派一位副部长和秘书长来我家中数次，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我要求不上班，不开会。我不从政。这其实是给中央领导出了难题，很难安排的。

后来李鹏总理也几次让人和我谈过，我向总理提出较适合我的工作单位是去国务院参事室或中央文史馆，总理让我写个报告。我写了送去，总理很快就批了，批示由罗干秘书长具体来做安排。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定编的，需要向人事部申报编制。

但是，按照惯例参事和馆员都要年纪较大的人担任（周恩来总理定的）。而我那时才四十出头，过于年轻，所以参事室方面不同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表面的理由是如此）。后来中央高层另做安排就把我放到了全国政协。

最近（2003年），中央统战部领导同志又曾安排我去参事室，后来因故未就职。



其实名义上的东西，对我已全不重要。我讲这个，只是说明党和国家对我一直很厚爱，曾以国士待我。

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

何新：我1990年工作关系调入全国政协，20年来我的职务就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三届了（第7、第8、第9届）。^①除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职务。

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

何新：这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但一些年里我基本上都自动放弃了。

例如，国家为关系在政协的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可以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多年用的都是自己的车。我每年有公务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都是有批文存档的。但所有的这些，我实际上全部放弃了。我在政协20年，没有向国家伸手要过什么。

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食客寄人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历史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彻达观的大智。得志则行其道而兼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

既然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既然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机会，那么我可以自食其力，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才艺去养活自己。

记者：这的确有些矛盾。你写了那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论文和政策建议，但你说你无意于政治……

何新：我关心政治。政治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政治是一个男子汉



政协会上（1995）

^① 2008年何新续任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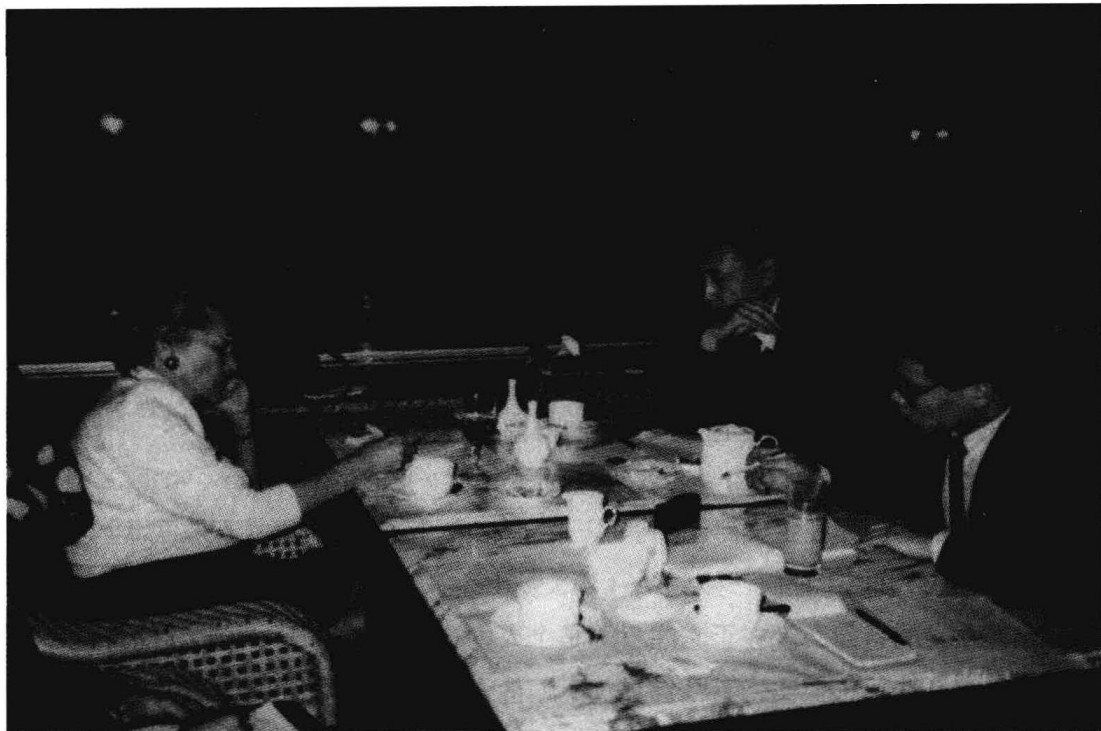
值得从事的伟大使命和事业。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于从事，我这个人就很不适合。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抛入政治激流的，当时人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

在“文革”时代，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and 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去承担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使命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途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十四、穷理观命

我是一个在家逃禅的僧人，一个行者。是人生和历史戏剧的观察者。我想我此生的宿命就是如此，也只愿如此。虽然我也曾做过其他事情，但多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何新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特派员采访

记者：您相信命运吗？

何新：是的，我深信宿命的存在。

记者：那么，什么是“命运”？您如何理解“命运”？

何新：从哲学上定义命运，我认为所谓命运，就是一个有目的地进行着，因而是必然性的宇宙进程。我们每个人，无论自我是否意识到，都作为一种角色而生存在这样一个进程中。这就是命运。对于这个进程，自我并非真实的“存在”(Existence)，而只是宇宙进程的工具而已。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是否可以说，在您的命运感中，存在着某种使命感。

何新：的确，那是使命感。这就是说，我认为自己的生存对社会、对他人、对历史，是承担着某种道义和责任的。虽然我不一定会做好。但是我认为人不应该仅仅为自己而生存。不论环境如何，回报如何，成败如何，我都必须完成我所意识到的宿命。只问耕耘，不计收获！

记者：(笑)如果收支不平衡呢？作为经济学家，您不认为会不经济、不划算吗？

何新：(笑)在人生意义的追求上，我无法做经济学家。但是我还是相信《圣经》中的这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凡有耕耘，必有收获。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存在”(Existence)，您是否了解存在哲学？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他认为人只能也只应该生存于自我之中。

何新：我根本就鄙视萨特。“存在主义在本质上不是一种哲学，只是一个标签。”(考夫曼)我一向蔑视那种所谓存在主义哲学，蔑视当代西方哲学中多数的以卑微的自我主义为单位的所谓现代性及后现代思潮。我认为那种生存哲学是苍蝇的哲学。

记者：为什么是苍蝇？

何新：因为存在哲学认为人生是恶心的(萨特的名著《呕吐》)，认为文明是垃圾，社会是厕所，认为人的本质类同苍蝇。我不能说他们绝对无道理(笑)。但是，人生毕竟还是有终极意义。至少，还是值得追求终极意义。

记者：存在主义是否彻底否认人生的意义呢？

何新：是的。存在主义自己都承认——严格来说，存在主义并不是思想上的一个学派，也不可以归属于任何一种主义。(考夫曼)

存在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注重的是个人内在极端的主观性、自我的情绪、自我的感觉，全然不顾现实，不顾世界，不顾他人以及他人的感受(所以他们认为他人是地狱)。存在主义不承认客观真理存在，不承认任何客观价值存在，因此也不承认上帝存在(上帝已死)。

存在主义不仅是原罪的哲学，并且是疯者的哲学。是自我“作贱”的哲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那是一部刻意描写疯狂和变态的书(鲁迅的《狂人日记》似乎也是模仿这部作品)，它一向被视作近世存在主义的开山作、代表作。

《地下室手记》中塑造了这样一种病态的人格：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可以庄重地告诉你，曾有许多次我确实想变成一个虫豸，但是连虫豸我也不配。

尼采说，一旦对上帝的信仰没有了，对基督教道德规范的信仰也就消失了。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一切都可以做。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只能通过自我选择价值。因此价值在存在主义中成为纯粹的主观性。人仅仅是个别的、随机的，这就是存在主义所谓“自由”，绝对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的唯自我“存在”(Existence)。

记者：那么你认为存在主义中就没有任何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吗？

何新：在存在主义的作品中，唯一使我喜爱的是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因为这篇作品不仅描写了荒谬，而且试图超越荒谬。

记者：意义？究竟是什么意义？这个词如何定义？



何新：意义是指事物的一种内涵。在这一涵义上，意义就是资讯。另外，意义就是价值。我告诉你有趣的一点，在汉语中，“意义”一词与“价值”一词几乎总是可以互换。例如说人生有意义，就是说人生有价值。

记者：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有意义吗？

何新：当然都有。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一直受到很多误解。其实所谓“合理”，就是说一切存在的，都是有意义的，虽然许多事物的意义还有待于人去揭示和发现。人类与宇宙中其他事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能够发现、能够自觉，而且能够创造意义的动物。

记者：“凡是存在的都合理”，这个命题真的是有道理吗？我对这个说法也有点不理解。

何新：过去也有人解释过这句话，但那种解释不令人信服。我的理解是，所谓“合理”，不仅是说其当然或应然，而是说，一切存在者都是有意义的。理解了事物发生与存在的意义，你也就理解了存在的合理性。

记者：那么一个小偷偷钱包，也是合理的吗？一块石头、一片沙漠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吗？

何新：小偷偷钱包，那一定是因为这种活动对他自身有某种意义或价值。这个现象的背后，必有其发生的原因和普遍性含义。自然，理解这种意义并非意味着小偷可以不受惩罚。相反，被惩罚这一现实则提供了与偷窃活动相关连的更深一层意义。而一个窃贼的错误就在于他不理解这些更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更深的意义使他的偷窃活动成为负面的东西。要知道，存在的意义始终不仅是在个体而且是在总体和群体中设定和实现的。

记者：您身上似乎表现了一种很矛盾的人格。您的经历表明，您本身是极富有个性的；但是在理论上你否定个性。您的个性是极其追求自由的；但是您却否定个性自由，即选择的自由。

何新：（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简直可以写一整本书。

记者：（笑）您能简单做个回答吗？

何新：让我这样讲吧，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其形态确实是作为一种孤立个体而存在的。的确，自我对存在的感觉、意识又是个别的和孤立的，是封闭着的。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在人生中产生孤独感是难免的。但是，存在的意义是理性的，人的理性就是对这种存在意义的自觉和把握。无论其是否有意识，或是否意识到，个人存在的意义也总归不完全在自身中，其意义存在并且实现于非自我的社会文化的总体中。

记者：如果是一个大人物、一个伟人，如毛泽东、邓小平，自然可以理解他的存在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或价值。但是，如果仅是一个卑渺的小人物呢？也许除了对于他的家庭，他周围的少数人，很难说他的存在对于社会文化会产生意义。

何新：所以人应当自觉地即自为地追求个人人格的伟大，这也就是追求自身对于社会、文化以及更多的人的存在意义。这种意义使个人的人格存在超越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超越时空，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而升华到永恒。

记者：您关于人生的这种见解，很有启示性。

何新：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意义，只是许多事物的意义还有待被发现和肯定而已。但是物质虽有意义却不能自觉，只有人能自觉其存在的意义，并且可以自我创造其意义，尽管许多意义常常是暂时的和相对的。

记者：您的说法未免太抽象了。

何新：如果你读过费希特的著作，就会理解我的话。关于自我与非我、自在与自为的关系，在西方哲学家中他是思考得最深刻的。实际上，存在哲学，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哲学，都是费希特主观主义哲学的夸诞和延伸。

记者：存在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是关于存在与选择的问题。

何新：这么说吧，比如你是一块石头，你当然可以说：我就是一块石头，并且愿做一块石头（即选择），我生存的意义就是作为一块石头。这似乎是可以自由地选择的。

但实际上，尽管作为一块石头，它仍然有它的生存环境。比如摆在戈壁滩上，它是戈壁滩中的一个分子。而在宇宙的演化链中，这块石头是作为无机物存在演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它的存在意义是在一个时空的更广阔的存在链上被设定的。总之，无论从时间空间的意义考虑，这个石头都只是一种暂时的“自我”，是一种过渡形态。这种时空定义就是命运，是这块石头所无法自由选择的。或者说，无论选择还是不选择，它的存在意义已经被设定，因之它的选择对宇宙的存在之流并无意义。自我、个性的卑微性就在于此。

记者：存在哲学的主题正是要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

何新：这是误解。在存在主义看来，所谓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那只是古典哲学的迂腐，是无意义的。而在西方古典哲学中，对自由及其限制面（即必然）在历史上有过很多讨论。其结论是——自由是与限制（必然）同在。

所以卢梭说，“人类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网罗之中。”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被列作理性的四大“二律背反”之一。但是康德的悖论仍是理性主义的，而存在主义的荒谬感则是彻底非理性的，存在哲学从根本上否认一切人生价值。

比如说，你不喜欢红色，你可能会选择另一种颜色，白色或蓝色。那么你就不是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意味着，不仅否定红色，也否定白色、蓝色，以至否定一切对颜色的感知，只有黑暗，只有黑暗所激发的焦虑、愤恨，以至焦躁，直到疯狂。抒发和宣泄它们，这才是真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是那种“摇头丸”，服用它之后，人就拼命地摇头，对一切都摇头，疯狂地摇头，摇头唤起兴奋。摇头就是对“自我”的疯狂肯定——这是存在主义！

记者：那么，您认为人对自身命运能不能抗争和自由选择？

何新：可以抗争，可以选择，但这种自由是相对和有限的。承认这种限制，并且要求认知和理解这种限制，通过限制而获得自由，这就是理性主义。否则就是非理性主义。存在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它是绝对疯子的哲学。

所以根据这种哲学制作的艺术作品多少都具有疯狂的意味。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克尔恺郭尔，都是具疯狂特征的天才。存在主义否认限制，它认为人可以自由选择一切，选择就是命运。萨特说人生下来什么也不是，人是什么，靠自我的创造，自我的选择，自我的决定，没有先在的意义。人性只是一个括弧，内容是个人通过生活和选择加进去的。存在主义认为，你把自己创造成什么，你才是什么，你是什么以后，才能对你下定义。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说人不能下定义，因为事前没有一个 *Idea* 摆在那里。

记者：是不是如此呢？

何新：萨特的哲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 70 年代的西方，是作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异化的哲学而流行的。拒绝接受资本主义文化所已经预先赋予的事实，而追求新的自我塑造，包括对命运的自我塑造。自然这比现在那班跪伏在所谓西方“主流文明”之下的新自由主义高明一些。

真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绝望的哲学，是一种面对虚无的绝望。面对绝望，挺身抗争，这是加缪。面对绝望，沉浸入疯狂，这就是克尔恺郭尔。所以存在主义有积极与消极两种类型。

但是，抗争尽管抗争，命运仍然是命运。抗争并不能脱离既定的环境，选择也是有前提的，是有条件的。说不要条件，自由就是一切，这是欺骗人也会害死人的。

记者：您知道“新新人类”吗？新新人类所体现的现代——后现代思潮，

哲学基础似乎也是存在主义。

何新：（笑）我的许多观念肯定是缺乏现代性的。对！我不追求现代性。在古典的理性主义思想与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之间，我选择前者！

现代性是什么呢？不过是“Modern”（摩登）而已。这些年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所谓 Modern，即时髦，那不过是一些文化或商业的骗子在一个时期中鼓吹起来的一种趣味和偏好（这就叫“流行文化”）。人类所面对的宇宙存在着两种永恒，一种永恒是过去，一种永恒是未来；而“现在”——所谓“现代性”恰恰是非永恒的。现代性，常常只是一种正在崩溃中的现实。因此，我不喜欢那种“新新人类”，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哲学，包括他们的艺术，虽然我理解他们所追求的某种疏离感与反叛的精神。

记者：然而您谈到命运，接受命运不也是非理性吗？

何新：不。我认为命运就是理性。

记者：为什么？

何新：理性，就是对于某种必然性的确知。命运不正是必然性吗？

记者：那么您是否整体地拒绝西方哲学？

何新：不。我认为命运就是理性。选择不能决定命运，但是命运却能决定选择。理性，就是对于某种必然性的确知。

记者：您看，不同的人信仰不同的哲学，这也表明了一种选择。

何新：对。什么样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而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命运。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古典主义者。在伦理学上，我十分钟情于孔子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人伦主义，孟子所追求的人格主义以及老子所体现的自然主义。我酷爱中华文明，因此我也热爱在几千年中支撑或者说哺育了这一伟大文明的中华古典哲学。

记者：那么您是否整体地拒绝西方哲学？

何新：不。早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对西方哲学史就做过深入的阅读和思考。西方的伟大哲人，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曾是我的精神导师。但是在价值观上，在人生意义的求索上，我绝不会孤立地追随任何一种西方理念。“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我要走的是我自己的路。

记者：这也就是选择呵，这不是存在主义吗？

何新：（笑）我所拒绝的是存在主义对人生意义的否定。但是有没有存在主义，人生中总是要面对选择的。



十五、思齐政教

记者：何先生，我想向您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就回答，如果不便回答，就不做回答。

何新：（笑）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

记者：您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您是否仍然真诚地信仰这一学说？

何新：（沉思良久）马克思主义，是19~20世纪对全人类生活和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我个人一直在研究它。

至于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幻想，但是美国当今向世界传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也是欺人之谈和幻想。

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自己的社会现实就远不符合这种幻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直到现在仍然不是真正客观的科学理论，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主观的、可以由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主观价值偏爱去选择和解释的意识形态信仰。

关于信仰与科学的不同，18世纪的康德已经做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认识论时，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赖的。但他认为理性是不可依赖的，因为理性具有借助思维符号（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进行自由构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论——即理论意识形态中，总是矛盾歧出，而且难以确切地得到事实的检证。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为依据，做出这样一种推理；人们也同样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种推理来与它针锋相对。这两种推理，谁也不比谁更高明。”^①所以康德主张放弃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为认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领域保留给信仰。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即划分知识工具和理性信仰的问题，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识形态的歧异性问题。

记者：那么您今天如何看待启蒙精神？

何新：启蒙即思想解放是锐利的双刃剑。五四激进的启蒙思潮，在反封建的口号下也否定了华夏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精神支柱。《狂人日记》说，“翻开五千年史书，只看到两个字‘吃人’。”这种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传统的看法在当时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第4卷，208页。

是有代表性的,但无疑是非常极端而片面的。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思想解放”(新启蒙)也产生了一些极端和片面的东西。例如,彻底否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就是一种片面而幼稚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不应当随意干预学术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世俗生活领域,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意识形态。

记者:人们经常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

何新:对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我所知,那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马、恩在1844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这个术语的涵义,指社会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例如,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自我表述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则是“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这都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象征和虚拟的体系,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社会自我表述。马克思说,“在现实中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说法为依据。同样,在历史中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也不能以它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面具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未具有这种常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①

所谓“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包括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即属于社会中某些阶层/利益集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例如,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陈述。

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时是一种极端的个性主义,有时又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反对公共威权/确立自我威权)。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极大的价值偏见和排他倾向,它很难中立。但是,科学这个术语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和某种利益)为根据等等涵义,所以培根将之称为“工具”,后来有人将科学称为工具理性。

科学是科学,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它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功能。它们常常被混淆,但是二者实际是非常不同的。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时很容易被混淆。但如果在政策的施用中,决策者对二者的功能发生混淆,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记者:您能否举一个实例?

何新:例如国家统计局是国家的经管部门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政策工具部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



门。但它所发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为现行政策提供经济业绩数字，以动员人们支援现行政策的宣传意义。

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来自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又具有社会经济的“压力表”的仪表作用，为决策者直接提供对于社会经济进程的量化监控。这种监控的可靠性，取决于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通过这些数字的及时回馈，决策者才能准确地了解经济和社会运行状态，随时对经济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记者：但是，出自自身“政绩”的考虑，统计局往往“报喜不报忧”。

何新：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有意的误报，实际上是统计部门误解了自身的真正功能。它是统计局，不是宣传局，它的责任只应该是真实地、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地、至少也是不失实地，像计算工具一般地统计和汇报数字。对国家不利的数字，它可以不对外发布；但是它无权也不应该由它为某种政策目标，直接政治化地处理统计数字。这种利用统计数字进行加工而进行宣传的工作，应当由专业宣教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部门去做。

如果对统计局给予可以自由加工处理、以致歪曲粉饰统计数字的授权，表面看来会有利于当局，实际是贻患无穷。让统计局利用所加工过的数搞政治宣传，以支持现行经济政策，这就是将统计部门由工具部门变成意识形态部门。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为自身制造一种极为危险的资讯污染。

记者：为什么？

何新：因为决策者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虚假的向外宣传当成了真实的现实，自身也被虚假数位和虚假经济情况所误导。

同时这种功能误用也为统计部门提供了机会，提供了行为范例，使它可以随时编造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似真似假的宣传数字，为阿谀和支援现行政策方针而上报当局，以此讨取执政者的欢心。

其结果必将导致决策者对社会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需要及时调整不良政策的时机被错过，使得需要纠正的政策失误得不到纠正，最终酿成重大的社会危机。

在共和国历史上，由于决策者被虚假统计所误导而做出重大错误判断造成经济灾难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

记者：宗教与意识形态一样吗？

何新：宗教是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宗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也可以作为哲学、文学、经济学或其

他学术而出现。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即儒教。

记者：宗教与哲学等学术的区别在哪里？

何新：简单说，世俗的宗教不要求理性。对于宗教来说，信仰比理性更为重要。宗教对其教义，要求人们整体地接受它，拒绝任何分析和批评；而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理性的本质就是分析和批评。

记者：您可以举个例子吗？

何新：例如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它当作宗教，就要整体接受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神喻或圣喻，不能分析、不能讨论、不能存疑、不能批评、更不能否定。但学术理性则不同。其实马克思与马克思也不同，毛泽东与毛泽东也不同。他们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神。他们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对事物的看法，在生活中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东北的时候，我当时通过直接研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已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完全相同。而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有所不同，有所变异、有所发展。

马克思早期是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中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晚期，在《资本论》后期手稿中，马克思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可能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阶段，这与他早期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激进主义立场已有显著的不同。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前也曾激进地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倾向于“左派共产主义”）；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面对落后的俄国迫切要发展生产力的现实，他就主张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行名叫“新经济政策”的让步政策。

不仅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也如此。毛泽东在 50 年代初期，曾认为中国应当搞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存在的。但在 1954 年后，他又主张加速过渡，1958 年甚至主张提前结束过渡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试图在中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斯大林，以及 30 年代他所培养的一批理论家（如尤金、日丹诺夫等），将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义化，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政治信条，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制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次大清洗，发起了许多次整肃科学异端和学术思想异端的运动（如在遗传学、控制



论等学科中)。中国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蹈了这一覆辙。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早已成为一名异端分子，但我当时却有决心以一种反迷信的态度去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记者：您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勇敢的。

何新：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勇气，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独立思考。

记者：这么看来，怀疑主义、理性主义，是宗教信仰的敌人。

何新：是的。康德说过，所谓启蒙精神的特征就是以怀疑为先导的理性精神的觉醒。马克思本人年轻时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中也贯穿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讲过一句名言，他说，“老实说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说，“那些摒弃世俗所信仰的神灵的人，并非是亵渎神的；只有那些迷信这种神灵的人，才是亵渎神的。”这些话，当时也深深地激动和鼓舞过年轻时代的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外，对我影响较大的书籍还有一些历史书，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法国革命史》（马迪厄）。我这个时期也比较注重对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例如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以及对休谟、康德哲学的研究。这些书中都贯穿着启蒙的精神。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对这些书特别感兴趣呢？

何新：《第三帝国的兴亡》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根据二战后美国缴获的希特勒德国档案资料所写的一部纳粹德国史。这本书在1965年第一次出版，“文革”中后期的1975年出了新版，作为“内部读物”在内部发行，我通过父亲的帮助搞到了这部书。在这个时期，几乎一切书不可能自由出版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出版这样一本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的书，似乎是意味深长的。

记者：您认为意味着什么？

何新：《第三帝国》一书记述了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和法西斯政治极权体制的形成过程，记述了戈培尔制造纳粹意识形态，实行思想专制，毒化德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书中指出，“第三帝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以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革命”（“褐色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

这些历史资料，使生活在“文革”政治气氛中而具有政治敏锐性的人不可能不产生非常切近和具体的联想。事实上，法西斯，这个字的拉丁语源就是棍棒与斧头，就是政治暴力，党卫军就是制度化的“红卫兵”，法西斯蒂的实质就是以暴力和恐怖维持的绝对极权主义、绝对专制主义。

而这也正是“文革”时代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新政治体制的特征。当时出版这部书，我认为这是党内反对“文革”派做出的一个有意识的文化动作。

记者：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您反对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您又认为一个国家制度不能放弃意识形态。

何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应该为信仰和理性划定各自的领域。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社团，不是所谓“自由契约”（卢梭），也不是一种暴力机器（列宁）。

国家是一种制度，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这种制度中需要有权威，需要有权威的象征符号（如国徽、国旗、国歌、领袖），也需要有支撑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原则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拟现实，它是被设定的一种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关于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马克思讲过一句经典性的话，“它（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①

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是意识形态，《圣经》是教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话是真理呢？美国总统就职前要到教堂中去做礼拜，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

日本国家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国家仍以神道教作为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难道天皇真的是神吗？追究统治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问题，常常蕴涵着推翻和否定国家现实政治制度的涵义。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国徽、国旗、国歌一样，因为它是国家权威、国家统一的象征体系。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不理解的。我们在大学读哲学时，教科书告诉我们，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愚昧的哲学，并且往往是和宗教愚昧结合在一起的。

何新：这是一种偏见。唯心论是一种哲学学说，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相关的政治属性（所谓“反动”或“不反动”）。宗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形态，但唯心论并不等于宗教。犹如细菌是生物的一种形态，但生物并不等于细菌。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第25页。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潮反对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标志着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直接为1789年的大革命做了意识形态准备。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执化的片面性，启蒙思潮也如此。

但是，近代法国的激进思潮后来深刻影响了19、20世纪的俄国革命哲学、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哲学。这种激进的反唯心主义、反宗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及发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促进时代精神从天主教统治下解放的进步意义。但在学术上，启蒙思潮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却是站不住脚的。

记者：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过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会阻碍文化进步？

何新：我同意。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政治工具。但是，对治国来说，没有思想自由和没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人类的新思想是社会文化中发生突变的活跃基因，过度地抑制这种变异就会阻碍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的连续生存和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功能。

要知道，恶性癌变也是一种基因突变。国家对于某些异端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否则一些意识形态的致癌基因就会发挥毒化社会机体的作用，例如“法轮大法”一类邪教。所以完全实行言论自由，不实施任何控制也不行。

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批注》中曾讲过，在生物的进化中，一个因素是基因的变异，另一个因素是基因的遗传。遗传保持物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变异，特别是创新机制的突变则提供物种创新的机会，使之达到进化和更高水准的生存适应。思想的自由创新和社会控制，可以说正是社会组织、文化形态通过矛盾作用而协调互补的两种功能。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处在激烈变迁中的大变动时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陷入持续不断的激烈动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价值崩解的时代，道术已为天下裂，学术已不能定于一尊，往日的宗教和学术权威不复存在。学界亦如流行文化界，只有明星（流星），没有恒星。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几乎一切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记者：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

何新：苏联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代，对哲学做阶级性分类，实际是为了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这种对意识形态作阶级性的分类必然导致“思想犯罪”。

记者：那么您认为，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客观上究竟是否存在？

何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哲学以及一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功利性？或

者说，人们信仰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宣扬它，是否有功利性？还是单纯地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只有纯学术的目的？

记者：我认为有两类人。一种人是有功利性动机的。另一种人热爱学术，以纯学术为目的。

何新：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这两个字，未免过于绝对了。但现在有人认为是，人类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存在，没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没有利益归属的差异，一切思想没有任何功利性，这也未免太荒谬。

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后面常常隐藏着自身的或家族的或社群的功利性潜意识。思想后面隐藏着利益和价值的判断和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选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范围远远超越了个人私生活的领域，社会性意识形态怎么能不含利益、功利性的意图呢？否认对于意识形态主张之后的利益归属的分析，不是愚蠢，就是骗人。

但是，过去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贴标签式的主观判断。对某种异端学说，一概武断和随意地贴上“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而给予扼杀。这种教权主义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张经济学远离政治。

何新：（笑）人文科学中，恰恰是经济学最不可能远离政治。政治是经济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马克思说过，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属性会把人心底最隐秘、最恶毒的私利欲望召唤出来。

记者：股市分析往往体现着股市操纵者的授意。我们且不谈直接的收买和操纵，难道政治意识形态后面也有操纵之手吗？

何新：意识形态是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石，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被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利用而成为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某些利益集团鼓吹、有意炒作、煽动某种意识形态，藉以操纵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以实现其自身的私利，这并不是新闻。近二十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偏颇，就是片面强调法制的功能，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则有所忽视。

西方国家表面似乎没有意识形态，但是却有宗教控制人的心灵生活，有基本统一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支配舆论。我认为，政党组织（在功能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教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以及法律和国家制度，这是维系任何一个国家制度的四大基础支柱。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性（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何新：这个问题问得好。以我个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我认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前者，它具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是有效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

作为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曾说过，他反对使科学的客观性从属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样做是“卑鄙”，是“对科学的犯罪”。

作为后者，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支持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它又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意义。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对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

意识形态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分裂必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意识形态与现实远相背离也会造成社会危机。我们当前同时面临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要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体制和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政治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政权会放弃而不利用这种政治资源。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

记者：在现代国家制度中，难道仍然需要意识形态吗？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难道不能保持中立吗？

何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请你指出这些现代国家制度哪一个是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当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俄罗斯这种仍处在演变中未成型的国家，是缺乏整体性政治意识形态的，而其政治局面也都因此而形同一盘散沙。但是苏联解体后，国家马上恢复了东正教的信仰权威，表明新统治阶级是懂得怎样利用宗教这一工具的。

^①新版《马恩全集》，人民出版社，第30卷，539页。

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瓦解？你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举出许多原因，但我认为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谈经济问题，难道1990年的苏联会比1917~1920年的俄国更落后更困难吗？会比1942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更困难吗？为什么那时苏联没有崩溃？我认为，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导致苏联国家崩溃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一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两大精神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精神价值体系和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有人煽动搞非毛化运动，然而中国制度之所以至今仍未被摧垮，就是由于邓小平当时坚决果断地拒绝了非毛化。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是什么？志就是精神力量，志就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那么，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法轮功”这样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乘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

要知道，对社会的一般民众来说，正常的人虽然都具有意识，但绝不意味人人都具有鉴别的意识、批判的意识，他们很容易受媒体的左右和欺骗。而且偏见与先人为主的成见极其重要，一旦形成，改变或替换就非常困难。

记者：当前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你认为这些问题与意识形态有关吗？

何新：当前中国面临若干危机，主要问题在三个方面：1. 由于严重失业问题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2. 由于腐败问题造成的政治危机，3. 意识形态危机。我个人认为，三大危机中当前更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危机。

当代中国之所以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是由于“文革”和后“文革”时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蹈向两个极端。“文革”时代的极端是极端意识形态化，即政教合一。

然而物极必反，后“文革”时代的极端，则是非意识形态化，消解政治意识形态，以“不争论”为方针而回避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问题，因之国家几乎丧失了对外部敌对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否则，不会有各种邪教的兴起和盛行。这种利用人性中最愚昧的下意识、利用愚夫愚妇的盲从心理和迷幻信仰的邪教，本应当一开始就将其遏制于萌芽状态，不使它形成气候。所谓圣者治于未乱，而非治于已乱。



我个人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当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现实相矛盾，严重矛盾，导致民众对国家体制及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心发生动摇；加上西方意识形态通过一些知识分子极力鼓吹所谓“制度创新”，更增大了这种信心动摇。第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记者：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必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

何新：对！对于一个人来说，支持其生存的力量有物质的因素，有体质的因素，但根本因素是精神力量。一个人可以被重病缠身，在生活中屡遭横逆，但只要其精神力量旺盛而不败，他就是打不垮打不死的；反过来，即使有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如果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他没有人生信仰，那么他的生存一定是萎靡的，其虽生亦犹死。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一个国家穷也好，面临困难也好，外敌强大也好，如果民族精神是强健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统一而有聚合力的，这个国家制度绝不会垮台。

记者：意识形态是否真的具有这么巨大的力量？

何新：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摧毁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推翻一个制度。在列宁《哲学笔记》中摘录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当今的制度。”拿破仑所谓摧毁封建制度的大炮，是指 1789 年法兰西大革命。

黑格尔曾指出，这个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墨水”的力量。革命前夜，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哲家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批判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意识形态与君主制度，摧毁了革命前的意识形态，为血流成河的 1789 大革命的爆发做了舆论和精神的准备。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英国革命。

由于英国近代没有激进的反宗教、反王权的革命意识形态，其主流思潮是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柏克等思想家所体现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因此英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比法兰西平和得多、稳健得多，社会变革过程流血较少。维多利亚王朝一直维系到今天。

世界历史、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现实则从另一面证明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

意义。伊拉克被美国封锁十年，哀鸿遍野，经济危机深重，但为什么至今不垮台？因为它是实施伊斯兰主义伦理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使人们团结在一起。

古巴不过是个弹丸小国，但摧不垮、打不烂，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有强大的意识形态魅力和精神力量。一旦意识形态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解体，一个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当今的互联网，美国通过文化传媒极力向中国灌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威胁也就在于此。

记者：某些第三世界的情况，与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完全相同。

何新：当代中国由于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动中，所以也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分离。这也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使当代人遭遇了非常深刻的精神危机、信念危机、信仰危机。

的确，今天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就中国的总体情况看，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局面，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最坏的。常有人拿人均数字排在160位之后论说中国落后，但我认为这个数字意义并不大。

瑞士人均数字比中国高很多，但瑞士的国力难道可以与中国相比吗？瑞士与中国比究竟谁是真正的强国？人均数位这个统计在1980年以前世界统计数字中还没有出现，其实那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造的一种意识形态陷阱。目的就是丑化和误导中国一类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摧毁他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

中国今天虽然问题重重，但局面和世界地位比印度、比南美、比非洲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好得多。但是为什么那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朝不保夕的深刻危机感？为什么那些国家中听不到那种激进政治制度改造论的煽动？为什么中国当今却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安和危机的情绪？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危机和信心、信念、信仰的危机。

由于政治是受到国家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政策是意识形态的派生物，由此引发出很多决策和政策上的矛盾和资讯混乱。这是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

面对这一问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道义也有责任面对和正视这种信仰危机。我们必须创造能够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尊严与自信心的新精神价值，这是每一个爱中国的学者当仁不让的精神使命！



【附录】

我对兵团战友何新的印象^①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8团 赵万龙)

记者孙伟化、杨威同志：

最近阅读了贵刊1999年四、五期《我是一个叛逆的学者》一文连载，使我想起了29年前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我与文章中主人公何新一样，1968年作为哈市知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友谊农场）。1968年和二十几位哈市知青从七十九连调到团机械厂，在硫化车间当司炉工，当时何新是翻砂车间工人。

因为何新同志年长几岁，在我的眼里他不仅像兄长，更是一个勤奋自学、思想敏捷、善于思考、刚正不阿、知识渊博，非常健谈且放任不羁，具有神秘色彩的一个人物，这在全机械厂是公认的。

正如文章所述，1970年从上半年开始，我团执行极左路线的一些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大肆残酷打击，迫害知识青年，致使我与机械厂其他几十名哈市知青被无辜打成反革命，全团大批知青被斗争、审查。

运动中，在我团团部地区又发生了“5.28”“6.14”信案件，我与机械厂哈市等四名知青错误地强定为作案人，非法拘押一年零四个月，在办案人不断审讯中，我才知道两个案件的内容是反对林彪，赞扬彭德怀、贺龙的。

因为我是运动初期被羁禁受审查的，无从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何新同志在当时极端恐怖，人人自危的形势下，勇于伸张正义，向专案组提出看法，这在当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最后他本人也惨遭迫害，错误地挨整。

我于1971年10月出来后回哈治病，1975年底返哈安排工作，这其中王怀滨等人几次进京到中央军委上访，反映情况。“四人帮”垮台后，直到1978年8月才由友谊农场正式做出平反决定。据有关人员介绍，全国类似的冤假错案达16万件之多。

我与何新同志分别已28年之久，再未谋面。在老知青相会时，则经常谈起这位不同寻常的兵团战友。贵刊登载他的消息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夜

^①此信原刊黑龙江省委《党的生活》杂志（1999.12）。

不能寐，脑海里闪现出当年风华正茂的知青们工作生活的以下一些片断：

我住的宿舍与何新只隔一墙，业余时经常到他宿舍中，一群青年听他高谈阔论，讲马列主义、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理论，讲《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这深奥的学问在当时的知识青年，其实是无知青年，都是相当费解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有一次，我被他的谈论所吸引，贸然地问一句“列宁见过马克思吗？”他不屑一顾地笑了，像这些可笑的问题经常提出。他一一做出解答，就这样，我对一些马列知识也有了点了解。

1969年底，一次在团俱乐部开会，团高参谋长（解放军），在台上大讲哲学，我们知青在台下老实听讲，何新同志竟然写条子传上去要与领导研究探讨，发表不同观点，高参谋长看后讲“会后交流”，这在当时也不是平常人敢为的。

他在生活方面很简单，不拘小节，可以说拉沓，剃个光头，铺一条不缝的褥子，上下两层布，中间是棉絮。有时工作一天后脸也不洗，一头钻进书堆，除了看书好像没有其他爱好。他的几箱子书涉及面很广，连《赤脚医生手册》都有，经常自己给自己针灸。一次为了证实中脘穴能帮助消化，我自愿让他在腹部上扎，果然，立竿见影，一针下去，马上排气。当时我们哈哈大笑，在他的影响下，一段时期我也敢在自己身上行针，尤其在患病时，缓解了病痛。

在此信未写完时，又看到了贵刊六期的七、八两节，知晓何新同志后来的苦难经历。他之所以能在逆境中坚强地活下来，并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成为一位对国家对人民做出贡献的学者，和他具有高尚的人生品格，寻求自身价值，对理念不断的求索精神是分不开的。

何新同志追求真理，铁肩正义，百年磨励，终成一剑。在当前形势早已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今天，金子终于发出了光辉，我相信并祝愿，这位兵团战友今后在他所热衷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最后，感谢孙伟化、杨威二位作者的辛勤劳动，烦请提供何新同志详细通讯地址。

此致

何新的兵团战友 赵万龙

1999年6月18日

中卷

VOLUME II

何新哲学自述





我对逻辑学的革新

一、探求唯实论与演化论的逻辑学^①

1. 我的第一篇逻辑论文

记者：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有一段经历是重要的，但也使人会感到不解和好奇。您没有读完大学，但是您却成为了大学教师。凭什么？

何新：在上大学之前，我在黑龙江友谊农场中是一名“知青”。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尽管是处在那样的年代中，我并没有荒度我的青春。我一直在自学各种知识，同时写了很多东西。

那时我写的东西中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革新问题的。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

记者：这个事件在您的个人经历中相当重要。您可以更详细谈谈吗？您那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何新：我那篇逻辑论文的中心论题，是认为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传统形式逻辑体系进行改革。

记者：改革传统逻辑体系？

何新：是的。你可能知道，约两千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逻辑体系。康德说：“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门已被完成的科学。”

这个体系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没有取得发展。直到近代，康德提出所谓“先(经)验逻辑”的存在，发动起对传统逻辑学革新的潮流。

19世纪初黑格尔从根本上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了彻底改革传统逻辑的一系列新的逻辑思想。

^①本文摘自《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一书，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此次出版前，作者有所修订。

但是，黑格尔的逻辑思想一直未得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界真正理解。

记者：这是您的论文的主题吗？

何新：是的。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认为应当据此改革旧的逻辑理论体系。

记者：这是很奇特也很大胆的想法。你的论文是否发表了出来？

何新：在当时当然不可能。事实上，这些论文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发表出来。有一些发表后收入到1988年出版的《何新集》中。^①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将它们寄给当时正在宣导研究“思维科学”的钱学森先生。钱先生读后似乎颇为赞赏，给我写了回信。并且将我所描述的一种概念系统树（历史概念系统）称作“何新树”。^②

2. 《哲学笔记》引我走入哲学之门

记者：我注意到《何新集》中开头的一组论文，都是关于哲学问题的。哲学是一种高度深奥晦涩抽象的东西，您是怎么对它发生兴趣的？

何新：我们前几次交谈时我说过，在哲学上最初引我入门的启蒙书是列宁的《哲学笔记》。那本书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好的哲学导引。

除这本书之外，还有一部令我在哲学问题上深受教益的书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

《哲学笔记》是使我在哲学上获得启蒙的书。我在1970年成为反革命分子，先被隔离，后来住医院。

那时我手边一直有一本从新华书店购到的列宁的《哲学笔记》，由于是列宁著作，所以它未被查禁，它和《毛选》一起伴随在我身边，伴我度过了那些被禁制、被隔离岁月中最为孤寂苦闷的时光。

正是列宁的这部书，激发了我对哲学思辨的最初的兴趣。

记者：我也读过《哲学笔记》。我觉得那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但我发现那实际也是一本未完成和不完整的书。所以我就没有对它发生太大的阅读兴趣。

何新：同样读一本书，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感悟，这除了理解的不同之外，也是由于人们的阅读背景、生活经历有所不同。

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一段话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关于人生的同一句格言，

^①《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见《何新批判》第3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版。但还有大部分研究，直到现在我也还未做整理和发表。



年轻人会讲，老年人也会讲。但是他们所体会的意义则迥然不同。尽管年轻人也可以正确地表述这句格言，但他绝对体会不到这一格言内涵中的那种深刻性和广袤性。因为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句格言不仅是一句语言，其中已凝缩了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人生体验。

记者：精彩至极！请问这是列宁的话吗？

何新：不，这是列宁摘录的黑格尔的话。事实上，《哲学笔记》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书，是列宁在读书时即兴而作的笔记。有很多随机浮现的自由思考，因此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关于西方哲学名著的摘要和提要。你知道培根关于读书讲过的一段话吧？他说：“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有的只须知其梗概，读它的笔记摘要就行了。”我当时读列宁这本书，等于同时在读一本西方哲学概论。

3. 上书毛泽东谈哲学

记者：在“文革”中，你已形成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一系列思想。难道当时不害怕承担政治后果吗？

何新：“死猪不怕开水烫”。因为此前反正我已当过“反革命”。

事实上，在1974～1975那两年里，我曾不断地给毛泽东写信，寄到北京中南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地。在这些信中，我既谈自己对当时的“文化革命”、批林批孔、中国历史的看法，也试图把我对哲学、辩证法和逻辑问题的研究呈献给毛。

我当时天真地认为，我所进行的研究，正是他老人家一直所期待着寻找的某种理论答案。

记者：（笑）您的确是太狂了。但是请问，您当时这样想的根据何在？

何新：我的想法有一点根据。

1966年春，毛泽东在杭州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曾谈到，关于辩证法的规律还没有确定。这个问题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反复思考和谈论。

他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品质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在时空中相互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1965年毛泽东读李达《哲学大纲》批注）。

他说他不相信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所讲过的三个规律（即品质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他说对马列老祖宗讲的话也不能迷信。他说他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最基本的

哲学规律，这就是矛盾，即对立统一的规律。

这个杭州讲话，虽然没有正式被发表，但通过“文革”时代印发的毛泽东内部讲话，流传很广。我在“文革”期间也读到了这个讲话。

4. 从语根找哲学

记者：有人说，“辩证法”的本来意义是雄辩术。

何新：是。但在国内还是我最早指出这一点的。1981年，我曾在《学术研究》杂志发表论文，指出当时的《辞海》中关于“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辞条释义是错误的。

因为在旧版的《辞海》中，形而上学被解释为一种“静止的宇宙观”，辩证法被解释为一种“发展的宇宙观”。这是沿袭于30年代苏联体系的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哲学上两军对战”的说法，是不对的。

论文发表出来后，《辞海》的一位编委不服，写文章与我辩论。争论进行了几个回合，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注意到，新版《辞海》已经完全修正了这一条目的解释。我这篇论文中发表的观点，正是我在70年代的研究中得到的认识。

记者：我在《何新集》中读过你的那篇论文。^①但是我认为这种考证，是一种很烦琐的语辞考证。

何新：不。我当时发表这篇论文的真意，是试图从这两个哲学基本观念入手，打破当时那种比较僵化和教条化的哲学概念体系。这是一次尝试。

你如果读过艾思奇的书，会知道他有一个著名的“两军对战”理论。对整个哲学史，他都采用30年代苏联哲学的观点，把一部哲学史，机械性地看成是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历史。

对哲学和哲学史的这种机械性分类的观点，渊源于30年代苏联机械论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在建国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主流哲学意识形态。这种哲学思想的二分法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思想性的分类。

我之所以要对辩证法做溯本寻源的语源学研究，潜在意图是想指出上述的政治分类所依据的哲学理念基础是靠不住的，是十分可疑的，因此可以打破。

事实上，我当时认为必须打破这个枷锁，哲学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

记者：那么，你是用语义学寻求对哲学的重新解释。

何新：1984年，我曾到南沙沟公寓拜访钱钟书先生。那次钱先生和我纵谈了整整一下午。钱钟书先生说，我在哲学及训诂学（即语源学）方面作的考证工作，有点

^①《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像海德格尔式的研究,类似海氏在《林中路》等著作中的工作,是“从语根上找哲学”。

我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评价并不高(我认为它是一个充满神秘主义的十分晦涩而思想意义却很浅薄的体系)。但所谓“从语根上找哲学”,这却是深获我心的精辟之论。

5. 人间最强大的力量是智慧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搞懂了黑格尔的逻辑观点?

何新:正是在我流浪京华的那一年,即1971年。

到1972~1973年,我已开始尝试将我的心得写成一系列论文,题名为“辩证法批判”,寄给《红旗》杂志,试图通过他们转呈到毛泽东手中。但是,一些编辑部把这些文稿一一退还给我。令我大失所望。

事实上,我的这几篇论文,直到10年以后(于80年代初)才在上海的《学术月刊》、北京的《自然辩证法通讯》、西安的《人文杂志》等刊物上陆续获得发表。

但遗憾的是,虽然我多年有夙志于此,这个工作却至今还未做。主要原因是自198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由于国内形势的转移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记者:转变的方向是向哪里呢?

何新:由关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即逻辑问题,转向关注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由形而上学走向了现实。

但对我来说,对这种新方法、新逻辑工具的掌握,可以说令我毕生受益无穷。我之所以能够经常具有前瞻性地预测一系列历史性事件,应该说正是受益于我所掌握和运用的这种新逻辑工具。另一方面,也深深地得益于我早年所做的哲学研究。

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记者:您认为呢?

何新:有人认为是金钱,有人认为是权力,有人认为是新技术或高技术武器,也有人认为是其他任何什么物质的东西。但这些所谓强大的东西,力量都是有限的。

真正无限的强大力量,是理性,是智慧(不仅是知识)。是精神的力量。

智慧不仅可以左右金钱,左右权力,实际上左右一切,而且可以创造一切。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上帝正是通过他的智慧而控制了人类和世界的。

这种有创造力的智慧,在佛家就是所谓“了觉”,“正觉”,“无上觉”,所谓“大智慧”。而在黑格尔哲学中,则被称作“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

6. 两种对立与两种矛盾

记者:我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曾谈到关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

这个规律毛泽东认为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也是辩证法的唯一规律。但是，所谓对立统一规律，究竟是什么意思？

何新：对立统一规律，是黑格尔最早提出来的。在他的辩证逻辑学中这一规律被认为是宇宙的一个普遍性规律。是一个本体论规律，也是一个逻辑学规律。

但是，就“对立”这个概念而言，过去的哲学家就没有搞懂黑格尔的真实涵意。例如我们读艾思奇、杨献珍关于辩证法的书，可以发现这些哲学家所讲的对立，只是现实中一些对立物的反对关系。例如阴电与阳电，男与女，以及东与西、南与北那种对立（列宁也是这样讲的）。但这种对立面，并不是逻辑的对立，也不是黑格尔逻辑中所意指的那种对立。

记者：黑格尔讲的对立是什么对立？

何新：要理解两种不同的“对立”，首先要理解两种不同的“运动”。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一切事物永远在运动。这种陈述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呢？有两类容易区别的‘运动’：（1）包括转移和转动的运动，我们称之为移动；（2）通过从年轻到年老、从白到黑、从硬到软的变动所表明的另一种运动，我们称之为变动。”

柏拉图指出，辩证的运动是指后者，即事物之自我异变，而逻辑关系的对立，也是异变形态下的自我对立。

记者：什么是“变异形态下的自我对立”？

何新：举个例子吧。一只鸡蛋，孵化变成一只小鸡。蛋和鸡，在逻辑关系上是两个不同质的、处于对立关系中的概念。从形式逻辑的立场看，蛋绝不是鸡，鸡绝不是蛋。但从黑格尔逻辑的观点看，鸡正是蛋的动态相变。

这一组对立的观念不仅相容而且具有同一性关系。

这就是所谓对立形态以及对立概念的同一性关系，就是黑格尔所谓“对立统一/同一规律”。黑格尔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规律，所直接针对的就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 $A=A$ ）。

记者：你对于对立关系和同一关系的这种解释确实有新意。

何新：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两种对立的差异，中国古人，特别是古代《易经》的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康熙皇帝在其御著的《周易折中》中说：

“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暑往来之类是也，即前所谓变化也。”

康熙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帝王，而且是一位高超的智者。他已意识到两种对立观念的不同。一种是并列、对峙关系中的对立。另一种是在时间流中通过演化和自我



更迭而生成的自我多相对立。

这是两种不同的对立性关系。前者是空间中并存的对立，后者是时间中保持着同一性，即连续性的对立。前者的对立是明显的，后者的对立是超越于直观的。

但其实只有后者才是具有逻辑意义的真对立。

应该说，康熙皇帝对对立问题的看法，是颇为深刻的。比我们现代的哲学家们要深刻得多！

记者：有两种逻辑对立，那么，是否也有两种矛盾？

何新：正如“对立”这个辞有歧义一样，矛盾这个词也是有歧义的。两种矛盾，一种是逻辑矛盾，概念的自相矛盾。这是黑格尔讲的矛盾。另一种是现实矛盾，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讲的矛盾都是现实矛盾。例如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和富有者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哲学的贫困》）

但是黑格尔讲的矛盾，不是这种现实中的矛盾，而是存在物自身分裂为两个概念（实在概念与潜在概念）而形成的自我矛盾。对于这一对范畴意义的矛盾，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已经提出，即“潜能”（隐德来希）与“现实”。这两种矛盾在逻辑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

7. 黑格尔逻辑学的来源

记者：你说到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建立者是他。但是，难道他也懂得辩证法吗？

何新：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实际上，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秘密，过去从没有人指出来，实际是没有被人发现。你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辩证逻辑思想的理论来源在哪里？

记者：您的看法……？

何新：黑格尔逻辑思想的来源，包括他关于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的思想的来源，并不是从天上突然地掉下来的。实际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思想中。

记者：人们通常只说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立者。

何新：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亚氏也是古希腊辩证法、思辨逻辑的创立者。黑格尔给予他以极高的推崇；但他又指出，亚氏哲学遭到了千年误解：

“亚里士多德乃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他是一个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当他把科学这样地分成为一定概念的一系列理智范畴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时也包含着最深刻的思辨的概念。没有人像他那样渊博

而富于思辨。他许多世纪以来是一切哲学家的老师，但却从没有一个哲学家曾被完全没有思想的传统这样多地歪曲过，人们把与他的哲学完全相反的观点归之于他。”^①

对亚里士多德的重大误解之一就是：人们只知道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形式逻辑，不知道他还有一种“思辨”（辩证）的逻辑。只知道他提出了同一律为基础的思维/存在三规律，不知道他还提出了对立同一的规律。

记者：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对立同一规律？

何新：是的。亚氏是在对“运动”的分析中发现了这一规律。所谓运动，有两种。一种是空间中的运动，人们通常所了解的可以直观的物理运动。还有一种是时间中的运动，这就是“变化”、“变易”的运动，“物件自身的运动”（黑格尔）。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不仅包括位移的两个位置，而且包括“生成”和“毁灭”这两个实体的特征，“增长”和“减少”的两个尺度（量变），变化的两个性质（质变）。运动是“潜在东西本身的现实化”。就是说，如果有某种东西，它现实地是 X 而潜在地是 Y，那么运动就是使这个东西的 Y 性质变成现实的性质。^②

亚里士多德在对变易性运动的分析中，极其深刻地阐述了作为本体论的辩证逻辑（客观辩证法）。他指出：

“运动的一部分实质恰恰就是潜在之物尚未完全丧失其潜能并且尚未变成现实；这是运动和实现之间的区别。在实现的每一时刻，潜能完全消除并被转变成现实性；在运动中，这种转变直到运动终止才能完成。运动是未完成的实现，实现是完成的运动。运动不能绝对持续出现。”^③

对这一过程的概念是在对立物之间，或一对立物和一中介（后者则代表另一对立物）之间，或矛盾物之间。

因此，运动本身必然是：

- “（1）从一肯定语词到一肯定语词（其反对），
- （2）从一肯定语词到其矛盾，
- （3）从一否定语词到其矛盾，或者
- （4）从一否定语词到一否定语词。”

在这里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由客观辩证法直接转向于辩证思维、辩证逻辑。

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三种运动：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第2卷，269～270页。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第2卷，269～270页。

③ Aristotle, BY William David Ross, Mothuen Co. Lid, 1960, P82。



- (1) 关于性质 (质变)
- (2) 关于数量 (量变)
- (3) 关于位置 (A → B, 有 → 无)

在这三种运动中, 都要有对立物。^①

记者: 这样看来,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确实蕴涵了黑格尔逻辑的雏型。

何新: 正是如此。但是, 正如亚里士多德传记的作者 W·D·罗斯所指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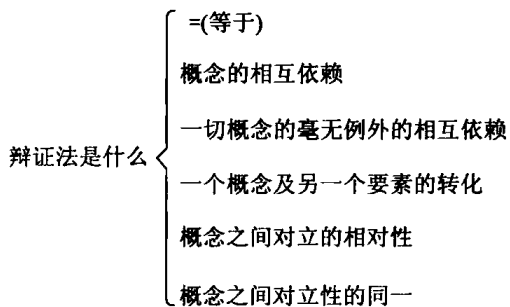
“尽管亚里士多德指出这些关系, 却从未尝试把一种变化化归为另一种变化; 范畴的差异不允许做任何这样的尝试。”

8.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记者: 同一性的意义是什么?

何新: 同一性在传统逻辑中就是同一律, 以及传统逻辑讲的“×× 是 ××”这种关系。现代逻辑称之为所谓蕴涵关系。

黑格尔认为, 存在本身是处在绝对运动中的。运动的本质是“一切都是从一种存在物产生——这就是同一性”。^② 这种运动的过程, 就是主体的自我矛盾思维和论辩。因此, 如果以存在物 (同一性) 为主词, 则由于其运动, 对它来说, 矛盾的陈述词不可避免。这种矛盾论辩的原理, 即古希腊人、也即黑格尔所说的矛盾论辩方式——辩证法。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上述思想极为赞赏, 并以下列图式做了概括性的表述:



记者: 这几个命题很难懂。

何新: 你在大学时是否学过形式逻辑?

记者: 学过一点。

何新: 形式逻辑提出三大思维规律: (1) 同一律 (A=A), (2) 不矛盾律 (A ≠

^① Aristotle, BY William David Ross, Mothuen Co. Lid, 1960, P83。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商务印书馆, 第二卷, 293 页。

非 A)，(3) 排中律 (A 或非 A)。

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就是认为在思维和论辩中，概念和判断（命题）必须坚持同一性，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发生自相矛盾的说词和命题，就意味着发生了逻辑谬误。排中律又称作“对立律”。这个规律认为，在两个相反的概念或陈述之间，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其中一个，不可能同时选择两个，若肯定一个则必须排除（否定）另一个。这就叫“排中律”。

传统逻辑认为，这三大规律是一切思维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基本逻辑规律。三大规律的基础是来自事物自身存在的确定性，不矛盾性和排他性。因此逻辑规律既是思维的规则，也是反映现实世界的（本体论）规律。

还应当注意，如果承认思维规律、逻辑规律也是现实规律、存在的规律，这就是相信思维与本体，即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

记者：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哲学上一直也是存在争论的。

何新：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包涵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层意义是思维性与存在性，在本体上是否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宇宙存在的过程，是否就是某种理念的思维性过程？

黑格尔在分析亚里士多德哲学时指出：亚氏哲学的根本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思维与思维物件的同一，客观的东西和思维（潜能）乃是同一个东西。”^①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观点，意味着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一种唯思主义。^②第二层意义是思维能否把握存在？即在思维中，能否逻辑地同时也是现实地认知存在？

记者：您的看法如何？

何新：我赞成黑格尔的观点，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在本质上是同一性的。

9. 逻辑理性主义更见深刻

记者：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头朝下”的理论，必须颠倒过来。这是什么意思？

何新：黑格尔认为概念、理性乃是宇宙的本体，现实是在概念、理性中存在的。

马克思则认为，概念乃是现实世界在人类头脑、理性中的反映、映象。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认识论颠倒了这一观点。

马克思认为，必须把黑格尔的哲学颠倒过来。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第2卷，299页。

^② 唯思主义，或理性主义，即 idealism，旧称为唯心主义。但所谓“心”即“心灵”，是一个人体器官，使用在哲学上是不严肃不确切的。因此不如弃置这个通行的旧词，而称之为“唯思主义”，即主张思维本体论的哲学。



记者：您怎样看？

何新：我认为在本体论问题上，实际是黑格尔的观点更见深刻。因为人类面对的现实本身并非绝对的。人类并非生活在固定的物质中，而是生活在流态的宇宙中。历史是一系列的事件，事件的载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而人类与万物作为事件并非实体（或“实在”），而只是形态（或“现象”）。而形态（现象）是处在不断蜕变过程中的。

万物所留下的，人生所留下的，最终只是资讯，而资讯也就是抽象性的“概念”，理念。宇宙在本原和终极意义上，是、也仅是一系列有组织联系的“资讯”或理念，所谓“Idea”。

因此，事实上绝对真实的现实只在理念和理性的意义中存在。这个宇宙的存在之流，仿佛是以光及影为符号在结构中的源源不断的一种陈述。

谁是陈述者，即陈述的主体是谁呢？那就是宇宙本身。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在只是言说。这是他比较深刻的一个观点。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说宇宙的本质是“逻格斯”（即言说）。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黑格尔称之为“宇宙的辩证法”，其意义其实都差不多。

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是思维逻辑，而且包括了关于存在本体自身的演化进程的陈述逻辑。这种逻辑学与古典逻辑的不同点，主要是黑格尔引入了动态的时序观念，是一种从发生和流变的状态中，观察和陈述存在形态的逻辑。

在这种逻辑中，存在的连续性表现为流动、多元性和相互融合的统一性。这种同一性，也可以称作多元的统一性，因此对一个处在变异中的主体，它是可以相容矛盾的概念和陈述（命题）的。这种多元的统一性，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立同一”。

二、一种新型逻辑的构建

1. 一种新的逻辑理念

记者：我听不大明白……

何新：对，那么让我用一个具体的事例解释一下。例如，我们面前有一条小狗。如果我陈述说这个物件是一只狗，那么假如我又说这个物件也是一条鱼，那我就违背了关于物件自身同一性的逻辑规律，一个物件不可能既是一条狗同时又不是，而是一条鱼。这两个陈述（谓词）是相矛盾的，如果其中一个成立，那么另一个肯定就应该放弃。

记者：是呵！难道可以有别的说法吗？

何新：可以。从静态的观点，或者从现象的观点看，关于存在自身的同一性似

乎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实际上，宇宙的本质不是静态的。因此宇宙的统一性是一种演进过程中的统一性，是多形态的统一性，是一种实现在连续的非同一形态过程中的统一性（这本身就是悖论）。

从动态的逻辑观点看，形成以下的矛盾命题并不是谬误。我们以字母“A”表示某种连续的生物物件，则：A是鱼，并且A是狗（A是鱼，A是狗，鱼+狗）（我们用“→”代表动态，表示进程）。

这个“A”，就是指那种生命原体。这种生命原体既可以设定为鱼，也可以设定为狗，甚至可以设定为人。

从逻辑的意义上分析，也就是说，现状态被判断为是鱼的东西，自身中潜在地同时具有非鱼的状态，并且必然会生成为非鱼的新谓词、新命题、新判断。

记者：这是对于同一性的一种新观点。

何新：同一性实质就是一种抽象。变异的过程就是在做客观性的抽象。一切抽象的东西都是自身含有矛盾的。

抽象就是建立一个集合，进入这个集中的各个元素，本身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但仅仅在某一特殊性上的联系使之组合。“差异就是矛盾。”（毛泽东）而存在本身的动态过程，不断地演变出同一性存在体的不同形态，这个过程，可以看作一种自我分类，自我差异化，即进行自我抽象的进程。

记者：你的意思是，存在的过程也是抽象？

何新：处在时空区内的一切存在物，随着每一个时间瞬间的消逝，而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的存在物，在每一个瞬间之后，都呈现新的状态，而旧的状态随时间的消逝则不复存在。宇宙的存在，是连续性的变化的进程。这种连续性，实质就是同一性。而同一性就是自我抽象过程。黑格尔说：抽象就是思维。所以存在之流可以被看作一个理念发展的流程，一个存在体自我思维的过程。（参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要把握（认识）这种连续的变化进程，就需要持一种动态的新逻辑观。而黑格尔的逻辑就正是这样一种动态逻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逻辑实在的观点。

记者：这种逻辑与进化论似乎一致？

何新：对。进化论告诉人们，一切生物（包括狗、鱼）均起源于同一个原始物种，是同一个原始物种进化历程中的种类分化。

尽管现代生物科学在理论上已经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许多方面被修正了。但是，进化分类学所确定的大物种演化序列这个观点不会过时。

什么是物种？物种的分类体系就是一个大的概念体系。或者说是一群子集的大



集合。在进化分类学中，已经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多元性的同一性，或者说对立性概念的同一性。但是，由于受囿于弗雷泽、罗素等人的狭隘数理逻辑观点，生物进化分类学概念系统所显示的新逻辑结构，至今仍未进入逻辑学家们的视野。

2. 唯名论与唯实论

记者：生物的分类，类名，难道不是人类赋予自然界的吗？难道是天然的吗？

何新：你这个问题，在中世纪哲学中曾经被西方哲学家研讨了几百年。也就是关于概念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辩论。它也曾经深深地困惑了18世纪的著名动物分类学家林奈。而在现代，这个问题正是认识论和逻辑基础研究的一个焦点。

记者：现代科学怎么解答这个问题？

何新：在罗素一类逻辑主义者看来，这种分类（集合）纯粹是人为的。也就是说，概念、类、集合只是人类直观的创新。这是现代唯名论，但它是谬误的。

记者：为什么？

何新：人类用以认知世界的理性工具是思维。思维是一个符号系统和资讯系统。这个符号/资讯系统有两种功能。第一是作为传递资讯的工具，即作为语言。第二是在系统自身中进行资讯处理和交换，这种资讯处理和交换，可以被看作一种“演算”。作为这种资讯演算工具的规则，就是逻辑。人类理性的这两种功能——语言和逻辑，在自然语言中使用的是同一套符号。这套符号的基本元素就是语词及概念。

语词不是概念。但是概念是通过语词而存在的。语词是人为的，人造的符号。

记者：那么，难道概念不是人造的符号。

何新：不是。概念是实体。不仅是语词（类名）的实体，而且也是作为客体的实体。

麻烦和问题就出在这里。概念在语言中以语词为符号形式而存在。因此中国古代学者对概念与词同样称之为“名”或“类名”。这个名/类名，记号似乎是人为的。

但柏拉图等古代哲学家早就意识到，概念自身具有客观的实在性，它是实体。因为分类并非人为地做出的。这种概念论就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实在论”，也就是中国古代佛学哲学中的所谓“真如”论。

3. 分类是大自然做出的

记者：这是一种唯心论，或你所说的“唯思论”。

何新：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观察人类思维中的概念系统，可以发现存在两种类型的分类概念系统。例如，对图书馆书架上的书，我们可以根据书的内容（哲学/历史/经济之类）、

作者的姓名（以字母排列）、出版年代、包装形式（精装或平装）……等等，以任意的一种特征为标准进行分类处理，并且将其联结而构造成一个分类的系统。这样建成的分类系统，它的抽象依据，显然纯粹是人为的。传统形式逻辑以及现代的集合论，它们所面对的分类概念以及所谓“集合”，都是指的这种分类。这种分类的基础确实是一种人工抽象。

记者：难道还有非人工的分类吗？

何新：对。这种分类系统首先在生物学中出现，但实际上它是具有非常广泛的普遍性的。对它的研究将导致逻辑基础理论和人类认识论的根本革命。

记者：请您谈谈这种非人工划分的分类和概念系统的特征。

何新：近代生物分类学形成的起点是在 John Ray（1672—1705）那里。他是著名分类学家林奈的先驱。他们当时面对着自然界中呈现为极其丰富的多样性的生物系统，Ray 在确定生物分类的标准（抽象根据）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

“经过长期而大量的观察后，我相信在确定一个物种时，除了可以把通过种子繁殖而使之永远延续的特点作为标准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标准了……”（转引自 Magner: *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 347 页）。

这就是说，生物学家在建立生物分类的概念系统时，发现存在一种非人工的、存在于生物本身的分类根据。这就是联系诸生物个体之间的遗传的连续性。这就是生物自身的遗传性状。

在现实中，一头雄狮子只会和雌狮，而不会和一只老虎交配。一对狮子也绝不可能生殖出一只猫。这就是大自然自身的客观分类。这种自然的分类，是人为分类即设定概念 / 集合以及命名的客观基础。

美国分类学家 T. Dobzhansky 说：

“生物的多样性，多少是为每个人所熟识的、一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它是在我们意识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作用而被我们所察觉到的东西。

“生物界并不是一个单线的行列，并不是其中任何两个变异体都是被不断的中间类型连接起来的。而是一个含有或多或少明显地分离的多个行列的行列，且在行列与行列之间没有或至少罕有中间类型。每一行列是多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的个体的集合体。一些小的集合体群结起来形成较大的次级集合体，较大的集合体又形成更大的集合体。如此类推而发展成为一种自然阶梯性系统。生物学家就利用变异的不连续性来制订生物的科学分类。

“为便利起见，就把分立的集合体称之为族、种、属、科等等。这样总结出



来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为的。因为这是为了方便和习惯起见而把某集合体称作属、科、或目。但是这些集合体的本身和在它们之间所观察到的不连续性，却不能认为是分类学家的空想或杜撰。

“这种分类，反应了客观地可以探知的变异的不连续性。并且在种、属以及其他范畴之间所做的分界，相当于生物的分立集合体之间的间隙；就这些方面而言，分类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

4. 概念具有实体性基础

记者：那么，也就是说，在现代生物学看来，分类的集合概念，事实上在自然界中是确然具有实体性基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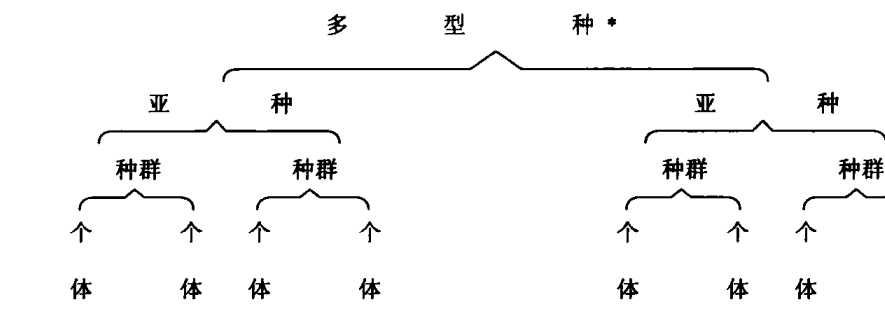
何新：对。生物物种是一个大概念（大集合）。而物种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新种，就是新的概念，新的类属的子概念（小集合）。

进化的历史关系，把这些对立而不同的小物种概念，归类为一，统统归属于一个大生物的概念。

孤立看，狗的概念、鱼的概念，是对立不相容的两种概念。但是，它们都统一于“生物”这个大概念，都可以归入“生物”这个大集合中。

为什么？这不是人为分类和归并的结果，而是在自然中客观地发生和存在的物种连续性使然。因此物质（存在）的统一性，来源于它们历史上起源和演化的同一性。正是同一种生物原体，在进化的某一形态上，形成了鱼，在进化的更高形态上，形成了狗，以至更高级的人类。生物的自我繁殖所构成的个体之间的连续性，成为建立分类的客观基础。据此，林奈建立了如下的分类体系：

物种结构示意图



*具有亚种的物种称为多型种，不含有亚种的物种称为单型种

由个体组合为种群，由种群组合为亚种，由亚种组合为种。这样的组成，我们称之为物种的结构。

你应该注意到，这种分类方式，以及由这种分类所建立的物种“集合”，与图书馆中对于图书的那种人工分类集合——例如“文学类图书”、“理工科类图书”、“历史类图书”、“工具类图书”等，意义是迥然不同的。

记者：我注意到了，是有所不同。前者是自然中客观地存在的类群，后者只是人工划定或设定的类群。

何新：我再引用一位现代分类学家的话。美国分类学家 T. Dobzhansky 指出：

“自从达尔文时到现在，‘自然分类’（natural classification）这个词一直意味着以生物由共同来源为基础的一种分类。联合在一个种、属、纲或门中的生物类型，被认为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传递下来的。在分类范围之间的分界线，至少在理论上是符合于系统树（phylogenetic trees）的分支的。”

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研究黑格尔逻辑时已经意识到，生物分类学家所说的这种“自然分类”系统，事实上在人类思维与概念中有极为普遍的和广泛的存在。任何一个具有历史演化联系的、自我形成的概念系统，都正是这种“自然分类”的系统。我将这一类的概念系统命名为“历史概念系统”，或借用集合论的术语，叫“历史概念类集”。

我发现这一类概念系统具有某些非常独特的逻辑性质和逻辑规律。研究这种新的逻辑性质和规律，可以构造出一种新类型的逻辑。而亚里士多德那种逻辑，即建立在人工分类基础上的古典形式逻辑，事实上只是这种新型逻辑的一个特殊形式。

因此，我们发现的这种新逻辑（作为客观逻辑）并不是现代逻辑（基本是主观逻辑）的一个分支，而是全部传统逻辑赖以成立的客观本体基础。

5. 思辨逻辑是形式逻辑的基础

记者：我似乎已有一点听懂。

何新：让我再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在分类和概念的形成上，传统逻辑认为概念来自人类意识的主观分类。概括某些事物的共同点，加以抽象，形成一类事物的概念，即命名。例如植物 / 动物 / 人类。

而黑格尔的逻辑则认为这些类群是在生物演变中自我区分（异化）和抽象出来的。演变就是一个自我分类的过程。人的意识，只是用符号去类比和记录这一过程的产物，这就是概念客观的形成过程。所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也包涵了认识论（即能够解释思维及概念的起源、本质）。

这就是黑格尔所试图超越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而建立的一种新型逻辑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可以相容自相矛盾的命题和谓词，而且必然蕴涵矛盾、悖论。这种新



型的逻辑,黑格尔称之为“思辨逻辑”(Die Spekulative Logik),是一种动态的历史逻辑,演化的逻辑,此即真正意义上的“辩证逻辑”,实际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元逻辑。

记者:但是,这种逻辑目前是否已建立?

何新:没有。黑格尔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角度,论述了这种新逻辑体系的若干基本原理。但黑格尔这个体系太晦涩。因此正如列宁所说,“从来没有被人们真正搞懂”。

我当年曾有志于建立它,但工作后来没有做完。1980~1982年我就这个论题在上海《学术月刊》、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西安《人文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后,我的工作就中断了。

记者:为什么?

何新:当时中国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冲突与辩论吸引了我,我的研究重点转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上。但是,我有关这个问题在80年代发表过的几篇论文,曾得到关注思维科学发展情况的钱学森(控制论、资讯理论领域的权威学者)以及生物分类学家陈世骧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6. 关于“何新树”

记者:钱学森先生在给你的信中,曾谈到“何新树”这个概念。请问什么是“何新树”?

何新:钱老给我的来信中是这样讲的:

您的“历史概念集合”是一个创见,我赞成。

但我认为您应该把集合论的Venn图扩展到三维空间成为“何新树”,也就是把一个时间的Venn图作为“树”的横断面,以时间顺序把横断面一层层架在时间座标上,再把外表联起来。当然这“树”可能不同于自然生长的树,不同“树”的“树枝”会在“上面”结合起来。这一设想得之于上述(二)之把形式逻辑用于事物的某一瞬间的关系。

有了“树”,数理的辩证逻辑学就可以利用数学中的拓朴学建立起来了。

因此我想您所开创的历史概念集合是有生命力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1982. 4. 17)^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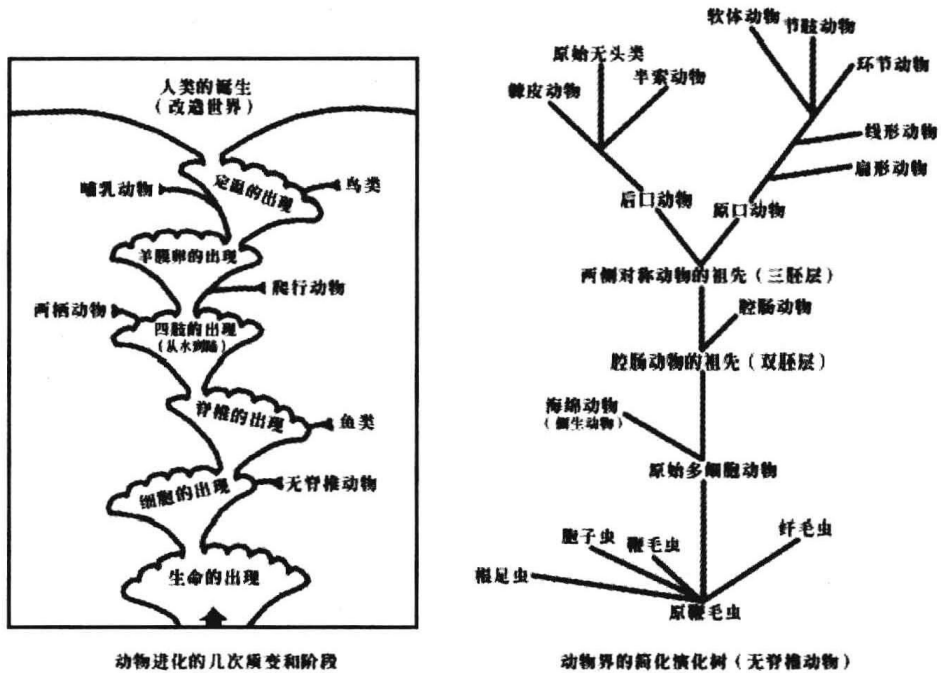
钱学森指出:(1)这种递归性的动态历史类集可以命名为“何新树”。(2)吸纳符号逻辑和数学拓朴学的成果,可以使辩证逻辑理论形式化,可以将这种递归动态逻辑建立一个系统化的新逻辑体系。

^①此信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331页,见本书前面收录的钱学森致何新的信。

钱老当时并不一定完全了解我的全部想法，但是他的洞察力是深刻惊人的。

记者：钱学森对您的发现评价很高。但是为什么称作“何新树”？

何新：在现代数学中，“树”是拓朴学和图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用点和线连通而成的一种像“树”的图形。



概念的历史系统发生，可以在二维平面上描述成“树”的模型。事实上，历史概念系统，可以用拓朴树状图加以描述。在这种历史系统树中，呈现出两种逻辑关系：纵向的抽象关系和横向的类群关系。

我们可以认为，纵向的系统关系是一种逻辑抽象或自我分类，体现着逻辑一般性。而横向的类群关系是一种个体集合，体现着逻辑的特殊性。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认识这种概念系统发生的逻辑基础，我们就可能构造一种新类型的逻辑系统。

7. 揭示思维之谜

记者：请您更具体一点解释。

何新：这个问题要讲深入就应该写成一本书。我在这里只能简单提示一下。

如果从逻辑角度剖析历史概念系统树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这棵树实际就是一个客观的演绎推理树。

仍以生物的演化为例。如果我们把最初降生在地球海洋中的第一批生命元物质，看作关于生物起源的元概念，那么它在这棵概念发生树上的整个走向：产



生新概念，由个体而扩展为群落 ($A=A$)，然后通过遗传和变异首先是个体变异 ($A \rightarrow \neg A$)，进而是种群变异，形成新的类群 ($A \rightarrow AV A \rightarrow \neg A$)，即生成新的分类概念 ($A \rightarrow A \wedge A \rightarrow \neg A$)……这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逻辑过程。完全可以看成一个概念的自我发生、自我运动、自我扩展、自我异化和对立化的概念推演进程。

这正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描述的“概念的自身运动”。更重要的是，对这个进程做更进一步的逻辑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树形系统自身具有构造演绎推理的能力。事实上，它就是人类演绎推理这一逻辑过程所类比的客观原型。

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揭开人类思维之谜，逻辑结构的来源之谜。你知道吗？一些西方古典哲学家，如休谟、康德，都曾提出一个人类理性之谜。

记者：是什么？

何新：让我用现代语言来表述。他们问，人类以自己构造的一套符号系统在头脑中处理资讯，但为什么竟会有客观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例如，以关于气象的若干概念（资讯符号）逻辑地组织起来进行推演，其结果竟会与未来的自然气象真实情况相吻合？这表明思维、理性并不是一种被动的主观模拟，而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从何而来，根据何在？

记者：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吗？

何新：如果我们知道人类进行资讯/符号演算的逻辑构造与逻辑规律，恰恰就是客体自身存在、运动的普遍的逻辑结构和规律，那么这个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8. 钱学森的第二封信

记者：对你的这种新逻辑观点，数理逻辑学家怎样评价？

何新：钱学森先生后来给我转来中科院院士、数理逻辑学家胡世华先生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说：

“何新的文章我没有看。

关于您说的：‘把 Venn 图的概念扩大，加上时间座标，再用拓扑学研究“树”，是否可以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数理化？这是否有道理？’

我认为可以，是有道理的。但是实际这样做的人似已有了，只是他们没有说这是‘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数理化’，应该进行的具体的数学研究也进行得还远远不够就是了。例如 A. N. Whitehead 在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1926) 就建立了以‘event’为基本概念的理论，数理逻辑家 R. Carnap 称之为 *Theory of events* (Ereignistheorie)。采用了作者所说的 *method of extensive*

abstraction, 就把您要求的内容十分自然地包含进去了。更详细讨论这问题的是他的另一本书,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an Enga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1925.*”

钱学森先生在附信中告我：

“胡世华同志还指出 Carnap 的又一本书 *Abribder Logistik* 也有应用逻辑部分, 与我们的问题有关。但这部分学问懂的人少, 搞不动。也就未受重视。”

他还谆谆地说：“何新同志：我想胡世华同志的这些意见很有用。看来您要做的已经有了开头，问题是吸取这些有用成果，把它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再一次把倒立着的東西顺过来！您要办的事是大有希望的！但我也以为完成这项工作，光您一个人也难，不知您找到了同道没有？总要有几个人的研究小组才行。（1982. 7. 9）”

记者：在这样短的时间，钱老连续给你两封信，表明钱老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

何新：可惜我辜负了钱老，直到现在没有把这个课题做完。

记者：胡世华先生的信中所提到的两个人是什么人？

何新：一个中文译名是怀特海（A. Whitehead），曾与罗素合作写成《数学原理》，他本来是罗素的弟子。还有一个是卡尔纳普（Carnap），数理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胡世华先生可能有点误会。这两个人都根本不懂得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对维也纳学派包括罗素的论著和逻辑哲学思想，我早年即已做过研究，他们都是所谓“逻辑实在论者”，这个学派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和逻辑是“形而上学”，与罗素一样是蔑视和拒斥的。他们怎么能理解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呢？

从根本上来说，我所致力欲建立的“辩证逻辑”，既不同于过去一些人所谈的哲学意义的辩证逻辑（实际属于本体论），也未见容纳于现代数理逻辑的任何分支之下（例如，根本不同于“时间逻辑”、“多值逻辑”、“认识论逻辑”）。它是一种完全新型的逻辑，是逻辑的逻辑，是逻辑的广义基础，即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

9. 探索新逻辑之路

记者：黑格尔是18～19世纪之交的人，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来，现代逻辑已取得了许多进展，出现了新的数理逻辑体系。

何新：但是，现代逻辑学家仍然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所基本设定的哲学背景和框架之下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尚没有摆脱静态的逻辑观点。只是应用数学集合论的方法，建立了符号数理逻辑的体系。由于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近代逻辑学家根本搞不懂黑格尔逻辑，反而由于无知而对黑格尔持轻视的态度，因此他们



对黑格尔的动态逻辑原理可以说一无所知。现代虽然也有人提出了“时间逻辑”的概念，但其内容是空洞的。现代逻辑完全没有吸纳这种新逻辑的成果。现代逻辑在形式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现在已经陷入了死胡同。

记者：什么是死胡同？

何新：死胡同的意思就是，现代逻辑正在变成一种极其主观和非常形式主义的东西。

在19世纪和20世纪，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体系给予高度的重视。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资本论》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逻辑方法（由正题、反题走向合题的三段论）。^①

毛泽东在50年代曾在中国哲学界发起过一次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问题的大讨论，表明他当时也曾关注这个问题。

从1965年的杭州哲学谈话看，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然在思考逻辑和辩证法的若干原理性问题。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一部哲学（本体论、社会论）著作，而不是逻辑学著作。他所关注的矛盾问题，主要是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矛盾，特别是政治矛盾、阶级矛盾。这种矛盾与逻辑理念中的矛盾虽有一些联系，但本质非常不同。

三、批判罗素的“逻辑斯蒂”

1. 新黑格尔主义不懂黑格尔

记者：尽管黑格尔在哲学史上被认为是一位大哲学家，但似乎人们并不承认他是一位真正意义的逻辑学家。我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对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逻辑学评价很低。在国外目前出版的逻辑史著作中，也没有黑格尔逻辑学的一席之地。

何新：确实如此。但那是因为罗素根本没有读懂黑格尔。不但他不懂，他的那些弟子也不懂。他不但未读懂黑格尔，也没有真正读懂康德。

罗素是通过布拉德雷的新黑格尔主义了解黑格尔的。布拉德雷的名著是《现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我读过他这本书。我的印象是，此人既不了解“现象”，也不了解“实在”，更不真懂黑格尔。^②大陆理性主义哲学与英国的经验主义

^①见本书《论〈资本论〉第一章的逻辑三段式》一文。

^②据说黑格尔晚年讲过这样一句话：“在我所有的门徒中，只有一个人可能理解了我。而他的理解也是错误的。”

哲学出自两个非常不同的传统。在康德和黑格尔时代就是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罗素这位英格兰贵族^①，头脑中充满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我优越感和傲慢的偏见。

记者：难道您认为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胡塞尔这些西方现代哲学家也并不理解黑格尔吗？

何新：是的，我认为他们不理解。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读懂黑格尔的著作。

2. 关于因果律的佯谬

记者：您能否提出一个具体的例子，证明这一点？

何新：关于罗素在哲学上的浅薄，我们可以用他对于“因果性”规律的解说作一个实例。

关于因果性的虚拟性问题，即对于因果关系是否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这个问题，最早是休谟（D. Hume, 1771 ~ 1776）提出的。休谟说：“因果之被人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乃是凭借于经验。”^②

休谟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是要求认识论对因果规律性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一种逻辑基础。“我们要问，由经验得出的一切结论其基础何在？”^③这个问题后来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实际上已经给予了解答。

罗素在他的逻辑哲学著作中也多次谈到因果律的虚拟性问题。但是，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理解是非常表面性的，非常庸俗的。他并没有真正理解休谟的问题，更没有理解康德、黑格尔对问题的解答。他只是用一种很庸俗的论法肤浅地复述所谓归纳法的“佯谬”。

记者：什么是“归纳”佯谬？

何新：休谟说：“在人心的种种思想或观念之间，有一种联系的原则。”（何新按：这种使观念“联系的原则”实际就是逻辑）。“这种联系的原则有三种：（1）相似性（Resemblance），（2）时空的排列（Continuity in Time or Place），（3）因果关系（Cause or Effect）。”休谟认为，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最难理解的，因为“每个结果都是和它的原因不一样的事情。因此结果不能在原因中发现出来。因此，人们所想象的结果一定是完全任意的。”^④对此，罗素鹦鹉学舌似地说：

“如果说 B ‘必然’ 跟随着 A，那么这只是表示，依照某种普遍的准则（这一

① “他的家系在 Burke 的《贵族名册》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其族谱中找不出一个平头百姓。”（艾伦·伍德《罗素传》，B. Russell, Alan Wood, 1963）。

②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30页。

③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32页。

④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30页。



准则已被大量的观察所证实，并且没有在任何情况下被证明是假的），B类事件是紧跟A类事件出现的。如果说原因强迫结果出现，那么，这个说法正如同人们反过来说结果强制原因出现一样，会导致同样的谬误。”

据此罗素认为：归纳法无法证明因果律的必然性。他援用一个极庸俗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圈养的鹅每天看到饲养员来，都是对它喂食。因此它们可以用归纳法得出以下的因果论：凡饲养员来/鹅即得食。但这两个事件是没有必然性的。因为有一天，饲养员带来的可能不是饲料，而是杀鹅的刀。

对于因果律的这种理解是极其肤浅的。罗素讲的这两个事件的关系，也并不是真正的因果联系。人类对于因果性的确知，既不是建立在经验的归纳法上，也不是建立在对于所谓“B事件紧跟A事件”这一先后关系的观察上，而是建立在实践上的。

如果否认因果律的这种实践定义，那么气象局就应当停止做天气预报。而人患了病也不应当去吃药——因为人们无法断定抗菌素究竟是否是病菌被杀死的必然原因。人甚至应当停止吃饭穿衣，因为肚子饥饿这一现象也许与缺乏食物并无必然关系。我们也无法知道是否衣物确实可避寒。

3. 因果规律与人类实践

记者：对西方哲学史，我不是很熟。请您讲得具体一点。

何新：一般来说，从洛克、休谟到罗素的英国经验主义者，他们都喜欢侈谈“经验”这个概念。但他们所理解的“经验”，仅仅局限在感性知觉的经验上，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实践也是经验的一个重要基础。实际上，因果关系并不是来自心理印象和观念的主观联结（休谟的说法），而是来自人类的实践。

真正的因果性并非分裂的两个孤立现象或事件。真正的因果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比如，人们说鸡蛋是产生雏鸡的原因。看起来蛋与鸡似乎是两个事件，但实际上，蛋孵化为鸡，乃是同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一个存在内在必然关系的事件。

农民春天种下西瓜种子那并非基于一种假设，而是基于一种确知——他深信这个“原因”在夏天将结出西瓜的果实。这一信念既是基于他对“种瓜得瓜”这一因果关系的确知，也是由于这一因果关系的可操作性——这种因果性可以在实践中得到现实的、直接的验证。因为种瓜真的只会得瓜，而不是得豆。这就是实践的因果性。

所以，西瓜种子是新的西瓜的原因这一因果性，并不是“佯谬”，而是客观真理。

以康德的理论形式来表述这个命题，我们可以说“西瓜”这一结果已作为一种“先验综合命题”而存在于“西瓜种子”这个原因的概念之中了。^①

这个过程可以不断地、无限地重复，这就是这一因果关系的普遍性。而导致这个过程发生的机制，则是由于西瓜种子细胞质内涵有西瓜的遗传基因。这种内在的基因密码，就是发生这一因果关系的必然性。

所以，“普遍性”与“必然性”也并不是人类理性的虚构（休谟的说法），而是确定的，并且可以实践地把握的真实（真理）。

罗素搞不懂这一点。他承继着休谟所提出的因果关系的归纳佯谬，连篇累牍地写了许多关于其如何不可证明的废话，充分表现出其哲学的浅薄。

4. 西方运用诺贝尔奖建树意识形态偶像

记者：然而许多人膜拜罗素是现代哲学的大师！他是否也得过诺贝尔奖？

何新：什么大师？虚拟大师。20世纪初罗素来过中国。当时胡适、张东荪等西化派自由主义者奉他如圣人，而鲁迅却对他表示蔑视，嗤之以鼻。鲁迅是对的！

罗素一类所谓大师（不仅仅是罗素）的光环，是英国文化殖民主义有意培植塑造的一种对西方意识形态崇拜和迷信的产物。西方主流文化需要向世界，特别是向非西方世界推广、推销这种崇拜和迷信。西方需要非西方崇拜他们的精神和文化偶像，需要建树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这不仅是一种商业性推销，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斗争，是从属于由西方来主导全球化进程，以征服和主宰全世界的全球战略斗争这一总目标的。自19、20世纪以来，这一斗争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恐怕还会再进行一百多年。

意识形态总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变局就是全球化运动。为了由西方来主导这一运动，西方不仅将全面利用其长期积累的资本优势、科技和工业的优势，而且也会充分利用其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的优势，包括由西方主导和操纵的诺贝尔奖以及其他种种文化奖，目标都是塑造从属于西方主流价值的偶像崇拜。

在这种意义上，什么罗素、萨缪尔森之类的伪大师，什么诺贝尔奖以及其他什么金狗、金猫、金熊奖之类，都不过是西方主流文化用以塑造虚拟偶像的精神工具而已！他们要用罗素、诺贝尔一类的偶像，来置换中国人自己的例如毛泽东、马克思、

^①孤立地看，农民春天把上好的谷粒丢到田野里，似乎是一种疯狂。但是，秋天的收获却证明了这一操作的明智。这两个事件是一种因果联系。它是必然的，并且是个百年里不断重复的因果关系。



列宁、孔子、鲁迅这样的偶像。(贬斥他们为“过时”和“落后”。)

中国人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在文化上竟然接受了要由西方人主宰文化评价和授奖。甚至以这种奖赏为荣，认为得到这种奖赏就是走向了世界，否则就是没有走向世界。这是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的文化自卑心态。但是，我记得列宁《哲学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①
——让我们站起来吧。

5. 罗素与逻辑斯蒂

记者：罗素毕竟是一位数学家、逻辑学家。

何新：罗素与怀特海合作写过一部《数学原理》(Principle Mathematica)。而这部《数学原理》在数学史上或逻辑史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呢？^②实际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空壳而已。

记者：这样讲是否过于刻薄？

何新：罗素写此书目的之一据说是为了解决悖论问题，解决数学逻辑基础中的矛盾问题。但是他究竟是否解决了？根本没有。

美国著名数学史家 M. 克莱因指出：“当罗素在 20 世纪初开始写《数学原理》时，他曾以为逻辑公理都是真的。但在《数学原理》1937 年的版本中，他放弃了这个看法。”^③而最终哥德尔以所谓“不完备性”定理告诉人们，对数学及逻辑基础实现无矛盾的公理化这个问题，根本是没有解的，也是不可能解的。

因此罗素的这部“数学原理”不过是逻辑史上一个永远不能转动的“永动机”而已。

在《数学原理》中，罗素用去 347 页英文的篇幅论证什么是数字“1”，把“1”定义为 $\hat{a} \{ x \cdot a = i \}$ 。对此，法国著名数学家彭加勒 (Poincaré) 的评论是：“对于从来未听说过什么是数字 1 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定义。”

彭加勒嘲笑罗素的“逻辑斯蒂”(又译“逻辑主义”)说：“逻辑斯蒂的理论并不是什么也不长的不毛之地，它只生长‘矛盾’。”^④

你知道罗素如何为“数学”这门科学下定义吗？

①列宁《哲学笔记》，1993年版，15页。

②《罗素传》的作者 A. Wood 说：很少有人读过《数学原理》一书，Schrödinger 说，他相信罗素和怀特海本人也不曾读过此书。

③ M. 克莱因著《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306页。

④ M. 克莱因著《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307页。

记者：不太清楚。

何新：他讲了一个足以流传千古的名言。他说：“数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在其中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所讲的是什么，也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讲的是不是真的。”

实际上，这句话用来描述“数学”并不合适，但若用来描述罗素自己的《数学原理》，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逻辑学和数学的基础理论方面，罗素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连《罗素传》的作者也承认：

“罗素在《数学原理》一书里最后所采取的解决方法是诉诸一种逻辑类型理论，这种理论极为专门，并且很有争议。很少有人读过《数学原理》一书，有一次施罗丁格（Schrödinger）对我说，他相信罗素和怀特海他们本人也不曾读过此书。”

我研究过罗素的一些著作。我认为他那一套“逻辑斯带”，堪称现代经院哲学、“繁琐哲学”的标本。

记者：那么您认为罗素的《数学原理》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何新：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让我再引用一位著名数学史家对此书的评论吧。

M. 克莱因说：

“Russell 和 Whitehead 的体系一直是未完成的，并且在很多细节上是不清晰的。把数学奠基在逻辑上的企图，遭到 Poincaré 的刻薄嘲笑。Poincaré 认为 Russell 的努力只是将数位化为无限的同义反复。”

罗素一生并没有统一的哲学观点。“在他长期的哲学事业中，罗素的立场发生了多次变化。”（梯利/P. Thilly）^①罗素哲学的最终结论是哲学上的“不可知论”。“罗素希望除了逻辑原则之外摒弃一切先验的知识原则，并且否定除了经验的知识外我们还有任何知识。由此（再加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产生了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t doctrine）。”^②

彭加勒（Poincaré）在《科学与方法》（见 Foundations of Science）中说：“对逻辑主义必须加以修正，但在修正之后，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来。”

罗素那一套逻辑斯蒂哲学，以及卡尔纳普那一套分析哲学，是一套使人愚蠢和呆化的逻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形式的与辩证的）会使人聪明。但罗素那一套，

①《西方哲学史》，梯利著，商务印书馆出版，481页。“假如罗素是在跟一位主教谈话，他会说：‘我是个无神论者’。然而他也能轻松地这样说：‘我信奉任何宗教信条’。”（Gilbert Murray）

②引自《罗素传》，艾伦·伍德著，中译本350页。



会使人变成呆子。

我有时甚至怀疑，英国人故意搞出和贩卖这一套伪学术，目的是让世人变成不懂逻辑的呆子，这是一种现代的愚民的意识形态。

6. 罗素哲学十分浅薄

记者：那么关于数理逻辑呢，您如何评论？

何新：20世纪以来，逻辑学中的最大偏见就是认为数学就是逻辑，而逻辑也就是数学哲学。19世纪40年代，G. 布林创建了逻辑代数系统，稍后，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发展了命题演算，引进了量词和约束变元，又几乎完备地发展了谓词演算。并且从逻辑出发定义了自然数，推出一系列算术定理。

自布林和弗雷格以来，现代逻辑发展的主流是沿着数学及其应用的方向前进的。数理哲学处在逻辑舞台的中心位置。

1931年，K. 哥德尔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1933年，A. 塔斯基《形式语言中的真理概念》一文，定义了句子的真和假，建立了逻辑语义学；1937年，A. M. 图灵建立了图灵机的形式理论。近年来，由于网络兴起，包括演算法理论、递归函数、 λ -换位演算、可计算性和一般能行过程在内的逻辑学的“算术部分”，被看成是高于其他部分的发展中的主流。

然而近二十年来可以看到逻辑学的各种非规范的理论分支正在蓬勃地、加速地增长，显示着逻辑学和数学正在发生分化。

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体系中，逻辑学与语法学在许多方面是混合而一的。主体（人类逻辑）与客体的逻辑，也就是康德所谓后验逻辑与先验逻辑，也是合而为一的。而关于数学思维的逻辑，即纯粹符号逻辑（无意义符号）与概念（有意义符号）思维的逻辑，也是混合为一的。

数理逻辑区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建立了关于无意义句法的纯粹符号逻辑。但是在基础逻辑问题上，在认识论问题上，现代逻辑学与康德、黑格尔时代相比，非但没有取得进步，反而是大大地后退了。

后来维也纳学派的所谓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试图以语言分析消解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析，使古典哲学的分析失去意义。但这正是现代哲学的浅薄所在。这些问题都照样存在，它们是消解不了的。

逻辑实证主义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可知论。

记者：为什么你认为逻辑实证论是一种不可知论？

何新：这种学说认为，人们只能知道可以观察到的事实，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对传统哲学所作的抽象讨论乃是毫无意义的。

罗素说：“当我说看见一只猫时，很可能有一只猫。但我们在逻辑上不能超越‘很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有时说人们看见猫时，猫却不在那里，比如在梦中。”^①罗素书中充满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废话。

由此出发，逻辑实证论彻底否定全部哲学存在的意义。罗素说：

“我不得不痛苦地认为，被称作是哲学的那些东西，其十分之九乃是欺人之谈。唯一确实的部分就是逻辑学。但由于它是逻辑学，所以也就不是哲学。”

实际上，罗素从来没有透彻理解一些哲学基本问题发生的根源。他是一个典型的骄矜自得而见解却十分浅薄的英国爵士。

我读过西方人写作的许多种《西方哲学史》，我认为内容最浅薄而庸俗的就是罗素写的那本。

7. 现代数学哲学中的不可知论

记者：那么罗素的数理逻辑与传统逻辑是否存在某种连续性的关系？

何新：并不存在。罗素的《数学原理》是一部形式主义的数学著作，他试图以逻辑的抽象形式重新定义算术。而这一努力是失败的。他与怀特海所建立的新符号逻辑，可以说与传统逻辑，即亚里士多德逻辑基本上没有任何承继性的关系或联系。

而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上，罗素所谓“反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也不过是重步康德“人类理性批判”的后尘。只是与康德相比，罗素贫乏的哲学要浅薄得多。

记者：都是不可知论，难道也有深刻与浅薄之分吗？

何新：当然。一个傻瓜说我认为世界不可知，与康德所说的不可知，肯定涵义不同。

康德所提出和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人类对世界进行认知何以是可能的？并且在何等限度下是不可能的？康德认为，人类理性的工具和方法是逻辑。但是在先验的逻辑形式中，蕴涵着发生逻辑矛盾从而导致无意义、无结果思辩和争辩（即辩证矛盾）的必然性。

我们之所以说康德的这一结论是深刻的，是因为这一结论在 20 世纪，实际上以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形式，在数理哲学基础中被现代数理逻辑所重新确认。

8. 关于哥德尔定理

记者：什么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①罗素：《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索》。



何新：数学逻辑学家哥德尔（K. Gödel, 1906 ~ 1976）在 1931 年证明：

“包含着通常逻辑和数论的一个系统的无矛盾性是不可能确立的，如果人们只限于运用在数论系统中可以形式表出的概念和方法，实际这就是说，数论的相容性用数学所容许的狭义逻辑是不可能确立的。”

[Gödel 的不完备性定理 (incompleteness theorem) 所表述的是，如果一个足以容纳数论的形式理论 T 是无矛盾的，并且算术的形式系统的公理都是 T 的公理或定理，那末 T 就是不完备的。这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数论的语句 S ，使 S 和非 S 都不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定理。因为 S 或非 S 总有一个是真的；于是就有了一个数论的语句，它是真的又是不可证明的，这个结果适用于 Russell-Whitehead 系统，Zermelo-Fraenkel 系统，以及 Hilbert 的数论公理化。]^①

简单说哥德尔定理的基本涵义是：

“在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都必定存在至少一个作为最终点或初始点的不可判定其为非自相矛盾性的命题。”

有了图灵机概念之后，上述定理的一个等价命题是：任何定理证明机器，都至少会遗漏一个最终的或初始的预设为“真”值的数学命题不能证，这就导致数学演算法的不可穷尽性。

这一性质被许多哲学家用来作为“在机器模拟人的智慧方面必定存在着某种不能超越的逻辑极限”的论据，但是事实，排除这一悖论图灵机做不到，人的智力也同样做不到。

实际上，哥德尔定理的另一种简化表达就是：在任何形式逻辑系统中，彻底无矛盾性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不矛盾律是受限制的。而这正是黑格尔逻辑的结论。

如果只用一句话表述哥德尔定理，即：“绝对排除逻辑矛盾在逻辑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哥德尔定理的发明，摧毁了罗素、怀特海试图构建的数理逻辑大厦，迫使其放弃不包含矛盾命题的《数学原理》的写作。但对于这一定理的逻辑意义和哲学意义，至今仍甚少被中国哲学界理解。

哥德尔定理从根基上推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试图以逻辑斯蒂构建数学公理系统的意义。

对于哥德尔的这一定理，数学家魏尔（Weyl）曾讲过一句十分幽默的话：

①引自 M. 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 4 卷，320 页。

“上帝告诉我们数学是不容矛盾的。但魔鬼（哥德尔）告诉我们这种不矛盾性是不能被证明的。”（1944）

现代数学哲学的这种理解，与康德的哲学的不可知论，可以说是惊人相似。

9. 先验的抽象时空并不存在

记者：但是康德哲学主要是一种认识论。

何新：它也是方法论。康德认为，除了依靠被直观世界（感性知觉）所决定的经验方法外，人类无法依靠理性的工具认知世界。特别是人类无法面对和洞察不可见的世界——例如未来世界，三维以外的多维世界。

记者：但是，康德认为存在着先验的绝对时空形式。

何新：关于这一点，许多人误解了康德（包括罗素）。康德所谓先验时空形式，指的是一种心理的存在，主观意识的存在，而不是客观的存在。在康德看来，人类对外界的感知，是通过内在于人性的时空抽象而实现的。

康德说：我的工作检测人类的认识工具。他认为，这种工具在结构上存在问题。就是一离开感性的手段，以纯理性做演绎推论，就会生成出自相矛盾的理论。这就是康德哲学著名的“人类理性悖论”。

康德认为，对于这些相互矛盾的理论，理性既无法证明它的真，也无法证明它的伪。因此，谨慎的办法是，都不要相信它们。

所以康德说：我们应当牢牢守住感性知觉的经验范围，不要让思维和理性超出这个可以被检测的范围。否则，我们会陷入无边无际的矛盾和争论，永远找不到真理。这就是康德“不可知论”的真实涵义。

20世纪的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以及所谓“逻辑实证主义”，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比康德知道得更多。

记者：数学一向被认为是具有精确性和必然性的科学。为什么数学哲学也会陷入不可知论？

何新：在现代数学中，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已被推翻。非欧几何的建立导致对数学认识论——直观反映论的冲击。数学哲学家认为：“那些在真实世界里没有直接对应物的数理概念被引进并逐步被接受，迫使人们承认数学是一种人为的并且多少带有任意性的创造物，而不仅仅是从自然界里引导出来的本质上是真实事物的一种抽象。”^①

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化，带来了意义更加深远的发现——数学并不是关于自然的



映现式真理。特别是 20 世纪初集合论悖论的发现，导致了所谓“第三次数学危机”。

10. 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

记者：什么是“数学危机”？

何新：数学史上发生过三次关于理论和方法的危机。都是由于在数学的基础概念中出现了矛盾。第一次是在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无理数”，所谓“无理数”，在希腊时代叫“Alogon”，即荒谬之数，不可理解之数。它引起了数理概念的第一次定义危机。（据说发现无理数的人由于这一发现而被丢进大海里。）

第二次是在 17 世纪，由于微积分的发明而发现了关于无穷小概念（动态）与其极限概念“零”的关系的矛盾，而发生了概念危机。

第三次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生了集合论的悖论，引发了关于数学逻辑基础可靠性的问题。这种悖论最简略的表述形式之一是，在涉及无限的集合时，整体与部分一样多。例如，自然数集合（1, 2, 3, 4, ……）它包含了偶数集合（2, 4, ……）与奇数集合（1, 3, ……）。但是事实上有多少自然数就有多少偶数，同时也有多少奇数。整体与部分同样多（伽利略悖论/Burall-Forti 悖论）。有一位美国数学家（T. Damtzig）说：

“一部分可能有全体之势，这句话与其说像数学，还不如说像神学。”^①

这犹如说父亲与儿子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一个荒谬的矛盾，导致集合论的逻辑基础成为问题。

创建集合论的 Cantor 在 1899 年给 Dedekind 的一封信中曾指出，人们要想不陷于矛盾的话，就不能谈论由一切集合所成的集合。而这也就是后来的 Russell 的悖论的内容。^②（还有诸如以下一些问题：由一切人组成的类并不是一个人。但由一切概念组成的类自身也是一个概念。由一切图书馆组成的类是一个图书馆的概念。由一切基数大于 1 的集合组成的类也是这样一个集合。因此，有一些类不是它们自己的元素，而有一些则是它们自己的元素。这个对于类的描述，包括了一切类，并且这两种类集是互相排斥的等等，都是悖论。）

数学史家 M. 克莱因描述第三次数学危机的发生过程指出：

“20 世纪数学中最为深入的活动，是关于数学逻辑基础的探讨。在这个世纪的前期，首先是矛盾的发现，委婉地被称为悖论，在集合论中尤为突出。这

①引自 M. 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 4 卷。

②《数：科学的语言》，丹齐克，178 页。

③《数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1903，P. 101。

些矛盾的发现显然深深地扰乱了数学家，另外一个逐渐被认识到并在本世纪初显露出来的，是数学的相容性（consistency）问题。

“在19世纪后期，有一些人已经开始重新考虑数学的基础，特别是数学对逻辑的关系。在1900年以前已经冒了烟的争论，经悖论和相容性问题加上燃料，就爆发成大火。结果，全部数学的逻辑基础，就成为极其严重和被普遍关心的问题。”^①

此即第三次数学危机，也是数学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这一危机不仅震撼了数学体系的真理基础，而且震撼了传统逻辑关于思维不矛盾的基本信念。这个问题至今并未解决。

11. “1+1=?”

记者：您所谈到的数学危机令我震撼。在人们的心目中，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逻辑严密而且具有精确性的唯一严密科学。

何新：真正的精确性也许只有在初等数学中才能得到。即 $1+1=2$ 。但实际上，就连这个等式也并非绝对无可争议。例如把两桶水注入到一个大桶中，结果就是 $1+1=1$ 。

记者：有人会说，前面两个“1”与后面的“1”在质上不同。

何新：然而“1”的本质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数量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一种“质”——不是定量，而是定性于质的一种关系。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以一个不知大小的数进行运算，可以得到确定的结果。如：

$$X = ? \quad \frac{X}{X} = 1 \quad \sqrt{X} = ? \quad \frac{\sqrt{X}}{\sqrt{X}} = 1$$

我们并不知道“X”是什么数，“ \sqrt{X} ”的数值是无理数，也是没有确定值的。但我们以之作相除运算的结果却可以很确定，结果就是“1”。为什么？

在这里，1并不是一个“数”，而是指示一种关系，即某物或某量，无论其多么大或多么小，其与自身的比例总是同等大小，这是一种“质”的相同。这种关系就是“1”。这样考虑的“1”，实际就已推翻了罗素、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中对于“1”的定义。

12. 数理哲学

记者：也就是说，现代数学的一些主要分支，已经发展得高度抽象，而远离了实际的运算阶段。

何新：数学发展已经过三大阶段：

(2) 代数（抽象数量关系）和抽象几何的阶段。所谓计算的精密和精确性，应

^①《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289页。



当被认为是初等数学阶段的事。代数学已经是与具体量的含义无关的一种逻辑抽象。因为：“显然我们可以用我们愿意用的任何符号，并按我们选定的任何法则去处理它们。”怀特海（Whitehead）指出，符号的这种任意处理可以是随便的，而只有那些能被赋予某种意义的或具有某种应用的解释才是重要的。

（3）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数学阶段，数学已经发展为数理哲学，已成为一种仅涉及抽象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逻辑哲学，成为一种符号模型系统，远远异于所谓计算以及精密性了。

M. 克莱因指出：

“大约到 1850 年以后，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数学能够引进并研究一些相当任意的概念和理论，或者像四元数那样，它们没有直接的物理解释，但却是有用的；或者像 n 维几何那样，它们满足一种普遍性的要求。

“Cantor 为了捍卫他所创造的超限数，说它是一种存在的、真正确定的量时，主张数学和其他领域的区别在于它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概念，而无需顾及是否实际存在。1883 年他说：‘数学在它自身的发展中完全是自由的，对它的概念的限制只在于：必须是无矛盾的并且和先前由确切定义引进的要领相协调。数学的本质就在于它的自由。’

“Whitehead 在他的《一般代数》中说：代数变换法则的合法性是不依赖于算术的。如果有依赖的话，那么显然可见，代数运算式一旦在算术上不可理解，则关于它们的所有法则就必定失去合法性。代数法则虽是由算术提供的，但却不依赖于它。代数法则完全依靠约定，用以表达某些把符号分组的模式必须被认为是等同的。这就给形成代数符号的记号指定了一定的性质。

“那种在真实世界里没有直接对应物的概念之被引进并逐步被接受，确实迫使人们承认数学是一种人为的并且多少带有任意性的创造物，而不仅仅是从自然界里引导出来的本质上是真实事物的一种理想化。但是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化，带来了更加意义深远的发现——数学并不是关于自然的一堆真理。”^①

13. 数学崇拜没有根据

记者：但是，人们通常仍然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学是科学中最严密最成熟的体系。

何新：对此可以称之为“数学崇拜”。但是，研究过数学史的人，会知道这种

^① M. 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 4 卷，280 页。

崇拜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至少近两千五百年来，数学是人类智力训练和精神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在这漫长的年代中，关于数学的本质始终众说纷纭，对数学至今并无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定义。

有一个最简单、最基本而实际至难解答的问题就是：数是什么？究竟什么是数？

我们知道什么是数字。但我们难以定义数字究竟是什么。在汉语中，数（shù）者，数（shǔ）也。数（名词）是“数”（动词）出来的，数是人类计数过程的产物，是结果，而不是原因。那么，数的原型究竟是什么？这是至今不可知的。实际上，数只是人类虚拟的一套符号而已。

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都注意到，演绎推理所得的结果跟观察的结果或归纳推理所得的结果往往符合。他们无法用别的方法去说明这种符合，于是就认为，数学乃是对于自然界和宇宙中内在的终极、永恒的实在的研究，而并非逻辑的一个分支或科学、技术的一种工具。他们认为对数学原理的认识，必定先于任何对经验的确切解释。毕达哥拉斯有一个名言：万物皆数；还有据传为柏拉图的箴言：上帝常以几何学家自居。

流行于中世纪的经院派观点认为宇宙是“井然有序”而易于理解的。在文艺复兴时代，随着柏拉图观点的再度风靡，促成了下述信念的复活：数学是以某种方式独立于且先于经验的直观的知识。这种观念表现在库萨的尼古拉、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在达·芬奇、莱布尼兹、康德的思想中。

14. 现代数学是虚拟的逻辑系统

记者：数学运算的结果似乎是先验性的，而非经验性的。

何新：18世纪在科学和数学问题中应用了微积分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功，使人们把注意力首先放在运算，而不放在研究数学的基础上。但到19世纪，人们力图在新的无限小分析中的有关概念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

这种努力，带来了一种批判的态度，数学的严格性被提上了日程。人们发现，欧几里得的公设并非如康德所主张的那样是绝对的综合判断，而只不过是一些假设。这种作为推理根据的前提，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选取——唯一的要求是它们彼此之间相协调——哪怕它们与感觉上显而易见的事实相矛盾。

在20世纪的数理哲学中，认为数学是量的科学或者空间与数的科学的这种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销声匿迹了。（但在中国学术界，这种陈旧观念至今仍很流行。）人们意识到，朴素的空间直观会导致矛盾。



否定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也就否定了康德关于时空的所谓“内在直观公设”。正是由于对数学公理基础无矛盾性所做的全面逻辑和哲学审视，导致了20世纪初所说“第三次数学危机”。罗素在出版《数学原理》第一卷时一度雄心勃勃，而在《数学原理》的后续一版中（1937），则陷入怀疑论，认为数学是“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也不知道讲得对不对的一门科学”。

而在这种意义上，数学就成为一个虚拟的概念系统。著名数学家魏尔（Weyl）对数学的现状作了这样的描述：

“关于数学最终基础和最终意义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不知道向哪里去找它的最后解答，或者根本就不能期望会有一个最后的客观回答。‘数学化’（Mathematizing）很可能完全出自人的一种自由创造性活动，就像语言或音乐一样，具有原始的独创性，它的历史性绝不容许完全的客观的有理化。”^①

因此，到19世纪末盛行的看法是：数学里的一切公理都是任意的。公理只不过是导出结论的推理的基础。既然公理不再是关于包含在它里面的概念的真理，于是也就不去管这些概念的物理意义了。当公理和实在之间产生某种联系的时候，这种物理意义至多只能是发现（真理）的向导，即使是从物理世界抽象出来的概念也是这样。

“到1900年，数学已经从实在性中分裂出来了；它已经明显地而且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对自然界真理的所有权，因而变成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的任意公理的必然推论的随从了。”^②

四、解决逻辑学中的悖论问题

1. 逻辑中的悖论佯谬

记者：您在前面多次谈到了“悖论”这个词。请问什么是悖论？

何新：在近代科学方法论中，存在着两大佯谬。第一是前面我们曾讨论过的归纳法佯谬，是休谟所提出，普遍性与必然性不存在于感性的经验观察中，因此归纳法缺少一个客观意义的基础。第二就是关于逻辑悖论的佯谬。

记者：究竟什么是逻辑悖论？

何新：所谓悖论（Paradox），康德称作“二律背反”，黑格尔称作辩证矛盾。它指的是两个相反的或互相矛盾的命题，但从正面论证则其反面成立，从其反面论证则

^①转引自《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324页。这也是克莱因此书的最终结语。

^②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324页。

其正面成立。悖论的存在，使得思维和语言陷入自相矛盾，成为语义混乱而不知所云。

在希腊和中国先秦思想史上，正是悖论的发现，推动古典学者开始探讨形式逻辑规律以规范思维和语言。为解决悖论引起的逻辑混乱问题，亚里士多德等古典逻辑学者提出了三大思维规律（同一律 / 不矛盾律 / 排中选择律）。事实上，不矛盾律构成演绎推论（三段式）的公理基础。

但是，悖论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只是后来人们学会了如何通过恰当的矛盾陈述，正确地表述和理解语言的意义。

近代数学在寻求公理化基础时重新遭遇严重的逻辑矛盾，从而发生了“第三次学危机”。

2. 悖论源于人类语言的有限性

记者：悖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何新：悖论的根源在于人类语言的不精确性，或者说，语言符号的有限性。

记者：如果悖论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就受到了严重挑战。你认为悖论是否可能得到解决呢？

何新：这就是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曾致力研究的问题。逻辑是区分为类型的。在古往今来的各种逻辑类型中，有一种可以容纳悖论（即逻辑矛盾）的逻辑，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黑格尔甚至认为，必须建构一种容纳矛盾的逻辑，因为矛盾乃是宇宙理性的本质。这种矛盾的语言表述形式，就是“辩证法”。

记者：黑格尔的逻辑学出版在 19 世纪初叶，那时数学基础中的悖论问题还没有被提出。

何新：而这正是黑格尔逻辑的深刻性和超越性所在。

记者：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的不同点是什么？

何新：黑格尔认为，客体本身的存在、演化序列本身就是一种纯粹逻辑的序列。在时间演进的序列中，逻辑的力量实现发展，辩证矛盾则推进发展。

黑格尔试图对逻辑学提供一种新的本体论基础，它认为存在本身具有理性的结构和秩序，存在的基础是逻辑的组织。

黑格尔认为，逻辑不仅可以描写世界，而且可以生成世界。因此，不可直观的第四维世界是可以被理性范畴所把握的，是可以洞察的。这种新逻辑形态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然而现代西方逻辑学完全不理解以至逃避了这一最重大的逻辑命题（认识论）。

事实上，只有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能够从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基础中解决悖论问题。



3. 我发现了逻辑悖论的三种类型

记者：黑格尔是如何看待悖论问题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思维的不矛盾规律。而黑格尔则认为逻辑的基本规律是矛盾。这个问题你如何理解？

何新：我在70年代已对悖论问题进行过研究。我曾将悖论区别为三种基本的类型。即：

- (1) 语义悖论
- (2) 本体悖论
- (3) 辩证分析悖论^①

关于语义悖论，包括康托、罗素所指出的那种集合论悖论：“我们用M表示一切包含自己为元素的那些类所成的类，用N表示一切不包含自己为元素的那些类所成的类。现在，N本身也是一个类，我们要问它是属于M还是属于N？若N属于N，则N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元素。因而必须属于M，另一方面，若N为M的一个元素，则因M和N是互相排斥的类，N就不会属于N。于是N不是它自己的元素，因而由于N的定义，它应当属于N。”

数理逻辑学者认为：“这些悖论的起因，如Russell和Whitehead指出的，都在于一个要定义的东西是用包含着这个东西在内的一类东西来定义的。这种定义也称为说不清的(impredicative)，特别发生在集合论中。”

这种悖论的一个古典形式就是“说谎者悖论”。

记者：什么是“说谎者悖论”？

何新：所谓说谎者悖论，本来是希腊哲学中由诡辩派哲学家欧布里德提出的一个语言游戏。这个悖论的内容如下：“试问如果一个人说‘我在说谎’，那么当他讲此话时，他是否真的在说谎。”

如果此话不可信，那么这句话的确是谎言。而陈述语的内容说：“我在说谎。”他就是在陈述事实，就是说事实上他并未说谎，而这一事实与其语义相矛盾。

如果此话可信，那么陈述者的确是一个说谎的人。而他说：他在说谎——事实上他正在陈述的乃是事实，那么他并未说谎。这一事实又与其语义相矛盾。

所以所谓“说谎者悖论”，实际乃是来自陈述操作的现实与陈述意义（语义）之间的矛盾。是语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发生的矛盾。

有人根据罗素的语言层次论认为“说谎者悖论混淆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语言，

^①《逻辑悖论的研究》，《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

把高一层次语言中的‘假的’用低一层次语言来表达，由此产生逻辑矛盾。”这种看法是排除不了悖论的。

实际上，黑格尔早于罗素一百年就分析过“说谎者悖论”。他的看法是：这个悖论表明，有些事件无法用非矛盾的语言进行表述。

4. 黑格尔论“说谎者悖论”

记者：黑格尔也研究过“说谎者悖论”吗？

何新：他在评论希腊哲学中的诡辩派时讨论过悖论问题。

记者：黑格尔他怎样分析这一悖论？

何新：他把诡辩学者的逻辑称作一种“独特的辩证法”。“他们把辩证法发展到很高的程度。”^①“他们的辩证法都涉及外在观念和语词中出现的矛盾，因而他们也有一部分流于玩弄语言。”黑格尔说：“事实上把它们抛到一边要比驳回它们容易些。”

记者：那么在黑格尔看来，悖论既是一种诡辩，但也是一种“辩证法”。他所说的“辩证法”，看来就是你曾指出的那种“辩论与论证的方法”。

何新：对。黑格尔指出：

“真正说来，它们所进行的，是把通常的语言引入迷途，使它陷入混乱，然后给它指出它是自相矛盾的。这些诡辩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可是，这些诡辩的任务有一部分就在于指出，当我们严格地按照通常语言所说的话来加以理解时，平常的语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使通常的语言陷入难以回答的困境，乃是游戏、开玩笑，是愚蠢的。别人完全知道我们的意思，他在语言上用心思；这是以形式的矛盾为目的的一种空洞无实际的语言游戏。理性的东西只是作为语言而存在的。

“希腊人异常喜爱找出语言中和日常观念中所发生的矛盾——这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把形式的语言当作物件，并且意识到它的不精确。”

而“说谎者”就是这种诡辩的一个实例。

记者：黑格尔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个悖论？

何新：黑格尔指出，对这个悖论没有简单的回答，回答只能是矛盾的：

“如果问他是否说谎，他应当回答‘是’还是‘否’呢？如果说，他是说真话，那么便与他的话的内容相矛盾；因为他承认他说谎。如果他说‘是的’（他说谎），那么他说的又是真话了；因此他既不说谎，又说谎，——同样情形，如果他说真话，他便与他所说的相违反了。

^①《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第二卷，115页。



一个简单的答复是不能有的。在这里，两个对立的方面，说谎与真话，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看到了直接的矛盾），这个对立面的结合，曾经在各个时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一再出现，并且引起人们经常注意。克吕西波，一个著名的斯多葛派，就曾经对这个题目写了六部书。另一个人柯斯的斐勒塔，便是由于用心研究解除这种二难困境的办法，操劳过度，因而得了痲病死去。”

黑格尔顺便讲了两个类似的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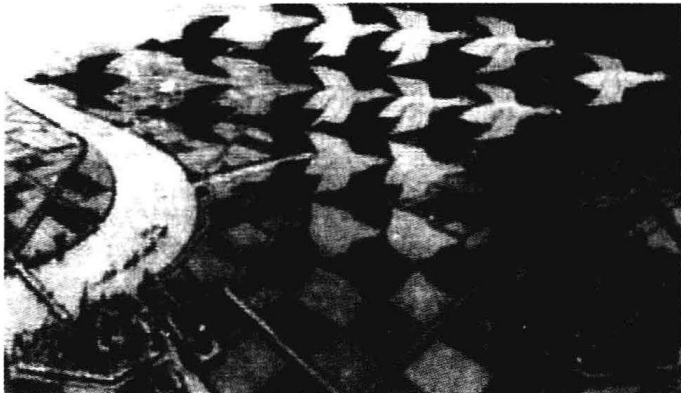
“这个小小的历史曾经得到了继承，并且得到过重演；例如在《堂吉珂德》中，就出现了完全相同的事情。巴拉塔里亚岛的总督桑乔坐堂问案时，便遇到一些非常麻烦的情况的考验。

“在这位总督的辖境内，有一座桥，不过桥旁还树立了一个绞架。行人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才许通过这座桥。这个条件是：旅客必须说出他真正要到哪里去；如果他说了谎，那就必须放在绞架上吊死。现在有一个人来到桥上，在回答上哪里去的问题时，他说，他上这里来是为了在绞架上吊死。守桥的人对这个回答大大地困惑了。因为如果把他吊起，那他就是说了真话，应当放他过去；如果放他走了，那他就是说了假话。他们无法解决，于是请总督明断，总督说出了一句聪明话：在如此疑难的情况之下，应该采取最温和的做法，因此应当放他走。桑乔没有苦苦地去想破脑袋。

“有人问梅内德谟，他是否已经停止打他的父亲了？人们要想使他陷入困境；不管他的回答是‘是’还是‘否’，在这里都是有危险的。梅内德谟回答道：我既没有停止，也没有打他。对方对于这个回答是不会满意的。这是一个两方面的回答，把两个方面都同样地扬弃了。通过这个回答，问题事实上是解答了，承认自己说谎的人是否说真话：他同时既说真话而又说谎，而真理就是这个矛盾。矛盾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意识面前指出来——矛盾出现在感性事物、存在、时间之中，它们的矛盾必须加以揭露。”



图一 少女还是巫婆？



图二 鸟儿飞向何方？

图一，骤眼看，你看到一位侧脸的少女，但是换个视角，你会看到一个低头的巫婆。
图二，骤眼看，你看到白鸟朝右飞，但是换个视角，你又会看到黑鸟朝左飞。

记者：真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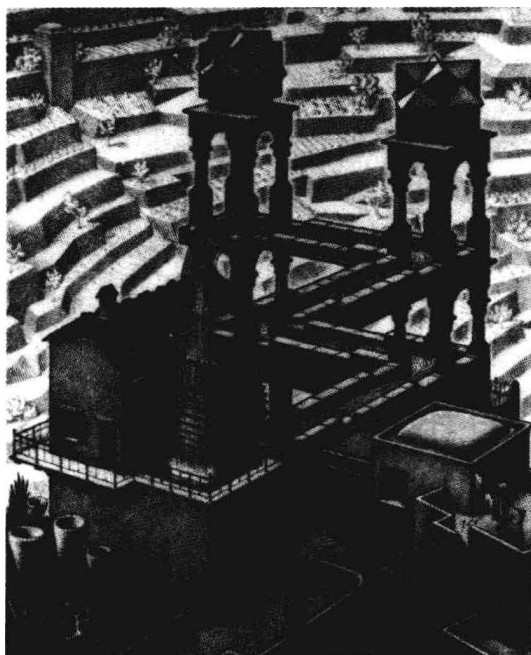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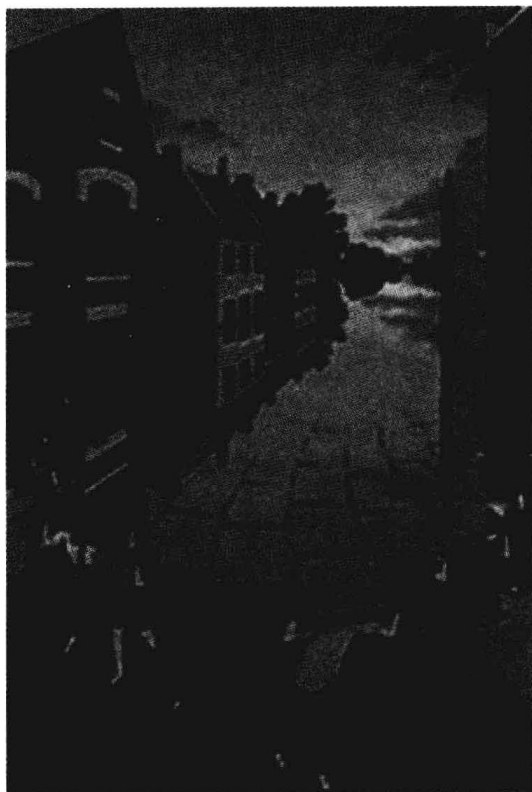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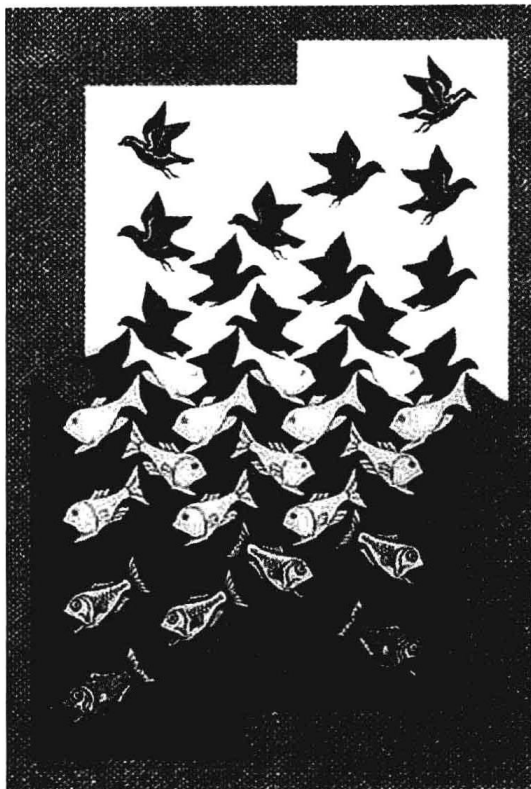
何新：黑格尔也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分析了上述悖论的意义，他指出：

“每一个语句都由一个主语和宾语组成，主语和宾语是不同的，我们在表象中以为它们是统一的；而那在平常的意识看来是真的东西，乃是单纯的、不自相矛盾的。可是事实上单纯的、自同一的语句却是同语反复，毫无所说；凡是有所说的语句，都包含有不同的东西——由于它的不同进入了意识，所以它就是矛盾的。可是平常的意识就此终结了；凡是有矛盾的地方，便只有解体，便只有自我扬弃。平常的意识并无惟有对立面的统一才是真理这一概念——并不知道，如果把真理了解成单纯的意思，虚假了解成对立、矛盾的意思，那么在每一个语句中就都有真理和虚假。一个命题或者是真的，或者不是真的；一个物件不能有两个对立的宾词。这是理智的原则，*principium exclusi tertii*（排中原则）。”

我在这里顺便想指出，中国古代辩者（也是诡辩家）公孙龙曾指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白马非马。这个命题的目的正是指出其主语和谓词（宾语）之间存在的矛盾。“白马”是一个类、集合，而“马”是另一个类/集合。问题在于连结词“是”，本身是有歧义的语辞：(1)“是”指同一性关系($a=A$)，(2)“是”指类属关系($a \in A$)。如果在前者的意义上，那么白马的确不是马，即白马 \neq 马。

事实上，所有的诡辩性悖论，都是利用语言的歧义——符号意义（语义/所指）与符号形式（语形/能指）之间的矛盾而构造的。

因此我将这一类诡辩性悖论，包括集合论悖论，罗素悖论，看作悖论的第一类型：语义悖论。



荒谬的空间：埃舍尔的悖论画

埃舍尔，M. C. Escher (1898—1972)，荷兰艺术家。以创作空间悖论绘画著名。

5. 悖论源于客体本体自身的矛盾

记者：那么，什么是本体悖论？

何新：本体悖论的一个具体实例，就是古希腊哲人芝诺所提出的运动悖论。芝诺一共提出了四个关于运动的悖论，其中之一是“飞矢不动”。内容如下：

问一个物体（飞矢）正在空间移动，在每一个确定的时间单位中，究竟它处在什么位置？

通常的想法是，在第一瞬间，它处于位置A，在第二瞬间，在位置B……如此类推，火箭的运动就是这些停留瞬间和停留微点的连续迭加（积）。但这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如果物体于确定的时间处在确定的位置，它就是处在静止中。第二，一系列静止的迭加，总和也应当是静止。

因此芝诺说：火箭的运动——位移，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对它的“微分”分析会导致逻辑悖论。

芝诺一共从四个与此类似的角度，提出了四个悖论，从而证明“运动”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悖论与“说谎者”类型的悖论具有明显的性质不同。

芝诺悖论是针对着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运动，通过逻辑分析，指出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悖论并非仅仅存在于语言形式或概念中，而是发生在有物理实体背景的现实过程中，因此我将此类悖论看作悖论中的第二类型：本体悖论。

记者：那么，这种悖论是否能够解开？

何新：这种悖论比语义悖论深刻。因为这种悖论并非仅仅由语言的歧义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根源是来自客体自身的内在矛盾。

黑格尔指出，问题在于两点：

- (1) 运动的本质就是矛盾的。
- (2) 因之对这种本质的语言表述也必然是矛盾的。

运动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无限小瞬间，物体并非确定地停留在某一点上，它到达这一位置的同时（在同一瞬间）必然也在离异这个位置——这就是运动。因此运动就是在每一瞬间处在同时又并非处在同一个点位上。这种陈述，就是一个悖论。但只有理解它，才能表述实在的运动。

记者：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客观意义的逻辑中的自相矛盾。

何新：说得对。应当指出，现代的形式逻辑论者，在叙述形式思维的三大规律时，



常常强调一点，认为逻辑矛盾只是主观思维和语言的矛盾。在客观现实中，不可能真实地存在逻辑的自相矛盾。他们试图以此来区别思维规律与本体规律。

实际上，这种逻辑学家完全无知于逻辑史和希腊哲学史。

记者：A=A，同一律。这是全部形式逻辑的基石定律。

何新：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形式思维的三大规律，特别是关于第一律。同一律当初是怎样被提出的？

记者：请您谈一谈。

何新：这个规律（最早只是一个命题）的提出者是古希腊埃利亚学派中的巴门尼德。巴门尼德的著名命题是：有是有，无是无。世界上只有一种存在，即有。如果同时还说也存在某种“无”，那就是自相矛盾。

例如柏拉图对话中有如下一个说法：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非存在毫无疑问也是存在。正如美是美，非美是非美，非存在作为‘非’，也是存在。”^①

这就是悖论。

芝诺是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哲人，他对“运动”这个概念的否定，正是根据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黑格尔指出：

“辩证法之所以首先向运动攻击，其原因即在于辩证法本身就是这种运动，或者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存在者的辩证法。一个东西，作为自身运动者，具有辩证法于自身内，而运动就是：自己成为对立面，扬弃自己。”

他又指出：

“感官确信有运动，在这个意义下，芝诺可以说是从未想到过要否认运动。问题乃在于考察运动的真理性；但运动是不真的，因为它是矛盾的。

“客观辩证法不仅是我们的理智的一种运动，而乃是从事实自身的本质出发。在这样的考察里，于是物件自身便显示出其自身（的矛盾）：即自身便包含有正相反的规定，因而自己扬弃自己，那种从外在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观辩证法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芝诺否定了正相反对的宾词。”也就是说：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如果讲一个概念（例如“运动”）既是有又是无，则这个概念就是虚假的。事实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就是通过巴门尼德和芝诺的这种论证，而被提出。亚里士多

^①柏拉图《巴门尼德残篇》6.27。

德最后总结和确认了它们（《形而上学》）。

记者：那么你所谓“辩证分析悖论”，是否也与本体悖论有关？

何新：是的。辩证悖论不是客观意义的本体论悖论。

它是在对存在内在矛盾的概念进行分析时呈现的逻辑悖论。这是第三类型的悖论。

如老子的命题：“有无相生”，可以说就是一个辩证分析的悖论。

本体和辩证分析悖论的产生，都是由于宇宙本体自身的内在矛盾。关于宇宙的这种内在矛盾，黑格尔讲过这样一段话：

“永恒的神圣的过程是一种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的流动。两个方向完全相会为一，贯穿在一起，较前的阶段一方面通过进化得到了扬弃，另一方面却作为背景继续存在，并通过流射又被产生出来。因此，进化也是退化。”（何按：即熵与负熵）

记者：也就是说，在黑格尔以及你看来，正是由于存在本体自身具有发生矛盾和构造悖论的本性，所以在思维中形成悖论是不可避免的。

何新：正确。罗素认为，一切悖论都是由于集合的自返性造成的。对这种自返性，他感到惶惑。然而实际上，这种自返性，我称之为超越性，乃是大自然的本质之一。你看一看生物进化中分类的形成吧，例如爬行动物的进化，就是在自身的类集中，扩张出一个非自身的新类/非爬行动物，从而超越自身的旧的概念定义域（分类/集合）。所有的进化运动也都是如此。“夫物云云，吾观其复。”所以黑格尔将自然中这种类集的扩张发展（自返性），称作“概念的自身运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建构一种新类型的逻辑。

6. 现代西方哲学没有巨人

记者：我理解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认为逻辑悖论的产生原因，从根本上是来自宇宙以及人类思维和语言的内在矛盾本性，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你认为罗素等人提出所谓“语言层次论”是不可能消解逻辑悖论的。

何新：如果谈作为逻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哲学的话，那么我要说，我对现代西方的逻辑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评价甚低。我认为它们不值得顶礼膜拜！特别是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论，在哲学、认识论、逻辑学三个方面的意义，都是远远地弱于黑格尔哲学的。英国爵士伯特兰·罗素被一些人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逻辑学家。这个人也甚为自傲，对康德、黑格尔几乎不屑一顾。

但实际上，此人及其哲学渺小至极，乏味至极。他那一套浅薄和形式化的理论，



根本不配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相提并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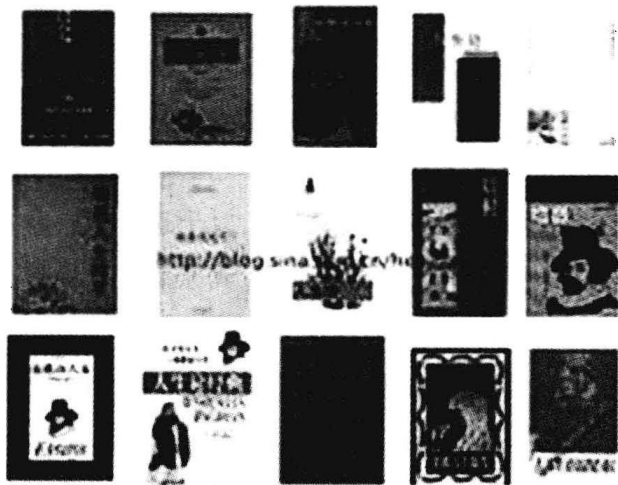
尼采之后西方没有伟大的哲学。总体而言，20世纪是科学技术发达、哲学浅薄和倒退的世纪。20世纪可以说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具有文明创新意义的伟大哲学，在西方文明中也没有出现任何可以类比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巴斯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伟大精神人物。

20世纪是西方哲学十分渺小的世纪。什么分析哲学、阐释学、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等，不过是些古典哲学的碎片杂拌而已。

什么德里达，什么伽达默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罗素、维特根斯坦、波普，都是一些精神上极其猥琐渺小的平庸人物。

20世纪是科学哲学包括数理哲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上，也出现了一批新的重大的哲学问题。而对这些问题，需要寻求哲学，认识论与逻辑的新的模型和方案。

回顾20世纪的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在现象主义和不可知论上，实际是对18世纪康德哲学的复归。展望新的世纪，我个人确信，得到现代解释和重新认识的黑格尔辩证逻辑及其认识论，对于解释当代科学及数学哲学所遭遇的悖论及形而上学问题，会具有极深刻的意义。



何新译《培根论人生》的版本

五、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

1. 宇宙秩序与科学哲学

记者：那么您认为神存在吗？“神”这个汉字的意义和本义究竟是什么？

何新：汉语中神的本源字是“申”。甲骨文中没有神字，只有申字。申的本义是闪电（申、电古音相通，都是闪电的象形字。申字引伸为长带，加丝旁即“绅”）。现代人认为雷电是物理放电现象。而古代人认为雷电是神奇现象。神就是这种神奇现象的原动者。从古以来，人们就认为神是有组织、有目的、超自然的宇宙意志。

培根说过一句名言：

“我宁愿相信圣使徒传、犹太经典和《古兰经》中的一切寓言和神话，也不能相信这宇宙是只有躯壳却没有一个主宰的精神和灵魂。所以，上帝无须显示奇迹来反驳无神论。实际上，宇宙中所存在的自然秩序，已经足以驳倒它了。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于无神论。但是对宇宙与哲学的深刻思考，却必然使人皈依于上帝。因为只有从表面上看去，这自然界的万物才是偶然和不相关联的。可是只要深入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那些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最终只能导向一个总的宇宙原因——这就是神。”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自然中理性的秩序和组织确实存在。美国核子物理学家卡普兰说：

“五年前我曾经有过一次美妙的感受。在夏末的一个午后，当我坐在海边，看着海浪涌来，并且感知着自己呼吸的节律时，忽然觉得整个环境都在参加着一场巨大的宇宙舞会。作为物理学家，我知道周围的沙粒、水和空气是由振动着的分子和原子组成的，而分子和原子又由粒子组成，这些粒子通过不断地产生和消灭其他粒子而相互作用。我还知道，地球的大气层不断地受到宇宙线簇射的射击，这些高能粒子穿过大气时，发生着多次碰撞。对于这一切，我在高能物理学的研究工作中已经熟悉。但是直到那一时刻以前，我只是通过曲线、图表和数学理论来体验的。

“当我坐在海滩上时，我以前的体验变得栩栩如生，我‘看见’能量的级联从外太空降落下来，在其中以有节律的脉冲产生和消灭着粒子；我‘看见’元素的原子和我身体中的原子参加到这种能量的宇宙之舞中去；我感觉到了它的节律，并且‘听见’了它的声音，就在那一时刻，我认识到这便是印度教徒们所崇拜的舞蹈之神，湿婆之舞。”

现代科学与原始宗教的神秘论者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二者都意识到宇宙中超人类的秩序、组织以及目的性的存在。但是自然科学家认为这些现象之后有自然规



律，而宗教则认为这些现象起源于有意志的神灵。

记者：你对于神灵的这种解释，是否就是“自然神论”。

何新：你说得对。自然神论，或译作“泛神论”，马克思认为是披着宗教色彩的唯物论。而我认为它其实是对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消解（扬弃）。理性主义的大乘佛学，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哲学家莱布尼兹、斯宾诺莎、黑格尔、康德，以及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是自然神论。

2. 自然神论与自然哲学

记者：自然神论究竟是宗教还是哲学？

何新：应当说既是一种终极信仰，也是一种自然哲学。自然神论就是自然的生命力论。这种生命哲学，在近代德国哲学中发展得最为彻底。如果说英国的经验主义是近代科学哲学的机械论代表，那么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莱布尼兹、康德、歌德、谢林、黑格尔，则都主张某种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即自然神论。

与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相反，他们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为精神活动所渗透，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应该用精神的内在活力来解释，而不应该用物质的机械运动来解释。（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作是《人是机器》，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刘少奇时建议他读三部书，其中之一即此书。所谓“机械人”。）德国理性主义把自然界视为宇宙通过矛盾斗争所发生的必然过程。人性是整个宇宙发展过程的精华和缩影。

自然神论认为所谓“神”就是宇宙本身内在的秩序、组织和规律性。自然神论的“神”没有人格化的神格、形相和面貌。为什么呢？因为偶像仅设定了神的一种确定性，它使人误解，似乎神只有某种确定的形相或面貌。

而斯宾诺莎说过：“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多次引述这一观点，玩味它。

记者：斯宾诺莎是如何理解上帝的？他是无神论者吗？

何新：黑格尔对此是这样评论的。他说：

有人说，斯宾诺莎主义是无神论。从一个方面说，这是正确的，因为斯宾诺莎不把神与世界、自然分开，因为他说，神就是自然、世界、人的精神——个体就是神以特殊方式的显现。我们倒是也同样可以把他称为无世界论者。斯宾诺莎主张，我们所谓的世界是根本没有的；世界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形式而已，并不是自在自为的东西。世界并没有真正的实在性，而是一切都被投进了唯一的同一性这个深渊。

有一位现代泛神论宗教哲学家也这样表述上帝：

人们认为我只是他们见到的那样，而不是他们没有看到的那样。但我是伟大的未表现者，而并非我在任何特定的形式中被设定为存在的那种形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乃是我所非是，而非我所是。我来源于不是，归结于不是。（如果我以这种那种特定的形相降临，人们就会把这种形相看作是我。而如果我以另一样式显现，因为第二个人看到的与第一个人不同，他们就互认为那不是我。）

“但问题在于不论我以何种形式显现，不管我选择什么形态，什么面貌，那都是我，我是唯一的，又是无限多的。

“所以，正确的祈祷不应是一个祈求，不应是祈求的祈祷，而永远应是一种感恩的祈祷。无论是福、是祸、是顺境、是厄运——那都是我，那都是我所赋予的现实，而且都是有意义的现实，是只有善因和善果的现实。人们感受到恶，感受到痛苦，并非这种恶或痛苦是真实的（只有善和幸福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存在使他们与善和幸福相隔离。如此而已。（尼·唐·瓦尔施）

我同意这种观点。

3. 爱因斯坦的自然神论

记者：爱因斯坦也是自然神论者吗？

何新：爱因斯坦认为，我们可以在宇宙的秩序和历史的理性进步、万物的有逻辑有组织的进化序列中感受到一种理性的操作。那操作者是谁呢？那设计者又是谁呢？爱因斯坦谈到他对宗教的理解时说：

“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即通过存在物的有秩序的和谐（道 /logos）而显示出来的上帝。”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神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

“就是这种神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觉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

“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神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爱因斯坦文集》）



P. 50)

记者：也就是说，在自然神论看来，所谓神就是大自然本身。

何新：是的。歌德曾说：“去倾听你的感觉。倾听你的思想。倾听你的体验。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与你的老师告诉你的、或者与你从书上读到的不一样，那就丢掉那些语言。语言是真理最不可靠的传道者。

“如果你相信上帝是你生命中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决定者，你就错了。

上帝是个观察者，不是创造者。上帝准备帮助你度过你的生命，但不是以你所期望的那样。

“认为上帝授意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动，这是人的一个大的幻觉。

“上帝并不在意人做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上帝连结果也不太关心。甚至最终结果他也不关心。这是因为最终结果是必然的。

“人的感激与诅咒不能用来作为操纵上帝、愚弄宇宙的工具。”

事实上，这种自然神论哲学，可以代表现今的多数现代自然科学家的宗教观点。

4. 大自然的普遍进化

记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否也是自然神论？

何新：正是如此。但是 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已由单一的生物进化论提升到一种视野更广阔的广义进化论。J. 普利高津指出：

“今天，一个变化和发生形态改变的宇宙愈来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时间的流逝是由宇宙中发生的不可逆过程，以及结构和形态的产生标志的。按照以前的科学，宇宙被看成是一种‘自动机’和社会文化进化不再被认为同无生命的物质系统遵循着不一样的规律。作为对所有这些进化过程进行研究的科学现在确实处在作‘广义综合’的开始阶段，它要讲清楚宇宙起源，通过生物进化和生物的发展到意识的产生这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些科学家不知道，早在此之前近二百年，黑格尔所建立的辩证逻辑体系，已经以神秘的语言形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广义综合的泛进化的基本原理和规律。

在黑格尔看来，宇宙的演化进程本身就是宇宙概念的逻辑发展进程。这就是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5. 广义进化论

记者：从过程和进化的观念看，自然哲学应该就是广义的进化论。

何新：对。根据现代科学比较公认的宇宙进化理论，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已经有 40 亿年以上的历史了。这完全是一部理性的、宇宙自我演化、自我生成和在自己分化中不断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的历史。

150 亿年前，宇宙开始于一个大爆炸，物质从能量中诞生。

50 亿年前，原始太阳系生成。

47 亿年前，地球诞生。

40 亿年前，也许从来自宇宙中漂移的原始有机物（或微生物），也许从地球上的大海中，发育出生命物质的最初胚芽。

40 ~ 35 亿年前，地球上出现原始菌藻类的生命体。

27 亿年前出现了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植物（蓝绿藻）。18 亿年 ~ 17 亿年前开始有了真核植物。而在 20 亿年 ~ 10 亿年前，地球上出现游离氧，它促进了真核细胞（真菌）的诞生。这是“植物”起源的时代。

到距今 5.7 亿年的寒武纪时，地球大气层中的氧浓度已相当于现在的 1%（古生物学中所谓的巴斯德点），已初步形成的臭氧层这时已能阻挡一部分高能紫外线，因而开始大量地出现多细胞后生动物甚至甲壳类动物，成为古生物学中的显生期。这是动物起源的时代。

历经了 5 亿年前的奥陶纪、4.3 亿年前的志留纪、3.95 亿年前的泥炭纪，地球大气层中的臭氧层保护作用逐纪上升，从而又为生命从海洋进入陆地创造了基本条件。

至 3.45 亿年前的下石炭纪和 3.25 亿年前的上石炭纪期间，地球表面上已遍布森林。古生代晚期时地球经历了一场大冰期，大批的生物物种惨遭劫运。中生代晚期，地球上爬行动物突然衰败，被子植物和哺乳动物兴起（约 1 亿年前）。

新生代的第四纪（距今 400 万年 ~ 500 万年），出现了人类，成为整个生物界出类拔萃的一支后起之秀。地球也因此而被赋予了来自人的感觉的辉煌景观。

由于进化，形成的生命体总共有 3 种：植物、菌类和动物，它们又分为自养生物和异养生物两大类。绿色植物（包括真核绿色植物与原核蓝藻）是自养生物，是大自然的生产者，它通过叶绿素的光合作用，将无机物质合成有机养料，既供给自己，也供给其他异养生物。菌类中的真菌和绝大部分细菌属于异养生物，是自然界的分



解者，它们从动植物及其残体上得到食料，将有机食料分解为无机物质，又为植物供给了生产原料。菌类取食的特点是通过细胞表面去吸取营养，因而亿万年以来始终保持着它的微小体型和简单的构造。

动物是异养生物，也是地球上最后出现的一类生物，其取食的特点是摄食，属于地球上不折不扣的消费者，人类则是自然中最大的能量和资源的消费者。

整个进化史总共产生了大约 10 亿个 ~ 40 亿个生物种类。目前，人们估计还存在着约 300 万个 ~ 1000 万个。可见在进化当中，淘汰了 99% 以上的物种，保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百里挑一的“幸运儿”，它暗示着生命的复杂性和与生俱来的神秘性。而人类，又是其中最复杂、最神秘的生物物种。

不管生物学和系统控制论是如何解释的，总之现代科学承认：一切生命的外形、外观都是在进化中自我生成的；一切生命的内在机制都是在进化中自我调控的。对称与平衡（协调）的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始终是调节着这一漫长演化进程的普遍和基本的规律，同时又是构成人类审美意识基础的规律。

人们不难看出，宇宙及其“物质”在这一进程中，这种“自我”生成、演化、协调、平衡的行为，是一种极其有逻辑的理性进程。是一个“辩证”即“矛盾论证”——在矛盾与对立中斗争、平衡、综合而发展的进程。什么叫上帝？其实这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漫长、理性而有设定目的“进化”的、有规律地发展的演进过程。

6. 关于“第一原动力”

记者：我与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交谈时，曾注意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无神论者。

何新：某些中国学者认为宗教与科学精神是互相排斥的，认为科学精神必然导向无神论的宇宙观，其实这是对近代科学精神的片面性了解。

近代无神论是近代机械论唯物主义哲学的极端产物。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最终可以通过机械的或无机的物理化学规律加以解释。这种思潮在 19 世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中得到典型和全面的发挥。

牛顿曾提出“第一原动力”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见之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有人认为这是牛顿向宗教和唯心论的倒退，我认为这正是出于他对宇宙秩序和起源的深刻理解。

记者：牛顿似乎还没有关于宇宙进化的思想。

何新：关于宇宙起源于一个演化过程，这一自然哲学思想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都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新思想。在中国，《列子》、《淮南子》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萌生。在近代，康德、拉普拉斯曾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著名假设。我告诉你，1975年，我也曾形成过一个关于宇宙和物质起源的假设。

记者：你的根据是什么？

何新：1974年，上海出版了康德关于宇宙起源的那本名著（似乎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但同时，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一面介绍一面批判了当时美国科学家 G. Gamov 提出的“大爆炸宇宙论”。

对于大爆炸宇宙论的详细情况，当时我所了解的内容甚少。但我从逻辑上知道，它认为现在的宇宙起源于一次瞬间热核爆炸，是有道理的。黑格尔的逻辑认为，事物的历史进程与概念自身的逻辑演化进程是一致的。我当时排列了以下一个物质概念的演化序列：

基本粒子→化学元素→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生物→人类

这是物质形态由简单概念向复杂概念演化的一个逻辑序列，但同时又正是宇宙和物质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列。而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逻辑序列同时又是一个圆圈套圆圈的层套式逻辑综合。

7. 所谓“恶劣的无限性”

记者：什么是圆圈套圆圈的“层套式”逻辑“综合”？

何新：你读列宁的《哲学笔记》，会发现列宁非常赞赏而且注意黑格尔关于圆圈式发展的思想。黑格尔说，概念的发展是圆圈式的，它从圆心出发，吸纳发展每个阶段的成果，像树木的年轮那样，一层套一层。因此，发展虽然是否定，但又是否定之否定，因为所有的先在阶段都不会被放弃，而是被吸纳在作为起点的圆心周围。列宁《哲学笔记》中多次引述这一思想，但没有解释它。

记者：事物是否真是这样发展的呢？

何新：黑格尔提出圆圈式发展模型，是针对直线性的发展模型。人们通常想象的发展模型，都是线性的，直线或曲线或波浪式的，这种发展模型本身是时间

①《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第4卷，关于斯宾诺莎。

②T. 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118页。



单维式发展的抽象。黑格尔将这种线性的发展模型, 讥称作“恶劣的无限性发展”。

黑格尔说:

“无限者的意义具有歧义。斯宾诺莎说: ‘那种仅在本类中无限的东西, 我们可以否定它具有无限性。绝对无限的本质则涵摄一切为一而不包含任何否定。’ 当人们说 ‘如此重复以至无穷’ 时, 这只是恶劣的无限性。数学上的无穷系列, 即数列, 也是这种恶的无限。这种无限是常见的, 当人们谈论无限时, 所指就是这种无限。它是不断的否定, 并不是肯定的无限, 现实的无限。而现实的无限, 是自我肯定, 是否定的否定。”^①

黑格尔所谓“恶劣无限”, 现代数学称为“有理无限序列”。“一个序列的各项如果都是有理数, 则该序列称为有理序列。若其中每次均有一后继项, 则它称为无限序列。用以产生无限系列的一组运算, 称为‘无限演算法’。

“所有无限演算法的原型就是重复。这种无限概念是从下述概念引申出来: 凡说过或做过一遍的东西可以永远重复。”^②

然而它之所以是恶劣的无限, 是因为永远重复的只是同样的东西。

8. 圆圈式发展模型

记者: 那么黑格尔如何理解无限?

何新: 黑格尔所理解的无限是设定的有限者, 而又自我超越为无限。

他认为不应当把发展的进程看作从一个他物变到另一个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在它的异化中保持自身。这种在向对立物的异化中保持着自身的辩证发展, 是一种综合性的发展, 黑格尔称之为“圆圈式发展”。

这种观点, 在 20 世纪的现代科学哲学中已被自然科学家重新提出。

记者: 请您解释。

何新: 在现代科学哲学中, 有人 (如 E. Laszlo) 提出了“普遍进化论”的思想, 并将超生物学意义的广义宇宙进化, 定义为“广义综合”(the grand syhthesis)。《易传》有一个词“保和泰合”即“太和”, 其实也是指这种广义的大综合。黑格尔说: 凭借辩证方法的性质, 科学表现为一个自我扩展的圆圈。仲介把结尾绕回到圆圈的开头, 每一圆圈因此而是圆圈中的圆圈。”这种前进是这样规定自身的, 即: “它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 而后继的总是愈加丰富和愈加具体。因为结果包含它的开端。而

① 以上均引自黑格尔《逻辑学》下卷, 551 页。

② E. 拉兹洛:《进化: 广义综合理论》, P. 42。

开端的过程以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普遍的东西在以后规定的每一阶段，都提高了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充实。”^①

“……特殊的圆圈，由于全体的性质，突破其中介的限制，从而成为一个更大领域的根据。全体把自身显现为圆圈的圆圈，每一个圆圈却是必然的环节。”《小逻辑》黑格尔所建立的圆圈式发展模式，是一种多维的或无限维的综合式模型。这一模型与现代科学哲学关于宇宙进化的观点惊人地吻合。E. 拉兹洛指出：

“进化过程在多等级层次上创造出各种系统。在每一个层次上，那个最高系统层次的结构最初是比较简单的：比组成它的下层系统的结构简单。（当然，那个包罗了下层系统的上层系统的复杂性，要比任何下层系统都复杂，因为它包容了所有下层系统的结构，外加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上层系统进一步的进化导致在自身所处的一定系统层次上累积性的复杂化过程，并最终导致创造出超回圈，这些回圈又把进化过程推向下一个组织性层次。进化就是这样从较简单的向较复杂的系统类型运动，从较低的向较高的组织性层次运动。”^②

以物质的发展为例。人类是生命物质发展的最高形态，但人类体质中最复杂的生命物质，如脑细胞、神经元，在其物质构成中，综合着从基本粒子到无机物、有机物、单细胞生命、多细胞生命的全部发展序列的成果。

不仅人类如此，在物质发展过程中所生成的每一形态上，都综合着其先在形态的遗传信息和物质成分。所以更高的发展，也就是更大的综合，圆中层层套着圆。从总体的观点看，这种发展无论从任何起点开始，指向任何方向，其逻辑结果却都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一个阶段是不必要的，是无意义的。其意义最终总是呈现在形成总体的进程中。

历史随机发生，其结果则总是合乎逻辑的必然。这就是历史的神秘性之所在或者说体现在“自然”现象之下的理性秩序——“上帝的历史意志”。

9. 宇宙自身就是生命体

记者：您的这些观点过去是否发表过？

何新：在1980年以后发表过。^③

现代大部分天文学家认为，宇宙是在150亿年前的大爆炸产生的。随机的过程

^① 见《外国哲学》第5辑，何新论文，商务印书馆，1985年。又见《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44页。



中（最初三分钟），原子结合中子，变成原子核，以及原子核结合电子变成氢氦和其他原子，原子尘埃和原子尘埃作碰撞，旋转，集结随机运动。

但是，随机运动形成的物质，是否能产生成千万万条适合宇宙适用的天体、物体、化学、数学等规律与定理呢？在现代天文学已知的几千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又有几千亿颗恒星、行星，那么要产生适应于这几千亿乘以几千亿近于无穷大颗星群上统一规律的机会、概率近于无穷小，可以说接近于零。

物理学家赫尔曾说：“物质变化生热，是由复杂而变简单，是一种退化现象。例如铀变成镭，镭再自动发热，变成铅质，都是复杂变为简单，这是物理的基本定律。”宇宙体，假如仅是物质和随机运动的的话，绝对不会有简单变成复杂的可能性。这种由简单至复杂的逆向运动不会发生，在大爆炸后，由简单的质子变为原子核，由原子核变为原子，由分子形成星球与星系，并随机产生千万条宇宙适用的规律与定理，这种有秩序的定向演化进程，是一个极其理性的进程，无法用随意性加以解释。

唯一能解释这种由简单变成复杂运动的只有生命性，即理性——逻辑的运动。只有生命性才会由简单的原子变成细胞，或胚胎；发育、成长，由简单变复杂，形成生命体。那么，宇宙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因之它才有统一的规律与定理，统一的原子，统一的射线，统一的星系。整个宇宙，尽管至大无限，至小也无限，但是在整体上却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体现于其存在的连续性和本质/本体的无差异性。

10. 新的发展总是走向更高的综合

记者：这种圆圈式发展模型，实际也肯定了发展各阶段对全过程的积极性意义。

何新：是的。因为发展就是综合，综合就是回复于自身，将外化与异化的对象，吸纳到更高阶段的综合中。

正是这种无限的综合，形成了存在的连续性。就是说宇宙中的万物，是一种统一而普遍的存在，物与物（阶段与阶段）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间断或分隔。这一点，早在莱布尼兹的时代，像莱布尼兹这样深刻地思考宇宙本质的哲学家已经洞悉和讲述过。他认为：

“所谓无差异性，就是说尽管存在的万物形态千差万别，但在本质/本体上，则体现于统一。”

人是万物之灵长。但人体物质中，综合着从基本粒子到灵长类动物物质结构、

遗传信息的整个序列，并没有新的、为其他事物所不包涵的东西。存在的秘密，似乎永远不是原创的秘密，而只是构造和组合的秘密。

人的生命的秘密、灵魂的秘密、意识的秘密，以至道德 / 法律 / 正义的秘密，都已在宇宙的基本存在结构（原逻辑，先验理性，及平衡与协调即对称的公理）中先验地存在。

宇宙万物是统一的生命体。可以把宇宙生命体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包括无限维空间、全资讯控制的智慧体。虽然宇宙无限之大，但一个星系发生变化，一定会波及整个宇宙。一个星系的生成毁灭，也是整个宇宙的生成毁灭。一个星系的规律，一定普遍地适应于整个宇宙。宇宙生命体的资讯控制不是由一个 CPU，一个脑集合体，由 CPU 式或脑式控制中心来指挥控制一切，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用光来传递控制资讯，亦即 30 万公里 / 秒，还是远远来不及控制整个宇宙的。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比光更快的速度。所以我认为宇宙生命体的智慧控制，是一种具有更深刻根基的、目前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全资讯控制”。

宇宙生命体总是通过毁灭自己来创造一个新的宇宙。宇宙毁灭与生成方程的基础就是对立同一规律。宇宙毁灭时，将能量压缩，但宇宙所含有的一切规律、定理不生不灭，资讯被记忆保存在超物质的“超子”中。当超子发生大爆炸时，将能量释放，质子和中子充满宇宙，结合成原子核。同时在原子核中，已带有宇宙一切规律定理的全部原生资讯。

宇宙本身就是具有最高智慧的生命体。一切星系、射线、空间、时间，以及其他生命都是宇宙生命体有限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既然宇宙自身就是一个生命体，那么也必然有生存、发展、壮大、毁灭的历史，这就是科学所要研究的宇宙的历史性。

对于宇宙这种生成逻辑的观察，涉及到宇宙本体问题的最深刻之点，它已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所能解答的。这需要一种泛理性甚至超越理性的更高信仰和理解，它包涵了对于至善的信仰，即对真 / 善 / 美的总体性信仰。这种超越于理性的信仰，我认为就是哲学及宗教信仰必然性与必要性的根基所在。

11. 自我与无限

记者：您是否认为哲学、宗教与科学三者之间具有互补性？

何新：科学是特殊性的专科知识，即康德所谓“智性”，哲学是综合的整体性认识，



即黑格尔所谓“辩证的理性”。而宗教及艺术则超越于感性与智性、智性与理性的鸿沟，沟通着已知与未知的世界，直接通达于人类对于至真、至善、至美的终极形态的信仰、追求和热爱。

近年自然科学方法论中出现了一种关于“弦”的理论。这一理论所蕴涵的哲学理念似乎也近似于黑格尔的圆圈式互补理论。在某种意义上，21世纪的自然科学与理性主义的宗教信念，正在一个同心圆系列（弦）中共振和互补。

在本体论上，心是物源。在认识论上，主体意识能动地反映存在。以模拟理性重构本体理性。

记者：最后再问一个问题，结束我们今天的对话。您对哲学和宗教问题的这种研究，也是在东北那些年代中进行的吗？

何新：不完全是。但是，我永远会怀念我在北大荒研习哲学、苦苦思考宇宙终极存在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那些难忘岁月。

在那夏日的夜里，独坐在草原上，脚下是一道浅浅流淌不息的小溪，听着夏虫呢喃，闪烁在溪边的萤火，注视着头顶上的星空。或是在那星夜寒冷的雪原上，雪在月光下闪现着幽幽的蓝色光，空气澄澈而冷峻。头顶上星空仿佛像一张神秘的巨网，以无数只眼睛神秘地投注着你。这时，我心中常常浮起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名言：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给人灌注了时时在翻新而且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我无需远求它们或猜度它们，仿佛它们掩蔽在黑暗中，或处在我的视线以外的超越境界中一样；我亲眼看见它们在我面前，并把它们和我自己的存在意识联系起来。

“前者从我在外部的感官世界中所占的位置开始，把我在其中的联系扩大到重重世界、层层星系的无限范围中。此外，还延伸到它们的回圈运动、生成和延续的无限时间中。

“后者开始于我的无形的自我、我的人格，并把我呈现在一个具有真正无限性的世界中，不过这个世界只有悟性才能追寻出来。它使我觉察到，我和这个世界不是处于一个单纯偶然的联系中，如在前边那样，而是和它处于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秩序中；正是通过这个秩序，而与所有那些有形世界联系起来。

“前一个重重世界的景象好像消灭了作为一个动物者的我的重要性，这个动

物在短期内不知怎样偶然地赋有了一度生命力以后，又不得不把它所由以造成的那些物质还回它所住的那个行星（而这个行星仅是宇宙间的一粒微尘）。在另一方面，第二个景象却借我的人格，把作为一个灵物者的我的价值无限提高了，在这个人格中，道德法则就给我呈现出一个独立于我的动物性存在，甚至独立于全部感性世界以外的另一种生命。

“这一层是至少可以从这个法则所指派给我的有目的的命运所推断出来的。这个命运不是仅限于今生的条件和限制之上的，而是通向于无限和永恒的。”

[跋]

以上哲学对话整理于90年代后期。盖人类之精神现象史有五个阶段，即：巫、信、智、理、魔。

巫即巫术，信即信仰，智即知智，理即理序，魔即魔境。

石器时代之多神教及万物有灵论是巫术阶段。一神教之中世纪是信仰（宗教）阶段。启蒙时代是知智阶段。20世纪之科学体系是理序阶段。科学以理性秩序为根本，声称“知识就是力量”，欲以理序“改造自然”，“重建宇宙”。然而其结果是自然生态及地球环境之巨大破坏。当今人类面临重大生存危机。于是人类方知，科学并不能穷究宇宙以及万物之理序。未知现象、未知自然对人类之反制反而愈来愈强大。故21世纪之人类精神正回归于无法之法的魔境阶段。所谓“UFO”一类未知灵界的各国政府档案公布，即是明证也。

古谚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性胜乎人性，宇宙胜乎人类。故歌德《浮士德》中预言，历史终以魔境胜乎人性及智性、理序而告终。

不弃智理，则不能通乎魔意，这正是理性主义之所局限也！一叹！

（2011年3月记于日本海大海啸之后）

钱学森关于“何新树”的三封信

(一)^①

何新同志：

四月五日来信和尊作均收到。我对哲学和逻辑学都是外行，有时想想这方面的问题，也只是业余爱好而已。您来下问于我，不敢不答，谨述所见，敬请指正。

(1) 黑格尔的东西诚然是倒立的，把它顺过来，他《逻辑学》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总结，即人思维的规律。这里面主要是抽象（逻辑）思维，所以叫逻辑学。正如历来承认的，他的逻辑高超之处在于是辩证逻辑。但多少年来，辩证逻辑未能像形式逻辑那样严格整理成数理形式。

(2) 科学技术当然要研究事物发展的过程，当然会涉及到辩证法。科学家也有科学家的办法，也就是用微分方程，把形式逻辑用于某一瞬间的关系，即

$$\frac{dx_i}{dt} = f_i(S_1, S_2, \dots, S_i, \dots, S_n), i = 1, 2, \dots, n$$

解出这组方程，就得到 $X_i(t)$ ，即事物随时间的发展过程。全过程就包含了辩证逻辑。所以微积分的应用使科学弥补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而取得飞跃的发展。

(三) 当然辩证逻辑如何数理化的问题仍未解决，您的“历史概念集合”是一个创见，我赞成。

(四) 但我认为您应该把集合论的 Venn 图扩展到三维空间成为“何新树”，也就是把一个时间 Venn 图作为“树”的横断面，以时间顺序把横断面一层层架在时间坐标上，再把外表联起来。当然这“树”可能不同于自然生长的树，不同“树”的“树枝”会在“上面”结合起来。这一设想得之于上述（二）之把形式逻辑用于事物的某一瞬间的关系。

(五) 有了“树”，数理的辩证逻辑学就可以利用数学中的拓扑学建立起来了。

因此我想您所开创的历史概念集合是有生命力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自然辩证法通讯》我有，心想您也许要保留这一期作为以后用，所以奉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2. 4. 17

^①此信收入《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出版。35页。



又：您研究过 Godel 定理吗？我想用“树”能解决他的难题，Hilbert 也将得救。

(二) ^①

何新同志：

近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胡世华同志（学部委员、研究员）来信，涉及“何新树”的问题，兹抄录奉告：

“何新的文章我没有看。关于您说的：‘把 Venn 图的概念扩大，加上时间座标，……，再用拓扑学研究‘树’，是否可以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数理化？这是否有道理？’我认为可以，是有道理的。”

但是实际这样做的人似已有了，只是他们没有说这是‘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数理化’，应进行的具体的数学研究也进行得还很不够就是了。例如 A. N. Whitehead 在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1926) 就建立了以‘event’为基本概念的理论，数理逻辑家 R. Carnap 称之为 *Theory of events* (Ereignistheorie)。采用了作者所说的 *method of extensive abstraction*，就把您要求的内容十分自然地包含进去了。更详细讨论这问题的是他的另一本书，*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an Enga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 1925.*”

胡世华同志还指出 Carnap 的又一本书 *Abribder Logistik* 也有应用逻辑部分，与我们的问题有关。但这部分学问懂的人少，搞不动，也就未受重视。

何新同志：我想胡世华同志的这些意见很有用，看来您要做的的工作已经有了开头，问题是要吸取这些有用成果，把它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再一次把倒立着的的东西顺过来！您要办的事是大有希望的！

但我也以为完成这项工作，光您一个人也难，不知您找到了同道没有？总要有几个人的研究小组才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2. 7. 9

^①此信收入《钱学森书信选》（上卷），40页。

(三)^①

何新同志：

二月二十八日信及大作《论概念思维与逻辑结构的客观基础》都收读了。您文章的一些内容前年通信中似已出现，现在是进一步发展了。

我完全同意您关于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论述，我在前年（见附呈抽印本）也是这么说的。^②关于主观逻辑，即人的思维规律，核心问题似为数理化。目前只有所谓抽象思维有数理逻辑，而更复杂的形象（直感）思维和辩证法就没有数理化，也就不能上电子电脑。所以我以为现在要攻下形象（直感）思维和辩证法的数理化，您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 3. 7

①此信收入《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44页。

②指钱学森同志《关于思维科学》一文，见《自然杂志》第6卷第8期563页，以及本书293页。

下卷

VOLUME III

往事杂忆





奇闻异事与奇谈怪论（六则）

一、人生成功度的幽默计量

1986年末余初次去香港，尝在港大文学院教授黄德伟处做客，时女港星B小姐亦在座。

黄教授方自美国留学归来，意气风发，又新迁港大教授别墅，甚为得意。座上忽发惊人之语云：“每个人人生的成功度可用其占有厕所的数位来计量。”

盖黄教授幼时居香港筒子楼，多年难忘每日晨起后众人排队轮流上厕所急苦之状。而今他单身而住好宅，房中有多间厕所云尔。



何新与饶宗颐先生（香港，2000）

闻彼所言，余忽发笑。黄教授顿悟——乃急补充曰：“我不是说她。”

余愈笑，彼亦笑。唯B小姐脸红也。

二、德间康快令我想起古越国人

1990年我应德间书店邀请访问日本。一晚，德间康快正装着和服设宴招待余于东京赤阪王子大酒店。席间讨论及日本民族特性，德间老先生忽投箸，神情默然严肃。

缄默片刻，德间正色云：

“日本人的生存环境与中国人不同，我们的心情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中华是幸运的民族，居住大陆，土地辽阔，物产资源丰富。你们失败后还有机会。而日本人仄据海隅，除了大海没有资源。日本岛的地质是高危结构，多活火山且经常发生地震，将来可能陆沉，而且常年有飓风台风。

山地贫瘠，食物无法自给。国土仅仅是中国的 1/30，人口却超过一亿多，生存空间过于狭小。日本人是宿命的民族，我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不能不做求生的奋斗。因为日本人没有机会输。所以不敢松懈，不敢不团结。而且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一个战败的民族。”

言谈间德间先生神情庄重凛然，正襟危坐，宛如一尊石像。当时对此我脑中忽然浮生勾践文种范蠡卧薪尝胆的故事，我乃知道日本从未接受失败，未来是一定要突破重围的。德间一族乃日本望族世家。德间先生引荐我见到宫泽喜一、佐伯喜一等日本政坛巨擘，所谓“知中派”，惜乎今日均已谢世。



宫泽喜一会见何新（1990年）

三、卡斯特罗谈革命与芝士

1991年春余在古巴。一晚大使陈久长忽急来余住处告今晚不可吃饭，盖古巴方面通知卡斯特罗今晚特邀共进晚餐云云。直至当晚 23 时余，专车乃接我们赴老卡办公地大理石宫。

晚宴丰盛，酒类有古巴之朗姆酒及葡萄酒。席将过半，侍者忽端上大盘，盘中陈列块状五颜六色奇形怪状之物一块块，且有颜色碧蓝如宝石又有浓绿及嫣红而表层有绒毛者——余讶异不知其为何物。译员小何乃悄声告余：此物高级芝士也，味道鲜美。而卡斯特罗乃力邀余品尝，余心畏惧不得已方试尝一小片，感觉味道异常，难以下咽，故浅尝辄止。



与卡斯特罗会谈（1992）

卡斯特罗笑曰：毛泽东说不吃辣椒不懂革命。在古巴，不吃芝士不懂革命。世人



只知道古巴产蔗糖与雪茄，不知古巴还有第三名产，即芝士。法国芝士品种最多，700种。你们中国有多少？我摇头无以对。

卡斯特罗乃笑曰：革命后古巴已能制作芝士400多种，仅次于法国居世界第二。苏联人虽然会做火箭，但也不会做这么多种芝士。言谈间意态甚为自得。

余归后查资料乃知：所谓芝士者，英文“cheese”，法语“fromage”，意大利语“formaggio”，日语“チーズ”，即发酵之奶品也，汉语俗称干酪或乳酪。乳酪本源自于西亚，是畜牧民族一种自古流传下来的美食，希腊人用为神殿敬神物，中古随蛮族传入欧洲，而后成为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餐桌之所最爱。盖老卡，亦西班牙裔移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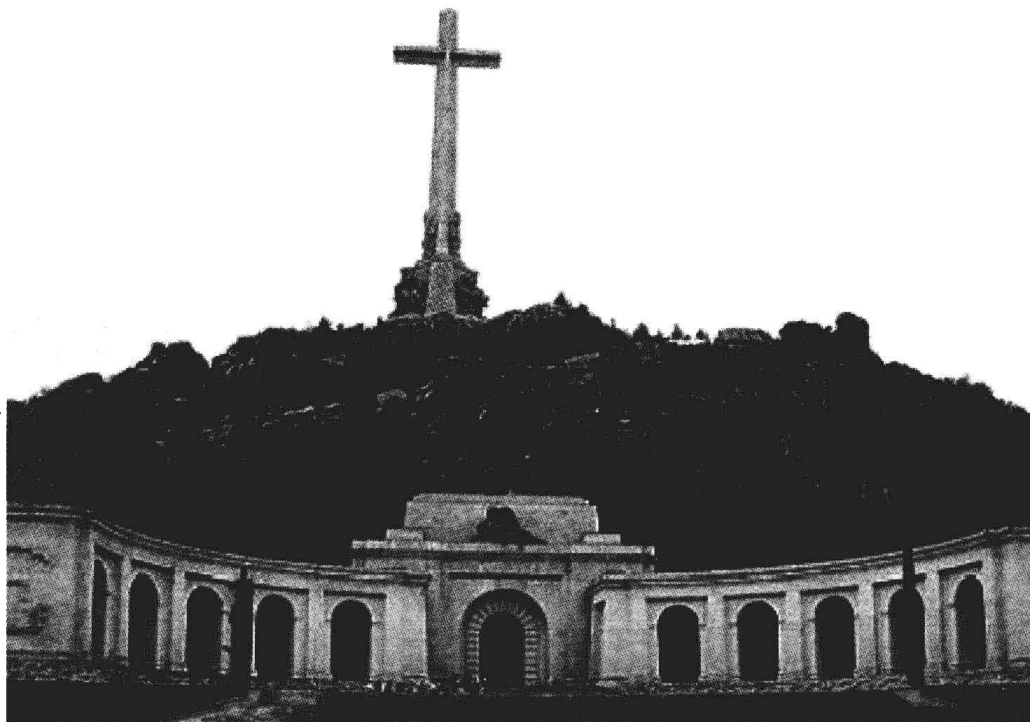


在古巴

四、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世界各国都有关于本国英烈的纪念碑。纪念碑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但是，我所知道的多数纪念碑只是一块刻字或不刻字的石头。而给我印象深刻质感格外与众不同的纪念碑有四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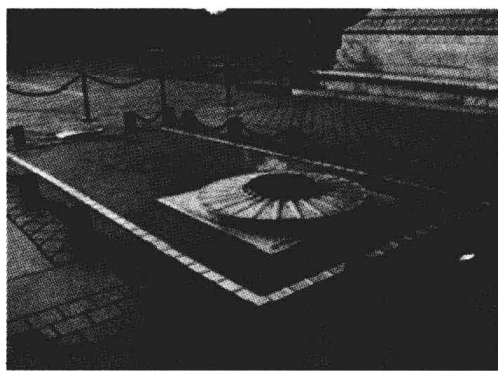
- 巴黎凯旋门及圣火坛。
-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外长燃着不熄圣火的火坛。
- 西班牙赛格维亚山上的阵亡战士纪念碑。



西班牙赛格维亚山上的阵亡战士纪念碑。那是耸立在一座山顶岩石上的一尊150多米高的神圣十字架，在数十公里外都可以看到。这也是世界上最巨型的十字架建筑，当年由15万政治苦役犯所建造。



巴黎的凯旋门



长燃着不熄圣火的火坛

还有就是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Korea Veterans Memorial）。这也是我平生所见过的寓意最丰富、造型最独特、哲理最深刻的纪念碑之一。而更使我难忘的则是我自身在这里所亲身经历的一幕往事。



美国韩战纪念群雕与越战纪念墙相对应，建造在林肯纪念堂的右侧。这个韩战纪念碑，准确地说，是一个被政治家和艺术大师精心设计和做了高度艺术化处理的建筑和雕塑纪念园区。纪念区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造型是 19 个高度仿真的不锈钢美军雕塑群像。与苏联模式的造型群雕不同的是，这些美国士兵造型高度写实，仿若一队真人披挂着伪装服持枪踟蹰前行，前方是美国的国旗。每个士兵的面部被渲染出不同的感情和表情——或疲惫，或坚韧、或勇敢、或迷茫。

这十几个钢铁铸造的士兵布列成一组散兵线，不规则地散列在青草地上。无论白天或黑夜——这些士兵都以战斗队形伫立在这片草地上，每一个身临其境者到此，都不会不感受到一种震撼！这群士兵就是朝鲜战争中美国大兵们的缩影。

纪念区的第二部分，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墙上，浅浅蚀刻而若隐若显着一些美军士兵的面容。据说这些形象都具有真实的原型，所有这些面容都是根据韩战新闻照片中美军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而临摹刻录下来的。纪念墙的花岗岩是抛光的，侧面那些不锈钢士兵的塑像群可以映射在墙上。因此当人走过时会注意到，群雕与浮雕的两组造型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为一体。这座墙的尽头，则是整个纪念园区的点睛之笔，镌刻着一句格言：

“freedom is not free” —— “自由并非不需要代价”！

纪念区的第三部分是一组设置于地的黑色石座，在每块石头上都镌刻有文字。置于这组石头雕塑群正前方一块是主题石，石上镌刻着如下铭文：

“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回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不了解的国家，为素不相识的人民献出生命！”

还有一些石头上记录着在韩战中死亡的美军人数、联合国军人数等。（据有关资料：韩战中联合国军总伤亡约 65 万人，其中美军死亡 5.6 万人，总伤亡约 17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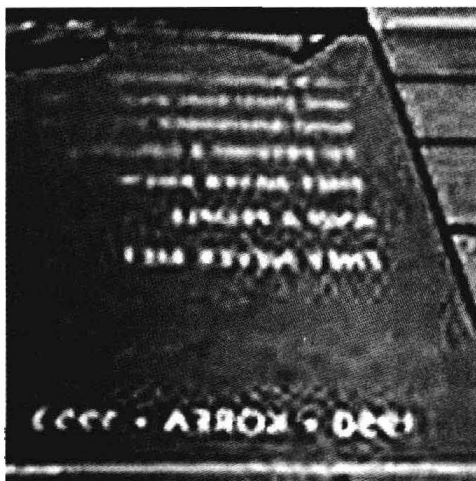
而中国军队的伤亡数字大约是对手的一倍以上。) 读着这些碑，我脑中掠过的悬念是——若此刻毛泽东到此，面对此情此景，感受会是如何呢？

我一路缓缓地走来，只顾阅读这些碑文，思索其政治含义和历史涵义，不知不觉中与同伴们失散了。

读完最后一块碑文，我感到有必要在此留下影像。附近正好有一个美国白人老太，我想请她帮我。我摘下相机，请求——Lady, Can you please help me for my camera up ?

然而，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老太把我的相机接去，什么也不说，就把它丢到草地上，然后昂头转身离去。那一瞬间，我在她眼中读到了一种冷蔑和敌意。我知道，这老太可能注意到我是中国人。

我从地上捡起相机，默默目送老太的背影，怅然若失。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被撕裂般的苍凉之情。



在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 (1995)



在巴黎 (1997)

时当深秋，华盛顿的天空湛蓝似海，而金风黄叶周边浸润着萧瑟的秋气。我感



受到了这个园区中弥漫的敌意。于是我赶紧找到同伴们仓促离开了那里。

归途中我想到，关于这场朝鲜战争，在中国早已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而且按照对手的意识形态被解构多年了。

——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忘记历史。真实的美国人，不仅生活在情感中，也生活在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中。

这座韩战纪念碑1996年建成，总统克林顿亲临剪彩。据说全部资金来自捐款——许多捐款人是参加过韩战的老兵们。

而中国人呢？对历史中的一切似乎都已忘却。当今中国精英认为韩战完全是中国人的错误。都沉醉在一片友好、伙伴的混沌温吞水之中了——这温吞水大概就是希腊神话中所谓忘川，那条通向死亡的遗忘之河吧？

五、除了法国人都是野蛮人

走遍世界，感受各国人的族性风情确实不同。

英国人古板，德国人严刻，奥国人高贵，意大利人浪漫，西班牙人奔放，南美人洒脱，美国人流氓，日本人拘谨，韩国人无赖，香港地区人势利虚伪，台湾地区人小家子气。

法国上流人士品味优雅，礼貌周到，内心倨傲。

法国多数人懂英语不讲英语。如果你在巴黎街头用英语问路，几乎没人睬你。因为法国人认为英语是俚俗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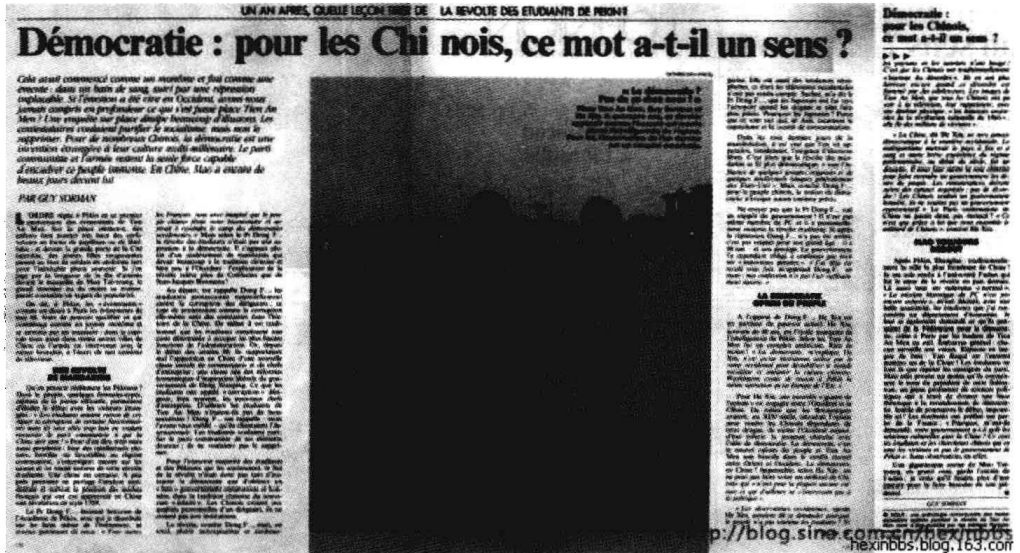
在法国有一次与一位出身贵族的法国朋友共餐，他酒后吐真言，我听不懂，我的翻译告诉我：他问我知不知道当年法国贵族怎么看世界上的人？我答：不知道。

翻译转述说：18世纪的法国贵族认为，除了法国人，世界上都是野蛮人。除了巴黎城里人，法国人都是乡下人。

此前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关于中国历史文明的国际地位以及与法国文化的比较。显然，这位骄傲的法国君子在调侃我。

于是我对翻译说：请你告诉他，法国文化的优雅精致的确值得骄傲。希腊是西方文明之母，法兰西是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文明之父。法国最美的宫殿是凡尔赛宫。修建凡尔赛宫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年只洗一次澡，所以庞大精美的宫殿设计中居然没有澡堂和厕所的地位。凡尔赛宫的欧洲花园华丽之极。但园中有园，其中最美的花园是中国园，那个园林的原型是苏州园林，17世纪的天主教传教士画图带回法国的。

17 ~ 18 世纪许多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但他们在中国传教并不成功，倒是把孔夫子、易经六十四卦和内阁制以及重农学说，还有瓷器和中国风尚带回了巴黎。于是有了洛可可艺术（中国风）。①



法国费加罗周刊采访何新



在塞纳河上

①洛可可艺术（Rococo art）是法国 18 世纪的艺术样式，发端于路易十四（1643 ~ 1715）时代晚期，流行于路易十五（1715 ~ 1774）时代。洛可可艺术风格是继巴洛克艺术风格之后，发源于法国并风行欧洲的一种艺术样式。洛可可的本义是贝壳，开始是指用贝壳、石块等建造的岩状砌石，灵感源于中国的清代家具的螺钿艺术和苏州式假山，具有玲珑剔透，华丽雕琢的艺术趣味，也指具有贝壳纹样曲线的主题，成为以室内装饰为主体的样式名称。



六、高处不胜寒

某日友朋相聚，席间遇一长者，体态消瘦，貌清奇不喜多言。

友朋告：此非凡人。年近七十，尤喜周游世界做“驴友”。屡历大难不死。去过南极，尝徒步穿越爪哇原始森林，近日方攀珠峰登顶而归。

我闻言肃然起敬，问：当您站在世界最高峰顶上，感受如何？

他淡然一笑，答：只想快点下来。

我又问：攀顶途中风光如何？所见印象最深刻者为何？

答：登山遇难者之冻尸。

余惊问：多乎？

答：自7000米以上，沿途不时相见，交错枕藉。有时遇峭壁而上攀，所能援手措足者，或竟唯有与危岩冻合为一体之僵尸。而它们都是先前攀峰的遇难者，或瞑目或张目，肤色栩栩如生。

此公言，攀登珠峰时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丢失墨镜。因雪光反射紫外线极强，脱镜子即致盲。

为避免灾难，事前都要准备很多副雪镜。他准备了十多副。但是攀步艰难，途中会不断损坏、丢失。下山时只剩下所戴的一副，再丢就完蛋了。

我问：丢了会怎样？答：瞬间失明——谁也帮不了你，没办法，那只能留在山上。

他告我，同攀峰者中就有一人，下山途中镜子失落。于是只能默默地倚岩瞑目，队友们默然而过，谁也无言，谁也无奈。那个人就永远留在雪山上了。很冷酷，但是没有办法。

早期，攀登高山常被称作“征服”，登临绝顶，意味着人类征服了大自然。然而历经数十年的珠峰攀登之后，一代代登顶者回头审视，却很难再怀有这种征服者的“自信”，在绝顶上获得的最大感受只是敬畏与感恩。

冰峰苍茫，雪光无言。只有在自然的默许下，人类才可以置足高山之巅。而人来复人去，山依旧在那里。

高处不胜寒。诚如一位攀登者所言，每个攀登者最终获得的是这样一种感悟——也许来时怀抱着征服自然的雄心，但走时所带去的却是被大自然征服和宽恕的敬畏之情。

忆吴冠中与80年代美学形式的革新

惊闻吴冠中先生去世了。30年前，曾与吴先生就中国视觉艺术的形式革命与创新问题有所交往。

1979年我写作《试论审美的艺术观》一文，提出对于艺术作品，形式表现重于政治主题和思想内容，艺术必须冲破意识形态之藩篱：“艺术以自身为目的，形式决定本质，表现（之美）就是一切”。

该文1979~1980年在香港《抖擞》杂志和国内《学习与探索》先后发表，后来传播开后在国内理论界一度引起轩然大波，以致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内定为“精神污染”言论，列名上报。（该文收入《何新论美》等书中。）

但此文得到两位人士的激赏。一位是吴冠中先生，一位是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栗宪庭君。

吴冠中先生读拙文后立即给我写来一封蕴含激情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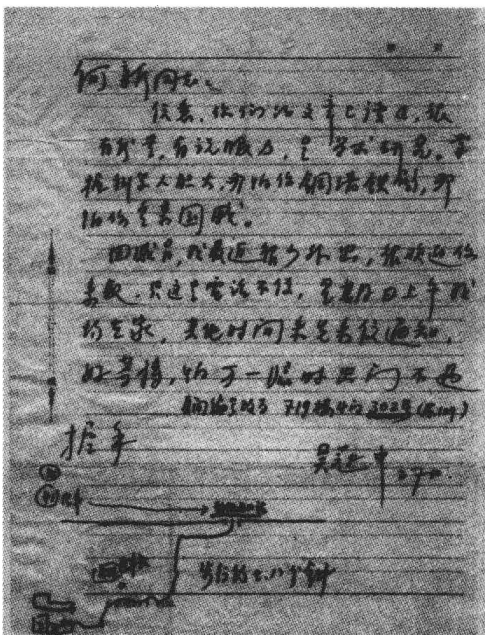
何新同志：

大作带来旅途细读，很好，因为是贴切了艺术实践的真实的，所以是科学的。不少虚伪的“艺术理论”文章，美术工作者不爱读，不读！年青一代更反感。所以在美术界，理论与实践者间是话不投机。

我自己的时间精力都倾注给实践了，没有理论水准，但看到伪论的毒害，使许多青年美工在做无效的劳动，有时写一点体会，比方“形式与内容”、“抽象美”等等有关形式美的关键问题，受到实践者们的共鸣。同时引起卫道士们的反对。因为有些识归途的老马，他们还负责驾车的时候，是决不敢走新路的。何况，逢迎者也总不乏人。

希望你坚决、勇敢地写下去。也给《美术》杂志写（稿子直接寄他们，我不负责编辑，但可了解处理意见），攻那个“内容决定形式”（此内容非你所指的内容）的毒瘤。《美术》在美术界算是最普及的刊物了，约二十多万份。……

其后经吴冠中先生引介，当时主持《美术》杂志的栗宪庭乃来访我，要我为《美



吴冠中致何新手机（1982）



术》杂志撰稿。

我说我的东西离经叛道只怕你们不能发表。栗君说，有吴冠中先生等画家为后援，他可以做主——并特转告，吴先生希望我力批“写实主义”，挑战冲击当时主宰艺术领域与美学理论的保守思潮。

当时我恰当壮年，正奋力参与并弄潮于思想界的启蒙与反思运动。对造型艺术中以伟大领袖政治运动为主题的小人书式绘画和造型久已倦眼，因此一拍即合。于是接二连三在《美术》杂志上发表数篇文章，鼓吹对视觉艺术的形式表现进行革新。

文章发表后，美术界回应强烈。正统派自然要骂。而吴冠中先生则再度来信，对我的文论继续给予鼓吹。其中最动人的有两句话曰：

“——掌握科学人胆大，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

期间多次信件往复。后来吴先生还绘地图邀请我去其劲松的新居拜访，赠画留念，相谈甚欢。

1988年后，邓林女士成立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吴冠中先生与我都忝列理事，时有欢宴往返。

90年代以后，吴冠中先生已成画坛泰斗，成为名震中外艺冠中西的一代大宗师——而且堪称是当今拜金主义五浊恶世之下，中国极少数真能名副其实的艺坛大师之一。

而我则自90年代后期即闭门谢客，与外界疏于往来。及去年某日余昆弟来家，云最近他曾造访吴老，吴先生问候老兄云云。我问吴先生身体如何，弟云：颇好而健谈。惟于交谈中乃痛诋时流以及美坛风气败坏，痛心疾首！

我云：世道皆如此，何止美坛？当今文化风俗之败坏，一如史上西晋、晚唐、明末、清之光宣后期，江河日下，不可收拾矣！未料弟旋以余言转告吴老，而吴老乃回电邀访。

但余则以怠懒之身日推一日终未成行。不期恍惚之间，吴老竟终天年而谢世矣！！闻讯后，不胜憾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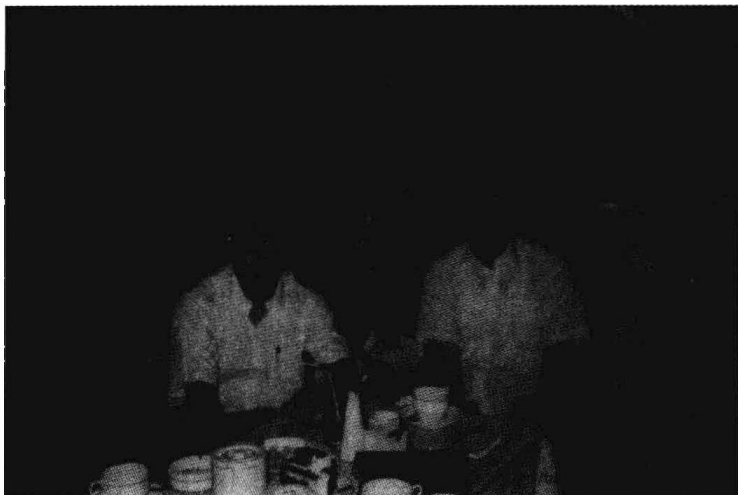
读吴冠中先生画，其妍貌如丽人好女。观吴先生文思，则器识才艺为一代之冠。忆其出处则彬彬君子，览其笔墨则云腾海翻。

余赞曰：

沧桑人生，冷眼世情。世道反复，落日悲沉。举世披靡，危岩峻立。峌峌巨木，桃李成荫。君子德风，污浊不染。高风亮节，垂范人间。

因录此篇，聊纪追思与怀念。

2010年6月27日



何新（左）与意大利记者佩利（中）、翻译（右）（1991）

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悲壮

接受意大利《信使报》特别记者佩利·查理（JL·Messaggero）采访三次谈话

这是何新先生一篇睿智的旧年谈话录。采访谈话进行了三次，对谈者是一位充满西方式优越感的意大利文人。^①

第一次谈话：“开放”与“封闭”

时间：1991年8月10日

地点：王府饭店

记者：我在《远东经济评论》上读到过关于您的介绍和照片。（手指何的录音机）但是，我采访世界上很多著名人物，我从来不使用录音机。

何新：我之所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必须使用录音机，是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记录下我的回答。

记者：您现在在社会科学院的地位相当于教授，是吗？

何新：差不多。顺便说一下，我取得目前的学术地位，主要是依靠我在1989年以前出版的五六本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而与任何政治背景无关。

^①本文收入《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记者：这些著作是你自己写的，还是集体创作的？是专著，还是文章或小册子？

何新：当然是我自己写的，是专著，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送两本给您。有个香港报刊为了糟蹋我的名誉，说我一部比较著名的著作（指《诸神的起源》）是剽窃台湾学者的。（笑）但我至今没有看到有人明确说出那位被剽窃者是谁，被剽窃的书名是什么。我也奇怪，为什么那位台湾作者（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始终不走出来作证。但是我倒知道，我的这本书在台湾（木铎出版社）有被盗印的版本。还有人说，我的理论都是抄别人的。那很好（笑），他们就不必这样地仇恨我了。

记者：但是您怎样向西方传播媒介，解释你目前的立场呢？

何新：你谈到西方的新闻媒介，坦率说，这两年我感到非常失望。所谓失望，是指这样一点，我以前曾经相信西方新闻媒介具有所谓的客观性、公正性。

但是我注意到，自从1989年的事件以来，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报导，带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价值观念的偏见。比如，最近我曾经写信给美国的一本著名中文杂志的主编（指纽约的《中国时报（纽约版）周刊》），因为在那本杂志里面所介绍的关于“何新”的个人经历——与我本人的真正经历是那样地不同，以至于我只能说他们所介绍的那个“何新”，是我从来不认识的另一个“何新”。

记者：你说的西方，是仅仅指美国的一些报刊呢，还是也包括法国、欧洲的一些报刊？

何新：这两年我被西方新闻机构追踪，因此我也很有荣幸地认识了西方一些著名记者。

记者：我想告诉您一些关于我自己个人的事情。

我在亚洲已经旅行了25年，我可以说我自己是亚洲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我到过越南；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我到过阿富汗；在菲律宾马科斯出逃的时候，我到过马尼拉；在英迪拉·甘地被刺时我在印度；在日本天皇去世时我在日本，在举行奥运会时我也到过韩国。我已写过的几本书是关于越南战争和关于阿富汗战争的。

在天安门那次事件前，我在中国待了两个月，事件之后我又来中国待了几个星期。我之所以可以在亚洲旅行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年，是因为这些亚洲国

家的人们相信我是正直的。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做一点评论和比较。我在中国，从官方媒介所得到的资讯，我认为也是不客观的，正像你抱怨西方的一些报导不客观、不真实一样。但我想，关键并不在这里。

我现在想探讨我们这次谈话的主要部分。（记者情绪激动）关键是，这里的制度为什么仍然这样神秘？这样封闭？我现在正在写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书，亚洲只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国家，就是中国、越南、朝鲜。我在思考，为什么这里的制度把一切变得这样保守，这样封闭，而总是在重蹈皇权时代的某些传统？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一些历史传统，仍然在束缚着这个国家的一切？就我个人的观点看，这并不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我认为这是在于一个资讯开放社会与资讯封闭社会的区别。否则，赵紫阳过去做过那么多事情，为什么人们对现在的他却一无所知。

何新：您一股脑儿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但我想，我们只能一层一层地来进行讨论。从同样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也曾经思考过类似您所提出来的问题。甚至在感情上，我能够理解您在表达这些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激动。如果单纯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话，在思考问题和评价事物时，我们总是倾向于使用普遍性的和永恒性的人类价值（普世价值）。然而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却是很严酷的，并且是存在着非常深刻的不同利益斗争的一个体系。

记者：您是说，在我和你之间，存在着不同利益的斗争？

何新：不，我指的不是你我个人之间。我指的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例如这种斗争既包括穷国与富国的斗争，也包括各个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而斗争。这种斗争在今天远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结束，相反，对于一些弱小的经济落后的民族来说，未来的前途是更加严峻了。而从一个民族必须生存下去的立场，从一个国家要求得到生存和安全的角度所做出的判断，与那种普遍人类价值和抽象人道主义的判断，似乎会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我是从马可·波罗故乡来的人。

何新：但马可·波罗的船驶向东方，是为了寻找宝藏和富源的。

记者：马可·波罗在13世纪就体现了开放精神，他被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所接受。

何新：我们不要忽略当时的蒙古（元）帝国是一个差点征服世界的帝国。

您刚才谈到关于开放与封闭的问题。我认为，泛泛谈论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封



闭”是一种政策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特征。我不否认现在中国并没有把它所能够展示的一切东西都向外部展示。我不否认在新闻政策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管理上，中国目前的方针，有的时候可能具有比较高的警戒性。

我同意我国领导人的一种判断，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我国社会制度的生存，在今天的世界环境下面临着威胁。这种威胁很明显的实际例子，正像南斯拉夫和苏联最近的事态所已经表现的，就是当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束时，它们作为一个完整民族国家的生存和独立，也同时受到了威胁。这种情况我认为并非偶然。

记者：我可以理解您的观点。我曾经在杂志上读到过您的观点，这些杂志上所表述的您的这一观点是准确的。

何新：所以我无法支持那些所谓的中国“民主”派，并不是我不热爱“民主”这一政治理想。但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人们在历史中要求什么，而是在现实的历史中，人们能够得到的是什么！那些人要求的似乎是民主，但中国所得到的却将是大动乱。

记者：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同意您的看法。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解决问题？

何新：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个人的看法认为，是悲剧性的。

记者：那也就是说他们的观念更加开放，或是更加……？

何新：我不使用“开放”或者“封闭”这样的术语，因为我认为，它们不是评价是或非的标准。我想说的是，今天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都是非常严峻的。我看在若干年内，中国无论如何也必须首先保持自己的社会稳定，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社会条件。任何政治和政策上的不谨慎，都会使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流出鲜血，使中国发生新的动乱。所以在这样一种历史形势下，我想，中国政府只有做出目前的政策选择。

据我观察，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在做三件事情：第一，采取一些果断的但是具有短期和临时意义的政策，来维持和确保目前的社会稳定；第二，在重新研究、认识国内外的现实，以探索一条能够使中国继续走向强大和现代化而又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新道路；第三，在这种探索的基础上，会导致形成一些目光远大的方针和政策，来解决中国社会中那些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社会问题。

所以我深信，当中国政府说它的改革开放路线没有变的时候，它这样讲是真诚的。因为改革开放这个方向，是中国根本性的战略方针。而目前所采取的

一些具有强制性的安全措施——像你刚才提到的在广场上放汽车一类的事件，以至于期间采取的某些警戒和防范措施，我认为既是必要的，但也是短期和临时性的。

我认为有远见的外国观察家，应该善于识别中国政策当中，那种短期性的成分和那种长远性的战略方针。

记者：但这个权力制度的真实情况并没有变。正如你们这里有一个部长曾告诉我的，中国的权力机构就像一种集体性的皇权制度，你刚才提到了革命，但我不懂什么叫“革命”。我认为这里的情况一直没有变。这里的人民仍然无法知道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观念。

何新：您不理解什么是革命，但是中国人理解。

我在与安莎社的记者巴尔巴拉女士谈话时也曾谈过这个问题。在1949年以前，中国当时的4亿人口中，每年有上千万婴儿，在刚出生不久的摇篮中就死去了，因为他们饥饿，因为他们没有奶吃。而现在中国儿童的出生成活率，以及社会人口的平均寿命，指数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甚至超过了一些中等发达国家，这是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记者：是的，是的。

何新：那么我要说，这就是革命。而在1900年，就是1991年以前，包括意大利人在内的八国联军，依靠一支千把人的军队，就把中国的皇帝、皇太后，在中国的土地上赶得团团转。1949年以前，中国工业不能生产一辆自行车，甚至一颗铁钉。而今天的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了原子弹、氢弹、卫星、核潜艇，中国人有力量，可以对抗世界上任何政治上、军事上的强权，这也就是革命！

我以前已经遇到不止一位西方朋友告诉我，只有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只有看是不是采纳西方的多党代议民主政体，才是判断中国有没有获得进步的惟一尺度。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了这些朋友，不，我不会承认这个尺度。而且，不仅我不会承认这个尺度，请到农村去问一问那些农民吧。

在社会的动乱和社会的安定之间，在有饭吃与没饭吃之间，在让10亿人口的社会结构松散甚至陷入无政府状态，以致一旦面临今年这样的水灾就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与能够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组织和帮助之间，他们究竟会如何选择呢？究竟是要选择一个终日辩论不休但却行动无力的政体呢，还是要选择一个能给社会



带来稳定、温饱的有权威政体呢？

记者：我也不愿谈什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问题。

何新：我还想说的是，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体，已经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尽善尽美的情况。但是这里也有一些背景情况是必须考虑的。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面临恐怕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沉重、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至今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微小的。

今天中国的政治管理操作，不可能不仍然具有专业化的特点。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进和改革，需要的是时间、过程和很多准备工作。但是我也想问，如果我们不采用抽象的价值标准，而从经验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同样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究竟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组织和治理得好，还是印度、孟加拉以及其他一些采用了西方多党制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国家组织、治理得更好呢？比如说，当同样面对着巨型的自然灾害的时候，究竟是哪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它的人民抗击自然灾害呢？

记者：20年前，印度有人写过一部书，关于革命与民主的书。

何新：坦率说，对西方的政治理论我也做过很多的研究。我认真读过从孟德斯鸠和卢梭以来，近代有代表性的关于政治民主主义的著作。但是今天我还是认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方向是对的。

记者：今天我和你的会见非常有趣，尽管我们的立场不同，但是很有意思，这就是我今天跟你谈话也十分坦率的原因。然而我很愿意跟你做一个更长一点的谈话，我们是否可以再见面，比如说在星期一吃顿午饭？在这期间，我想把您的这些书籍读一读。与此同时，我希望您能把您今天这些回答，译成英语或法语。

何新：因为我的时间比较紧，星期一不一定可能。我们不一定在一起吃饭，如您阅读我的书以后，确实认为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交谈，我争取下周另找一个时间。

记者：或者吃顿晚饭，不占用您的工作时间。

何新：好吧！

第二次谈话：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悲壮

时间：1991年8月13日下午

地点：王府饭店

记者：我读了你与巴尔巴拉和日本教授的谈话，有几个问题没搞清楚。您在北大荒待了9年，是真的吗？

何新：是的。在我今天送给您的我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朵夫的谈话中，关于我个人的经历有过很长的一段对话。

记者：那么这9年的经历在您的心灵上、在您的心理上、在您的思想上，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记？

何新：我认为我一生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在这9年中找到的。因为那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部分，我通过那段经历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生活。在这9年当中，我从事过多种多样的职业，比如我当过农民，当过铸造工人，也曾经由于写信反对江青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

那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在1970年我从关我的那个地方跑出来，后来我曾经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当中，我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生活很艰苦。但是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也包括意大利的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

早年在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对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我既懂得了书本知识的价值，也充分地知道了它们的无价值。

记者：那么您对您早年的经历，您对它们的评价，对您思想的演化，能否总结成一句话来说。

何新：我为我的人生经历感到自豪，也感到悲壮。这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经历。直到今天我身上仍然保持着体力劳动者的很多痕迹，因此很多人认为我不像个正统知识分子，甚至有些日本的记者和香港的报刊也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一点也不想使自己变得更像一点。

记者：好像您曾说过一句话，如果中国建立了一座大厦、一座建筑，如果它有100个门的话，那么99个门都会被关起来。

何新：您可能指的是我在1984年，在一次演讲中的话吧？但我不记得我这个演讲翻译成英文。您如何读到的？

记者：我在某个地方发现的。



何新：是的，我曾经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会上，谈到中国文化的特征的时候，谈到过这一点。当时我把“封闭”和“开放”作为一种文化性格，我当时讲到了长城和北京四合院儿的封闭性，我的观点后来被《河殇》的那些作者所剽窃。但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深入和变化。

记者：那个时候您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吗？

何新：从现象来说，中华民族由于从古以来所面对的生存环境是严酷的，所以形成一种防御性心理，这种防御心理具有某种封闭性的特点。

记者：下面我要问几个问题，不一定符合逻辑，是从我看到的一些材料里面产生出来的。

在西方新闻媒介中，您的声誉和形象受到批评，有一点就是说您是一个不倒翁。那么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

何新：这个“不倒翁”的评论，恐怕不是来自西方的新闻媒介，而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至于在政治上我是不是随风倒的人物，我想有我10年来在各个时期发表的著作在。让后人去评论吧。事实上，我经常是一个逆流的人物。



1984年以后，我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学术界中，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被攻击的对象。这种攻击在当时主要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学术性的。因为我在进入学术社会以后，在许多领域里不满意前人的理论，不跟随流行的多数人的理论，而总是试图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这种创新性的研究由于具有挑战性，因此在很多领域经常受到多数派

和主流派的怀疑、抵制和反击。

例如，在1986年到1987年之间，北京一些文科研究生曾经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当中制订了要在学术上围攻我的计划。后来他们果然在一系列全国性刊物上同时发难，发表了一批攻击我学术和文艺观点的文章。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人物，有的在学运中成为知名人物，现在跑到国外去了。

记者：过去我认为我们彼此不能理解，就在于我仍然认为这是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区别，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即使开放社会不那么稳定，社会总是在向前进，而封闭社会则是向后退。

何新：我和你可能有一个最基本的分歧，就在于——我是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从国际经济之间的不平等，从这样一个世界背景上去理解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的自我防卫。

我深知在今天的时代，面对着国际资本要在经济政治上完成统一世界的目标，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保卫自己是多么艰难！因此我是否可以用一个寓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是说，在一个既存在着狼也存在着羊的世界上，如果羊群为自己建一些特别的篱笆和墙，试图把自己保护起来，那并不是由于他们在观念上不够开放，而仅仅是为了设法不被狼吞掉。但从狼的观点看，也许会认为这些篱笆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挑衅性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近两年的时间当中，由于我所持有的政治信念和立场，我既受到了国内知识分子的误解，也受到了来自国际传播媒介的集中攻击。为此我反复地反省过自身。

反省以后我的结论是：我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和立场，即使有一天我为此而失去我的生命。原因在于，我清楚地知道，那些今天期待西方和国际资本将给他们带来西方人所许诺的种种美好未来的人，也就是那些期待在抛弃今天的社会主义后，将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获得种种利益的人，必有一天会发现，这是一个骗局也是一场美梦。

正如二百年前，那些闯进中国和落后民族国家地区的西方殖民者，给这些落后民族带来的并不是文明而是掠夺一样，我们在失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并不是走向富裕和繁荣，而是在国际上成为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被剥夺者。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深深知道，一个时期总有一个时期的大潮流。今天



的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成为当前的潮流。

这种潮流今天不仅在冲击社会主义,而且在“主权有限”、“世界联邦”、“超级国家”等新鲜理论的支持下,冲击着一切民族国家。在各国扶植代理人政权,实施间接控制,最终就是要以世界上七个发达国家(或者“7+1”?)为领导核心,构建所谓“世界新秩序”。



与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库柏(负责东亚事务)合影

但是潮流是会改变的,人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这一点。

记者:有一个另外的完全不同的问题。您需要生活。在您的生活中什么时候您是感到幸福的?

何新:我始终感到幸福。这一点也许会令您意外。我至今的全部生命经历,都是与艰难、困苦、敌意和误解作斗争,我在搏斗中感到幸福。是的,我也有失意、沮丧、挫折、痛苦。但是我对我的整个人生经历感到自豪和幸福,我已经习惯于挑战与接受挑战。

记者:我想告诉您,我曾经采访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如英迪拉·甘地、西哈努克,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我对于他们没有做过任何一点错误的报导。这次有一名做记者的,还有一名翻译,证人是很强的。我们谈话的问题都是拐弯抹角的,不是系统的,也可以说这只是一次学术性的对话。

第三次谈话：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时间：1992年10月9日

地点：王府饭店

记者：我们可以谈多长时间？

何新：一个小时后我另有安排。

记者：我去年来访何新先生后两天，苏联发生了“8·19事件”。我立刻赶到莫斯科，在苏联待了三个月。现在中国边境那边的作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而这边中国还在准备召开共产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何新先生，您怎么看苏联的前景？

何新：我看俄罗斯正在回到类似19世纪民族主义俄国的轨道上。可以说，自“8·19”以来的一年中，俄罗斯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叶利钦正在从所谓人类普遍理想的“民主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向政治现实主义后退了。俄罗斯正在重新成为一个坚持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国家。19世纪的俄国与西方列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记者：是的，我有同感。

何新：中国本身在这一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更加稳定了。自从我们上次谈话后，世界上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但目前的中国情况和世界上的变化，似乎并未超出我们上次谈话的预料范围之内。目前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文革”结束以前的意识形态是根本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色彩。高度务实与政治浪漫，这可能就是邓小平的中国与毛泽东的中国在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区别。

记者：你认为邓的这种共产主义能维持多久呢？

何新：我看历史需要多久，就可以有多久。在当今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它们各有不同的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例如有信仰佛教的国家，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既然有那样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对各国的现实利益并没有发生不协调，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呢？何况我们的意识形态不是乌托邦，而是邓小平先生所说“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说国际共产主义发生的变化对中国造成某些冲击的话，目前这些冲击也已经过去了，即将召开的十四大就是一个标志。——不知道佩利·查理先生是否理解我的意思？

记者：我可以听。我有一个问题，苏联的“8·19事件”，原来只是20万人



在克林姆林宫前聚会闹事，结果就能把苏联多年坚持的制度，一下子就搞垮下来。如果这是一个好的制度，为什么一个只死了3个人的一个小事件，就会造成整个制度的垮台呢？

何新：对于西方历史，我想佩利·查理先生肯定比我有更深的造诣。不知您是否研究过法国历史？请问1789年聚集在巴黎巴士底底广场上有多少人呢？据我所知只是几万人。1917年攻打冬官有多少水兵？只有几千人。所以问题不在人数多少。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有长期准备条件的。严格来说，认为只是由于几十万人聚会在红场就搞垮了苏联国家，这种看法是幼稚的。

佩利：我也相信不是因为这几十万人，就使一个制度垮了。但我想知道，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何新：首先是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国家制度的基础搞得松垮了。

佩利：你们总是不喜欢戈尔巴乔夫，是不是也因为发生“8·19事件”而不喜欢戈呢？

何新：不，不是因为“8·19事件”。在上次谈话中我说过，我不是不喜欢他。更确切地说，我是相当蔑视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这个人。我看不起他，并非因为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位不负责任的领袖。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白痴，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政治白痴，不管他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或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者，如此而已。

佩利：苏联本来看起来是一个文明、发达、稳定的好国家，为什么一下子就政治、经济都不行了呢？

何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面临类似这种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发达的、文明的、稳定的，但实际内部面临许多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于是突发因素一来，一下子就出事了。去年美国不是也有人烧房子吗？贵国总检察长最近不是被黑手党搞死了吗？这些事件，似乎与意识形态并无关系。

重要的是，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不仅社会主义在变，资本主义也在变。如果用一个宏大长远的眼光看今天发生的事件，可以这样说，整个工业主义的世界基础目前都正在发生变化。我肯定在今后二三十年里，美国、德国、意大利、中国都会发生深刻变化。至于这种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结果将是好还是坏，我看还很难预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20年后的时代，也绝不会是西方民主主义乌托邦所期望的那种时代。

佩利：你怎么看20年后的世界？

何新：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的，一言难尽。

佩利：你觉得将会是独裁制度吗？

何新：一个制度是走向集权化还是多元化，不完全是由人设计的，而是由历史中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30年代意大利人也是自由自在地选择了墨索里尼，既不是靠阴谋，也不是靠政变，而是靠选票，民主地选择了法西斯。德国人对希特勒也是如此。

佩利：现在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那些大的国家要分开、闹分裂，如捷克、爱沙尼亚等。这是什么主义？还有意大利北方和南方的问题。甚至不仅是苏联、印度等大的国家的问题，小的国家、小的民族也要分开。

而现在中国，邓小平的政治中有很大的矛盾，基本上是一个大国主义，要把香港、台湾、澳门、南沙群岛等都收回来，变成一个大国，像汉朝时那样。

但是矛盾的是，经济改革让中国南方的省变得富有了，南方的省越来越独立。比如在广州你与人约定5点见面，他们会问你是香港的5点，还是大陆的5点。这些富有的省不愿把钱分给贫穷的省，理由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干得好。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把国家分小了，为什么中国相反，却还要越来越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人要开个“十四大”了。

何新：根本不必。今年4月有一位日本人已经向我提过与你相同的问题，刚才我给您我的新著《东方的复兴》第2卷中已经收录了这次谈话。我建议您读一下这个谈话，那里面我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至于是不是世界上现在都在分，这要画一个大问号。我看是，一方面有的地方在分，一方面有的地方却在合。

佩利：比如说？

何新：像美-加-墨经济区、欧洲共同体，不就是在合吗？一些地方分的情况我们都看到了，分的后果我们也看到了。比如南斯拉夫，惨不忍睹吧！现在世界上究竟是分的力量大，还是合的力量大？我看是有人在策划让别人分家，目的却是想把大国分小后才好把别人吞下去。欧共体中相当大的倾向是合。苏联前几年的动向是在分，三到五年后，我们说不定又看到要合，甚至不排除使用军事手段来整合。

刚才佩利先生好像说“分”的方向是主流，而中国有一部古书《三国演义》，它的开头有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为什么会分？一是外部有人插手，二是内部有经济利益的矛盾。近二百年来的资本主义造就了世界市



场，但没有造就完整统一的世界文化。

中国今天的问题正好相反，中国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目前正在不断发育中，但是中国还有一个覆盖了几千年历史的强大、统一、优秀的文化。所以并不是邓小平要让中国合，而是中国人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要求合。中国人做过一种算术，我们计算了一下，发现合起来对我们带来的利益要比分家得到的利益大，包括把香港、澳门还有将来的台湾合起来。所以，今后恐怕中国还是要合，不要分。

去年我自从会见佩利先生后，基本谢绝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今年以来，佩利先生可能是我唯一同意会见的一位外国记者。

佩利：谢谢你。但是为什么？

何新：因为，第一，很多问题无非是已经讨论过的旧问题，第二，进行我们这种内容的谈话，是让人感到很累的。

佩利：我不懂失败者为什么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前些时候有一位记者从香港打电话给王蒙，他也说他不愿意接受采访。

何新：前不久王蒙给我写过一封信，因为我送给他我的一本新著，我理解他。比如，我现在到意大利，想要采访一位刚下台不久的总理或政治家，你认为他会轻易地同意吗？我想他的秘书或保镖就会拒绝，因为出于对公众舆论的顾虑，不会轻易接受陌生人的采访。佩利先生向我提出一个要求，我也向您提一个要求。我想采访意大利的一位幕后政治家或什么人，我随便提一个什么人，是否你都可以安排呢？如果你能保证做到，我也可以设法联系你想采访的人。

佩利：今年我在日本采访了一位神秘的人物，连日本人都惊讶我怎么能见到他。

何新：我知道佩利先生是一个能干的、出色的老记者，你做出什么神奇的事情，我都可以想象。你去年见到我的时候曾说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你写出来了吗？

佩利：还没有。我现在正准备写一本关于独裁政体的书。

何新：你有资格研究独裁问题。因为真正的政治独裁就是罗马人发明的，你们有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利。

佩利：您刚才说的这种交换方式的采访，很有点意思。

何新：我们都在接触双方敏感的问题。

佩利：再一次感谢你把我当作今年唯一会见的外国记者。

何新：我今天来谈谈，只是把您当作已经见过面的老朋友，而不是作为一次正

式的接受采访。您准备一直住在这里吗？（指王府饭店）看来您是一位很有钱的人。

佩利：不，我不是富人，我是个笨蛋，让他们从我的兜里掏钱。这里房子很漂亮、高级，价钱也很高，但服务糟透了。

何新：关于这个服务问题，中国人一直听到外国人的很多抱怨。为此，中国人也不止一次地做过道歉。但是你今天对我提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谈一点不同的想法。我也去过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我发现类似宾馆服务不佳的问题，似乎世界上到处都有，并不是只有中国特殊地坏。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还是人乡随俗吧。

佩利：至少服务应当与价钱相一致。

何新：（笑）这个世界所以不公平，就是因为许多人也都付出了代价，但并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们与其特别抱怨中国人，还不如抱怨上帝，因为他似乎就是这样设计了世界的。^①



新战略论(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①这篇谈话录可与何新以下数篇谈话录结合起来阅读：

《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07/168547.html>

《何新：改革开放及其他》<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7/169188.html>

《何新：世界未来的展望》<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7/169617.html>

《何新北大演讲：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7/167652.html>

庶几可以部分复原 20 年前特殊历史时空的中国思想与社会情状。

以上谈话收入何新《东方的复兴》、《为中国申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等著作。

下卷

VOLUME III

未
来
展
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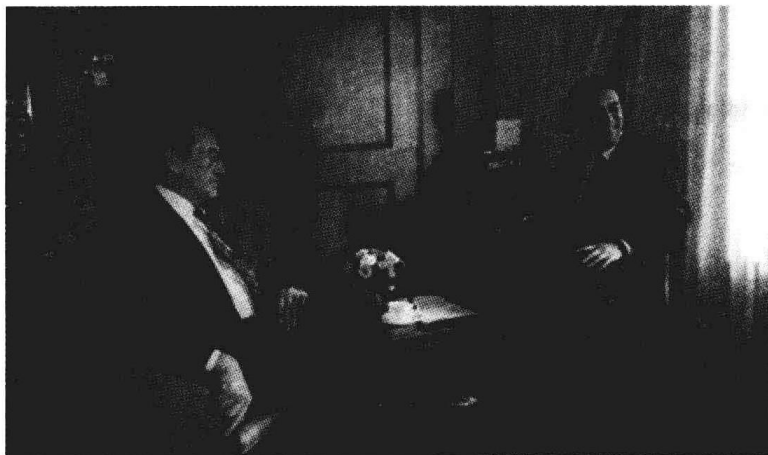
跨越20年仍未过时的一场对话：

对世界未来的展望：与托夫勒谈21世纪

时间：1993年1月10日

地点：北京王府饭店

主持人：日本富士电视台企划制作部部长森永勉



何新与托夫勒谈话（1993）

托夫勒：感谢您在星期天的下午来和我交谈。我接触了一些您的著作，您的观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何新：谢谢！有机会与您就世界前景问题交换意见，我想，哪怕就是在深夜也是应该来的。

托夫勒：我们现在交谈的时刻，在世界历史上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世界上有许多种变化目前正在发生。包括在中国、日本、美国，以及前苏联，许多巨大的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正在发生。不同的国家，正在向着不同的方向、

以不同的速度变化着、发展着。您认为，中国在与世界上其他的主要力量和主要的国家的关系方面，未来将如何变化？具有什么特点？

何新：在此之前很久，托夫勒先生的几部主要代表作都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了。我有幸在几年前就读到过您关于世界前景的一些预测和看法。我注意到，关于世界的前景，您曾经与一位记者谈过这样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说法：您说您对于世界的未来，虽然在主旋律上是乐观的，但是在许多重要的副旋律上，却是极其悲观的。

托夫勒：因为人们看了我的书后，觉得我对世界的看法很乐观。但实际上在我的书中，在字里行间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世界有那么乐观的看法。我认为，世界是以一种比较乐观的方式发生着变化，这意味着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有10亿或者20亿的人将摆脱贫困，从这点来说是有乐观的成分。

但我认为世界不会永远沿着乐观的直线发展下去。我也不相信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冲突出现。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共同面临很多巨大的困难。现在有些人正在以武力、暴力的手段试图来解决这些困难。我们面临的形势具有很多危险，可能还会引起更多的武力或暴力冲突。人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必须把这些武力或者暴力的危险减小到最低程度。

二

何新：我个人对世界前景与托夫勒先生一样，至少就短期来看，是相当不乐观的。

托夫勒：我对近期的世界展望也不乐观。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我与你是有共识的。但我的问题是，今后冲突的焦点是什么？

何新：刚才我谈到悲观和乐观的问题，是因为您的几本书在中国引起了一些误解。这种误解就是中国的很多读者，在阅读了您关于新世纪和文明展望的著作以后，普遍对于世界的未来，特别是对于近期的未来，持有一种相当不切实际的乐观看法。许多人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一种将超越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的黄金时代。

托夫勒：那是他们没有仔细阅读，或者说没有领会我的书的精神实质。

何新：我指的是他们对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解。很多中国的读者认为，人类很快就要进入到一个对世界历史来说技术上非常进步，使得现有的工业文明都完全过时的新的乌托邦时代。但是，我也认真阅读过托夫勒先生的著作，我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误解。



托夫勒：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世界的生产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这种生产形式的变化，会伴随着许多社会的、政治的变化，比如说可能会引起战争。国内战争，也包括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各种其他冲突。

人们对于我的书或者我的见解发生误解，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于异彩纷呈、各个国家情况将是不一样的这一点缺乏认识。我的意思是，未来生产形式的变革，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很多人认为，一种工业上的改革、进步，好像增加了各个国家在工业状态上的一致性，好像使它们都将成为一样的——实际上当然并不是这样。虽然都在发展，但各个国家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发展变化着。美国将不可能变成日本，中国也不可能变成美国。自然中国不可能总是现在这个样子，更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样子，它在变化发展，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三

何新：从托夫勒先生的书中，我看到的基调，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进化论。

托夫勒：但是这种进化的步调有时是无形的，有时是一种波浪式的。

何新：（笑）关于社会是波浪式的、曲折地向前发展的这个哲学观点，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毛泽东一直持有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观点，一直是这样教导人们的。

托夫勒：您说的社会波浪式发展是对的。我刚才强调的是，历史中常常会出现许多令我们大为惊奇的事情。有些头脑简单的未来学家，总是乐于把过去与现在两点连成一线，然后延伸出去就认为能够达到未来，这是不对的。

何新：我同意托夫勒先生对于世界前景的这样一种观察方式，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会是直线式的，也不会是单一线路的。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面临空前挑战的时期，一个严峻的时期，困难的时期，诡谲难测的时期。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端（像有些未来学家所预言的），倒似乎是面临着一个黄金时代的尾声。未来的前景中具有非常复杂和难以测度的多种可能性。而在可以展望的几十年内，严峻的成分似乎要远远大于令人乐观的成分。

四

托夫勒：我想问问您认为中国的前景中有多少乐观的成分？我过去曾经与一些中国人交谈过，他们似乎都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快，还会直线性地更快地发展下去。我很想知道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何新：你要知道我在中国是属于离群索居的一族，很少与表面上十分活跃的那些知识界贵族来往。像您谈到的这种乐观的看法，我有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标题，我就把它翻过去不看。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天真。我认为这些人没有充分看到当今时代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而且发展进程愈快问题就愈复杂。中国的未来，我认为也面临着非常复杂严峻的多种挑战。

托夫勒：您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未来最艰难的，或者说最危险的挑战是什么？

何新：我看到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只是我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要看到一线希望也要为之奋斗，如此而已。

至于您刚才问我看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也是当今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罗马俱乐部那些专家曾经指出过的那个问题——落后国家达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可能性，或者说资源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世界市场的可能性，在今天似乎正在趋近某种“极限”。（指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

托夫勒：您是否说这种发展到了一种尽头？还是说经济本身不会再发展了？

何新：不是，经济本身会发展，但是提供这种发展的某种条件，或者说是发展所必须的世界市场空间，现在越来越狭小了。

托夫勒：为什么会这样？

何新：我在读了托夫勒先生关于后工业社会的那些著作以后，我曾产生一个想法。也许我的这个想法，只是我个人对于您的命题的一种主观发挥。我认为，所谓后工业社会，它所指的另一种意义，就是从19世纪以来，非西方社会试图按照西方那种模式进行工业化的道路在当前已越来越难以走通了。

托夫勒：您说物质的可能性，您是指自然的资源？石油、煤？

何新：当然包括这些东西，并且也包括环境作为一种同样昂贵和有价的经济资源，甚至于包括市场也作为一种经济资源。



五

托夫勒：如果市场的确受到了限制，如果世界市场的规模不会再太大地扩展了，在这种前提下，中国会不会为了占据这个已经有限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而跟世界上其他的力量发生冲突？

何新：为了争取和保持有限的国际市场，现在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已经被卷入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不仅中国如此，也包括美国、欧洲、日本。

托夫勒：那么这种冲突有没有界限呢？就是你认为，会不会导致，比如世界战争呢？

何新：我想，世界现在正处在一个情况非常复杂的，也许是发生某种大动荡的前夜。我们面临着许多难以捉摸的不确定因素。

各个国家自己制定的政策，它所追求的目标是一回事，但是在历史中也存在许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力量，那些难以测度的力量将如何左右形势，这又是另一回事。

托夫勒：您能不能给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何新：比如说在前苏联。我想戈尔巴乔夫在当初设计他的改革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他自己在四五年以后，会使他的国家以至会使他本人遭遇到今天这种悲剧化的局面。这就是一个例子。同样的，历史并不终结。叶利钦今天所追求的目标，以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目前所追求的一些政策目标，在五年或者若干年以后，将会导致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现在也是很难预言的。

托夫勒：那么邓小平能够知道吗？

何新：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与一些平庸的政治家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在他们活动的时代中，对于历史进行塑造的可能程度，要远远大于那些平庸的政治家，这是戈尔巴乔夫一类所不可比拟的。

托夫勒：那当然。否则我们就不会把邓小平称为伟人了。你讲的这就是伟人的定义。但是，如果未来的这种变化超出了国家意志的控制范围，超出了个人意志的范围，对于我们来说，未来就更难生存了。不知道您是否看过我新出版的《大未来》这本书？

何新：我注意到你这本书中，关于中国有一个预言。

六

托夫勒：我并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我曾多次访问过日本，但是每一次访问，我就更明白我对这个国家真是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对中国了，每次来都很不一样。

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只是想更多地了解你们这个国家。中国对于未来世界非常重要。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您刚才说保证世界未来发展变化的资源和物质都是有限的。但是我看到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知识，知识的发展恐怕是能够超出这些物质的范围，这种限制的。

何新：我注意到您在《大未来》里面对于知识构成权力三角形一极的那个看法。我也很赞赏您对于知识的推崇。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就是说如果以百年以上的时间作为尺度的话，我赞成你对于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乐观论。

但是从眼前的情况来看，我想提出的一个小问题就是，在现实世界当中，知识、技术应用起来是有代价的。在市场经济当中，知识和科技的代价，有的时候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高到即使科学家已经创造了某种知识和技术，但是在现实条件下，许多人还是无法或者没有钱来使用它，用不起它。

在工业革命的早期，科技就是利润，应用科技就可能创造利润。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有了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并不是只要使用科技就能得到利润。例如现在在农业就有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提高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而是采用这些手段——就会提高生产成本，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又面临农产品过剩，结果反而导致没有利润。

在国际市场上，在美国、西欧，也包括在近年来的中国，都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会约束知识和技术的生产应用。

在你的《第三次浪潮》中，曾谈到后工业社会中的生产小型化、分散化、手工化，许多使用者自己动手加工小产品。这是一种反工业化、反科技主义的情况。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与现在的发达社会中，高科技带来高成本以及高价劳动力这些情况有关。简单说，在现实的市场经济当中，应用知识和技术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昂贵了。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知识产权的问题，更加剧了科技应用的昂贵性。

托夫勒：但是这未必会阻止知识和技术的普及。我可以给你举一个涉及我个人的例子。比如说我写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被大量翻印，但是没有人给我一分钱。现在科学、技术、资讯这种成果散布得非常快，几乎无法保住什么秘密。

此外，在科技发展方面，我不认为中国必须要依靠进口或者依赖其他国家的思想、知识或者资源。中国自己就可以作为科学发展、思想发展的源泉，中国自己就可以作为生产者，它有这种潜力和能力。中国不仅是一个知识消费者，



它还是一个制造者。

有价的知识也不仅是科学和技术。比如在美国，不管我喜欢不喜欢，这最重要的工业组合之一就是百老汇（电影业）。我们这样的人可能不喜欢看电影，但成千上万的人会花很多的钱去看电影。这是一种不可触摸的产品。

文化的产品或者文化的生产，过去一直是从西方往东方流动。那么，现在它可能会由东方流向西方。列宁就曾经写到过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已应用一些比较先进的通讯设备，这就是一种飞跃式的发展，跳跃了一个阶段，而不是自己从头来研究。（笑）我引用列宁的话，不那么受人欢迎。

何新：托夫勒先生的书在中国和世界上赢得这么大的读者群，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件奇迹。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正是美国文化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的成功的一部分，是一种渗透性的成功。

我看，20世纪的美国文化通过类似百老汇、好莱坞这样的资讯工业，为人类世界塑造了一些现代的图腾。用你们举世无双的广告手段，征服了很多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一些新的图腾，其中一个图腾就是政治民主主义的图腾，在文化上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图腾，在经济上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图腾。我这样讲不是不恭敬，我说的是在第三世界当中相当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包括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一部分知识界人士中。

至于知识能够改变世界，您知道我也是一个神话学家。那么我想说，神话与图腾也能改变世界。神话与图腾也是一种资讯。在远古的时候，人类就已经进入了资讯社会。您看，这是我对您的《第三次浪潮》的一个反论。

七

托夫勒：如果我们所有的看法总是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互相学习。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集中到关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作用以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上来。中国当前正处在一个巨变当中，日本也在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美国也一样。在这些变革当中，您看这三个国家今后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您是怎么看的？

何新：我认为中美日这三个国家，正在被世界市场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但是联又联不紧，分也分不开。我看将是一种不断发生矛盾的相互依存关系。首先我们三国互为对方的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对方市场中总是有得有失。于是就有矛盾。

的确，当前这三个国家都在进行着改革，或者面临着变革。中国已经进行了十

多年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我想，美国人民这次选择克林顿做总统，正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位将给美国以一种新的改革理想和希望的总统。我在前几天的报纸上读到日本宫泽首相最近提出了所谓“宫泽主义”，认为日本的关注点，今后应当转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即由过去以北美西欧为重点向东转移。这似乎也意味着日本的内外政策正在进行某种意味深长的调整。

托夫勒：我们现在要谈谈军事上的问题。你知道现在日本宪法中关于它的军事行动还有许多限制。人们现在正在展开热烈的讨论，就是说是否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应该在军事上也有所作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何新：我观察日本的动向，我认为日本人肯定可能正在考虑做出某种战略性的调整。首先就是以参加联合国的军事行动这样的形式，来逐步地修正宪法里对于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约束。我认为肯定有这样的动向。

但是我认为，尽管有这样的动向，或者说有这样的战略考虑，这还并不能变成一种政策现实。还不那么容易！这里面既有来自日本国内的制约条件，也有来自国际上的，包括中国、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甚至也包括俄罗斯的非常强大的制约条件。以至于可以这样说，如果现在的国际关系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日本要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成为军事大国，虽然在主观上他们有愿望，但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

托夫勒：为什么呢？

何新：很简单，如果在目前国际条件下日本人一定要那样做的话，那就可能意味着要打仗。

八

托夫勒：我并不是在暗示说日本已经在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即使在日本的国内，他们的公众舆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日本人民是要和平而不要战争的，他们自己就会形成一种对于战争的限制力量。

但是据我所知，中国目前正在不断地把你们的军事设施和军队进行现代化的装备，而且着重在电子资讯技术方面进行现代化。从作战的角度来看，日本是有很强大的科技力量和电子资讯技术方面的实力的。如果他们决心选择要自己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

何新：从技术上、经济上看是容易的。但从政治上来看，又是不容易的。从国际关系的现实条件来看，在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也必须补充一句话，这一



点我们一开始时就谈过了——目前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政治的结构，正在发生非常重大的全面变化。美国在变，中国在变，俄罗斯在变，亚太地区的整个战略形势也都在变。那么在这种变化后的各种可能性中，其中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日本在未来重新军事化。

托夫勒：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将会有什么反应？

何新：那种局面目前是不好设想的。这里有四个大国的因素，就是中、美、日、俄。可能形成三种组合：中美对抗日俄，中俄对抗日美，以及中日对抗美俄。而从全球的范围考虑，又不排除也许会有中、日、俄联盟对抗美国或美欧联盟的可能性。情况非常复杂，经济政治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目前实在难以预测。

还有一种情况。你在《大未来》那本书中结尾的部分，在预测未来的时候，你曾经谈到了中国将来演变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将被分裂成许多区域性的、独立的小型政治和经济单位，或者说“国家”^①。如果发生这种变局的话，那么日本就一定会得到条件发展成为远东最强有力的军事大国。那时日本甚至有可能与其他西方大国一起，伸进手来控制一部分中国大陆地区。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将克服所面临的许多麻烦和问题，永远不发生这种分裂的局面，而始终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实体矗立在日本的旁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很难得到重新军事化的国际条件。把握远东战略重心之权将在中国。

九

托夫勒：我们现在谈更大一点的范围，把美国也考虑进来。在包括整个美、日、中的大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是非常显著的。但是现在在美国和亚洲，都有人提出在经济上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使得太平洋地区都出现了这种保护主义的现象。

你认为在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下，中国是否可能会被挤压而分散化？如果受到这种压力，你认为会产生什么后果？因为现在这个保护主义还只是一种建议，并没有全部实施。如果一旦实施，您认为会怎么样？

何新：我已说过，就我的观察所及，中国未来发展的确仍面临着很复杂的各种可能性。至于说外部地区的保护主义是不是会使中国分裂那么我想要问您指的是哪

^①见《大未来》中译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438页。

些地区的保护主义？是否主要是指美国市场？是否就是指美国施加贸易压力，要求中国改变政策？也许美国认为在这种政策下，与美国经贸联系较紧密的地区——如东南沿海，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于要求独立出去？对这个问题我还要考虑考虑。

但是在亚太地区目前还有另一种保护主义的呼吁。例如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已经提出要建立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经济共同体。

托夫勒：您刚才说的马哈蒂尔谈到的经济共同体，是否将排除美国？

何新：我看他的方案似乎是准备排除美国的，甚至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保护主义的。所以他的主张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

托夫勒：您认为他的主意好不好？

何新：对中国，那当然比美国市场的保护主义好。但是，我引用他的设想只是说，这也是这个区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中的一种。我个人对亚太将来是否会形成某种经济共同体这个问题目前还在研究，还没有形成肯定的看法。

但是，将来的世界形势的确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世界市场被分割成若干大的区域性的经济共同体。目前能够看到的，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组成了美加墨的自由贸易区。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在1月1日达成了某种合作方案，最近德国有人提出了让欧共体更扩大一些，把东欧包括在内建立大欧洲的设想。在亚太地区，将来也有可能形成某种经济共同体。

现在事实上已经有了好几种不同的设计和方案。比如说和马哈蒂尔的方案相平行的，现在还有关于华人共同体（大中华经济圈），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组成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设想。在韩国和日本方面，也提出了吸纳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州的东北亚共同体的设想。最近东盟的东盟国家，宣布它们已组成了东南亚共同体。在北非，我们看到马格里布贸易区正在筹组当中。

在伊斯兰地区，也有人提出把西亚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组织在一起的方案。在南美，南锥体共同体也在筹组中，等等。总之，这种区域化的跨国市场割据，正在成为21世纪未来世界经济政治中一种极其引人注目的大动向。

由这一趋势看，未来世界不是在走向多极化，也不是一极化，而是会愈来愈分散和混乱。也许是一种无极化。



十

托夫勒：这种区域化的趋势也可能并不会进一步发展下去了。比如说在西欧，欧共体关于统一货币和建立统一银行的事情就受到了公众很大的阻碍。所以这种趋向很难说会顺利进行下去。

不同的地区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和路途，不可能互相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区域未来会变得紧密起来或者分散化。问题在于，比如说中国现在正在争取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因为中国需要美国这样一个大市场。但是如果双方都关闭各自的贸易边界，那么情况你认为会怎样？

何新：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将会导致世界历史发生一个很重大的转折。

托夫勒：那是什么样的转折？

何新：我最近几年一直在从旁观察美国国会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辩论。我感到惊讶的就是，那些议员先生在倡议停止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我看他们对于这个政策所将给世界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连锁变化，似乎估计得很不足。

简单来说，假定美国取消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话，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并不会灭亡，而仍然会寻求自己国家和民族经济的继续生存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迫使中国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和做出一系列反应。这种反应无疑地将使中国周围的国际关系发生变化，又会进一步带来世界全局形势的深刻变化。

托夫勒：您说可能会影响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你可以具体地说一下怎么样影响吗？

何新：假如真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中国在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上，在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上，都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内外政策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些调整必定将会改变世界的形势。

托夫勒：你估计有没有包括对外卖导弹这一类的方案？

何新：我不知道。但我想提示一点，我认为回顾 1949 年以后的世界历史，可以说在一些最重大的方面，正是由于中美关系的转变，而带动了其他一系列世界性的变化的。甚至可以说，中美关系在 1949 年以后，就已成为决定世界历史究竟如何旋转的一个主要轴心。

托夫勒：是的。

何新：如果没有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的话，就不会有苏联后来的崩溃。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也就不会有日本奇迹和所谓亚太四小龙的兴起，等等。

现在这个中美间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也就是将决定世界历史这样旋转或者那样旋转的一个中心问题。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我认为美国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常常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对于中国人，常常过低地估计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求生意志和生存能力。我衷心希望在美国新总统的任期内，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上不要犯这种错误。因为这将是一种悲剧性的错误！

十一

托夫勒：我并不赞同那些常来中国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看法的美国专家们的观点。我并不欣赏很多来自哈佛或者来自麻省的经济学家，在日本、中国到处游说。我也并不特别赞同世界银行的一些做法，我并不热衷于这类事情。

我认为美国确实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同时我也希望中国应该在更深层上了解美国的政治。其实美国人民也不是对美国的政策、国内的政治都具有非常一致的看法。美国人并不是都用同一个声音讲话。他们也并不是总有一个很长远、完整的长期打算。他们只是每天对新出现的事情进行讨论，对不同的压力做出不同的反应。

认为美国人对于整个世界有一个很大的目标的想法，这是错误的。因为美国人即使对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计划，这是一种生物群体，每时每刻在经历着各种变化——它并不朝着只是由少数几个人决定的一个直线方向发展。

何新：（笑）是这样吗？

托夫勒：现在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亚太地区即便在经济上不是世界最重要的地区的话，那么在军事上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沿着中亚哈萨克斯坦到巴基斯坦，到印度、中国，甚至到北朝鲜，这一地带现在到处都分布着核武器。北朝鲜可能正在制造自己的核武器。亚太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区域也是一个被核武器包围的区域。问题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何新：这种情况自然不好。也许将来地球上会出现一种核游击战的局面。

但在目前，我看一些国家尽管有自己的核武器，第一他们不会用来自杀，第二恐怕也不会主动攻击别人。除非是在绝望的情况下，人们不会使用这种武器。假如大国不准备攻击他们，似乎对这种情况目前还不必有特别多的忧虑。

十二

托夫勒：谈话一开始的时候您显得比我悲观，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却好像倒



过来了，我显得比您更悲观一点。您却反而成为一种乐观主义了。

何新：（笑）这也正是我想补充说一下的。

如果世界按照目前的一些趋势继续演化下去的话，我看全球范围将发生无数的大小战乱，进入一个“战国时代”。

甚至局部的核冲突都很可能会发生。在今后的30年内，确实有可能发生。也可以说打核战争的危险现在比冷战时期反而更加现实了。但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地球上会出现这种可悲的情况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生存正在变得比过去更加艰难和昂贵。有些国家越来越难活下去了。所以你看，在这个总的哲学问题上，我还是比你悲观。

托夫勒：（笑）我们现在成了一种竞争——比赛谁更是悲观的。

何新：实际上我看到的世界情况就是，从最近十年来的变化看，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无论是现在的发达国家，也无论是更多的那些贫穷国家，要想活得好，要想活下去，都似乎比过去要更艰难了。这就是我的悲观论的根据。

总之，世界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代，目前正在进入一种结构性的拆除、破碎与震荡的时代。现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还是开始，我就是这样预测未来的。

托夫勒：非常感谢您与我们这样坦率地交谈。我今天收获到了一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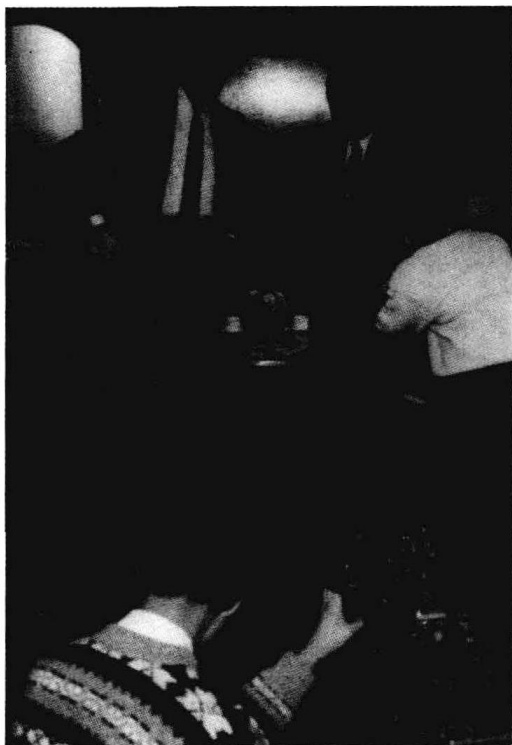
何新：与您交谈是我的荣幸。事实上我们在书本上已经进行过一个长时间的对话了。

托夫勒：但那只是一种方式，我更喜欢现在的方式。希望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继续进行这样的交谈。

何新：那就请您经常到中国来吧！

托夫勒：谢谢！您曾去过古巴吧？我在拍完这个节目之前，在华盛顿曾碰到过一位CIA的官员。这个官员告诉我，他在去年1月去古巴时见到了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问他：“你是不是曾参加过入侵古巴的行动？”那个官员说：“不，



托夫勒与何新（1993）

当时我在台湾呢。但是，正是我把俄国导弹的照片传递给肯尼迪总统的。”

卡斯特罗说：“好吧，这毕竟已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英文中有一种说法，这也可能是从莎士比亚那里继承来的，那就是“时间足以治疗一切”。（Time heals all wounds.）

何新：（笑）是的，对此我与您有同样的理解。

记者：作为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记者，我也有几个小问题，想顺便向何新先生请教。请您谈谈对中日关系的展望。

何新：我看中日关系的前景，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本未来的世界政策。

记者：您对于日中关系未来的发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何新：现在看不准。情况很复杂。

记者：那您对于中美关系呢？

何新：也是如此。不可测的因素很多。

记者：我以前看过您的一篇论文，您谈到过关于日中提携的问题，互相联合。您是不是认为用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中国的军事力量结成一个同盟，可以对抗美国的霸权主义？

何新：在将来的世界形势演变中，这不是不可能出现的局面。

记者：什么样的局面呢？请您更具体说一下。

何新：可以考虑若干种可能性。其中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日本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的内部实现劳务、商品、资金、技术的自由流动，对外则采取某种区域保护主义。接近于现在欧共体和欧共体中的法德轴心。这种情况可以作为对其他地区那种排他的经济共同体——比如北美经济区和欧共体保护主义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以及（西部）亚太地区的一部分国家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制某种外部力量。

记者：您指的外部力量是指哪些国家呢？

何新：我在此无意特指任何一个国家。

记者：那么现在苏联霸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只剩下一个美国了。你是不是针对美国来讲的？

何新：（笑）你们不要借我的嘴，讲你们日本人想讲不敢讲的话。美国将来究竟怎么样选择它的世界地位，现在看还是一个问题。在布什执政的时候，他无疑曾考虑以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核心，发挥美国的世界作用。

但是美国现在是力不从心。巨额债务和双赤字，使美国目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



位处于一种纸老虎的地位。观察克林顿的竞选纲领和他的施政演讲，他虽然反对美国走向孤立主义，但似乎主张把关注国内问题放在他的政治日程上的首要地位。那么，美国在将来会不会继续选择走一国独霸的道路？如果它决心这样干的话，它实际上是不是有这样做的经济能力？情况仍然在变化着，目前看不准。

当然，如果美国仍然决心照一国独霸统治世界的目标干下去，那么，我认为前面就有发生世界战争的危险。不仅在亚太地区会出现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抗衡，就是在欧洲——最近我注意到法国总理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已谈到欧洲联合起来抗衡美国的设想。

记者：以您的观点看，苏联已经解体了，将来中国会不会谋求取代苏联的地位？

何新：没有这种可能。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不会谋求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何新：中国领导人已说过，中国的军事力量，是防御性的。

记者：也就是说，您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何新：对。

记者：您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达不到那个能力？

何新：是在政治上目前并没有这样的目标。

记者：那么您说的日本、中国还有和亚洲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具体联合起来的形式是什么？

何新：我刚才与托夫勒谈到过，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在亚太地区组织区域性合作的蓝图和设想。其中既有中国人提出的，也有日本人提出的、韩国人提出的。

记者：您认为哪一种形式比较合适呢？比如说我看您的文章，是否认为用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中国的军事力量相结合是一种形式？能具体地谈一谈吗？

何新：我不想谈论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

至于亚太区域的合作形式，在托夫勒著作中，曾谈到过关于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他认为工业文明已经终结了。但我看实际上工业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许多国家的工业化——例如中国，还在大规模进行中。这也是我与托夫勒的分歧之一。

那么 21 世纪究竟是什么世纪？我看至少在前半世纪，世界上还有可能会兴起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具体说，如果中国的工业化成功，就将导致一个新的世界工业中心的兴起。

但是，中国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全面的工业化。只有当远东地区潜在的物



接受日本NHK采访（1992）

质资源，包括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物质资源，与日本以及西太平洋沿海地区（即“四小龙”）的资金和技术，还有中国自身巨大的人力储存结合起来，如果这三者终于能找到某种形式结合于一体的话，那么这个在地理上非常开阔广大的区域，就可能成为世界历史中一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新工业文明中心。

这将开辟世界历史中一种巨大的、新的可能性。我过去曾谈论过的“东方的复兴”，就是指这种可能性。

19世纪美国战略家马汉预言了一个海权时代的到来。但是未来的世界战略空间，目前正在由沿海边缘地带向欧亚大陆的纵深区域拓展。决定世界未来的将是陆权时代。由海权向陆权转移的枢纽地带，就是目前西太平洋盆地的周边地带。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写一本书。但我所谈的不是近期10~20年的事情，而可能是决定未来一个世纪的历史内容。（略）

记者：谢谢！谢谢您的回答。

（1993年1月19日 根据录音整理）



何新与宫泽喜一的谈话

时间：1990年10月19日

翻译：陆仲伟

宫泽：何新先生，听说你已经会见了一些日本的学者，很愉快吧？你在北京研究国际问题，像东京这里有很多外国的出版物和杂志，你能读到这些资料吗？

何新：是的，北京也能读到，很丰富。但是自然这里还有一个选择和判断的问题。

宫泽：如果你想了解的话，究竟对哪些问题有兴趣呢？

何新：我非常感谢宫泽先生能够给我请教的机会。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的研究者，我感兴趣的问题很多，但最关心和目前感到最迫切的问题，实际是两个。一个是海湾局势对于未来世界形势将造成的影响。第二个就是今后日中经济关系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在这方面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宫泽：我在今年夏天曾经访问过北京，那时我曾经访问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各位。当时日本正在研究准备要恢复对华的第三批日元贷款。所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江泽民和中国的各位领导人。

我注意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开放的政策，从外面来看，确实取得了成功。当时我所会见的中国领导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开放道路，中国走的改革开放道路并不会是一条坦途，一条平坦的大道，其中肯定会碰到曲折，肯定会有一些上上下下的波折。我当时感到，他们认识到会有这种波折，是很了不起的。

实际上在1988年出现了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我是今年1990年7月份到的北京，而前一年刚刚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因此在当时，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经济方面的改革会不会后退。从最初的改革看，中国主要是走以增产农产品为中心的市场化路线。这条路线，在后几年扩大到农村的工业体系。从现在来看，这一进程是一种平静的转化。但是在改革深入到城市的时候，却似乎遭遇了挫折。那么中国今后如何搞？会不会后退呢？

为此，在我见到李鹏等领导人的时候，曾想就这方面问题，请教一下中国的领导。但是，我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后来江泽民先生跟我讲，中国正在进行经济调整。这个调整阶段，还要进行几年，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所以我认为，他们当时不多讲工业企业的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因为日本要恢复对华贷款，所以我更关心这方面的情况。我认为，中国的调

整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它使中国的经济摆脱了最坏的一个阶段。

当然了，最关键的时期是今后的阶段。我认为在今后这个阶段，到底中央政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这是引人注目的。如果从农产品价格来看，以及煤炭也好，石油也好，你搞了市场改革以后，它们的成本就会不断上升。从我个人来看，中国人较之苏联人和欧洲人，也许更善于灵活地应付这一系列复杂的局面。

那么何新先生对此，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另一个关心的方面就是，中国前几年考虑经济发展、经济特区等，特别抓了一下沿海地区和特区的开发。当然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必然加剧和内陆地区的差别。我想中国领导人也会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今后，沿海地区的经济会如何发展？这也是我所关心的。

在中国一星期，进行对华贷款可行性的调查很快结束了。另外由于海湾事件，中国也在国际上持一个公正立场。我认为世界银行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贷款，也将有所增加和恢复正常。那么，如果这些方面恢复到“八九”事件以前的状况的话，我认为天安门事件所造成的挫折，就可以告一段落。那么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恢复的阶段。

现在日本的商人、日本的企业家，主要担心一个问题，就是邓小平年事已高。

如果是在邓小平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会不会倒退？而从我来讲，我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基本上铺设下了这么一条开放路线。它在农村活跃着，起码是不会倒退的。但问题是，在今后的继续发展中，尺度到底怎么样？这也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因为你刚才提出了关于日中经济关系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在日本的经济学家还不一定有答案。

何新：我了解了。官泽先生十分关心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据我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路线没有后退的可能性。这不仅由于它是邓小平先生所开创和倡导的，而且因为这一路线也使多数中国人民受益。自然，正如您所说的，目前中国进入一个调整的阶段。但调整不是后退，毋宁说是为了更有效的前进。您刚才谈到恢复对华贷款的问题。但是，我想进一步了解的是，中日除了贷款这方面的合作关系以外，中日经济是否还可能以其他的方式进行更广泛的合作？比如说，最近一年来日本有学者提出建立东北亚经济圈的设想。官泽先生是否了解这个设想？具体地说，在这方面，日本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推进中、日、朝、苏在这个方面扩大经济合作



的蓝图呢？

宫泽：你说的这个东北亚经济圈到底指的是哪些范围？

何新：我最近在日本的杂志上看到，野村证券集团的董事长田渊节也先生有个想法。他所指的范围主要是，日本以新宿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中国的东北地区，还包括苏联的西伯利亚，建立经济合作圈。

宫泽：我对苏联的经济前景并没有一个很明朗的估计。相反我认为，现在对苏联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合作。如果按照我个人的尺度来衡量，我对苏联经济的信赖感要远远低于对中国经济的信赖感。虽然说苏联积极要求日本参与对苏联的经济合作，但从我本身来讲，我却没有很大的信赖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如果让我说自己的希望，与其说建立东北亚的大经济圈，还不如说把重点放在中国的东北，也就是过去日本人讲的满洲。如果通过日本和中国的东北进行合作，我认为潜力将是非常大的。现在已经搞了好多项目，比如说在大连，正在搞各种经济合作。

何新：宫泽先生谈的这一看法令我非常感兴趣。但是我还有几个问题不大清楚，想向宫泽先生请教。一个是明年年初，戈尔巴乔夫先生将要访问日本，如果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先生带着某种方案，例如以交还北方四岛换取日本经济合作的方案，向日本提出要求提供资金、技术、贷款各方面的合作的话，日本准备给予积极的合作吗？

宫泽：如果苏联真能这样做的话，当然我们情愿考虑合作。但是实际上，问题恐怕不会很简单。更大的问题在于，第一，对苏联，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确实可行的经济合作项目。第二，苏联的经济体制正在瓦解。总的来讲，苏联的经济给人一种不愉快的预感。比如说，苏联最近在吵嚷所谓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激进过渡，提出了这个方案、那个方案。然而总的印象给人一种很混乱的感觉。所以说，即使日本有合作的意向，但是也找不到对象。这是事实。

何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在东北，刚才宫泽先生谈到对在中国东北建立合作经济区有兴趣。我想中国这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据我了解，也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这里发展了经济加工区以后，工业产品的出路如何呢？是以中国市场为主要销售对象呢？还是部分地准备回销日本呢？还是能够推世界的其他市场呢？

宫泽：你过去曾下放到东北。

何新：是的（笑）。

宫泽：总的来讲很难说。恐怕主要是看项目而异。中国的外汇存底也是比较多的。

何新：在合作项目这个问题上，苏联的西伯利亚不是也有日本很感兴趣的项目吗？比如说他们的天然气，还有石油、森林资源。

宫泽：从开发木材来讲，可能比较简单易行。但是要合作搞天然气或者石油，就不是很简单易行的事了。首先，你要有合作的伙伴呀，这取决于其他许多条件。此外，需要的设施方面的投资也是很大的。成本又如何呢？会不会低于日本对中东油田投资的成本呢？所以我认为，即使资源丰富，一下子能够轻易夺取的项目，恐怕也并不是那么多。

何新：谢谢，宫泽先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海湾事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宫泽：关于海湾事件对日本的经济影响，似乎何新先生也考虑过。如果按照现在的形势，维持半年，对日本经济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当然总体来说，这个海湾事件，对世界各个国家经济都有影响。但是相对来讲，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呢？我想，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从1973年那一场石油危机来讲，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够大的了，但是日本还是挺过来了。而且以此为起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所以这种机制一直到现在仍然能够适应下去。从这一点来讲，日本反而相对具有较之他国更有利的回旋余地。

何新先生到日本来和日本的专家、学者、政治家进行接触，我在这里想对你做一个解释，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以前见过邓小平先生，那当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次交谈中我曾经问邓先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生来讲，邓小平先生确实遭受过很多的风波，几上、几下，但仍然挺过来了。我就问他，您的这个秘诀是什么？记得邓小平先生当时对我说，是他的乐观精神。（笑）我也学会了这种精神。

何新：谢谢宫泽先生。您的话使我获得教益。如果宫泽先生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谈的话，我愿意就我所知，做一点讨论，没有的话，就不打扰宫泽先生了。

宫泽：我的问题很短，就是刚才谈的那个农村经济改革，在中国，它何时将能够转入城市的企业改革？

何新：实际上，探索性的改革早已进行了几年。有一个问题是，在“六·四”以前，



当时影响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一些理论家普遍认为，企业改革的最终方案是变国有制为私有制。现在这一派意见虽然仍然存在，但是，恐怕已经不是主流派了。最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如何协调计划经济和商品市场经济的问题。我想在国家关注的一些重点工业项目中，比如说重工业、能源、化工、交通、铁路等等，这些方面国家的控制将会相对加强。而在满足民需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农产品、农产品加工以及轻纺工业这一方面，商品市场化的成分会有扩大的可能。在整个经济模式的修正上，会认真吸取和总结前几年经济陷入紊乱的教训，同时也将着眼于加强中国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中国经济学家中也有一派意见，非常重视中国和日本今后在经济上的合作。但在这方面，我从这次访问中似乎感觉到，日本学者方面的呼声并不高。甚至对此持冷淡和怀疑态度的人似乎也不少。在这一点上，我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宫泽：但是，扩大日中经济合作与否，并不是由学者来决定的。

何新：在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者的意见对于企业家、对于政府机构，影响力是很大的。

宫泽：在我出任大藏大臣时，我也曾和政府的一些官员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提出，学者对政府的经济决策确实应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是一个自由经济国家，它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上的问题。比方说在恢复日元贷款的问题上，那是由政府决定的。但是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活动方面，那是由企业决定的。也就是说，日元贷款是国家决定的，其他的活动是民间企业自己决定的。所以呢，各个国家情况不同。对华日元贷款现在已经恢复了，我自己为对恢复日元贷款作过努力而感到非常的光荣。

何新：在世界未来的经济政治局势演变中，中日关系如何发展，对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恐怕具有决定意义。

宫泽：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源和交通设施非常落后，这也是影响日中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你们很多地方基本设施很差。

何新：中国现在工业化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缺少资金的问题。

宫泽：你刚才所说的资金是国家还是私人的？

何新：中国国内的发展资金，现在是通过多种渠道来筹集的。

宫泽：从中国来讲呢，借钱必还，这在国际上信誉是很高的。从我们来讲呢，向一些国家提供贷款，是有一定界限的。但是我认为对中国和对拉美国家，应当方针不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重要得多。前一段，当时西方对华的制裁还

没有解除之前，我有一次在美国和当时的世界银行总裁在一块玩高尔夫的时候，谈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说，我们日本想要对中国恢复提供贷款。当时他只能说，恢复就恢复吧。

何新：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是否存有戒心？

宫泽：总的来说，西方对中国的警惕性是比较高的。至于对给予中国借款还是不予借款，如果也要说是一种戒心的话呢，主要恐怕还是担心中国的政治方向会不会发生急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邓小平先生是一位关键的人物。不过总的来讲，“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个思想还是非常恰当的思想。

何新：我理解。

宫泽：谢谢：我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将主导世界的未来。未来20年，可以预期东亚经济将继续以年5%的速度增长，北美的年增长速度为2%，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为3%。到2010年，日本和10个东亚主要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北美。到2015年，我们将超过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总和。希望中国经济也尽快恢复发展的劲头吧。你还很年轻，祝你的研究访问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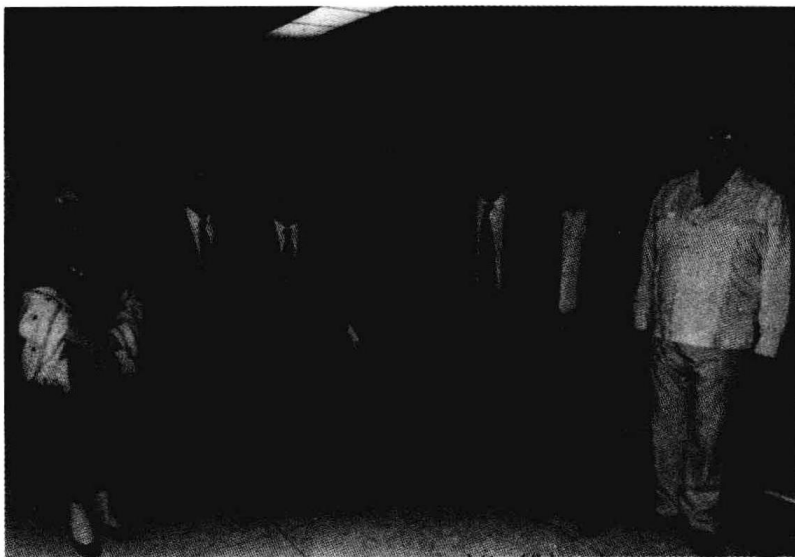
何新：谢谢您！



【附录】

“北京密使”说服卡斯特罗搞改革秘辛

作者：（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唐典伟



与卡斯特罗（1993）

一、漆黑的夜空

1992年3月的一个夜晚，一架载有中国大陆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航班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上空盘旋。机舱里一位学者模样、操纯正北京口音的人一会儿激动地向窗外眺望，一会儿满面狐疑地和他的翻译窃窃私语。“下面是哈瓦那吗？”“没错，正是。”“怎么一片漆黑，跟我当年插队的北大荒差不多？”“灯的确太少了点。”

有“插队”感觉的人不是别人，是北京政府派遣的特使、大陆当时红极一时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战略学家何新，另一位则是他的翻译，外交部译员何瑞鹏。

不过，作为特使，他们此行的任务并非要解决一场外交争端，也不是要鼓动古巴参加什么结盟，而是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说服古巴军事强人卡斯特罗^①进行中国式的经济改革，让古巴摆脱民不聊生、陷入濒临崩溃边缘的命运。

^①原文如此，即卡斯特罗。

当时中国大陆在邓小平主导下实行改革开放，已进入第十三个年头，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而位于加勒比海的古巴当局，内部却还在为是否应该通过改革使古巴摆脱经济困境和国际封锁，没完没了地激辩。

那时正值苏联与东欧变天不久，不仅以前的老大哥不念旧情，撕毁援助合同，撤走数万名军事和技术专家，东欧的前小兄弟也串通一气，修改同古巴的贸易条例，以致卡斯特罗 1990 年一月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里，痛责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里的“同志”一词，已被资产阶级的“先生”、“小姐”取代了。

被老大哥与小兄弟抛弃的古巴，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当时也是乍暖还寒，古巴改革派大将、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兼政府主席罗德里格斯前往北京，专程考察大陆的改革经验。他希望中国政府能派出一位特使同卡斯特罗面谈，介绍中国大陆的改革进展，并让卡斯特罗相信只有改革才会有出路。而当时何新因在经济和国际战略领域不断提出独树一帜的见解，不少建议为北京当局采纳。因此，曾被《纽约时报》称为“邓（小平）的卫道者”的大陆专职全国政协委员何新，就被高层选中作为执行此项特殊任务的使者。



何新访问古巴人民日报报道

二、部长说：萝卜好办，牛肉上哪儿找？

对于年龄在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大陆老百姓来说，古巴这个加勒比海最大岛国，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可能不是两国都有“被先烈鲜血染成”的大红旗，也不是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难兄难弟，而是那甜蜜蜜、香喷喷的古巴糖，还有统



治古巴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强人卡斯特罗数不清的传奇故事，和他天不怕、地不怕，“有种”敢向美国说“不”的惊人的魄力和耐力。

十几岁便会唱当年大陆的流行歌曲“哈瓦那之歌”的何新，对面积 115000 平方公里、人口 946 万的古巴并不陌生。但他出使古巴仍然要面临许多考验，第一个考验当然不是街上的灯光太少，而是那里的饮食，尤其对那里的牛肉吃法深恶痛绝。

何新回忆说，在古巴的日子里，他虽获得特殊礼遇，备有专门厨师，但厨师把牛肉烤得血淋淋的，眼睛瞪着，实难下咽。当着热心的主人，他只好一块一块切下，堆到盘子里，说一会儿吃。最后盘子放满了，再让厨师原封不动地端回去。

几天后，一位细心的部长去看他时，询问是否不喜欢古巴饭菜，他只好如实以告，并趁机建议让他自己来教那位非洲裔女厨师做中国式的牛肉。

女厨师迷惑不解地盯着大眼，看他如何做中式牛肉。他于是透过翻译要她别再烤制，只要先切成小块，然后用白水煮烂，配上白萝卜，加盐和葡萄酒即时可。就这样煮了一下午，到晚上，香味四溢。他与翻译十分陶醉地吃起久违的中式饭菜。

正巧古巴的外交部长和驻中国大使来看他，他马上邀请两人品尝。两人开始还客气一番，终究抵挡不住牛肉的香味，一尝，果然美味了得。他于是好为人师地主动教他们做法，叫他们回家再向夫人露一手。两人津津有味地听了一遍，听后便开始喃喃咕咕。何新见他们面有难色的样子，好奇地问翻译对方在讲什么。翻译回答稍后奉告。

等他们讲完，翻译才跟他说，部长同大使讨论：“萝卜倒是很多，牛肉到哪里去搞？”原来，给特使的牛肉是特供的，连部长家中都吃不到。

这一判断很快得到证实。当时与何新同时抵达的还有由大陆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霖（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率领的一个援助代表团。国务院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告诉何新，早餐每日每人只给两片面包，他们没吃饱想请服务员加一片，对方回说爱莫能助。

何新说，古巴当时的确困难至极。在集中劳动营，老百姓都吃淡蕉，他们称之为“饭蕉”，很短，很涩，但这是他们的主食。

卡斯特罗在 1990 年夏天宣布古巴进入“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以因应苏联和东欧减少和断绝经济援助的困局。农业劳动中不再用电，而代之以畜力和人力，木柴和木炭再次成为燃料。食物供应实行配给制，鸡肉或猪肉每人每九天一磅，鱼则

每两周一磅，面包每天一片，洗澡和洗衣肥皂每月各一块，牛奶则作为一种奢侈品，只能七岁以下儿童和病人才能享用。

由于燃料缺乏，不少地方的邮政系统甚至被信鸽取代，哈瓦那3月13日广场就有一个信鸽邮局，鸽子在那些用大木柱上搭建的鸽子洞里扔下信件，有如现代社会的中世纪文化遗址。

三、不知经济问题症结何在

何新作为北京特使到古巴后，热心的主人每天都由一位政治局成员陪同他到处参观，同时向他显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何新记得，他们带他去参观一个蔬菜种植园，那里不用土种蔬菜，全部都用水泥槽。肥料则是法国进口的营养液，面积大极了。参观以后，对方向印象如何，何新未置可否。

第二天又接着参观，包括军事设施、导弹基地，还有同美军遥遥相望的瞭望塔。末了，由一位古巴政治局委员专门听取何新的参观印象。

在礼貌一番后，何新毫不客气地指出，古巴的经济问题很严重。第一，他看过的番茄基地，从法国进口的营养液很昂贵，而番茄在古巴却卖不了多少钱，这种方法栽培是得不偿失，与其如此不如直接进口番茄。第二，古巴有巨额的财政赤字。这种财政赤字和票券经济导致隐性严重的通货膨胀。

古巴官员否认有通货膨胀。但何新指出，古巴实行高工资，每个老百姓只要干活就给钱，每家每户最不缺的就是钞票，但商品紧缺，购物却需凭配给票，跟中国大陆“文革”时一样，连一件背心、一根针都是要票，买面包都得凭票排大队。这就是隐性的通货膨胀。价格虽没有涨，但如果把黑市的票价折算成钱，加到价格上就是明显的通胀。因此古巴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强供给消除通胀。对方恍然大悟。何新回大陆后，很快就从报上得知，卡斯特罗在议会上讲话宣布了有关消灭财政赤字，平衡预算的决定。那是后话。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古巴当时虽然经济状况那么不好，百姓的精神面貌却不错。每逢傍晚，海滩上总有众多青年男女，用最落后的苏式的留声机播放音乐，跳舞狂欢。

何新说，卡斯特罗的神秘性无处不在，就连会见一位北京政府的特使也是时间一改再改。何新在三天前就被告知卡斯特罗要接见他，两天内不要出门。但第一天足不出户等到晚上12点，才被告知没事，可以就寝。第二天又等一整天，每两个



何新向古巴烈士碑献花（1992）

小时被告知一次继续等待，不要出门。再过两小时说“卡斯特罗同志”正在忙，须再等一会儿，气氛弄得非常紧张、深不可测。

四、卡斯特罗：认同实行中国式改革

他说，苏式变色以后，卡斯特罗出入公开场合异常警惕、小心。从那时起，他每次外出都戒备森严，不仅有两卡车警卫跟从，还有一辆卡车配有一台功率强大的电台，可保证通讯联络畅通，随时可以向全国发号施令。

何新在焦躁不安中进入第三天。到下午4时，他突然被告诉说卡斯特罗正有一个活动，活动完以后就会接见和宴请他。可是这样一等就等到晚上快十点，以致他饿极了不得好几次去吃小饼干。突然，一辆黑色苏式伏尔加车疾驰而至，将他载至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进门后需过好几道关，公事包得留下，还要经过特别检查的门，进入会见大厅，方被告知可以进去。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和繁琐手续的折腾后，卡斯特罗在客人心中的神秘感已层层加码到了极限。见面时膀阔腰圆、身高接近一米七五的何新发现，卡斯特罗比他至少还高半个头。与卡斯特罗拥抱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巨人搂着的小孩子。

卡斯特的绿色军服永远是那样簇新、挺刮，显得质地优良。但在长期与前苏

联结盟，疏远社会主义阵营的另一大国——中国大陆之后，他对大陆的看法却仍停留在十几年前。他固执地认为，古巴驻北京大使说中国现在粮食够吃了，物价便宜，商店里什么都有，这些都是大使编出来骗他的，不可能。因此他在谈话中便变换各种方式来盘问何新，有关上述消息的真实性。



何新在古巴考察经济（1992）

卡斯特罗始终奇怪，几年前还饿肚子的中国怎么会有如此变化。他印象中的中国是经常发洪水，大家都骑脚踏车，什么都同古巴一样实行配给制。何新于是详细告诉他，邓小平上台后，中国到底采取了什么有效措施，才会引起大陆的变化。

那顿令何新终生难忘的晚宴从晚上十时一直吃到次日凌晨四时。北京驻哈瓦那大使后来说，那是非常破例的，卡斯特罗会见外宾很少有那样的情形。

何新在对谈中，不仅坚定了卡斯特罗实行改革的信心，也建议卡斯特罗设法与美国改善关系，不要再那么对峙。但卡斯特罗直斥美国是“恶魔”。这位掌权已达数十年的古巴最高领导人敲着桌子、义愤愤膺地说：“你知道美国人怎么看古巴吗？革命前他们认为古巴就是美国的妓院，休假时到古巴来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现在的古巴已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何新委婉地对他说，古巴的成就的确了不起，但与美国的无限对峙会使古巴所有的机会都难得到，因为古巴不是处在别的地方，而是美国的邻国。卡斯特罗则说，古巴不是没有同美国谈，但谈崩了。何新笑说，寻找不谈崩的办法嘛。

马拉松式的晚宴即将结束时，卡斯特罗邀请何新留在古巴做他的经济顾问。何新思忖了一下，说：“可以。但我就是吃不惯你们的饭菜。”于是商定何新可做他的“客座”经济顾问。

何新在临离开古巴的时候，古巴的一位政治局常委请他带回一个卡斯特的口信给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即古巴已决定实施中国式的改革。同年，卡斯特罗就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放弃不搞市场经济的誓言，要实行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3年以后古巴开始出现悄悄的变化，个体经营重新被允许，私人计程车再现



街头，农村也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私人可以拥有外汇，外资比重也在增加。1995年卡斯特罗在纪念“七·二六革命”的讲话中，更把中国大陆和越南等他以前视为“修正主义”的国家放在一起称赞，称它们是改革开放的榜样。当年底，卡斯特罗第一次访问北京，参观了多个经济特区，回国后即宣布建立几个自由区，让外资享受免税待遇。古巴终于搭上改革开放的最后一班车。

五、赠送名贵礼品

何新回忆说，卡斯特罗这位经常以强硬批评西方、形象冷酷而闻名的一国之君，送礼却非常大方。他在与何新分别时，送给何新一套老鳄鱼皮的公文箱和宽鳄鱼皮皮带，每点花纹都有酒杯那么大，显然都来自老鳄鱼。

还有一本羊皮书，内容是他那篇著名的演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当然著名的古巴雪茄必不可少，古巴的一位重工业部部长对他说：“你要理解卡斯特罗同志送你的这礼物（雪茄）的珍贵，这在国际市场上是二十多美元一枝”。那种雪茄目前在美国已卖到40美元一支。但抽烟成瘾的何新，到现在都没舍得抽它。

其实当时何新作为政府特使访问古巴，还有一个特殊使命。由于那时两国关系



卡斯特罗签名赠书（1992）

尚不热络，在苏联和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夜变色后，北京领导人十分担心古巴是否也会受“骨牌效应”的影响，发生崩溃性的突变，因此认为有必要考察局势是否会稳定，会不会大乱，中国大陆对古巴的援助会否如泥牛入海。

何新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古巴不会乱，绝对控制得住。第二，给他们的援助也很难收回来。第三，援助仍有必要，否则有人会饿死，但援助可记到账上，或者进行易货贸易。后来中国大陆就提出了易货和记账的要求。古巴方面知道何新提出的上述建议后，据说很生气。而中国大陆对古巴的第一个最大的援助项目就是与建一个脚踏车厂，当时因为没有汽油，卡斯特罗亲自提倡放弃小汽车，骑脚踏车通勤，并给每个部长备一辆自行车，还让各家各户在后院种番茄、土豆。

六、卡斯特罗身后难保不出乱子

美国与古巴对峙几十年，外界不解为何美国一直不敢对古巴动武。何新在这个神秘的国度考察了48天后分析说，第一，卡斯特罗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确实高。第二，整个古巴的山全都被挖空了，到处都是堡垒，飞机藏在山洞里，所有汽油都



与卡斯特罗话别（1993）



用于军事用途。美国假若要打，难度可能不比科索伏甚至阿富汗低。古巴军方在展示他们的军事设施时曾自豪地说：“美国人不敢来打我们，因为我们全国都是一个堡垒。”

古巴的情报部门也手段了得，让何新颇长见识。何新当时虽是他们的座上贵宾，也不例外地受到他们监视。一次他同翻译坐在沙发上聊天，忽然听到地板底下嘟噜嘟噜直响。两人纳闷，掀开地毯一看，原来是老式的苏制窃听答录机卡带了，转不动，两人看后忍俊不禁。古巴的情报人员为防他在同卡斯特罗谈话时录音，也早就把他们的录音带偷偷破坏了，结果多亏翻译是一个速记高手，经过特别训练，回旅馆后，几个小时的谈话，他一下就能整理出来，十分准确。

74岁的卡斯特罗目前仍稳坐古巴国务委员主席高位，大权在握。但有关卡斯特罗身体出现问题的传闻不断传出。何新担忧，卡斯特罗一旦逝世，古巴可能会出乱。他现在培养的接班人是他的弟弟劳尔，他的儿子也在军中，当时已官至上校。何新还同卡斯特罗的儿子一同搭乘同一架小飞机从哈瓦那飞去圣地牙哥考察。

自中国大陆政府向古巴派遣特使，近十年过去了。当年力主其事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年11月中以大陆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身份访问古巴，卡斯特罗冒百年不遇的特大龙卷风，两次看望李鹏，并与他长谈，可以想象他对当年北京政府派遣特使的感念。

美国《世界日报》2001年12月16日

《香港商报》2002年3月14日

大陆《海外星云》2002年第4期

【附录】



何新在演讲

重塑中国远古文化^①

(1992.10)

何新口述
孙伟化博士记录

一、历史的追溯

在史学研究中有几个概念常常容易混淆，例如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这两个概念。人类的起源不等于文明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要远远早于文明的起源。人类起源问题，目前仍说法不一。有一种南非起源说，还有西亚起源说。欧洲的学者相信此二种。我倾向于东方起源说。人类可能是距今大约四百万年前，起源于印度和中国的西南部，也就是今天的南亚和东南亚这一地域，有几块古老的化石出现在这里。

然后在距今三百万年左右，在西非和南非也发现了人类化石。关于人种的起源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一根线上分化出来不同颜色的人种，一种认为从一开始各人种就是从不同的起源地独立地发源的，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有优势，现在还难确定。

^①此文原载于《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此次出版，作者有所修订。



所谓 DNA 的测定，也未必可靠。

人类文明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呢？这要看以什么东西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人类一起源，就知道最基本的利用工具的知识，甚至于当原初人类还居住在巢穴里面，已经在使用一些简单的石器工具，使用火，这就是旧石器时代，即原始石器时代。

文明的进步，是以工具和技术为标志的。所谓旧石器，就是当时人类使用的石器非常粗糙，基本上是原始形态上的石制物。但这个时期人类就已经具有了居处、火、熟食等等这样一些具有人类特征的工具技术，而与动物区别开了，这就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萌生。

但是真正意义的文明，是在新石器时代诞生的。欧洲的一些人类学家确定了几个标志，其中重要的一种标志，就是城邑建筑，以庙宇为中心的宗教和政治性大规模建筑。其实人类一直到石器时代的后期，把工具精致化，发明斧头，甚至发明弓箭，都还不算一种新文明，但是车轮却是一大发明。因为圆形车轮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它装在车子上，用来进行远端行动，就使得人类生存的地理空间大大地扩展了。

早期农业文明的起源，现在学术界比较有公认，认为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交界处。那里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那两条河间的河谷地带，历史学家叫“两河流域”，古代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农业从这里起源，不是简单地采集大自然中的果实、植物，而是开始有系统地进行农作物栽培，小麦、大麦就是西亚最早种植的农作品种。三千年前传到中国，所以麦子上古称作“来”。

西亚这地方最早发展了农业，距今大约 1 ~ 2 万年左右。最早的宗教建筑，也出现在西亚，距今大约八千年至九千年，包括埃及的金字塔，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大规模庙宇建筑群，两河流域文明及西亚文明发展的更高形态就是埃及文明。文明由两河地区传播到埃及河谷，在这里出现了许多很辉煌的宗教建筑，包括大金字塔，时间是距今七千年左右。

中国文明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呢？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一些来到中国的法国考古学家，他们首先注意到中国较早的彩陶文明，出现在今天的甘肃、青海地带，而不是出现在中原内地。彩陶文化沿河西走廊向东南分布，由黄河上游到中游。这条线路恰好沿着河西走廊行进，这条路后来叫“丝绸之路”。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有一个自西向东演进的序列。当时有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他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从埃及传播到中国来的。

但是这种论点，后来遭到郭沫若等本土中国学者的坚决反对。但从时间顺序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现在距今一万年以前，而埃及文明出现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在西亚文明当中，除麦作农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畜牧业，大规模的畜牧养殖以及游牧文化，这东西也比中国的起源早。虽然中国本土很早也有猪的畜养，但也不过五千~六千年左右。中国的仰韶文明，包括青海甘肃的彩陶文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年代都是距今五千~六千年左右，时间上恰好形成一个落差。在中国早期的西部文明里，确实有两河流域文明的多种影像，存在某些传播的痕迹。

最重要的是，中国文明中还有一个迄今未解之谜，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青铜文明是突然出现的。因为文明的发展总有规律，是演进的。由石器文明开始，石器时代分旧石器、细石器（又叫中石器），以及新石器，有一种演进顺序。中国本土旧石器遗址很多。但考古学家发现中国细石器遗址的分布有一种规律性。它不是集中在大陆中部、南部或者东部，而主要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内蒙区域。黑龙江流域和内蒙高原这一带细石器遗址发现特别多，而这种细石器分布又和欧洲，特别是西伯利亚一带相关联着，然后又通过西伯利亚大草原和荒漠地带，可以追溯到西亚、两河流域。

有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在远古时期，整个欧亚大陆的这一草原部分，都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而游牧民族对时间不大在乎，可以花几十年的时间带着畜群由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当时草原上也没有国界的分隔。所以牧人们（往往也是猎人们）可以花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四处游走迁徙，成为文明的远距离传播者。

但是也有证据显示，人类不同地区的农业似乎是独立起源的。以四大作物为标志：西亚的麦类农业，东亚、东南亚的稻米农业，中国中西部的粟稷农业，以及南美洲的玉米农业，是独立发明和起源的。

在我们考察远古历史的时候，要避免一个错觉，就是远古时期时间的概念和我们今天大不一样。历史越到后来节奏越快。例如，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才四十多年，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期，文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变化。而现代史，从“五四”到1949年，也才几十年的时间，则又是另一个阶段了。

对现代史来说，10年，100年可以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单位。但古代则不同。中世纪以千年时代为单位。

那么上古史呢？就更加长了，以5000年或万年为时代单位。越往前作为一个时代的划分，时间的幅度就越大。因为无论工具也好，技术也好，文化风俗也好，



越在远古的时期演进越慢。旧石器时代延续几百万年，而新石器时代也是经历了上百万年。

在新石器到人类文明大规模起源时期，金属物的出现被认为是新文明的标志。除了青铜时代，还有一个铁器时期。金属改变了工具的性能，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使得人类生活在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变化。

青铜器是一种很特殊的铜器。青铜很坚硬，但红铜（纯铜）不能用做工具，因为它很柔软。在西亚，首先发明了红铜冶炼和器具制作，然后才有了青铜。红铜即较纯质的铜有时在富铜矿地区能天然地找到，但它的质地太软，没有制作工具的价值。必须要把铜熔化，掺入一些其他金属，锡和铅，才可以使它变成一种硬度较强的金属工具。青铜发明，这是人类技术的一大进步，这不是在自然形态下能够达到的。而由铜到青铜这个发明，需要很长时间的探索和演进。

但在中国文明当中，成熟的青铜文明却是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突然出现的。在河南的殷墟挖掘出了非常进步、非常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大量的铸造器，大量的礼器、兵器。

考古学家挖掘了中国新石器后期的很多遗址，到现在为止很少找到红铜器物。这很奇怪。这是文化上的一个断裂。这种现象的解释，只能是认为青铜器不是古华夏的原创，有人把青铜文明带到了中国。而我们如果向西伯利亚草原、向西亚的考古遗址看去，会看到完整的红铜——青铜发展系列，从红铜到各种各样的青铜遗物。有些地方用红铜做各种各样的装饰物，然后发明了青铜，从粗糙的原始的青铜，到比较高级的工具和武器，存在一个演化的过程。而中国青铜时代却没有这个过程。

所以看起来，中国的文明也有一个传播过程，必定曾同外界有很长的交流过程。

自然形态下的纯铜与金，在上古时代曾被认为是同一种金属，这两种金属的共同点，是其耀目光泽和具有较柔软的可延展性。黄金崇拜起源于西亚。早期人类认为金子是太阳的一部分，是日光的精华、结晶体。“金者，日之华也。”带在身上可以避灾。所以金、铜崇拜是太阳崇拜的延伸。而白银则被认为是月华、霜雪的金属结晶。

二、文化的渊源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启示，那就是对文明的追溯，可以从宗教开始。宗教是什么？其实宗教的起源就是政治的起源。宗教权就是对人类的统治权

和精神控制权。宗教确立了至高无上神对人类的治权。而僧侣就是神的人世代表。最早的王者，其实就是巫师和教父。

考古学家早就注意到，西亚和埃及的宗教，它们有一个核心部分，源自对两大神灵的崇拜。一个神是太阳，一个神是女性神、高母神。实际上从哲学上来解释，对这两个神的崇拜有必然意义。欲与仙，生命与永恒，力量与性爱，这是一切宗教、哲学、艺术的永恒主题。

太阳是宇宙中最引人注意的天体，它的运动带来了昼与夜以及季节的变化。而这种季节变化通过对农作物周期，包括对动物周期的影响，体现出一种规律性。植物春天发芽，秋天就枯萎，形成一个周期。而人类观察太阳的周期，发现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移与植物的自然周期同步。

因此，人类通过因果性的原理解释：太阳周期是大地上季节变化，也之动物、植物生命和变化的原因。太阳是一个主动者，是神，是生命力的永恒之源——所以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们很自然地把太阳设想成一个伟大的神灵。

如果太阳活动发生异常，以至天象有变——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凉的时候不凉，出现季节性的颠倒，地球上就会出现灾异。不仅太阳的运动有周期性，月亮以及恒星天宇的运动，也都呈现着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就是中国古人所谓“道”或“天道”，所谓“天行有常”。

所以太阳运行之道叫“黄道”，月亮运行之道叫“白道”，天宇运行之道叫“青道”或“天道”。

人们还发现，女子的一种生理性运动，也有周期性，这就是月经。观察女性月经这个现象的时候，古人已注意到它和月亮的周期性有关。女性的月经周期是27天左右，而月亮的周期也是约27天左右。在天空当中，太阳有大周期，365天为一个周期。而月亮是小周期，27天半为一周期。

月相产生于虚无（晦），接着出现月牙（新月），月牙逐渐地长大，直到变得又大又圆，然后又向相反方向，逐渐地变小（残月），直到消失，然后又复生（朔）。这一盈一缩，形成月亮的盈缩周期。天文学上测算为27.4天为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同女性的月经周期基本一致。所以，月事叫月经。经者，径也，径是路的意思，就是月亮经行的一周恰好同步于女性生理运动的一个周期。在月经周期期间，第14天也是女人最好的受孕期。第14天也是月亮最圆满的一天。阴阳学说也从这里起源，人们认为在月面达到全阳的时候，是阴阳会合的最佳时候。从天文学上来说也是如此。日月合朔于望日。所以中秋节是古代盛大的民俗节日，所谓“团圆日”，原因



即在于此。

月亮呈现满月的时间是太阳光照月面最足的那一天，人们把太阳的周期运动和月亮的周期运动结合在一起观察的时候，认为这一天是阴阳和谐的日子，阴阳合和的日子。而恰恰就在这样的时期如果进行男女交合的话，最容易受孕，而且生育率高。

所以，人类很容易想象有一个原始的女神（西王母），太阴女神，月亮之神。这个女神主管生殖和生育，这个女神中国人叫做高母之神，又叫做高媒之神，或高唐女神。民间称作“月老”。

早期人类非常关注繁衍的问题。因为原始人的出生率低，死亡率高。人类社会早期都是以血缘联系组成一个个小社团，这种血缘社团的大族长是女性，这种社团称作“氏族”。这个族团内同辈者都是兄弟姐妹。人们互相保护，互相帮助。

起初人类是近亲交配的，后来发明了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但是不管是同姓通婚也好，同姓不通婚也好，同氏族的人总是聚集在一起，就是说有一个共同血缘的纽带把原初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共同的神灵，一是太阴女神，一是太阳神。主管天上的是太阳神，主管人间的是太阴神，这两大神灵构成了人类最早的宗教崇拜的基本内容。

三、西亚南亚是早期文明的主要起源地

人类最早的、系统化的宗教萌芽，大约两万到三万年前已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以及东北亚的西伯利亚。

在距今六千年左右，在南亚出现了非常辉煌的文明，大规模的宗教建筑甚至比西亚还多。

在西亚，埃及的金字塔至今对科学是个谜，它的建筑是由那么巨大的石头，没有任何粘接物，一块一块地严丝合缝地叠起来，经历了近万年的风吹雨打，仍矗立在大沙漠中。当时西亚那些地方还是草原地带，现在的沙漠是由于生态的变异所造成。在远古时期，埃及可以周期地接受尼罗河水的灌溉，养育了一大片绿洲，是非常富裕的地方。

印度文明也是如此，有些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解释不了的。所以就有了外星人来传播早期文明之说。人类今天的科学知识有一个很长的进化过程。但长期内，人类的技术、技艺、科学停滞在原始状态。强大的人工技术体系，实际上只是在最近四百年左右的时间才在欧洲发展起来的。

西亚和南亚所出现的几个大文明中心，很早就具有高度发达的一套早期科学知识，以至于对天文星辰周期能进行非常准确的预测。当时没有电脑，完全通过人类的头脑和手去运算，竟有那么精确的计算，难以解释。有人提出是外星人带来了这种知识。这种说法当然并不被很多人信服，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假设，并没有理由完全否认它。

在印度，有一个千手佛，有一千多只手，还有一千只眼。中国人叫千手观音，实际她是印度梵天神的造型之一。千眼表示无所不见。千手表示无所不能。最早的印度人同伊朗人是同族源的人，伊朗人、印度人与欧洲人也是同一族类的人，都属于白种人。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有一支白色种族叫克罗马农人。克罗马农人的一支向东方迁徙，到达西亚和南亚。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迁移的，带来了哪些东西，现在人们不好确证。但是人们知道，在西亚那个地区的人种是混合的。今天看埃及人，他们有的人很像欧洲人，有的人似乎皮肤偏黑，有的人又似乎像黄种人。

在欧洲的许多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古埃及的雕塑造型，其中有些人非常像中国人。而且埃及的文字与汉字相像，有的在读音上、语意上、字形上近乎一样。比如一些关键字，像“天”字，上帝的“帝”字，这些字都是文化当中的重要字眼，因为它代表着神灵的称呼，而通过比较可以看到这些字的中国甲骨文同埃及文字有所相似。

四、西亚文化与印度文化的融合

印度人同伊朗人是同族的，语言系统上也接近，这一点考古学家已经是公认的了。古代的印度实际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偏白色的；一种是皮肤偏黑的，就是小黑人，个子不高。前者进入印度后成为征服者。这两种人，存在着很严格的宗教、种族和文化的界限，这就形成种姓隔离制度，不同种族之间不许通婚，也不允许有性关系。

白色人种到了印度以后，和当地文明相混合，宗教观念上互相传播。他们在种族上和本土印地人坚决隔离开，但是在宗教上却发生了混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古印度教。

在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满族人进入中原征服汉族人以后，他们在种族上同汉族人相隔离，不许通婚。但在宗教上，他们接受孔子的儒教。孔子在中国古代实际上也是一个神，文化之神，清朝把孔子看作满族人、汉族人的共同圣灵，同样祭祀，顶礼朝拜。

在印度也是如此，白种人外来的神灵同当地的神灵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多神



教的体系。这个多神教体系就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这个婆罗门教。伴随着一个社会制度，把当时的印度人分成了几等：最高的一等人是僧侣等级，也就是婆罗门教神职人员。第二等级是武士等级。第三等级是农民等级。第四等级是工匠。最下一个等级是奴隶，贱民。奴隶就是那些本土的小黑人。在印度的多神教体系里，虽然吸收了许多当地土神信仰，但可以看到，有两个主神至高无上，一个是太阳神（梵天），一个是月亮神即女性神（湿婆）。

五、印度文化与中国早期文化的融合

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历史学家一直认为，中国文明自古以来是自成一体的，是隔离封闭的。中国的神社与宗教观念，上古的文化形态和世界其他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郭沫若等近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不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近似于西亚或者南亚那样的宗教和神灵。

我的《诸神的起源》这本书，出版后发生了轰动，但也受到了正统史学界守旧势力的攻讦。因为我这本书离经叛道，公然提出中国上古也存在类似西亚南亚的太阳神、月亮女神及宗教信仰。在我这本书之前，大陆上古史中很少引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资料和成果相比较，这本书当时是有开拓意义的。当时国内知识分子，提起中国古文化普遍持否定批判态度。而在我这本书之后，发生了研究中国古文化的寻根热潮。

我写《诸神的起源》这本书，实际上就是系统研究中国上古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中出现的太阳神和月亮神。我论证华夏始祖神伏羲就是太阳神。这本书的这种观点，曾经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受到攻击，攻击我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太阳崇拜（这也是郭沫若的权威观点）。

此外传统考古学界也不能接受我的研究方法，即以假说和试错来寻找真相的探索性方法。他们主张只描述材料不建立假说，是一种极僵化呆板的经验主义方法。

但是后来，还是有很多人接受了中国古代有太阳崇拜的观点。据说近年在湖北神农架还发现了远古的《太阳经》。

实际上，中国古代有一个五方神体系，就是认为天和地这个宇宙结构，存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这五个方向上各有一个主神，同时有一个配神。主神与配神是阴阳关系。这五个主神的名字：东方神叫伏羲，南方神叫祝融，西方神叫少昊，北方神叫玄冥。中央之神是黄帝。与此相关还有四灵崇拜——东青龙，南朱雀，西白虎，

北方是龟蛇合体动物——鳄鱼（玄武）。

后来到汉代，今文儒学重建礼教及宗教体系，就不再认为有四个或者五个太阳神，而是认为只有一个昊天上帝。上帝在不同的时期，住在五方不同的宫殿里面。在东方叫东宫，南方叫南宫，西方叫西宫，北方叫北宫。上帝在元旦这一天住在正宫，中央，然后就开始远征，在春天的时候来到了东方，在夏天的时候，来到了南方，在秋天的时候来到了西方，在冬天的时候来到了北方。

这实际是在中原地区观察太阳于四季在天空当中所居位置的变化。这种阴阳五帝学说，就是后来我破译屈原《九歌》十神的宗教依据。

有人认为中国自古无宗教。而我的研究证明，中国古代存在着系统的天文崇拜。而这个天文崇拜又和中国古代的高媒女神，也就是女性神信仰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我这本书出版后不久（1985年），出现了一件轰动考古学界的事件。1986年，在辽宁红山距今八千年左右的一处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一个高媒女神像。还发现了一组较小的女性神像，人们发现这些女神的形态，都是大肚子，裸露乳房，恰好和高媒女性神是一致的。这就确证了中国古代存在女性神的崇拜体系。后来，人们在很多中国古代遗址的发掘物当中，发现了大量对太阳神的崇拜遗迹。所以考古学界现在基本上也接受了中国上古存在太阳神崇拜的说法。

西亚、南亚文明向东方传播有三条路线，其中两条人们早就知道了，一条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也就是“丝绸之路”，这从上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国内陆地区和西亚、欧洲的陆路通道。有人以为丝绸之路是汉代发现的，但实际上这条路的存在远早于汉代。在中国人和西亚人之间，很早就已经有了文明的传播和连接。而张骞打通西域主要是为了建立起政治性的结盟而已。

第二条道路就是通向南亚之路，所谓“茶马古道”。从印度到缅甸，缅甸到云南，云南到四川，进入中国。

此外还有第三条通道，这条通道是北方通道。这是我研究的成果。从哪儿呢？通过西亚，走中亚，就是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进入西伯利亚，然后又有两条分路，一条分路通过宁夏、内蒙、山西进入到中国的黄河中游地区，直到陕西长安。长安是中国古代所说的中原文明的中心、心脏区。

另一条分路，通过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的东北、内蒙、辽宁交界的地区，然后通过辽西走廊进入山海关，到达北京。所以北京自古以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大都邑和军事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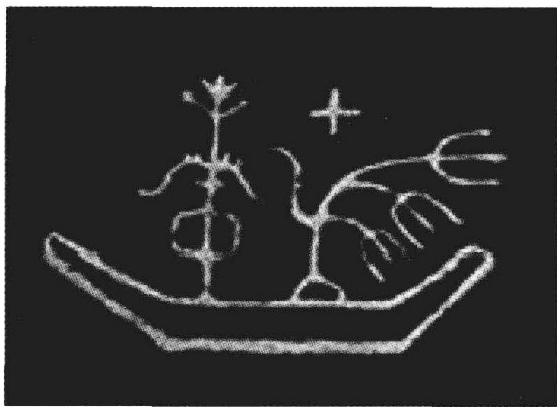


最后，举两个例子结束今天我们的谈话。在四川和两湖地区，常有一种像船的棺材挂在悬崖上。人们不能解释。我给了一个解释，我说只要你们去研究埃及文化就清楚了。埃及人有一个传说，认为人死之后，不是升天，而是顺着一条地下河进入地下之海。这条河叫冥河。那个地下海与地面上的大海相通。古人认为，地下的冥河与天上的银河也是沟通的，整个宇宙的外壳是一个水的体系，大海洋。

你站在海边看海，海水连通在天外，海是蓝色的，天也是蓝色的，人们可能认为天上有一个水晶罩，把海水给盛住了，但有时漏下来就下雨了，雨水就是天水下来了。

古埃及人认为，太阳神每天乘坐一条船，由天河下到东海，升上天，在西海降落，顺着冥（夜）河回到天上。这是一种很素朴自然的宇宙体系，这也就是西亚及埃及人的宇宙观。那么，假如人死后能够找到一条船，把他通过冥河送到天上的话，他就能得到太阳之气（阳气）而能复生了。所以，古人死了的时候，就把死者放在船棺内高高地挂起来。就是想通达天河，把人引渡过去，得到再生。

近年在四川涪陵出土一组 14 枚青铜编钟，系东周时代巴国君侯的祭礼乐器。其中一件淳于上有如下的船形铭文：



这个神秘的图案很有意思，其中包含四大元素：

(1) 十字，(2) 凤鸟，(3) 饰羽鼓，(4) 船

我认为，这个图具有的象征意义正是宇宙天地：

(1) 十字，象征太阳

(2) 凤鸟，象征风神

(3) 饰羽鼓，象征雷神

(4) 船，象征大地（方舟）。

河南、江西有好些大庙，如南岳庙，房顶的正中间有两条龙叼着一个太阳。一般老百姓的住宅，搞不了那么复杂，就用瓦刻出一个圆圈，中间是一个太阳，或者是一个十字。其实十字就是太阳的符号。十字旋转，动态的十字就是（万）字。那个字是代表太阳的旋转。这个符号文字，在古代印度，在中国的古陶器花纹里都有发现，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吉祥符号。其实它就是太阳神的象征。这也是我在《诸神的起源》中提出的。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远古的早期文化中，其实融合了大量来自西亚、南亚和西域的文明因素。

（本文是1992年8月何新的一次学术谈话）

1992年10月整理

【补记】

此文是20年前的旧作。近年关于人类起源最新的理论认为：

第四纪是人类出世并迅速发展时代，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主要阶段：

早期猿人阶段（200万年～175万年前）：能人（*Homo habilis*）在东非坦桑尼亚出现，这可能是早期的直立猿人（*Homo erectus*）；

晚期猿人阶段（100万年前）：直立猿人（*homo erectus*）从非洲扩散到中国、爪哇，最著名的代表是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

早期智人阶段（50万年前）：智人（*Homo sapiens*）在非洲出现并迁移到欧洲。

晚期智人（新人）阶段（25万年～35000年前）：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在非洲南部出现，约5万年前，现代人类分布到中东地区，到35000年前，现代人类分布到达欧洲—克罗麦昂人（*Cro-Magnon*）；

在更新世晚期，大约3万～2万年前，现代人类通过白令陆桥进入北美洲并向南迁移。进入全新世后，现代人的分布到除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并且成为可能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科动物（*hominids*）。

现代的人类源于非洲，之后一支为数不多、结构上现代的人离开了非洲。新的族群自此壮大起来，不知何时这其中的一部分继续外迁，一直不断。就这样这群现代的智人（*moderne Homo sapiens*）一步一步地遍及了世界所有可居之处。前古人即直立人（*Homo erectus*）以及尼安德特人（*Neandertaler*）的消失没有留下混居痕迹，甚至丝毫的遗传标记资讯也未留下。



人类族群史前迁移不只是可从化石物品和考古文物中索取。对今人群落 DNA 的比较得到了某些（迁移）路径和扩散等更为确切的细节。群体遗传学家们已开始利用完整的基因组比较。除了对人类族群间的亲缘关系外，还可以对各地族群的古老程度进行分析，通过 DNA 对照证明遍布世界的相应迁移途径图。



这群向外迁移的非洲人在人类学特征上与我们现代人(modern man), 如体格、行为、脑的大小和语言能力等等已经无异; 他们中的部分随后继续外迁。在漫长的千万年的时间长河中, 他们的后代穿越了整个大陆, 并通过陆桥(当时因为海拔过低而有陆路相通)迁向澳大利亚、欧洲、美洲直至火地群岛(Fueerland)(南美的最南端)。

考古发掘出来的骨化石及其他器具(像标枪头等)只能星星点点地叙述与迁移者们扩散途径和时间先后等相关的情节。从人类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考古发现中很难绘制出一张完美无缺的历史画面来。

现代人(modern man)是源自非洲。新的资料显示那里的人们具有高的遗传多样性, 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基因特征群/基因库(Gen pool)流出非洲, 而遍及世界。在基因树上最古老的枝杈是布须曼人(bushman), 而最年轻的枝杈是南美的印第安人(Indios)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居民(Pacific people)。DNA显示, 南美的印第安人带着它是在大约5.5万年前离开非洲和经亚洲来到美洲的。

诸如今天生活在南美的原住民是源于西伯利亚的“雅库特族”(Yakuten)以及别的一些亚洲族群; “巴斯克族”(Basken)是与“高加索民族”(caucasic people)有着近的亲缘关系; 而中国的“汉族”更确切地讲是应分为“南汉”“北汉”两族; “贝都英族”(Bedouin)的遗传因素是源于欧洲、巴基斯坦和中东。

这些新的结果既与人类学、考古学的发现相吻合, 与语言学 and 生物学相吻合, 也与线粒体和Y-染

色体的资料分析结果相吻合。这就有力地验证了现代人类是源于非洲的假设。

新的分析显示，每一个小的族群部分，包括那些远迁族群的基因组，多样性中或多或少地留有祖先的一部分，即便经过千万年的岁月流逝以及漫长的迁移路线，遗传因素多样性中原源痕迹渐渐稀薄，还是可以很好地对一路下来的扩散跟踪。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美洲的原著民的遗传多样性的变化要较非洲的明显少得多：美洲也是人类最后征服的一块大陆。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像亚洲人或者中国人等已经被更细微的划分所替代。例如，从基因组的研究中证明，南北汉人是两个有明显区分的族群。

下卷

VOLUME III

诗与画





何新旧诗抄

沁园春

三十抒怀

(1979年12月)

少年英俊，满腔豪气，志如朝华。挺身入世界，万般艰难，等闲看作，芥末尘沙。肉骨凡胎，烟熏火炼，是非海中搏浪花。惊回首，竟沧桑岁月，变化腾那。

人生自古多磨，更哪堪多情意婆娑。笑冷月残杯，欢愁醉解。孤帆浪迹，傲骨难压。遍历危机，依然壮志，笑弹人生乱如麻。理不尽，付苍茫往事，流水天涯。

纪念堂

戏改唐人绝句

(1980年5月7日)

“文革”烟销国业虚，
高堂空厝祖龙居。
大事付托徒踌躇，
四人误在错读书。

观看审判“四人帮”电视新闻有感

(1980年11月20日)

反者道之动，势变不由君。
翻作阶下囚，昔曾头上人。
翻手成云雨，覆掌乱乾坤。
十亿苍生惨，域内多冤魂。

行浙东丽水石门涧

(1981年9月10日)

碧水急湍夹岸来，两壁青山相对开。
车行高处云碍眼，路向弯时翠拥怀。
石如卧虎伏深莽，松似游龙拔地栽。
不堪听是艸公号，长歌一曲断肠哀。

游雁荡山

(1981年9月28日)

古道按杖且徐行，清溪鸣笳放耳听。
巨石如斗云托起，曲洞深幽天凿成。
半日云看三千变，终年山着一色青。
问路高崖采药叟，发语惊是七旬翁。

满庭芳

赠女友

(1982年夏)

孤枕梦残，往事千端，月华暗送飞霜。眉间心际，几回动愁肠。人间谁真知己？妄自作多情惆怅。正夜深，寒星万点，寄心事苍茫。

魂伤！犹记否，轻分罗带，暗解香裳。更枕席颠倒，云雨轻狂。燕子楼空人去，余颊上淡淡唇香。难分舍，推倒杯盏，灯火自昏黄。

凤凰台上忆吹箫

赠女友

(1983年10月)

独立危栏，霜风残叶，秋在杨柳梢头。更暮气袭来，残照当楼。惹动一怀思绪，剪不断，霞飞云游。人何似？墙头弱草，急水孤舟。

无言！往事悠悠。看塞鸿飞去，岂我能留？叹世情纸薄，歧路分手。纵有海山盟誓，终不过，几点孤愁。伤心处，一撮烟蒂，半杯浊酒。



沁园春

送女友辞国远游

(1983年12月)

从兹一别，天涯海角，两地魂伤。看一水横陈，风烟寥廓。心高志远，寒暑炎凉。我有愁思，寄托明月，万里人间共此光。白驹逝，笑百年易过，底须惆怅？

当初萍水相逢，竟酿成而今恨满腔。叹长夜煎人，几番难寐。耳鬓厮磨，日短情长。歧路迢迢，大野荆棘，弥望波涛更大荒。愿此去，唯诸事如意，好运频将。

沁园春

自嘲

(1985年作)

学海苍茫，勤搜苦探，浪迹萍踪。叹孤帆来去，单形渺影，水天空阔，大道无穷。蓬岛何乡，琼阁安在？无底无边系缆绳。波涛里，只云烟痕迹，一抹平生。

百年几许光阴，纵遍历恒沙路难平。羨高翔鸥影，超然辽阔，蝇头蜗角，笑他浮名。喜怒由之，行藏在我，一任人间不了情。行去来，更屎（史）中觅道，沙里寻金（精）。

七律二首：湘 魂

纪念毛泽东

(2003-9)

小序

巨星陨落，千古魂悲。岁岁仲秋（毛去世夜乃1976年农历中秋夜），年年圣诞（毛誕生日乃1893年西历圣诞日之夜）。每近斯时，天亦垂霾。采菊登高，难赋哀情。格律不工，聊致长思而已。

之一

祝融飞降芙蓉国^①，力挽天河洗神州。

砥柱擎天摧霸气，狂潮动地灭鬼酋。

^①祝融，太阳神。又乃南岳主神，湖南衡山主峰名祝融，号称南天柱也。

时来天地皆同力，势去英雄不自由^①。
滴水岩下无情水，年年未改向东流。

之二

仲秋此日悲奇豪^②，遗编读毕想风骚。
何妨举世排浊浪，依旧芳泽慰寂寥。
华章焕彩难萧瑟，莽苍烟雨鼓湘涛。
雄图伟业谁得似，万古云霄一羽毛^③。

读《心经》

(2009年)

不增不减如其来，^④亦在亦迁随化开。
浮世徒惊锡杖响，^⑤大千明月照楼台。



何新在书房中

①罗隐诗成句。闻毛泽东晚年每读此句常泪下之。

②1976年9月8日，时当是年阴历8月15中秋。夜深时毛病危旋，谢世。

③借杜甫咏诸葛亮诗成句。

④《心经》：“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来无去相，去无来相。

⑤锡杖，智杖也，梵语“吃弃罗”。东晋《锡林经》：“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皆应受持锡杖。所以者何，过去诸佛。现在诸佛亦执是杖。”“是锡杖者，名为智杖，亦名德杖。彰显圣智，故名智杖。行功德本，故曰德杖。”



【附录】

读何新著作有感（二首）^①

沧海烟客

1991年秋晚

一掌奇风惊海内，半轮红日偃山脊。
谈龙总恨欢情少，说项惟觉路途迷。
长铗归来非无肉，蓬门别去意谁知？
浪迹江湖独稽首，潦塘深处看鸬鹚。

岁寒

置身尘秽难萧瑟，满腹牢骚转犹疑。
思接漠然芳草地，情系霜寒傲雪枝。
事多迁灭随风化，意自顽愚守正持。
深冬夜色书窗里，楮暗灯红析沉泥。

读何新论陈寅恪后记

陈述元^②

绝代才怜绝代才，不妨禅榻近妆台。
枯杨也有生华日，多谢春风费剪裁。

战时绵蕞起昆明，文化西移四海惊。
难得五星东井聚，管教民族志成城。

① 此诗采录于“兴华网何新论坛”。作者署名“沧海烟客”。

② 陈述元，陈寅恪先生弟子，云南民族学院教授。

学贯丘明密尔敦，翩翩浊世一公孙。
袖衣大裙皋比上，绝域殊方语笑温。

剑胆琴心如是柳，残山剩水奈何天。
男儿枉有须髯戟，岂独虞山不值钱。

文史庄谐杂醉醒，今人歌哭古人听。
秦皇坑后汉皇溺，更有燕王十族刑。

请何新先生教正

陈述元

1986年6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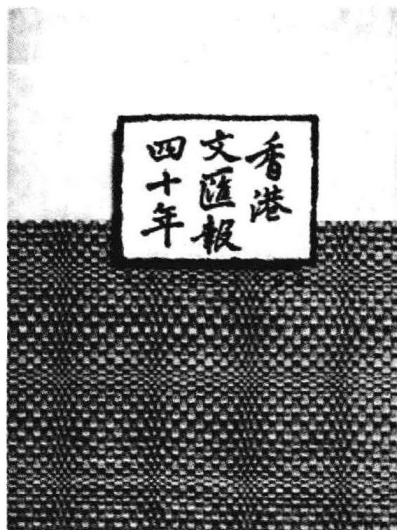


何新画存

1988年香港《文汇报》成立40周年邀请何新作画



何新：晴岚秀色，拟石涛



香港文汇报40周年纪念画册（封面题字：邓小平）

邀请函

何新先生：

今年9月9日为本报在港创刊40周年（1948～1988），为隆重纪念报庆，暨纪念本报中国书画周刊刊出488期，届时举办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展览会，展出年来书画界朋友馈赠本报的书画原作，中国书画周刊介绍的书画家的近作。

素仰台端驰誉中国艺坛，今特敬约书画原作作品一幅，除参与展出外，还将编入报庆纪念画册。对惠赐佳作，致送珍贵纪念品。来件务请于7月上旬惠寄或通知本报派员领受，是所感荷！

此致

敬礼！

香港文汇报社社长 李子诵

1988年6月1日



5. 拟齐白石棕榈小鸡



6. 荷花雏鸭

江兆申论何新绘画^①

何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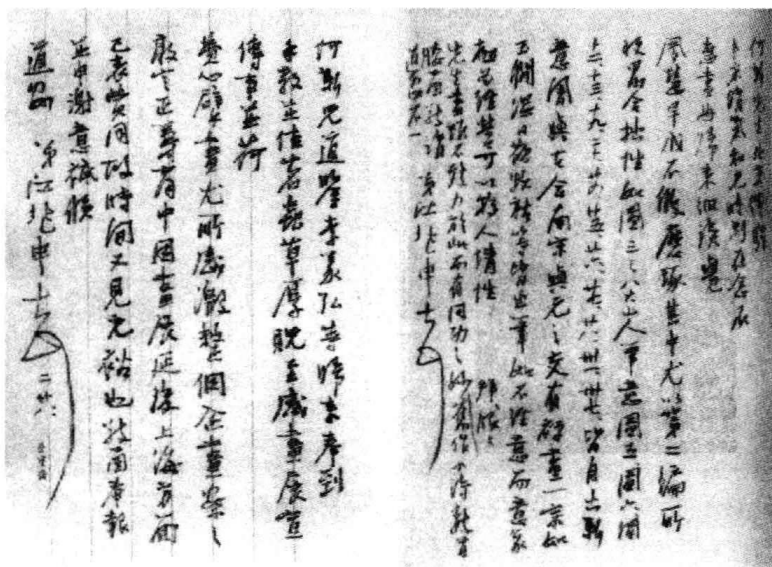
北京得睹丰采，清气和光，时刻在念。

承惠画册，归来细读，夙慧早成，不假磨琢……皆自出新意，暗与古合。

南宋与元之交有禅画一宗，如玉润、温日观、牧溪，皆出笔如不经意，而意匠极为经营，可以移人情性。先生画致力于此，有同功之妙，拜服拜服。

旧作小诗数首，贻二图。敬请道安不一。

弟江兆申 十月五日



江兆申手札（二封）

^① 江兆申，中国台湾画家，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何新画集》1993年香港印。

下卷

VOLUME III

学
术
评
论



【评论】

祝东力：何新一人平衡了整个精英知识界^①

祝东力（博士）

89 风波之后，何新以令人震惊的姿态一跃而出，对这一巨大事件，对民主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战略环境等，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从而以自己的言行与精英知识界割席绝交，斩断了最后一丝关联。

何新在新时期十年里出入于知识界的轨迹颇耐人寻味。

他最初似乎是以一个文学评论者的身份为人们所知的。何新撰写文学评论，也创作小说。他以复苏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刚刚开始流行的异化学说，评介了王蒙的几个短篇新作，在文中控诉“四人帮”的极左政治，呼唤时代的新的生活。

他的小说很有“学术味”。《寻找被遗忘的世界》（1983 年）掺入了自己的若干经历，并似乎预示了日后《诸神的起源》的主题。《蓝色的雪》（1983 年）以高尔泰的厄运为原型，描写“我”和一位被押解的思想犯在严冬的路上的遭遇，塑造了一个高大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

同时，何新还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史。另外，他关注历史理论，对社会发展史中的正统的五阶段论提出了质疑。这样，在新时期最初几年，他已经并非浅泛地涉猎和探索了文史哲诸多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何新几乎参与了新时期知识界的所有思想运动。他的《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人道主义思想》写于 1979 年，发表于 1981 年。此文专门论述青年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高度评价了这部“不朽杰作”。

他的《试论审美的艺术观》（1980 年）从普遍人性论的立场观照艺术，鲜明提出“审美是艺术的根本功能”，表现了唯美倾向。此文援引青年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那段著名论断，在文章中“美学热”的基本主题清晰可见。

他的《艺术系统分析导论》（1985 年）运用“符号语言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的方法研究艺术系统，算得上“方法论年”里的一篇重要文章。

^① 摘自祝东力著《精神之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年版，129—139 页。祝东力，《中国艺术年鉴》主编。

此外，他还以《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和《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两文（均1986年），较早评述了陈寅恪的学术和情怀，以及顾准的地下思想探索。这二人日后在90年代初、中期，在自由主义知识界发生了广泛影响。

80年代中期，何新曾深入于古史、古汉语等领域，陆续发表了一组颇具新意的《文史新考》，同时写作了《诸神的起源》（1986年），探究“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以“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所在”。此书在当时（特别是在专业领域外）颇具反响，毁誉参半。

同期，他还在讲课基础上“整理改写”了《中国文化史新论》（1987年），其“侧重点是指出传统文化中哪些东西阻碍着现代化，需要批判和改革”。

因此，《诸神的起源》和《中国文化史新论》似乎可以代表何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正一反两方面观点，而这两面，即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崇仰与批评，始终贯穿于他在80年代后期的所有论述中。

这样，从新时期初叶的人道主义哲学、“美学热”到新方法论和中西文化比较，在历次思潮中，何新都曾参与其事，以此追踪自己时代的问题。总的来说，在80年代前期，他一直笼罩在当时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斑驳的投影之下，侧身于自由主义的传统之列，除去涉猎领域较他人远为广阔和多样外，在思想观念方面，似乎并未表现出十分鲜明的个性。

1985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何新发表了《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由对徐星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的评价，引发出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整个新潮文学的全面抨击，同时呼唤“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等正面价值。该文反响剧烈，导致了知识界从高尔泰到一批新潮学者的讥评，这里面有误解也有偏见。从此，何新与主流知识界之间出现了裂痕，逐渐拉开距离。

随着80年代后期的展开，裂痕日渐深巨。到1988年，何新发表《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我的困惑与忧虑》，对包括文学、历史、中西文化比较和经济学等在内的全部知识界的新潮理论和激进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同时表达了对“新的巨大民族灾难势将不可避免”的深切预感。也正是从80年代后期，他开始关注中国和世界经济以及国际政治等新的领域。实际上，在当时，时代问题的重心的确

已经越来越转移到这些方面了。缺乏正规高等教育这一环经历，对何新的学术生涯有着明显的正反两面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他常能独往独来，蔑视和



超越学院派的各种清规戒律（从科系分类到思想轨范等），独辟蹊径，发前人所未发。从消极面看，他似乎欠缺那种在学院环境里熏陶濡染而成的严谨扎实作风，立论有时显得草率鲁莽，在细节知识和资料方面有时漫不经心，粗疏错漏现象时有发生。

但总体来看，新时期十年，何新的学术足迹遍及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和国际战略等学科和领域，这在中国当代学界，大概是罕有其匹的。在十年里，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观念和视角逐渐趋向整合。“89事件”则提供了一个契机，在何新那里，一个新的完整的“叙事”体系宣告诞生了。

在“89”之后同各国记者、外交官及经济学家的众多对话中，何新系统地表述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十分陌生的观念和见解。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问题，而是国际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他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他认为，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依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他认为，“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

前述《寻找被遗忘的世界》曾经获奖。在获奖后的一篇创作谈里，何新表示要创作一部以《追求》为总标题的三部曲。可以设想，这部系列长篇小说如果完成的话，将以当代知识界为重要展开背景，以众多的人物群像和繁复的情节展示主人公“追求”的漫长过程。对这部作品的拟议与构想，也许可以解释何新对柯云路类似题材的两部系列长篇《新星》和《夜与昼》的评论兴趣。但是，这部文学作品似乎已消隐在了作者的一系列学术撰述之中，因而最终问世的是一部多卷本理论著作，这就是《东方的复兴》。

在《东方的复兴》中，何新试图集合在不同学科和领域中的一系列个别探索成果，以系统地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传统文明及其价值体系，探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与新世纪背景下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命运。这一总体意图包含四个专题：

1. 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传播进程。
2. 研究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伴随世界市场形成、竞争和危机而同时

兴起的世界霸权斗争。

3. 揭示 20 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不断迁移，以及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现代中国革命。

4. 论述新世纪人类经济、政治、文明一体化的大趋势，以及这一进程所面临的激烈历史冲突，世界重新导向社会主义前途的逻辑必然性。

尽管这些专题有待于多卷本篇幅的论述，但其基本观点、思路和轮廓在他数十万言的对话中均已具备，从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以“东方的复兴”为总题的新的叙事构架。详尽评述这一叙事超出了本书的题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新叙事的落脚点基于历史正义，基于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基于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民主意识形态席卷泛滥的世界潮流面前，何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坦诚直言，这种独具只眼的、孤胆的知识分子个体，即使在中国近代以来也是不多见的。

与他相比照，精英知识界无论在道义方面或学理方面都显得苍白而贫乏。他们私下流传着有关这位论敌的各种来历不明、也无法证实的“佚闻”，种种流言统统指向他的有关“内幕”或“品行”，而对他一系列对话的实质内涵却几乎不置一辞（即使是在私下交谈中）。

实际上，未来的史学家也许断言，当时的何新几乎以一人之力便平衡了整个精英知识界，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一个持续十年的知识分子时代的终结。他之所以有可能成就这一工作，毫无疑问，首先是基于个人学力。由于具备众多学科和专业的知识、理论和视角，从而使他本人几乎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知识界”。

在何新身上，隐约可见知识分子左翼传统的重现。本书第 1 章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传统发端于五四运动，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战烽火直至““文革””运动而抵达巅峰，同时也跌入低谷，陷于绝境。新时期十年，左翼知识分子的阵脚步步后移，在知识界备遭冷遇和嘲笑，但却始终具有转型和释放出巨大潜力的可能性。何新的立场使这一伟大传统的劫后新生在中国大陆初现端倪。

从方法论上看，何新“对现实和历史采用动态发展的观察方法（辩证法），通过经济必然性和利益集团的分野（阶级分析方法），去剖析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和意识形态现象（唯物史观）”。

从学科角度也可以说，他以经济学为轴心，汇聚和概括了政治学、国际关系、



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文化理论和文艺学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门新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地给以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应该说，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在经典作家手中，所缔造和运用的正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活的“社会科学”。

从文体特征看，何新的上述政论仍然延续了某种文学性的形式。一系列对话发生在观点、立场全然对立的人物之间，“声情独具”，音容形貌跃然纸上，令人油然联想到长篇小说中的大段人物对话，或者戏剧作品中的激烈对白。同时，这些对话的内容也不是政治、经济或国际关系领域的纯专业问题，而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

80年代末叶，知识界曾普遍热衷于某些政治谈论（从新权威主义到多党制），何新在“89”之后的对话正是这些谈论的某种延续，尽管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可以说，在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两种普遍的体裁之后，新时期在逼近尾声的时候，还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政论”体裁时期。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思想大于形象、内容超越形式的文体变迁的最后一笔。

回到本书的题旨——“美学”。上一章曾指出，新时期初叶，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介入倾向与超越现实的对人性复归的向往，分别以文学和美学为代表，达到了一种暂时的平衡。

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介入现实的一端持续上升。经过报告文学、中西文化比较和政论，平衡终被打破，抽象的人性复归的理想，逐渐被更为切近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楷模的发展模式和目标所替代与超越。

“中国向何处去”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似乎已压倒了一切。知识界所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迅速滑向社会现实一端。在一片急进变革的狂躁氛围中，人文理论界、知识界再也没有心境和余暇去思考美学问题了。

“美的本质”等问题已完全失去原有分量，甚至显得有几分可笑。可以说，知识界的这种复杂语境直接导致了“美学热”的沉寂。

何新是中国思想界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

祝东力（博士）

1989年之后，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变色。我先是欣喜，继之怅然，终而惶惑。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资本主义，这种单极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在国内，80年代的启蒙主义全面溃败，继“文革”后期革命理想衰退之后，启蒙理想再度滑坡。在理想真空的情况下，恰逢我们这一代人进入或接近而立之年，渐渐以独立的社会身份发出声音。

这代人早年根深蒂固的那种调侃、讽刺、解构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开始登堂入室，乘虚而入地跻身于主流社会并且盛行。北京作家王朔是文学创作界的代表，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与伴随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相结合，在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所谓“后现代主义”。

但是，与此同时，“89”之后还萌现了另一种趋向。在“89”之后的一两年里，何新作为知识界的一个异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年代，何新以国家主义为诉求，刷新了“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

何新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早期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设计者。“89”之后，精英知识界对何新支持政府的立场言行一片谩骂，但几乎无人从学理上认真思考或反驳何新的立论。我开始也未免俗，但渐渐却发现，何新确凿无疑地占有某些事实和逻辑。

通过何新的一系列文章和访谈录，我逐渐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同情的理解。可以说，何新是中国思想界从20世纪80年代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枢纽。^①

从总体看，无论是“革命”，还是否定“革命”的“启蒙”，都并非这一代的原创——早年的“革命”来自晚年毛泽东，随后的“启蒙”则来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思想。因此，在相继经历了“革命”和“启蒙”这两个阶段之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必然会有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原创性的合题。

80年代末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和解体，冷战结束的历史大变局，提供了一个契机。何新（1949年）在1989年之后同各

^①刊于2005年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



国记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理论思考。

何新认为：在当今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民主”并非一个单纯的价值问题，而是国与国战略斗争的一种手段；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农业国以国有制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对抗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模式。

世界经济结构和关系并不合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恰恰倚赖于第三世界的贫穷；从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着眼，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

这些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常识”，但公允地说，它们的确是由何新在“89”之后首先系统论述的。

何新的生平和性格在“红卫兵—知青一代”中颇具代表性。““文革””初期造反、串联，之后到北大荒建设兵团，务农做工，其间流浪、读书、写作并被关押批斗，在思想上也同样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过程。

与众不同的是，何新较早摆脱了“启蒙”路线，又没有简单回到“革命”立场，而是将以往的知识、理论在80年代末的大变局背景下加以综合，在后冷战时代较早地形成了一种新国家主义的论述体系。这是“红卫兵-知青一代”真正原创的成熟理论。

从学科角度看，何新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轴，汇聚和概括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理论和思想史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度地给予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就。

何新的观点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思想界从20世纪80年代向20世纪90年代过渡的枢纽式人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预告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新左派和非主流经济学等思潮。

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世代”，在思想理论层面，也只有经过了八九十年代的过渡，“红卫兵—知青一代”才真正成熟。其原因，除了历史变迁的周期外，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正是他们年届40岁——古代中国所谓“不惑”、古代希腊称为“鼎盛年”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间，他们才开始独立地表述成熟系统的思想，而不再依傍前人，或借助西方。

在思想历程外，性格因素同样重要。何新自述，20世纪80年代与某学者因著述而争议，便写信极尽刻薄挖苦之能事，并夹寄“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仁丹”

为隐语)。另据社科院人员回忆,某学者著文批评何新的“常识性错误”,何遂致函,自称是“业余拳击协会会员”,威胁要“练上一百回合”。这种表现也许比较极端,但相当有代表性。早年在“乱世”中造反、串联、大辩论、大批判以及底层经历所造就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成为他们许多人在思想理论上纵横无忌的人格基础。

也许这不是巧合,中国国势在毛时代曾臻于极盛,同时也面临““文革””所提出的国家机器异化的问题。

后“文革”时代,中国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需要思想理论的艰苦探索,需要颠覆、反叛、改造现有国际国内模式和成规。这一任务,也许不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世代所能胜任的。



房宁：论何新^①

房宁（教授）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自由主义立足于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之上，扮演着哺育新阶级的乳母和代言人的角色；民族主义则以挑战全球化内在逻辑的姿态，对自由主义给予中国未来选择发出强烈质疑；“新左派”承袭世界主流思潮的考问现代性的批判性话语风格，将反思传统社会主义与批评资本主义、西化潮流熔于一炉。每一种思潮都有它的历史渊源与学术背景，彼此间呈现出既有重大分歧又有密切关联的特质。

20世纪90年代伊始，一篇来自海外署名闻迪的长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对20世纪80年代政治精英们的思想倾向提出了全面质疑。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国内的年轻学者何新发表一系列文章，全面批判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闻迪与何新，一外一内，率先在中国的思想界揭开了对20世纪80年代再反思的帷幕，并在20世纪90年代里逐步发展成了中国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识中的一种新的倾向。

在闻迪的来自海外的另类声音发出后不久，一个更强的声音在国内出现了。发出这个声音的是已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以学术观点特立独行而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年轻学者——何新。有人说，此时何新的出现有如在1989年后有些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搅动起一阵旋风。1989年后何新在中国思想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北京大学对学生的一次演讲，从当时的场景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何新给青年们带来的思想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

何新于1990年6月应邀到北京大学对正在进行毕业前教育的1990届毕业生发表演讲。刚刚经历了“八九风波”、陷于苦闷中的北大学生们对1989年以后的所谓教育极其反感，何新的到来似乎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对象与机会。

何新当然也知道北大学生在1989年的经历，知道学生们的情绪，但他事前绝没有想到他将遇到的场面。

事后何新回忆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一次经历。那天，何新一出现，

^① 本文摘自房宁著《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思潮》，发表于《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四辑。《成长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

会场上哄声四起，嘘声一片。有的学生拍座椅、踩地板、鼓倒掌，有的学生大声地嘲笑他，让他滚蛋。

何新在一片混乱、嘈杂声中开始了他的演说。居然，学生们渐渐地安静了下来，相当多的学生被何新的演说吸引住了。当何新讲完的时候，气氛完全转变了，学生们竟然鼓起掌来。

何新的一席话有什么神奇力量，能够感染在场的众多怀有敌意的学生？以下是他当年演讲的内容。

中国的外部环境险恶

何新一开始似乎避开了中国国内的问题，也没有正面讲什么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之类的话，而是讲起了美国。

他说，自己通过研究“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书”，了解了美国对世界和对中国的真实意图：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竞赛方略》中所说的：“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布热津斯基还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冷战的真实涵义，不仅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斗争，说到底是由谁来主宰全球大陆、世界市场，由谁来建立这个世界帝国的斗争”。

在这种战略目标下，美国自诩的“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选择”的“热心”，只能是作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工具和策略，目的是“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何新还谈起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他说：“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所谓‘大一统’是落后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

因为，“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在东亚出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



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联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联将不必要”。

何新发出了警告——“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何新的警告与“球籍”讨论中所忧患的所谓“落后挨打”不同，他讲的危险更直接，即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和改变落后面貌努力的“遏制”，以及为此制造的“理论”、“学术”与舆论，而这些已经在中国流行。

何新将这渗透着当年典型、直白、有些狰狞的“精英”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做了比较。他指出，“精英”们的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的逻辑发展必然导出一种“杀人的理论”。在他们的视野里是没有普通的百姓的，是没有生命价值的；为了他们希望的西方式的制度——据西方人说是“最好的”制度，他们要求在中国拔除一切阻碍他们的东西。

何新说：社会主义“作为现存制度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运”，它不可能像一件衣服，感觉不好就可以换掉。“一种制度是长在社会上每个人的骨肉里的。你硬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到那时，也许中国“当殖民地都没人要”。中国的前途也不可能出现新的生机，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只能是“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值得注意的是，何新这个年轻而且显得不那么正统的学者，在提及他的社会主义观的时候，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平民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闻迪不谋而合。

何新旗帜鲜明地驳斥方励之的观点。方励之以跨国公司、资本都已世界化为依据，认为爱国主义是狭隘的、过时的。何新尖锐地指出：“资本无祖国，利益没有祖国吗？……投资哪儿都可以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诘问学生：“美国好，是你的家吗？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家园，行吗？”

这样的问题，现在看似乎有点多余和好笑，但至少对当时的学生，在他们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上学的四年里，也是一个青年真正长知识、长见识的最为重要的四年，没有人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似乎这不是问题。

何新忧虑地提醒青年人：“在西方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和歧视，是始终存在的”。而“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

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爽！”“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还是如此。想生存就要发愤图强，而要图强只能靠自己。”“如果中国人不想自杀，真的不想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中国人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何新在北京大学“单刀赴会”、“舌战群儒”之后半年，这阵“旋风”刮到了《人民日报》，而此前他是相当民间化的。《人民日报》于1990年12月11日发表了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读者中产生了大面积的、多层次的、长时间的‘轰动效应’”。

在国内，文章发表的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了上千封读者来信，这是编者“办报二十多年没有见到过的现象”，并且其中98%以上的来信是欢迎这篇文章发表的。在海外，香港几家报刊12日便针对该文发出述评；《中国商报》和《统一论坛》认为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学术界出现了“何新热”；国外华人、留学生也有许多人寄信给人民日报社或何新本人表示赞赏该文。

何新在这篇长文中全面展开了自己几年来对中国学术界主流思潮和对当代世界格局的看法。

何新首先说明了自己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他认为，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有两个：

“第一是世界资源有限，发展机会也有限。看来，在世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走向富裕、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对各国都同样宽阔的多行道。第二是目前世界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在这种构造下，世界各国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相反，它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急剧的贫富两级分化。”

从现象上看，发达国家愈来愈富裕，蓝领工人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自70年代后，将其劳务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工业转移运动，却同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现在这个规律（指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工人阶级日趋绝对贫困化）主要不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在非发达世界中，在相当巨大的人口规模上惊人地发生。这一规律之所以在世界经济范围发生作用，显然也是世界经济日益深刻地走向一体化的结果”。

原因之二是：发达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和外债型经济两个手段，使得“近十年来



世界上的资金，并不是由富国流向穷国，而是由穷国流向富国”，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不发达国家尽管实现了工业化却反而比以前更穷的原因和发达国家富裕的源泉所在。

何新说：“在世界市场中，巨额债务正在导致国际间贫富两极剧烈分化，众多不发达国家，甚至包括东欧那样的工业化国家，现在都必须把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偿债”。而对于发达国家，根据凯恩斯的思想——一个社会贫富两极的剧烈分化，将导致多数人消费水平的下降，这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

何新预言：“从现在起，向下看今后 10 ~ 20 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正在遇到其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总体性危机。”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何新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一直在依托于一个世界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上，发展机会对于先进国和落后国，并不是平等的。工业和技术的先进者，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占据了先行的优势，可以居高临下”。“但是数十年来，西方却一直在封锁社会主义，一直在用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办法，隔绝社会主义国家与你们控制下的世界市场的联系”。如果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放在完全同样的生存条件下，即面临同样被锁闭的情况下，“究竟是谁的发展速度快？是哪一种制度能更有效地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的创业史中，人们应该能得出答案。

【附录】《成长的中国》简介

2002 年 5 月出版的房宁新作《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被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主办的“迎接党的十六大百部重点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列为重点推荐书籍。

该书从政治社会化角度，记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发展变化的脉络。该书认为，80 年代青年人的社会意识总体上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的历史道路以及现实选择反思的基础上。在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80 年代中国青年的社会政治意识中充满了对国家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批判；反思与批判是进步的前奏，但是 80 年代主流思想最终走向过度否定，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很快大行其道。否定自我、认同西方的激进的西化主张终于造成对现实政治及政权的冲击。

该书认为，90 年代末我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想有自己的独特背景。民族主义产生于国家、民族生存的边缘。在西方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势和敌视政策的压力下，中国青年意识到只有保护国家、民族，才能保护自己。

《成长的中国》为今天和明天的青年记录了 20 世纪末中国青年心理成长的日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叶慧坚：何新思想与当代世界历史大格局

叶慧坚（浙江财经大学）

一

何新的国际战略思想之所以呈现一种宏大的景观，是因为它映现着当代世界历史的大格局。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何新是中国的弗·李斯特。他是作为后进大国的中国在20世纪晚期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寻求突围和强国之路的一个政治思想代表。

二

何新对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格局有着整体的把握，这确实是首要的。

自肇兴之日起，资本主义就开始有力地重塑世界格局。简而言之，这就是世界的两极分化，和同时进行的一体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世界越来越分化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殖民地。前者剥夺后者，前者的先进以后者的落后为基础，两者相对相成。所谓一体化，就是整个世界日益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组织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这个市场被先进国家所控制，是先进国家控制后进国家的工具。

这个历史过程是浪潮式的层层推进的，同时伴随着激烈的争夺和严重的危机。

这是客观过程，也是先进国家主观推动的过程。关键在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商业、金融、工业技术、意识形态等手段控制世界资源，掌握全球利益分配权。在其中，所谓一体化是指这个控制体系的全球一体化；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在这种权力主导下全球利益的两极分化。

而激烈的争夺，是指各个国家和集团对资源控制权和利益分配权的争夺。在这过程中，争夺的手段和方式不断进化，规模和激烈程度也不断升级。激烈的争夺又必定带来严重的危机，有时候危机是竞争的手段，有时候危机又是竞争的结果。

作为这种争夺的一种具体形式，先进的国家必定要极力遏制后进国家的兴起。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权力的垄断性是厌恶分享者的。但是，由于竞争手段



和方式可以不断进化，所以如果后进国家能创造和运用更先进的竞争方式，那么就可以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超越。英国对德国的遏制，以及德国对英国的超越，就是这种竞争逻辑的一种经典演绎。

三

这种历史逻辑是不断延续的，在何新看来，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质也是后进国家试图摆脱先进国家的控制，掌握和运用自身资源，寻求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新的制度方式。何新认为，苏、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吸收了德、日的国家主义体制的优点，以更新的竞争方式来应对资本主义发展之历史格局。

同样，以美、日、欧为首的先进国家必定要竭力遏制苏、中为代表的新兴后进国家。这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正是基本的“竞争逻辑”问题。无论苏、中怎样变色改制，只要不放弃现代化的目标，不放弃强国的努力和可能，西方国家就会不依不饶地予以压制和围困。

这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历史格局，因为正是这些西方国家塑造和维持着整个世界格局！中国注定是这种格局的抗争者，强国之路必定是一条突围之路。即使在中国要对原有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时代，这种格局依然不变。何新属于最早对此格局有清醒认识的少数之人，他代表了中国的不屈的强国意志对这个格局的一种思想抗争，反压制是何新思想的一种底色。

理所当然，何新自己也是一个思想上的突围者。中国在世界上的境遇与何新在学界的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受到主流国家或人士的孤立和围困，同时也都赢得草根国家或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的必然，中国的境遇正是何新的境遇的原因，这又基于何新是寻求中国强国之路的一个自觉思想者，因此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作为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何新在自己的祖国受到如此的围攻，这也表明那种压制与反压制的历史斗争深化渗透到了何等程度。

但是何新并没有对“竞争逻辑”失去信心，何新深信中国能够创造新的现代化模式，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即新的竞争方式，因而中国能够成功突围。他始终孜孜不倦为中国寻找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

四

20世纪以苏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引领，反抗殖民主义的运动风

起云涌，亚非拉落后国家纷纷赢得政治独立，开始推行国家工业化，旧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这正是20世纪前70多年的历史潮流。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潮流发生了逆转，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面临经济停滞，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逐渐陷入债务经济的陷阱，新殖民主义兴起，美日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重新扩张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体系，重新建立了压制后进国家的战略优势。

在何新看来，先进国家压制后进国家的战略战术和方式方法有了新的进化和提升。

欲擒故纵的欺敌之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心之术，因利乘便、因势利导的诱导之术，成为这套压制战略的核心。这套战略让对手在自以为奔向天堂的喜悦中奔向地狱。在这种战略的推动之下，苏联东欧集团灰飞烟灭，中国也几度岌岌可危。

而何新是最早识破这套战略图谋，并对之进行系统批判的主要学者。何新曾自言以一个人反抗一个世界。但是他又绝非仅代表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种宏大的历史意志，这也正是他自己所揭示的，中华复兴的伟大历史主题！同样也代表那个延续已久的历史格局中必有的反压制的力量，只是何新自觉地以一己之力担当了这种历史角色。因此，何新在此历史格局中才获得了关键地位，堪称一个历史的支点！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新开始与西方新战略斗法，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方位思想辩论。

五

冷战进行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认识到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正面对抗并不能占到绝对优势，于是另辟战场。

1. 西方鼓吹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鼓吹经济全面持久繁荣，政治世界大同，宣扬世界主义，宣称国家和民族观念已经过时。

但是何新认为先进国家压制后进国家的格局不会改变。世界大同并非事实，这种宣传别有企图，这个企图仍然源自那个格局。世界和平的宣传正是先进国家对付后进国家的一种战略工具，目的是麻痹后进国的抗争意志，和平的攻势仍是战争的攻势。

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对世界格局保持清醒认识，保持对敌情的警惕。由



于资源有限,全面持久的繁荣也不可能,危机是时刻存在的,居安思危是必要的。

面对战争和危机,国家和民族仍是个人利益所仅能依靠的利益共同体。只要这个格局不变,对于后进国家而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是永不可抛的精神武装。

2. 西方还做出一副帮助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姿态,它们告诉后进国家,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由其社会制度的先进造成的,而后进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是由其制度的落后的造成的,只要按照西方的指导进行制度变革,后进国家就能很快达到西方一样的富裕和发达。

但是何新首先怀疑西方的善意,他认为西方不可能乐意看到后进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事实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并非真的由于其制度的先进,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依靠一个由其控制的全球市场,能够从其他国家输入大量资源,甚至通过跨国公司和债务链条,还能够直接输入巨额资金。这个原因同样正是后进国家不富裕、不发达的原因,因为大量的资源流失了。

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因遭受西方的市场封锁,面临着发展资源的不足,自然无法如西方一样富裕。而这些正是西方刻意造成的。因此,即使后进国家改变了制度,只要资源条件不改变,也就不可能达到西方的富裕和发达。

西方之所以宣扬这一套不实之论,是要使中国一类后进国家对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从而跟着西方设计的方案进行制度改革,其结果并不是走向一个导致富裕发达的制度,而是走向一个更利于西方进行控制、进行资源榨取的制度,从而是更贫穷和落后的制度。

西方确实富裕,东方确实贫穷,但这是由综合的历史格局造成的,西方把这种现穷富局发挥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战略优势。东方的贫穷实际是西方有意造成的,这正是西方富裕的基础,这是其一。但是西方又把东方的贫穷论证成东方必须按照西方的方案进行制度改革从而达到富裕的理由,这是其二。如果东方不知道其一,却相信其二,那么结果是什么?只能是上当受骗,在奔向富裕的幻觉中,陷入更深的贫穷。

3. 西方把自己扮演成传播和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的道德卫士,它们宣称自由、民主、人权是世界的潮流,是普世价值,是进步的标准。它们高举正义大旗,居高临下指责东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自由、不民主、无人权,是不人道

的罪恶的制度。同时，西方又宣称自由、民主、人权是实现国家富裕和发达的条件，天下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

但何新认为，民主、自由、人权被西方当成了战略利器。首先，没有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只有具体的。西方的较高水平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建立在西方优越的经济、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个基础，那种程度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不可维持的。

即便如此，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控制的，有限度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西方国家的历史也充满着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践踏，即使在现代也绝非一干二净。

何新赞同黑格尔的话：“人权并非天赋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后进国家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强调对有限资源进行集中统一的调配，强调中央权力对经济社会运行过程进行整体的控制，以利于更快的资本积累，形成更强的整体竞争力，这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所必须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同时这种制度中的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对个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限制和压抑，同时，这也是由后进国家相对低下的经济、技术水平造成的，另外还有旧制度旧文化残余造成的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水平确实相对低下，这是事实，但并不能要求一下子提高到西方国家的水平，因为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基础条件，更不能要求绝对的自由、民主、人权，因为这样只会冲垮正常的资源分配和制度运行秩序，造成社会大动乱。而这种动乱正是西方所期待的。

西方国家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局限性为切入点，发动自由、民主、人权攻势，期待以此废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并顺势搞乱、瓦解其国家。

何新谴责西方的伪善，西方一方面指责社会主义专制独裁，一方面又扶持一些专制独裁政府；西方死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权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却只字不提，对于非洲战乱和饥荒造成的人权灾难则漠不关心。

何新认为，民主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西方的民主形式并非唯一的民主形式，中国自古至今自有一套实质民主，同时现代中国实行相当程度的集权主义是必须的。



关于人权，何新认为，人权包括公权和私权，前者属于国家和社会共同体，后者属于私人，在某些情况下，当后者与前者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捍卫的是前者，这是任何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但西方完全无视前者，而一味鼓吹后者，并且用后者攻击前者，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招牌践踏他国主权；何新还认为人权首要的是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为了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国家有权利更有义务对一部分人的政治和思想等权利进行合理限制。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这么做的，并且这也是一国的主权。

总之，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只能由中国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实际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西方没有权利和资格在此问题上充当教师爷，中国也没有义务遵循西方的指示。相反，中国要倍加警惕西方在此问题上的险恶用心。

4. 西方还积极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出谋划策、开方抓药。西方极力推荐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宣称计划经济会导致低效率，导致短缺，应该改用市场经济，放手让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运行，政府应该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宣称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清，无法调动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只有推行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改革，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提升企业效率；宣扬经济全球化、世界主义，宣称国民经济观念过时，国家应该放弃对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的保护。

何新断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付后进工业国的一种战略工具，他对之进行了全面的驳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

何新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效益最大化只是神话，因为它必需四个条件：

第一，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第二，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第三，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第四，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

这四个条件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不能具备的。

在现实的经济中，若放任“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必定造成大量的投

资不良和生产过剩，调节的过程必须付出巨大代价的经济震荡和危机。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和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足，并非完全由双方的制度差异造成，而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能够凭借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攫取巨大利益。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这种地位，反而受到发达资本主义的外部围困。

因此，转换体制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何新认为计划经济是应对短缺的一种手段，而非短缺的原因。何新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并非自由市场体制，而无不是计划控制和市场自动调节相结合的体制。这种体制要求国家积极有力地干预和管理经济运行。

关于国企问题，何新认为国企低效主要是由市场有限造成的，市场有限和资源有限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市场有限造成生产过剩，资源有限造成成本递增、效益递减，因此解决国企低效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扩大市场，不是坚持内需主导，而是扩大出口市场。在不解决市场有限问题的情况下，所谓积极性不高正是生产过剩的表现，单纯改变经营体制和所有制，并不能解决整体效益低下的问题，反而造成大量的失业，危及社会稳定。同时国有企业是中国民族产业的主体，私有化改革将使之瓦解、涣散，最终被国际资本所击败、吞食。

关于全球化，何新认为全球化仍然只是一个神话。少数发达国家所鼓吹的经济全球化，主要集中在要求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仅仅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始终严密封闭自己本国的劳务市场，同时又以各种非关税壁垒保护着自己的商品市场；而只要求全球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自由开放。

这里实际确有一个阴谋，有一种陷阱。它是单方面有利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集团的。在此种全球化中，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的保护，特别要谨慎金融安全，防止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金融突袭。

六

以上简略列举何新与西方战略之辩论要点。实际上，这涉及更深的逻辑。西方实行的一切战略战术仍是要推进其主导的分化、统一世界之进程。而西方对付竞争对手的根本战略正在于自觉取法此进程：分化之、瓦解之，然后按自己的利益体系整合之、统一之。而竞争成败的规则也在于：集中的统一的力量战胜涣散的分化的力量。力量又来自于资源，而资源又是争夺的根本对象。

在此格局中，只有那些能够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源，并且能够有效动员自身



资源，造成集中的统一的力量的竞争实体，才能突破由先发国家控制的格局，首先是保持自身的主体存在（独立自主），进而走向崛起之路。

德、日是奉行较之英法更加集中的国家主义体制实现赶超，美国则一方面奉行国家保护另一方面凭借丰富的国内资源实现后来居上。而对于苏、中而言，起步更晚，起点更低，所以只能选择更加集中和统一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且巨大的国土和人口资源还要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在此体制和资源条件下，苏、中崛起为第三代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同时也必然成为先发工业国所要打压的主要对象，而这一点又加强了其集中化。

可见，越是后起的国家，要在竞争中胜出，越需要高度的集中化。不可否认，苏、中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确实是高度集中化的体制，并且也因此取得了高速工业化的历史性成就，但恰恰是在这快速取得的成就面前，高度集中化本身遇到了困难，实际上是它无法适应它自己的成就，因为它的成就已经大大改善当初使它成为必要的那种基础和条件。在此新的基础和条件上，原先的集中化就成为僵化和沉闷了。

在此意义上，改革成为了必要，应该适当地降低集中化，以发挥部分及个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体制的活力。但是也恰恰在此时，改革容易走向过度地取消集中化，改革的失误无不集中于此。

实际上，适度的集中化仍是苏、中的立国之本、强国之道，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这是改革必须保持而不能废除的，这是由最宏观的资源竞争大格局决定的。

西方对付苏、中的战略同样是：分化之、瓦解之，然后按自己的利益体系整合之、统一之，从而将战略对手化为自己的资源。这战略的箭头正是对准了苏、中体制的集中化！西方必欲取消苏、中的集中化而后快，其误导苏、中改革的也正在于此。

在政治文化方面，自由、民主、人权、世界主义等等是对准苏、中的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集中统一的政治文化意志，以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两方面瓦解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开放化等等就是对准苏、中的计划化、国有化的集中化的经济体制。显而易见，这些战略工具都是瓦解性的！

西方战略特别要对准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权，因为，实际上政府是造成政治经济文化集中化的把手！废除了这种控制和管理权，也就废除了一

国的集中化，从而可以从容插手，施行分化和瓦解术。

而何新的反击也正好针锋相对，他明白揭露西方的分化瓦解战略意图，并激烈反对之。他提出新国家主义，试图将在西方战略冲击下日趋涣散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重新整合和统一。

新国家主义特别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和管理，集中全国的意志、资源和力量，维持中国的主体存在和统一，进而实现崛起。根本上，何新的努力正在于维护中国必要的集中化，保持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过度取消集中化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误所在。

何新提出新社会主义是对国内弱肉强食、两极分化的非人道的资本主义进程的反动，实际上是新国家主义的一种深化，后者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反抗同样的分化、统一进程。共同的意志都是反抗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统一）。

在何新自己看来，这都是一种历史正义。而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历史进程尽管来势滚滚，但并非历史正义。历史必须有另一种方向，这又是一个更为深远的主题。

七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与苏联、东欧不同的成果，是因为中国人关于世界格局有一种不同的思想。因为有这种思想，西方的分化瓦解战略没有能够轻易得逞。二十多年来，何新担当了与这种西方战略进行顽强抗争的重要角色。说他曾是一个历史的支点，这并非虚夸，而是公平之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平被沉埋得太久了！今日，那些曾经光鲜无比的肆意围攻何新的主流们已经黯然失色，这正是对何新之光辉的最好映衬。



何新的史学研究

景戎华^①

何新为当代中国著名的政论家、国际战略评论家，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然而就其三十余年治学经历以及治学的旨归而言，我以为何新先生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其研究领域博涉上古史、先秦史、秦汉史、宋史、明清史、近现代史、世界史、学术思想史、比较文化史、人口史、农民战争史、史学理论、史科学、语言学史等诸多史学领域。

近二十年来，其论著对于当代中国史坛及史学理论所带来的冲击、震撼、影响之重大深远，绝无仅有。其用力之勤，考索之深，成果之宏富为一般研究者所不可企及。其研究视野宏观至宏大，微观至精微。最初发轫于历史哲学，由博返约，终结硕果于史学、经学。

然而，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思想深邃的杰出史论家，早年却曾经被逐出当代史学之“教门”。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将其史学研究的一些重大成果结集出版，奉献给当代史坛。其功过是非，自可留待后人去评说！

一

历史学、历史研究是干什么的？即史学研究的功能是什么？说来是老生常谈，但真正弄明白其实质含义又谈何容易。

何新开宗明义，强调历史学与国民意识直接相关，历史学从属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认为历史学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历史形象，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何新以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为例，指出日本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学教科书的编纂工作，而不顾周边邻国的抗议与反对，始终对其国民隐瞒、篡改历史上侵华、侵朝的历史真相，就是为了塑造日本的国民意识。

为了塑造民族意识、国民意识，首先应当统一对民族历史的认知，此为国民意识的最基础的层面，其次才是新闻媒体的传播，再其次才是大学的讲坛、讲义和史学研究。正是从这一立国之本的政治学视角观察历史学，何新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死人的历史是要由现实中活着的人去诠释的。而活人眼睛里的历史，是受活人的视角、方法论、经济利益、政治信仰制约的。同

^①作者曾任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及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元史学会会员，中国林业史学会理事，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员。

一历史人物、同一历史事件，出于不同观察者，在研究中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历史学想要完全摆脱政治的束缚只能是史学家们的一厢情愿，几乎是不可能的。何新以陈寅恪为例，指出：陈氏一再标榜他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绝口不谈革命，既不从蒋也不从毛，但讲隋唐制度渊源，却仍不能不从阶级（门阀）利益集团去分析，实质上仍受影响于马克思所代表的阶级分析思想。

毛泽东为什么重视历史？何新说，除了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运用于当代的大政治智慧之外，毛泽东也是从历史学塑造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国民意识的宽阔视野角度来观察、分析历史的。毛泽东善于从中寻找、发现治国韬略，御国之术。所以，一个国家成熟的领导集体总是非常重视历史学意识形态构建的。

何新指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对其本国历史、本民族文化不容亵渎的重视，远超过一般中国人之想象。

何新在《思考》第一卷中曾深刻论述：

“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这一认识，已经超越了史学研究范围，超越了学术价值。而着眼于重建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形态。”

事实上，自80年代后期以来，因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解，东欧国家社会结构的突变，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变革潮流，对人们心灵带来的冲击和震荡，造成的信仰危机是极其重大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已成为当代关乎民族存亡，国家根本的大问题。因此，何新说：“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

如何摆脱这一危机呢？

何新说，必由出路就是，对全民族进行爱国意识和国家利益意识为本的历史教化，以重构中国历史及政治意识形态。何新呼吁我们的史学家要关注史学研究的这一重大责任，肩负起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召唤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

诠释历史当然就是为了重新诠释现实。诚如何新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

在专门史的研究领域，何新也有诸多前人未发现的重大创见：

1. 早在80年代之初，何新即以惊人之胆识，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否



定了斯大林的五阶段的历史公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公式。他指出，这个公式既不符合马克思本意，又不合中国历史之实际。由于此文，一扫群庸之见，惊世骇俗，株守五形态说的老先生们如丧考妣，竟然不惜采取组织手段，1983年何新被逐出了史学研究的教门。

但现在回头看，只有打破这个公式的束缚，才能使人们理解到，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市场经济性质的改革，并非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逆转和历史倒退；从而才能摆脱左的意识形态对于80年代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束缚。

2.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何新在上海的一次文化史演讲中，开“文化热”研究先河，引领一时潮流，提出许多论点，对思想解放、文化启蒙导夫先路。何新此时更多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封闭性的负面影响。

其中一些著名观点被“河殤”在解说词中大肆抄袭和肢解（如关于著名的长城、四合院与封闭文化心理之关系）。但他们有意漠视何新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亦具开放性的论述，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会发生全面复兴的预言和展望，而构拟了一种中国文化悲观论和否定论的伪史体系。为此，何新又撰文对他们进行了尖锐透彻的批评（见本书《论“河殤”》一文）。

3. 何新是“陈寅恪热”、“顾准热”最早的始发动者。早在80年代初，当陈寅恪、顾准名字尚不为学界多数特别是中青年一代所知时，何新即在《读书》杂志撰文，阐述了“陈学”与乾嘉朴学的渊源及“陈学”的价值，并以之与西方现代语言阐释学进行了比较。

他最早著文评论顾准的史著，着重探讨了顾准史学方法论的政治涵义，使本来沉寂的两位大师死而复生，从而引发了后来史学界的研究的“顾准热”与“陈寅恪热”。

4. 文集中《论康谭》一文，气势恢宏，排山倒海。其中对谭嗣同本人与佛学关系的分析超越前人。文中认为谭嗣同之所以能为变法舍生取义，其献身精神导源于佛学的宗教力量。

80年代，何新正值盛年，该时期文章多一气呵成，哲思缜密，锐不可当，有一股不可征服的逻辑力量。

5. 何新在考古学方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建立一门“考古神话学”。他认为，远古神话不同于晚近的文人自由想象的文学创作。神话就是远古的历史，神话具有现实主义的基础。神话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其隐藏在荒谬神异的表层符号背后的文化和历史真实涵义。

他在《诸神的起源》中提出中国上古存在太阳神崇拜系统。认为这种太阳

崇拜的基础是远古的历法学。这种怪论，引起了一时轩然大波。遭到《历史研究》、《中国语文》等权威杂志的严辞批判。但现在此论在考古学中几乎已成共识。

何新长于运用多学科的综合考证方法，揭示传说中的龙、凤都不是神话式想象综合创造的神异怪物，而是具有真实生物原型的鳄鱼和鸵鸟。他考证楚帛书，指出这是古中国一部关于宇宙起源的开天辟地神话。何新对《易经》、《老子》、《楚辞》的研究均独辟蹊径。他的许多新说初提出时常被学界所惊异而反对，但后来却常常被广泛剽用而流行。

6. 自1983年后，何新多年来一直沉浸在乾嘉朴学及黄侃、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中，下了苦功，并撰写了大量读书笔记。近几年间，何新沉潜上海竹园，完成了对《周易》、《老子》、《尚书》等十几部古籍的重新整理与注释。他发明的许多新义给人石破天惊、凿开混沌之感。《何新古经新解》等系列新著，正是在这些学术札记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研究完成的。

在即将出版的《尚书》研究中，何新批评了以《尚书》研究而享名于史林的顾颉刚先生，何新认为顾颉刚不懂朴学，所以他没有真正弄懂《尚书》真义。何新对“古史辨”派的疑古理论甚为鄙薄。反之他对孙诒让等清儒的研究评价很高，认为清代朴学的重大成果，至今仍被忽视。

何新在本书关于《尚书》的评论中指出，《尚书》浓缩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中的传统政治道德基石的核心价值。长期以来，不为现代史学所重视所理解，甚至目之为“伪书”。以至今人多认为商周时代政治不成熟，以近乎半“野蛮时代”和“巫史文化”的说法诬蔑之，这都是因为根本没有读懂《尚书》。

7. 何新认为，我们对中国古代史有必要给予全面之重新审视。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不是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动力，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力量。中国历史并不是农民起义与皇权更替的交互循环。而一些农民起义与民间蒙昧邪教有关，反而是历史中的破坏性力量。

8. 何新近年来全神贯注于战国秦汉间历史之研究。朝夕披览《史记》、《左传》、两“国”（《国语》及《战国策》）、《汉书》。年初他曾要我准备一批材料拟编纂一个《汉武帝年表》。我两周内主要据《资治通鉴》匆匆草就万言约十纸赴命，缺憾甚多。未想到其后何新竟充实以大量史料，乃成本书中50页约十万言之力作。于表中撰写大量批注，往往发前人所未发。其阐述建元新政、汉初儒道斗争之政治背景，以及认为《淮南子》是一部谋政变之书，董仲舒“天人论”具制约君权涵义等；都为前人所未言，可谓发千古之覆。

9. 何新热衷于朴学、语言训诂学之研究，每发现一个字的新解，其兴奋之意，溢于言表。我每次与之接谈此印象颇深。近年何新闭门读书，工作时间表安排



甚紧，阶段性目标绝不延误，数月不见，必有新作。其治学精神令人感佩！

以何新之才名及其人之实力，本来早可以悠哉游哉地过一种休闲隐居的生活。然而何新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曾对我说，天若假我时年，我要对《诗经》、及古“礼学”给予全新的解释。

三

何新尝言，当代史坛，是用独断论、传统的陈旧思维方式研究社会科学的最后的、最顽固的一个堡垒。其根源一是20世纪初之“疑古”学派，二是独断论即阶级斗争决定论的一元史观。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亦曾经说过，以阶级斗争论研究历史，并不是百花齐放，只能是一花独放。又说20世纪现代史学只有“五朵金花”。所谓“五朵金花”即农民战争史、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清官问题等五个专题的讨论。当代中国史学论坛，曾经以这样五个话题讨论为学术时尚，竞相驰驱，而其方法多为片面绝对主义之“独断论”。而其结论至今仍渗透在中小学课本中，大学入学考试的试题中，甚至研究生的教学中。这种看法反映了老一辈史家对20世纪旧史观的反思和觉醒。而何新则是率先突破了这种旧史观和方法的思想前锋。

因史学研究的自身特点，一些旧式史学家虽不悟乾嘉学术真精神却割捨斯斯细节于家学门户之见。提出“你不读遍某一中国断代史的全部史料，你便没有资格撰写该断代史论”。这里我们暂且将这些“大师”自己是否真的像毛泽东那样认真读完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或者像邓广铭先生、漆侠先生真正通读了宋史的全部史料搁置不论。这一要求，形成限制研究资格的森严门户之论。于是有人倡导皓首穷经，“板凳要坐十年冷”，以之作为史学研究者治学的座右铭。年龄、家法成为了治史的必要“资质”。

在这种不成文家法下，各个断代史，都塑造了某些所谓权威。而唯“权威”马首是瞻乃成史界之风尚。于是历史学师承有自，传承有绪，其学说，其学风于是形成一脉相承即近亲繁衍的特点，不仅形成森严的门户戒律，更生出许多伪学之怪胎。此其为史学顽固性之表征也。

因此，在中国史坛立足，没有“十年媳妇熬成婆”的忍耐力与决心，是断断乎不可能的。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史坛蛇行龟步，陈陈故态的症节所在。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中国史坛为什么“大师”如此之多，而学术面貌则一直陈陈相袭的原因。

何新自80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及其成果足以表明，他是敢于突破这种种清

规戒律和门户樊篱的孙悟空。

刘知几论史家认为必须兼具德、才、识。何新认为，“史德”就是必须高扬民族文化和国家利益。至于他的才和识，则久为学坛所共见，何须我在此赘言？不具备一种过人之胆、过人之学、过人之识，便难以解释，何新何以能在艰难的治学环境下，冲破层层阻力，最后终于攻克了顽固的史学之“堡垒”，从而做出了一系列惊人的成就与发现。

四

何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及部分结论，仍然会遭到传统史学某些恪守门户者的责难与非议。以何新的才智毕力于某一断代史研究，一定会做出无与伦比的成就，但那样一来就不是何新了。

何新并非不注重史料学。这一点我们从本书之《屈原年表》与《汉武帝年表》可窥其大端。其目光之宏大广博为一般史家所难以比侔。何新并不是以“六经”注我的主观之徒。但也不是我注“六经”的章句腐儒。他以精湛的微观研究为基础，所寻求的是达观与汇通。

何新的史识是他史学研究最闪光的地方。在近现代史家中，能如他那样打通哲学、宗教（佛）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甚至古生物学及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统一作壁上观，遂令万法贯一，宇宙会于一心者是罕有其俦的。余编撰此书后谨赞之曰：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万法汇于无量法，通识结晶菩提心。

一代文章两司马，贾生奇谋著《新书》。每于变法多推动，功成身退是醇儒。

读毕此书，相信凡不持偏见者皆不会不叹服其广博于深刻。何新何新，斯人斯言何其新也！诚一代良史、一代奇才也！

2002年 6月 18日于北京

[作者附识]

此文写于9年前，所论已不能涵盖近十年来何新的史学，经学研究的新面貌。十六卷《古经新解》的发表，使何新晋身于继闻一多、郭沫若、黄侃、杨树达之后的又一新时代史学大家，笔者拟专著论述，谨此附言。

2011年6月6日



20年论战：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歧

倪阳（安徽滁州学院副院长、教授）

叶慧坚（浙江财经大学）

近来较为系统地阅读了何新先生的整套经济学论著，感触良多。何新先生从1987年开始在《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经济问题评论，曾经强烈抨击1988年主张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反对实施通货膨胀政策。

1993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的白皮书《何新政治经济论集》，开始系统形成何新独特的一套政治经济学理念，并从而与吴敬琏、厉以宁、张五常等所鼓吹的按照美国企业模式和市场制度为样本，克隆复制中国市场经济——即所谓的“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展开了激烈论战，于今持续已经二十余年。

以下做几点简略总结，兼谈自己的理解。本人虽然是经济学专业毕业，但才低学浅，表述肯定有不完整和不准确的地方，仅仅作为抛砖之论，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

一、危机源于生产能力过剩

1988～1989年中国经济发生所谓“过热”，物价飞涨引起社会不满，成为不久发生政治危机的导因。早在1988年，何新即在《经济学周报》发表文论，指出经济政策发生失误。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何新与日本经济学家的对话，何新首次系统发表自己对于经济形势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由此展开了他与新自由主义市场派长达二十余年的理论论战。

1988～1991年，中国经历着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物价飞涨，企业发生三角债，银行贷款无法回收。起初，何新也与主流一样认为危机的根源是货币超量发行，造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但是后来经过对经济数据的调查和重新研究思考，何新改变了看法，认为这次危机是一次古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

生产过剩的表现就是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商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导致企业生产资金无法回收，银行贷款无法归还，由此发生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所谓“三角债”。过去这种情况被主流推诿给所谓产品结构问题。何新指出，这不是什么结构问题，而是投资误判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何新指出：由于需求不足，使得产品不能在合理的时间以合理的价格销售出去，库存增加，企业就无法收回生产资金。由此而造成资金不足，造成支付困难，形成“三角债”。同时企业也没有钱向银行及时归还贷款，形成呆账烂账。问题的上半部分是流通危机，下半部分是金融危机。何新曾经幽默地说：由流通危

机到金融危机，这就是一次完整的古典形态的生产过剩危机。

何新提出的生产过剩理论，使得当时的主流经济理论界一片哗然，因为主流经济学界迷信西方经济学的洋教条——萨缪尔森说过：生产过剩是一个过时的术语，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直流行匈牙利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匈牙利一样是短缺经济，总是发生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何新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这当然不仅仅是理论观点的不同，也意味着应对政策的全然相反。

如果危机的根源是生产过剩，则应该设法尽快倾销过剩产品，削减库存，从而换回流动资金。就应当少进口，刺激出口，为过剩产品开辟国际市场。同时还要压缩过剩的生产部门，刺激消费，扩展有效需求。

在银行的金融政策方面，应该降低利率，释放储蓄，从而鼓励消费，等等。

反之，如果认为危机的根源是短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则应该抑制总需求，提高利率，将消费资金关进银行，减少产品出口，扩大进口，等等。

在何新的建言下，1991年以后国务院逐步采纳了根据抑制生产过剩思路而制订的新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

1. 国务院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放弃了供不应求也就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流行教条；

2. 银行多次降低存贷利率，释放消费与投资的资金；

3. 实行放长假制度，压缩市场，鼓励节假日消费；

4. 明确提出“限产压库”；

5. 实行出口退税，实施鼓励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政策。

这些重大政策，都是基于中国经济存在生产过剩的思路提出的。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重大政策，中国迅速地在20世纪90年代初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度引发了政治动乱的严重经济危机。

而对于经济危机的多方面研究，奠定了何新经济思想的基础。何新断言：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与历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都是经典式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是一种新的大胆判断——因为按照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根本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危机，更不会发生什么生产过剩。

二、市场也是资源，市场空间是有限的

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深入研究，何新认为经济现象背后存在着普遍性的基本规律。何新认为市场经济规律可以概括为四条基本规律：



1. 市场有限性规律；
2. 投资效益递减规律；
3. 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4. 经济运动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波动性规律。

其中最根本的是第一条市场有限性规律。何新说，这条规律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不亚于万有引力定律对于物理学的重要性。

何新提炼出的一句经典名言是：“市场就是资源。”因为市场是有限的，生产能力的扩张，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遭遇市场容量不足的限制，也就是发生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总会周期性发生。所以对市场经济来说，困难的不是生产，而是销售。

何新认为，市场就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市场容量决定了利润总额。一种商品的利润总量和利润率与市场容量和占有率成正比。

何新讥讽当道的主流经济学家，说他们貌似什么都明白，就是对市场资源有限这一定律永远不明白！的确，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系统性分歧，可以从双方对这一条规律的不同认识中演绎出来。

在何新看来，正是由于国内市场是有限的，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能完全依靠中国的内部市场完成，而必须依托于整个世界市场的空间资源。

何新说：中国的过剩人口、过剩的生产力（人口也是基本的或潜在的生产力），只有依托于世界市场才能找到出路。

所以，开放本国市场的目的绝不意味着放弃本国市场，国家不应让本国企业在无保护状态下与外来企业和商品的竞争中自行倒闭，从而把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发达国家的外来企业。开放市场的目的，是为了引进资源和技术，改善本国产业的对外竞争力，二是为了让本国产业走出去，展开全球性的市场大竞争。

在这个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却有着与何新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主张向发达国家不加保护地全面开放本国的市场，将自己的市场资源拱手让给外国资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懂得市场是最宝贵的资源，反而认为外来的竞争能够促使中国的企业提高效率，一旦中国的企业竞争失败，他们就认为优胜劣汰是当然的、是合理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利益立场。他们认为自己是所谓的世界主义者，认为国家民族利益的概念已经过时，他们实际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吹鼓手。是为国际资本所利用而误导中国经济政策的内奸政策工具。

何新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始终坚持把中国利益作为经济研究的根本目标。

何新指出：市场的有限性意味着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市场竞争的历史，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也包括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

由于市场有限，发达国家特别是占据国际市场霸主地位的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因为这只会增加一个可怕的市场竞争对手。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一定会竭力阻止中国的发展，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基本的国际环境。

何新认为，国家有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天然责任和义务。市场资源问题是产业生存空间的问题。从这个原则出发中国才能够形成一整套长远的全球战略。

三、瓦解中国国有经济是西方夺取控制中国市场的阴谋

何新认为，国有企业的困顿问题，不是其“国有性”所造成，也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机制不良”造成的。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何新指出，所谓“产权不明晰”，是现代产业制度的必然。所有现代的西方大企业（股份制企业），都是产权不明晰的，都并非纯粹私有制的。企业经营责任问题与产权问题没有本质关联。

何新同意国企需要改革。但正是由于“三资”企业通过不公平的条件和手段从国有企业手中夺取了大量市场，包括争夺原料、能源、技术人员和供销渠道，加之国企自身负担过重，导致国有企业的衰败。

何新强烈批判私有化政策和下岗政策，认为这些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要把国企问题死死地盯在产权所有制问题上呢？何新指出，这是包涵一种经济学的预设性阴谋，这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何新认为，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担当了帝国主义瓦解中国产业经济的战略工具！他们之所以紧紧盯住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支柱，所谓机制改革、产权改革都是为了瓦解以国企为支柱的中国工业体系。

他们批判中国国有企业具有高度的垄断性，但在他们本国——例如在美国，所有的产业巨头无不对美国本国市场份额保持着高度的垄断控制。工会则对劳动市场保持垄断，外来劳工几乎没有工作机会。新自由主义鼓吹摧毁中国国企的垄断，其实是为了让本国企业渗透中国夺取新的市场空间。

这个判断是非常理性的。从这种观点看过去——整个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改革思路，根据中国自身以及苏东改革的已有教训，都可以断定为是为了有针对性地搞垮中国本体经济，使之走向对外来



资本的依附化。因此，何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争论远远超出了理论争论的范畴，实际是一场关乎中国改革根本方向的战略争论。

何新指出：他们在搞垮了大批国企后，现在又把目标集中在中国最后一个国有企业的堡垒——国防军工企业上。不能让他们瓦解中国国防军工体系的阴谋得逞！

何新认为，美国利用中国经济学界的幼稚无知，不失时机地向中国输入误导性的经济学理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为了误导中国的经济政策。

这种把戏并非新鲜，当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曾被英国作为经济学意识形态推荐给其他国家，成为瓦解别国工业的战略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好源于亚当·斯密，同样起着瓦解中国工业体系的战略职能，经济学本身沦为了市场经济争夺的手段！

四、批判萨伊定律

何新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所谓萨伊定律。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自动会创造需求，永远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只要任由“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每个人根据市场信息追逐自己的利益，就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增长。而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只会导致效益低下、福利减少，计划经济则必然造成短缺。

新自由主义的命根子就是萨伊这种理论。科斯定理则认为私有制是最高效的经济制度，这也是针对中国的公有制。据说，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私有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只要中国人相信了这类理论，就应该放弃计划经济、放弃国家管理、放弃国有制。就可以自然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富裕。

但是何新认为，这类理论的前提是虚幻的，是欺人之谈。听信这种理论的后果不是走向繁荣，而是经济崩溃，急剧贫困化，拉美、非洲以及私有化后东欧经济的休克都是明证。

何新指出，经济危机实际上又会形成一个非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是市场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是资金过剩，大量的资金退出生产流通的循环，这部分资本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即为过剩资金。

新自由主义否认生产过剩的存在。却鼓吹那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神话。

何新指出，众所周知，近年的高房价是被大大小小的炒房团炒起来的，五年里翻了十倍之多。近期农产品也遭遇了恶炒，继大蒜、红辣椒价格疯涨百倍之后，最近绿豆价格惊人上涨，由年前的每斤3元，疯涨到20元~30元。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究竟什么叫“炒”？“炒”这个厨房中的烹

调词语，何以竟然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以致竟可以决定市场物价，影响和改变千家万户小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呢？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言，所谓“炒”这个概念是根本无法解释的！主流经济学的神圣教条是：商品价格由市场需求决定。物价蓬勃上升，反映市场需求大旺，是好事，不应受到任何行政干预和限制，否则就是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律！从这种观点看，某种商品被恶“炒”也是大好事。不仅房子能“炒”，从股票、期货到粮食、大蒜、辣椒、绿豆、火车票等等，一切市场稀缺资源无不能“炒”也应该热“炒”，不炒就是违背市场的规律和逻辑。

而何新指出：其实，所谓“炒”无非就是对某种稀缺品在其价格未高涨前，低价大量买进予以囤积，待其价格上涨后抛出，从而谋取来自价格差的暴利。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把稀缺物资购进储存，待价而沽，从而牟取暴利。“炒”的必要条件是炒家能够控制大量资金，背后有金融力量作为依托。“炒”的本质其实是金融资本的运动。

五、价格并非市场竞争决定，而是资本竞争决定

何新说：“炒”，并不是什么“现代市场经济”的新鲜事，古已有之，毫不稀奇。所谓“炒”，古人谓之“囤积居奇”或曰“奇货可居”。两千年前赵国商人吕不韦就曾是一个成功的大炒家，他所囤积待炒的“奇货”（也是“期货”？），就是当时在赵国作人质的秦谏公子异人，而其利润就是异人后来取得的王位，吕不韦的投机一“炒”，使他后来差点得到了秦国的最高国家权力。

所谓“炒”，在《资本论》中被定义为“为卖而买”的投资行为——囤积者并非为自己的使用和消费而购买，而是为“卖钱”而“购买”（这是悖论），这一买一卖、一进一出，炒家就得到巨大价差——红利。此种伎俩，改革开放前叫“投机倒把”，是一种犯罪行为——其实在当今多数发达国家，任何炒家的囤积居奇行径仍被视为经济犯罪。但在中国，种种恶“炒”却都叫作善于“抓住商机”和“理性投资”。

其实，“炒”的本质就是由炒家以货币金融手段垄断和控制物资，从而操纵控制商品的市场定价权。

而每当经济濒临萧条，货币资本必然大量从实体产业领域溢出，于是在货币流动性大增的背景下，恶性炒做的行为必然会大规模发生。

何新指出：由“炒”而为商品定价，这本身就揭破了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编造的一个市场神话：稀缺资源通过市场供求这只“看不见的亚当斯密之手”，来公平地、科学地予以“配置”，自由竞争可以为每种商品合理定价。



使人震惊而悲哀的是，这一套极为幼稚的“市场”谎话居然骗倒了中国两代人。其实，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无论国内和国际，究竟在哪里存在着那只“看不见的”、为人类合理配置稀缺资源和“福利”的神圣公平之“手”？相反，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是一只有形的金融资本之手——通过期货和现货交易，通过掌控市场的绝对定价权，把全球（包括中国）的宝贵而稀缺的资源导向国内外大资本权势集团的手中。

六、市场竞争必须由国家力量控制和管理

何新认为：既然市场不可能自动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放任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让纵容资本竞争——让资本大鳄鲸吞和垄断全部经济利益。

现实中的私有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这是19世纪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而计划安排、国家干预正是针对生产过剩问题而来的。

生产过剩实际上又是一种投资效益低下，是一种投资不良，投资效益递减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虽然投资效益递减不可能根本消除，但是可以抑制。而且这个规律也是一种推动力，推动了投资的转移和升级。但这个过程不是没有代价的，投资越盲目越无序，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就越严重，投资调整的代价就越大。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是相伴相生的，并且都不可能完全解决，只能是通过国家政策性干预有所抑制。

比较成功的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实行的这种体制。资本及工业、企业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国性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无论是莱茵模式还是英美模式都早已不是私有自由资本主义，在莱茵模式中存在着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英美模式则是依托于具有国家定货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

何新认为，国际经济竞争早已不是私有自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的跨国竞争，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是本国产业和国民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总之，国家力量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强大工具，这是经济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

经济竞争必定要动用任何力量，必定要动用国家力量，这不是由某种经济学设计好的，而是历史的力量运动的必然结果，反过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竞争如果不援引国家的力量，则必定要在竞争中惨败，胜还是败，道理就这么简单。进而，国家终究会成为资本主义竞争的真正主体。因此，中国的最佳选择也应是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混合经济体制。

集中性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有利于在投资、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克服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的问题，防止恶性竞争。在投资方面，垄断组织具备一般企业不具备的资金实力，有能力投资一些高科技战略产业，这本身就是投资的升级和优化，因为高科技战略产业不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而是短缺，这种短缺绝对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满足的。在生产方面，垄断组织能够对市场需求和供应做出合理预计，尤其是供应，因为生产厂家就它一家或者很少，控制了供应就能够控制需求，从而避免生产过剩。在销售方面，因为避免了生产过剩，并能对整个销售体系进行统一管理，垄断组织就能制定产品价格，保证利润率。而国家呢，是真正的顶级垄断组织，国家积极管理投资、生产和销售，对于克服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也是同样有效的。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靠国营计划体制集中全国的资源，形成强大的投资能力，进行工业化投资，才初步建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核心精神正是借助国家力量强化投资能力。以国家力量作为主要的工业化投资者，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明，而最早是欧洲重商主义的发明，德、日资本主义都是这样兴起的。

七、何新经济思想述要

何新的经济思想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建言的性质。没有超意识形态的纯粹经济学。不同的利益体系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派——这是何新所强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敢于明确地宣示这一点，可以视为何新对中国当代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一观点使人们可以洞察一切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背景，也使何新旗帜鲜明地声言：经济学者天然应当以其经济思想服务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同时，何新斥责自西方输入的新自由主义是伪装成经济科学的经济意识形态；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损害中国经济利益，是为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服务的政策工具。因此他疾呼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误导我国经济改革”。

正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何新的高声呼喊，唤醒一代人，使他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名颠覆者。

如同当年亚当·斯密、凯恩斯、李斯特的经济学曾分别为英国、英美、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提供政策理论依据，为国家经济服务一样，何新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以其经济研究致力于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自1988年以来，何新写下了大量的政论、经济形势分析和著作。



其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作为2001年出版的《思考：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和2008年出版的《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这两部著作集中概括了他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何新的很多政论、分析和建议常常直达中央高层，成为中央决策的重要参考。

他回顾说：“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诚进言而不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何新，《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8～9页）

时至今日，重新翻阅何新于1988～1994年间写下的国内外形势分析、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仍然不胜感慨，为何新先生那种济世利人的情怀，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那种一以贯之的方法，而感佩不已。正所谓世局如磐，铁证如山。是焉、非焉？历史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何新的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他所明确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何新说：“在经济制度的选择上，我想提出一个新国家主义的制度概念。我提出新国家主义这个概念，一方面既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针锋相对，另一方面又以此而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135页）

这一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在他于2001年出版的《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一书中得到了集中的阐明。

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

其一，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即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同于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存在着两大不同类型，一种是“莱茵模式”，一种是“英美模式”。这两种模式，都与19世纪建立在小私有制基础上的中小企业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模式”具有根本的不同。

在“莱茵模式”的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和公有经济，而英美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并非依托于私有化的中小型企业，而是依托具有国家订货和金融背景支持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何新指出：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不是大型企业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而是工业的集中化——大型（跨国）股份公司。现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和功能上（英法德日美），其实都是不同程度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或超国家的大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小私企资本主义。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我们观察现代经济问题和管理国家经济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有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会导致绝然不同的政策取向。

其二，由上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对现实中混合经济的认识和对混合经济的管理。我们看到，在现代经济中，国家组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绝非可以通过所谓看不见的手，放任经济自由流动。所谓混合经济，是从两个层面的含义上来理解的：一是所有制层面上，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二是在管理手段上，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结合，在市场调节运行的同时，必须保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何新说：欧美等发达国经济运行实际一直如此，在中国也应如此。

混合经济的根本思想，就是强调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及有计划机制实施点市场调控和监督，从而对市场缺陷进行纠正和救治。何新指出：市场经济根据其本性，天然地存在宏观失控和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两极分化的必然性。

2008年9月以来所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真的纯粹对金融市场放任自由，美国政府何以还要救市？何以还要注巨资去拯救其汽车工业？何新说：中国经济，也应是这样一种混合经济。而绝不应当去搞什么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那种绝对的私有化和纯粹的市场经济，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是子虚乌有的。

何新指出：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发生的经济竞争，并不是自由企业（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仍然是、也必然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跨国化大竞争。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扮演着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整体利益的重要角色。

其三，在这样一种混合经济体制中，由国家建立和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分重要。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中都具有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它是维持西方社会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而建立和完善一个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世界第一，绝大多数又是农业人口的国家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何新所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的核心原则有两点：（1）经济制度是建立混合所有制，而以大型国有企业居于经济的龙头和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2）国家应是国民经济体制及运行的引领者、策划者、规范者、协调者和保护者。何新的这些经济思想，似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词，即：混合模式，国家利益，社会保障，国家管控。



何新经济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如前所述,他深入研究过马克思、列宁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尤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过极其深入细致的研究。

他所撰写的《论价值规律与当代世界经济——对《资本论》的现代读解》就是一个证明。他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深入研究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他尤为推崇德国19世纪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19世纪时后进而新兴的德国的经济学教父,在当时德国的时代背景下,李斯特正面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若在德国实施,就是祸国殃民的理论。

李斯特说:自由贸易是强势国家的有力政策武器。(《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188~193页)正是在这些深厚学养的基础上,包括其哲学观、逻辑与方法(参见《何新的方法与逻辑》),综而统之,以其去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何新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正如黑格尔以其逻辑理性主义贯穿其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何新也以其理性决定论贯穿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之中。这是他始终坚守的一种价值,坚守的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所坚持的一个基本点是:世界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理性进程,其中所蕴含的必然性是可以认识的。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浪费精神去作这样、那样的研究。对此,在何新的诸多文章和著作中,对此都十分强调并加以阐发。并著有多本专著加以论述,其最集中的一本为2008年1月出版的《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在《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致何兆武的信中,对此方法,也都有坚定的阐述。

何新的逻辑与方法,深受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影响。他说:“我对现实和历史采用动态发展的观察方法(辩证法),通过经济必然性和利益集团的分野(阶级分析方法),去剖析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和意识形态现象(唯物史观)。这些方法,均得力于我早年对黑格尔、希腊及中国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毛泽东著作的潜心研究。”(《为中国声辩》,3页)

在其经济研究中,何新也始终贯穿这一方法。在他的《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中,他有多节专门探讨方法问题。如第三节(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第四节(探索历史主义的辩证方法)、第十一节(20世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中,他都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他指出：历史哲学是经济理论的基础。经济学离不开决定论。在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一切经济现象、经济运行有超越主体意志的自身法则和秩序。所以它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观察、表述和做出预测的。而这就是决定论的哲学观点。其根本点在于对历史中所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规范性的承认。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必然性和决定论。（《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388～392页）列宁也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辩证决定论者。（《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405～408页）在经济领域，何新坚持用这样一种历史辩证决定论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相结合。

这种实证的方法，就是对所存在的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知和解析。由此他强调研究经济，第一应从中国国情出发，也就是说，无论当年照搬“斯大林模式”，还是今天照搬被曲解和误解的“美国模式”（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所谓“与国际接轨”），都是极其幼稚的。第二必须从实际出发。第三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而这种实证的经济研究必然与经济政策紧密相关。因为任何一种政策必定依据于某种预测的结果，而这种预测必定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134页）

正是由于何新在经济研究中贯穿和使用了解证经济决定论的历史理念和实证的方法。因而他所阐发的经济思想有着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和恢宏的整体观。一种远大的历史眼光和世界性的经济视野，既洞察入微又高瞻远瞩，揭示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

例如，展望未来，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产业必须向外看，必须面向全球，寻找全球市场，利用全球资源。近年来，中国的银行体系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实力最强大的金融体。中国金融力量应当成为中国资本及产业走向全球化的组织性力量。”（《何新：论价值规律与当代世界经济》）

何新的经济思想，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无情斗争，其中洋溢着战斗的精神，在《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的篇首，何新就旗帜鲜明、开宗明义地列出了一张“指导中国改革的两种思路”的表格。（《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7页）

他以其犀利的思想，对西方破坏和瓦解中国经济的阴谋进行了无情的揭破。他认为根据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英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

“私有化的鼓吹者在大呼反垄断——反对国有企业之垄断。殊不知，公共资源在



私人资本或外来资本手中被垄断, 将比在国家手中更坏。目前的房地产业巨头垄断就是例证。所以小民百姓备受高房价之折磨。”(《何新:论价值规律与当代世界经济》)

在何新的经济思想中, 有很多独创性的贡献。或一些不同凡响的声音。例如如上所述中他所强调的经济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他所倡导的逻辑理性主义、辩证经济决定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经济研究方法。又如他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综合表述。

在1993年2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 他集中表述了市场经济的四个基本规律, 即: 第一, 市场有限性规律, 第二, 投资效益递减规律, 第三, 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第四, 市场经济呈周期性上升与下降的运动规律或称市场经济波动规律。并特别指出, 这四个规律是相互联系的, 可以看作是同一个规律的逻辑推演。

在这四个规律中, 第二、第三两个规律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中都曾有明确的表达。第四个关于经济周期的规律,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有明确的表达。而第一个关于市场有限性规律为何新所独有的表达, 亦可视为四个规律中最基本的规律, 推演出其他三个规律。

何新指出市场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要素, 是最大、最宝贵的经济资源, 高于技术和管理的因素, 因为改善技术和管理的目的, 正是为了夺取和控制市场。在一切经济竞争中, 最根本的竞争是市场机会的竞争。(见《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247 ~ 258 页)

从17世纪重商主义以来的全部世界史, 就是体现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以一切手段进行世界市场争夺的历史。这一规律是理解当今世界许多重大经济事件的钥匙。例如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未来将面临更多贸易摩擦等。

何新有很多超前的预测和洞察。例如在国内1990年指出中国经济中的生产过剩问题, 较早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过剩问题引起的经济衰退, 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大胆的理论新见解。(《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273 页)

又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夜指出中国应警惕金融危机以及泡沫问题。1997年在中国当代经济学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并于2003年深入研究了现代经济中的“地租”问题。(《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65 页)在国内较早提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崛起。(《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273 页)

盘点近二十年何新的魔鬼预言

原作：mend^①

1、1988年10月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预言中国将发生动乱。此文震撼内外。1989年，中国发生事变。

2、1988年何新在《中国金报》撰文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必定失败，苏联东欧帝国体系将解体。1990年6月12日，何新给国家当时最高领导同志（邓公）写信，预言苏联即将面临解体。

1991年8月，苏联“8·19”政变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丁关根同志）问询而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并报中央领导。何新认为此次苏联政变不会成功。并预言：此次政变失败后苏联政局的崩盘趋势已难逆转，苏联体系将崩溃，叶利钦必将掌控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成为象征性人物和下台。

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体制的彻底瓦解。

这年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3、1991年，何新在《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华进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的具体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即“普世价值”）

（4）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5）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6）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

^① 作者是兴华论坛注册网友。



区域性的自立运动。

美国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

回看近年的历史，私有化（下岗改制）、普世价值、西藏拉萨事件、台海问题、否定岳飞、所谓“性革命”，次第发生。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文中预言：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已很难再结聚为威胁美国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看，此地区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因此，此地区在90年代以后将不再是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

何新说：全球战略中心未来将东移，中国大陆及沿海边缘区域将是未来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焦点，成为矛盾的敏感区和触发点——在中国大局维持稳定而无内乱发生的前提下——中国的边缘区域将事变不断。即：

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新疆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此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不断涌现。

何新还针对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销售武器，认为这是一种信号。何新预言：李登辉掌控台湾局面后将搞台独，台、陆关系会面临急剧裂变。

何新建议以中程导弹威慑台湾。

5、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夜），何新写报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呼吁警惕金融行业出现危机。何新指出：现代经济中金融业成为主导产业。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形态。此后，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不久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6、1997年3月，何新在《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中还指出，实施分税制改革，使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将导致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包括房地产业）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将发生分化：

(一) 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

(二) 出现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在政协会上提出交书面发言《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称被当时媒体大肆吹嘘的“新经济”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预言香港将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年初的11397点下滑到9072点，前三季度累计下跌2325点，跌幅达20.4%。

在上文中，何新还认为：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资本炒作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竞争或市场需求决定价格。

在此文中，何新反对对国企私有化和让工人下岗失业的政策。他尖锐抨击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有所减缓和收敛，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

8、2003年2月20日（伊拉克战争前夜），何新对伊拉克局势发表评论。他预言美国攻击伊拉克后根本不会有大型的、有意义的对抗性战争。伊拉克即将发生坍塌性的崩溃。萨达姆政权的生存期限屈指可数。这种论点与当时央视评论等主流媒体的论调截然相反。然而伊战迅速结束的结果惊人地验证了何新的该预言。

9、在2001年出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中，何新警告：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正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汇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灾变。何新还肯定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已经具有不可避免性。

10、2008年，何新发表《中国人该有过苦日子的精神准备》一文，预言：



国内物价和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极其严峻。发生企业大倒闭、高失业，同时伴随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

何新说：过去几年国内经济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于超市的时代，就要结束。

这些话在当时仿佛是一种“唱衰论”而受到舆论的讥笑。但现在对这一点，想必一切工薪阶层已有切肤之痛而感同身受。

11、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层的《人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导致恶性通胀》等文论中提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吸引外汇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兑换人民币过量发行流动性资本失控。同时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势必带动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伴随人民币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

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商的时代即将结束。

——如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发生的，正是中国与世界物价的不断上扬。

12、2008年6月，何新在《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飙升。

油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经过2008年下半年短暂下跌后，尽管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油价仍然从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过120美元/桶。一直以来美联储实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元汇率连年持续走低。

13、2011年春，何新发表博文《2011年中看内外大势》预言：预料国内物价，主要是民生用品物价以后将会飞起来。

何新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唱好美国经济以为即将复苏的论调，预言：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远未结束。金融大海啸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态突然发生。

中华民族已再次逼近最危险的时候！

何新说：如不改弦易张，通盘检讨过去20年以来改革方向的失误，未雨绸

缪；则未来如何——只有天知道。

此后何新基本失语，很少公开发言。但是在2010——2011两年，何新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金融战争揭秘》、《统治世界：神秘组织共济会揭秘》、《命运与思考》等著作。

在2011年于香港出版的《命运与思考》一书中，何新说：我不讲假话。但我并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附注：以上预言见何新有关著作：《新战略论》、《致中南海密札》、《论政治国家主义》以及《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何新看中国经济》等书中。]



何新致滁州学院倪阳教授：“何新研究”应正名为“何新批判”

尊敬的倪阳教授：

问好！

从有关新闻中知悉贵校开设“何新研究”选修课程的消息。对此，表示感谢。同时有必要说明一下对此事之立场：不支持，不反对。

不支持者，是窃以为开设这类课程时机过早。其实，一切活人都不该研究。因活人仍在动态中，思想学术尚未凝固，仍在发展变化，昨日之思未必仍为今日之所想。

但是，也不反对。盖人之所以写作、著述，本来目的就是提供于社会，让公众去评论和研究。研究有助于传播。当今异说纷纭之时代，余之学术以利国、利民、复兴中华，弘扬传统为宗旨，研究之亦好事也！

但是，既称“研究”，则不宜只推崇，而必须做分析、质疑与批判。尝闻有人问：何新，何新，何新之有？诚然，“何新”二字本来就是问题。

余一生经历殊具特异，生活一向率性自由。凡喜怒哀乐嘻笑怒骂，皆发于一时之真性情，向来不喜做苟且经营，谄媚逢迎之事。

常自惟余生存之价值及平生之所抱负，皆已凝聚于所存世之数十卷文、史、哲、经、政、语言及逻辑著述之中。自信这些书足以无愧前贤，传之未来，启迪后学。盖余在众多之学术领域，或创异论而开其先河，或发新谛而发前人所未发，确有超越当世侪辈——包括那些洋大人之诸多发明、创新也。所以余甚自傲！

但余亦颇有自知之明。余深知本人著作中的颠倒、错落及失误，必与发明成就一样多。我的书每隔几年必出新版，一方面固然因为市场读者有需求；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不断以新版改旧错而已！故我也常以冷眼审看自己之过去。盖当今之世，早已无公认之权威及公认之价值在——何论乎“普世”？！昔日诸多不可一世之权威及伟人，均已被网络及群氓文化解构颠覆，“打得粉碎”！何况我辈乎？！今日之神圣秀，必为明日之袒衣裸舞。凡一切造神塑大师之运动，都可以休息矣！

每当清夜静寂中，余常扪心自问：“何新”究竟何许人也？答曰——非文人，非大师，非圣者，但也非小人，非俗物，一介闲云野鹤而已。

说以上一番话，意思无非就是：何新可研究，但是莫吹牛，莫作秀。何新

从来不是偶像，过去不是，将来也不是！故也不需要任何“粉丝”。

何新平生不会说不想说的话，但也没有说所有想说的话。何新平生是难得明白，但也难得糊涂。何新不喜为人师也不足为后世法。所以余早就声明：杜绝与媒体来往。余在网上开设论坛博客，非为自炫也，一是有时想骂骂帝国主义及洋奴走狗混账们，剥开其辈骗人之障。多数则是自说自话，现身真人在此——免得被诸多网络上的“伪何新”冒名耳。

所以，如开设“何新（学术）研究”，则务请增加一词曰“批判”——建议此门课应称作“何新（学术）批判”为宜。今日开之我所乐见，随时停止亦所无妨。

谨附赠国内外有关书籍资料若干，以备收藏，并聊致谢意。顺颂教祺！

何新

2009年5月20日



滁州学院开设《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课程

(2010年04月6日)

[新华社安徽分社报道]:

新学期开学以来,滁州学院《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课程受到了许多大学生的欢迎。

何新是中国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专职)。其研究文、史、哲、政、经、语言、逻辑、美学等方面的著作达数十卷之多。

据了解,滁州学院是在2007年下半年首开《何新研究》课程的,当时作为一门选修课提供给学生自由选读。2009年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何新先生本人的关注,他致信开设这门选修课的滁州学院副院长倪阳,表示感谢,并陈述理由,建议将该课程更名为“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随后,还专门派助手前往滁州学院,为滁州学院送来了他已出版的多种版本著作、国内外评论汇集和部分手稿,供有兴趣研究何新的师生研究和批判之用。倪阳亦回复何新先生,表示赞同其观点,感谢其赠书,并将继续推进该项学术研究工作。这以后,倪阳又积以时日,认真修订和完善了讲稿,定名为《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并于今年新学期为有关专业开设。其间,还在全校为学生开设过讲座。

新的《何新学术研究与批判》课程共有9讲,按照30个课时讲授。具体内容分别为:一,何新其人;二,何新学术概览;三,何新的哲学与宗教观、方法与逻辑;四,何新的政治观;五,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六,何新的国际关系战略研究;七,何新的历史观和历史人物论;八,何新的文化观和国学经典研究;九,何新的美学研究和实践。

据悉,该校近期还将成立大学生何新研究会,为有兴趣的同学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平台,促进对何新(学术)的系统研究。

倪阳教授的回信

尊敬的何新先生：

5月20日来信收悉，十分高兴。

因近日出差在外，迟复为歉。

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今后我再为学生开设“何新研究”课程时，将更名为“何新（学术）研究批判”。并赞同您对此所阐发的内涵。这实际上体现了您所倡导的逻辑理性主义的辩证法也彻底地贯彻于您自身和您的学术。这是令人敬佩和尊重的。

何新，何新，其命维新！我深知，胸怀济世利人的宏旨，永不停息地研究、探索，是您的宿命。

我深切地感到，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能够认真学习研究，独立思考，具有分析批判眼光的人正越来越多。当今学界，虽有浮躁与肤浅之流，而成熟和深刻的涌泉，也必然在不可抗拒地滋长。我们有信心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对于当今各种学术思潮，他们自会做出自己的评判。

我为学生开设这一选修课程，其目的，也就是把他们引入这一值得去涉猎、探索、感悟的新天地。我明确告诉学生：我只是力求比较客观地介绍何新的观点并表明我的态度。至于何新所言是否真理，你们自可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实践经历，去体会，去做出自己的评判。以怀疑为审视的出发点，以实证为判别依据，以逻辑为论辩武器。这是我经常向学生所介绍的三句话。

您的学术，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中国社会伟大变革时代的必然产物，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其怀抱的宏伟，涉猎的广大，整合的深度，贡献的繁富，在同时代的确堪有人可与您比肩。因此，要对您的学术做出有价值的研究和批判，需要每一个热心研究者的诚实劳动和艰苦努力。

感谢您将派人向滁州学院赠送您手中尚有的已出版之存书、国内外多种评论集及部分手稿。我和滁州学院将十分珍惜，悉心爱护，并提供给您所说的有兴趣选修此课题的年轻者研究及批判用。这令我和滁州学院十分感动。滁州学院的年轻学子也会深深感谢您的。我们期待着！

致以

崇高的敬礼！

滁州学院 倪阳（教授）

2009年5月25日



塞枫（旅美学者）：论何新

对何新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或者所谓历史性的断定，显然都为时过早。在中国自 80 年代以来的改革、现代化进程中，在最近三十年以来，何新的思想比当代任何一个学者都更加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政治思想及文化学术。对何新或褒或贬的纷纭评论仍然是中国思想界和中国学术界最引人入胜的奇特景观之一。

何新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似乎是横空出世，却如此持久而如此强烈地切入我们的时代，也许还将更为持久地和强烈地影响未来的时代——带着他对民族学术的贡献，或者如一些他的论敌所诅咒的，带着对时代文化的“无穷流毒”。

我想，当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断言，能够现在就对这样一个人做出无愧于时光流逝和历史变迁的结论。也许，只有如何新自己所言“把一切托付给历史”，我看他这一点是说对了。他看准了，除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这个时代谁也没有能力全面而彻底地肯定他、否定他甚或论定他。

何新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异数！对他的思想，无法以传统的“左”或“右”的标准来判认。何新曾自豪地说，他始终“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坚持独立不阿的人格”。他是这样说的，他也是真正这样做的：

在举国正轰轰烈烈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他就像是一只早醒的虫儿，开始用还远不成熟的声音，质疑这场运动的正确性。一次次的质疑信件被退回了他在的农场，他因此成了“反革命”。

当人们还仍为政治禁区所震慑的时候，他语出惊人，激烈而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提出应该重新研究马克思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论述，在史学界掀起一场地震，而他则被解除了著名历史学权威黎澍先生学术助手的职务。

当人们还沉浸在“文革”的创痛伤痕中悲不自胜时，他作为领头人之一，掀起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潮。

而当人们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传统时，他又提出应对文化反思进行“再反思”，并开始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正是十几册《何新国学经典新解》在 90 年代的出版，带起了重新解读国学

的风潮，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

当“文革”的极左思潮仍然给人们的身心发展带来持久破坏甚至是摧残时，他带头从哲学上探讨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异化”理论，反思现实生活中的畸形政治经济制度带来的异化问题。

而当人们蜂拥而上大谈“自由”、“民主”，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为“圣经”时，他却以他惯有的敏锐捕捉到了弥漫在社会中的“危险气氛”，大声疾呼民族和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希望人们能够保持冷静。

何新是世界上最早预测前苏联行将解体的学者之一。^①他最早在艺术界冲破政治“左倾”思潮的影响，旗帜鲜明地提出艺术美首先在于形式而不是内容。

90年代以后，何新被西方媒体视为“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旗手，并因之而被中国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者视为死敌。但他却是陈寅恪和顾准最早的研究者和介绍者之一，而这两人是中国当代所谓“新自由主义者”们心目中顶礼膜拜的学术偶像。

何新的学术广博，几乎覆盖人文学术的全部领域——文、史、哲、经、政以至逻辑、语言、文学、神话、艺术和人类学。何新的思维深刻，他具有独特的文风，准确、简洁、明快、有力。他的论敌谩骂他，攻击他，但始终没有力量驳倒他，解构他，从而撼动他的学术存在和地位。

何新是孤独的，从不见他出席任何圈子的集会，不见他与学术界交往。何新是怪异的，只身大隐于市，因之人们无从窥见他的生存状态。自从90年代中期他宣布隐退以后，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只闻其声，难见其人。

对于当代文化与学术而言，何新始终像一座峰一样地存在着。这个人无法被漠视！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无法不重视他。对于未来的研究者，何新的学术是一种挑战，是一系列问题——而何以能做到他所已曾做的一切，则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塞枫（旅美作家、学者）

2003年3月10日写于斯坦福

^①本文原发于“土柏论坛”及“西西河论坛”。



《人民日报》、《新华文摘》 关于何新的报导

一、1992年前《人民日报》关于何新的报导资料

1991年关于何新破格晋升高研职称

《人民日报》1989.01.24

在专业职务评定中排除非学术因素，中国社科院破格晋升一批中青年学者。

本报北京1月23日讯 记者李泓冰报导：曾经以他们的学术专著在许多青年学生的书架上站住了脚的严××、张显扬、朱狄等和王逸舟、林岗、何新等分别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度晋升的181名研究员和450名副研究员的名单上。他们是在“平等、公开、竞争、择优”的方针下脱颖而出的。记者今天从该院人事和科研部门获悉了这一消息。评定专业职务是科研单位颇感头疼的一件难事，司空见惯的是“一年评一次，一次评一年”。然而中国社科院从去年10月底开始的高级专业职务评定工作却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速战速决了。面临国内外社会科学层出不穷的新成果的挑战，建立一支自己的有雄厚实力的学科带头人队伍成了该院的当务之急。据称，他们在这次专业职务评定中尽量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影响，着重考察专业人员的学术、学风、学德。对于有争议的学者的学术观点，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估。学术委员会的评审结果得到充分尊重。

就像农民中曾流传过的“县委书记最会种地”的讽刺一样，社科院也曾有过行政部门主持专业职务评定的历史。为使专业职务评定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该院把专业职务的审批许可权由院人事部门下放到各研究所，由各所按照学术队伍人员配置的情况确定各级专业职务的比例，三年内基本稳定。

该院还试图打破高级专业职务评定中“中年拖到老，青年给拖跑”的恶性循环，破格晋升了22名虽年限未达标准，但学术成果卓著的专业人员，其中研究员8人，副研究员14人。社会学所年仅35岁的李汉林由于在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突出成就，成为该院最年轻的研究员。

该院一位分管人事的副秘书长（杨润时）介绍说，他们将设立学科带头人的特别档案，在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面“开小灶”。在职务评定中逐步建立定量描述式的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力争

进一步减少非学术性、特别是人际关系因素的干扰。因为人们注意到在这次评审中，确有一些造诣较深的学者，由于受本人原因和他人原因造成的人际关系问题的影响而未能评上相应的职称。

2. 本报六版发表文章：“五四”精神继承与超越 分析中国为何至今未能现代化 《人民日报》1989.03.24

本报讯 “五四”以来70年，中国已经突破，甚至粉碎了它的旧传统，并早已走出了所谓“封建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至今还没有现代化？今天本报第六版发表的何新的文章认为，现代化不能自一个社会外部向内部作直接的嫁接和移入，它应当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转变中，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现代化意味着文化形态和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

3. 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

何新《人民日报》1980.01.03

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合理解释究竟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黑格尔论述这个规律的真实含意。黑格尔对这个规律的主要论述，是在《逻辑学》下卷的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在那里，他对这个规律的主要内容是这样解释的：

（1）一切事物，在它的内容中都包含着这样的矛盾：既是现在的自身，同时又是一个非自身的“他物”，一个现在尚未获得存在的东西，“无”。

（2）这一矛盾的存在，使事物由过去的旧形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即是对于旧事物的第一次否定。由于这一否定，使它演化成为一种新事物。

（3）在这个新事物中，吸取了旧事物的某种规定，保存了原来事物的某些发展成果。这种在否定旧事物时对旧事物内容的保存，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否定之否定。

根据黑格尔的这种论述，可以看出黑格尔所谓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即：正题：旧事物A为肯定；反题：变化过程为第一次否定；合题：新事物B（吸收了A的合理内容）为否定之否定。而并非像通常所说那样，事物的每一次发展都是经过三种形态，第一步是作为正题的一个事物，第二步是作为反题变成一个相反的事物，第三步是正题与反题的综合，形成第三个事物，即：正题：第一个事物A为肯定；反题：第二个事物B（与A相反）为否定；合题：第三个事物C（综合了A和B）为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还认为，由于在作为发展起点的第一个事物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的两个因素（“有”和“无”）。所以他认为“三分法”（正题、反题、合题）也可以被看作“四分法”（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247页及黑格尔《逻辑学》下册，544页），即：正题：旧事物A（包含着第一项“有”与第二项“无”的矛盾）；反题：“变化”，是为第三项，即第一次否定；合题：新事物B，是为第四项，即否定之否定。而如果按照那种对黑格尔“三段式”的旧解



释,黑格尔的这种“四分法”的观点,就无法理解了。应该指出,黑格尔是反对对“三段式”作形式主义运用的,但是他在自己的《逻辑学》中却没有摆脱这种形式主义的局限。他的《逻辑学》的全部范畴,都是按照这个“三段式”模式构筑出来的。恩格斯批评他说:“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5页)。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理解和阐释,确实非常深刻地抓住了这个规律最本质的内容。至于那些“三分法”、“三段式”等说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乃是一种表面化的形式主义的观点,根本没有反映这个规律的真正内容和实质。(摘自《光明日报》何新的文章《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探讨》)

4. 何新《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和《中国文化史新论》出版

《人民日报》1987.07.17

何新的两部新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和《中国文化史新论》已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前一书中,作者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运用艺术符号学与文化社会学方法,分析和阐述当代艺术美学和文艺学中的若干问题。后一本书是根据作者近年的学术讲演记录稿整理成文的,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中,作者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文化社会学和价值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在下篇中,作者结合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的目标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作了分析。

5. 《九歌》应是《九天十神歌》

《人民日报》1987.05.17

4月21日《文汇报》报导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何新近期研究《九歌》的一项重要发现。

《九歌》是战国末叶伟大诗人屈原的一部著名诗篇。围绕这部著作,历史上一直存在一系列疑难问题。例如,《九歌》名“九”,但实际上却有11篇。这些是否都是屈原的原作?“九”究竟是什么意义?《九歌》中的群神,许多名号不见于其他先秦典籍,这些神从何而来?是不是楚文化所独有的?它与中原各国的宗教文化关系如何?一直聚讼纷纭。有些海外学者(如台湾凌纯声、苏雪林)甚至认为,《九歌》中的诸神乃是由东南亚或古巴比伦辗转流传到楚国的。何新对这些问题,均给予剖析和做了令人信服的解答。他指出,若将《九歌》中的十位神灵,按东、西、南、北、中的五行方位排列成图,而与《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五方十帝图相比照,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种结构性的相似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九歌》十神,五男五女,正体现了古人的阴阳观念。十神分别配置在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又体现了五行、五方位的观念。《九歌》中各神与中原五帝五佐神的关系如下:

东皇太一——黄帝(皇天上帝);云中君(太阴君)——后土(高母神);湘君——炎帝(舜);

湘夫人——祝融（女娥）；河伯（龙神）——太 ǎ（青龙）；东君（日神）——勾芒（春神）；少司命——少皞（秋神）；少司命——蓐收（刑杀神）；山鬼——颛顼（冬神玄英）；国殇（蚩尤，兵主）——玄冥（即玄武，真武大帝，战神）。

何新还指出，屈原在 27 岁时曾出使齐国，两年后创作《九歌》。阴阳五行学说是战国末期由方仙术士邹衍所宣导而流行于齐国的一种天文理论。《九歌》可能正是他采纳了邹衍的阴阳五行理论，结合古代的五方帝神话而创作的一部瑰丽神话诗篇。这首十天神诗，加上最末一首作为送神曲的“礼魂”，共 11 篇。组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缺一不可。至于《九歌》为什么名叫“九”，何新指出，“九”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数字概念，而作为天体宇宙观念的名词，其涵义就是“郊（郊祭）”。

6. 何新主编《开放》丛书即将出版

张莉（1988.03.14）

由何新主编、张文达副主编、李泽厚担任顾问的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开放》丛书，即将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包括三个系列：中青年理论家文库——为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崭露头角、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编选集，出专著；世界文化译丛——选择介绍近代、现代影响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介绍二十世纪人文科学中的主要学科和流派；《开放》丛书（普及版）——选编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强的人文社会科学普及读物，以普及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即将出版的首批书籍有《危机与挑战》、《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文化哲学的探索》、《现代哲学入门》、《西方的没落》、《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等 20 种。

7.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新探索——读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何新《人民日报》1985.11.29

（略）

8. 读《何新集》

周武《人民日报》1988.09.12

最近，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何新集》，编选了何新的 32 篇论文，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文化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以及“训诂学研究”等十个方面，展示了作者十年来的学术成果。

在这部集子中，以“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为题的一组文章，十分发人深省。《论精英淘汰》一文，作为一篇社会学论文，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最为令人痛心的痼疾。他指出，近三百年来，一是中国的人才浪费，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精英淘汰的机制。“那些最富有独立思考精神，最富有主动性和独创性的精英分子，往往最容易受到摧残和打击。一些人



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另一些人稍稍出头即被摧残、毁灭。就是极少数特殊者,也往往要在扭曲、改变、泯灭自己创造个性的前提下,才能被社会接纳。”所以中国历史中正是那些最富有天才的精英人物,都或佯狂避世,或被世人目为狂怪。这种现象反复出现,意味着其中有规律。精英淘汰的一个结果,是人才的普遍平庸化,是创造力的退化,是社会发展的迟滞和缓慢。

文集的末篇《婊娟·混沌·鳄鱼及开天辟地的神话》,共分十四节,每一节都提出一个新的语源学问题,通过对层层语言屏障的解构式释义,终于在“婊娟”、“团圆”、“混沌”、“鳄鱼”以及“女娲”、“盘古”之间,发现了不曾被人想到的联系。由此,作者验证了自己在《诸神的起源》中对中国上古神话和文化起源的一系列新解释。

9. 何新从一种新的历史角度谈：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原因所在

《人民日报》1990.09.0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年学者何新最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历史评价》一文,从一种新的历史角度,阐述了中国人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作者在回顾了世界近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及德国、日本和苏联经济起飞的情况后指出,近代工业化有两条基本道路。一条道路是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以轻工业带动重工业发展,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发展轻工业实现,亦即英、法、美三国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道路。另一条道路是依赖国家力量,主张集中控制和调配有效资源,对外贸易实行保护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倡导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来带动经济迅速起飞的路线。

后一条工业化道路产生了两种模式。一种是19世纪末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另一种就是本世纪30年代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模式。

人们注意到,在19世纪初,经济大大落后于英、法的德国、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经济力量迅速勃起,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而20世纪初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的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后,经济也发展迅速。在二次大战中,苏联作为战场主力而战胜德、日,在50年代成为当时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恐怕就不能说反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包括“斯大林模式”),是完全不成功和不可能成功的。

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何新认为,如果我们深入观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形势,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因为马列主义对于苏联、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恰恰是一种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

第一、当时面临被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提出

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已濒于破碎的中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

第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主张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约束两极分化，对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机制。依靠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够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过的野蛮剥夺。

第四、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极其有效地集结在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甚至被某些人讥笑为“清教徒”式的中国50~70年代那种崇尚俭朴、刻苦、勤劳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压低社会消费，快速积累社会资金，有利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作者说，无论1949年后的40年，中国共产党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以上四点是什么人持论公正的人，都难以全盘抹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并且的确救了中国，秘密就在于此。

10.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何新访谈录

吴月辉、张益俊《人民日报》1991.07.1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一位中年学者说，今后十年内，中国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群众基础将更加广泛，它和群众的联系将更加密切。就这一意义而言，他确信党内和党外的民主将会有新的发展。

但是他说：“我不相信中共会发生西方期待的那种‘民主化’。”

42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新，是针对西方一些人做出中共将在今后十年内发生“民主性的变化”的预言而说这番话的。他认为多数西方预言家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因而他们有关中国前途的许多预言，已被证明成功率很低。

何新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来的70年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主导着中国现代历史潮流的政党，中共面临当代世界变化的潮流，必然要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进行新的适应。适应就要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十年中，中共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当笔者提到西方有人预言中共在今后十年将发生“和平演变”时，他说，本世纪的最后



十年对中国的确极为重要。他说：“我也认为中共在今后十年中将有深刻变化，不发生变化是奇怪的。问题是如何变和向什么方向变。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与一些预言中共会‘和平演变’的人有许多不同。”

何新的兴趣本来注重在文化研究方面，在近几年由于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而就政治和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独立性的见解。

他认为，在中国，以其他社会阶层为背景的政党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他说，只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即只要坚持为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这个党就一定会继续成为凝聚十几亿人的政治核心和力量的源泉。他说，中国与一些国土小、人口少的国家不同，一两个街头事件，是不可能动摇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

他说，中国共产党过去在 70 年中取得奇迹般的成功，由一个几十人的小组发展成今天世界上就人数言的第一大执政党，而且至今仍然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和拥护，这一点绝非偶然，而是有深厚根基和历史原因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在过去的 70 年中一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使被列强蹂躏百年的中国人恢复了尊严和光荣，引导中国实现了工业化，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从而创造了中华文明复兴和民族振兴的历史可能性。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从历史看，这个党无愧于这个称号。

他说，他曾花力气系统研究过中共的历史。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塑造了一种崭新的政治传统。中共引人注目的一个政治特点，就是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有人认为中共早晚会追随什么外部的潮流东施效颦，那是低估了这个党的政治能量。像中共这样一个饱经国内外政治风雨磨练的党，是不会轻易垮台的。

何新说，诚然，中共在 70 年中犯过许多错误。但这个党总是能够顺应历史的新变化，而主动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不断拓宽自己的社会基础，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发展。共产党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正面和反面的教训，把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公开出来，甚至批评自己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

他说，不可否认，在当代，由于货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共内部和社会上近年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如腐败问题。

但他说：“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大多数高层领导人是廉洁、奉公、守法，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而不是搞腐败的特权主义者。此外，解决腐败问题，不能靠一时激愤，而要靠制度，靠法治，靠改革。”

在谈到所谓“特权”问题时，何新认为：第一，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公务上的某些便利，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第二，中国高级干部享受的这种便利，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与普通人民之间

生活上的差距，实际上是有限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看到一些海外报刊的渲染。他认为这些渲染，有的是政治谣言，有的是夸大不实之词。他说，毛泽东搞“文革”，动机之一是试图解决社会主义的特权问题（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方法不当，并未成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政治改革，一个重大措施是废除了领导人的终身制。这一改革意义重大，它使权力被法制保障成为公器，任何人不能终身垄断。同时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及身而没，也不能世袭和传递，这就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产特权和封建制度的特权，在性质上有了根本的不同。

他说：“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干部不应当追求特权，他们应当是人民的服务员。的确，在现实中，有的干部滥用权力。但这在制度上是被约束的，在道义上是被谴责的。”他认为，前些年在这个问题上确曾有过失误，就是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干部的政治道德问题，导致一些干部也一切向钱看，从而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但是他说：“这恰恰是由于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他说，“如果真正谈特权问题的话，还是应当到西方去看看。且不谈那种亿万富豪，就是美国的总统和英国的王室，他们享受的特权和豪华生活，也是一般平民所不能梦想的。但在私有制下，这一切特权都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

他注意到人们对货币和商品侵蚀政治的现象的强烈不满。他说，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类似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在发达国家也并不罕见。但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批评呢？何新认为这种批评，恰恰反衬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统所历来崇尚的清廉作风。

他提到新上映的电影《焦裕禄》。何新说，像焦裕禄这样一种克己奉公，近乎无私的人格形象，对西方那种个人主义文化来说也并非陌生的。但这种干部在中共的历史上实际是很多的，他自己在过去的生活中就遇到过不少。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高于一切，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是中共所坚持的传统价值之一。这种价值观，既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同时在中国传统的某些政治道德观念中也有渊源。中共坚持的许多价值观念都既是现代的，又具有传统根基的。正是根据这种深厚的价值传统，一些人的腐败才在舆论中受到了格外强烈的批评，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

他认为中共今后会建立更加严密的法规，并对内部的腐败现象，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戒除。但是他说，个别性的腐败现象是难免的。但只要不懈地坚持清除，那么认为中共会因为腐败问题而垮台是没有根据的。

何新目前以主要精力和时间从事中国现代化、经济改革和国际问题的研究。在谈到国外对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的批评时，他说：“中共的意识形态具有现代性，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现代化的进程。对此我深信不移。”他说，他注意到一些西方人批评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僵化的教条主义。他认为这是不真实的。他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也在改革，在不断适应形势的变化向前发展。这种发展具有相当广阔深厚的社会科学基



础。他说，中共意识形态的这种适应性和发展活力，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所坚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上，也体现于陈云所宣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上。根据这种原则，中共的意识形态不可能陷入僵化。

何新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不断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而调整、修正自己对现实和历史的认识，以及做出科学、客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解释，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说中共的意识形态僵化毫无根据。

但他说，中共在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当然也一直注意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性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持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他认为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针上有两个法宝，一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维护国家政治稳定性的四项基本原则。前者可以防止僵化，后者防止发生政治失控、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化。

在谈到中国思想界的现状时，何新说，最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发展时期，出现某种思想混乱和不稳定是难免的。但这种混乱如果听其扩大下去，就可能打破政治稳定，这虽然是有些人所欢迎的，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却是不利的。不过这种混乱已被中共明智地克服了。他说，有人说坚持四项原则就是僵化。他认为这不是僵化，而恰恰是大智慧。不如此，中共就垮了，中国社会主义就垮了，中国和中华民族也垮了。

当笔者谈到国外有人认为中国存在“信仰危机”时，他说，根据他理解，所谓信仰危机是价值体系的大崩溃，是政治思想的大混乱。但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并没有发生，看来今后也不大可能发生。他说：“我认为中国思想界目前存在问题，但并不是危机。如果把一些探索，各种观点的争论和分歧，都称作危机的话，那么西方思想界，不是每天也都在发生危机吗？争论和探索可以是积极的，能够刺激新思想的发生和理论的进步。问题仅仅在于，让什么样的思想去掌握主流。”

他认为中国思想界目前的主流并不是在走向无序化的危机或崩溃。一方面，探索和寻求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新思想的进程，继续在积极地发生。但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指导下，新的思想秩序也在建设中，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何新说，一些西方人往往只看到近年思想理论界的局部现象，就做出普遍性的归纳。这种思维方法本身是可疑的。就当前来说，他们低估了中国思想界中健康清新力量的发展和成长，以及这种力量的生命力。

11. 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 S 的谈话录

《人民日报》1990.12.11

编者按：本报今天发表《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 S 的谈话录》这篇长文，因为文中讨论的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国际大势、国家大事，讨论又是在坦率对话、据理辩诘中展开的，声情独具，相信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味。

当今的世界，当今的中国，确实有许多尖锐紧迫而又纷纭复杂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如果人们不愿意长久陷于困惑中，不愿意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跟着国内外的错误舆论导向走，那就要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多读书，多研究，探究客观事物发展的进程。同时，还需要交流、讨论。本报在这里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年轻学者何新的思考，正是为了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并促进互相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何新的许多观点有独到之处，对于人们认识问题是有帮助的。当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人们只能接近真理，不能穷尽真理。何新在此文中的具体论点不一定是确当的（何新在文中申明有些见解尚属不成熟的看法），但我们认为，何新同志在文中所体现的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特别是，他着眼于从世界的大视野来观察中国的事情，又着眼于从历史的大趋势来分析现实世界的纷争，这种高瞻远瞩的科学的思考方法是值得提倡的；他注重从经济利益去揭示世界各国各种势力的政治取向，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来讨论我们对生产方式的抉择，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值得赞许的；他反对“自暴自弃”的民族虚无主义，申明把为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作为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这种爱国主义的立场是值得尊重的。此外，作为一个主要靠自学成才的年轻学者，他博览群书，学涉中西，善于独立思考，既敢于向西方的权威挑战，也勇于反思自己，求今日之是弃昔日之非，这种追求真理的治学作风也是值得提倡的。我们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在读了何新这篇谈话录后，都能参与讨论。如果您有什么相同的观点想发挥，有什么相似的思路想交流，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想商榷，都欢迎您写信或撰稿给我们。我们将发表有见地的稿件，并通过其他形式组织交流讨论。来信来稿请寄本报理论部。

12. 《人民日报》（1990.12.21）开辟专栏讨论何新《谈话录》

《人民日报》编者的话：本报12月11日刊登《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赞同的与反对的，都很激动；撰文发挥某个论点或商榷某个问题的，都很认真。这说明该文确实触及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

从本报已经收到的国内大批来电、来信、来稿中看，绝大多数读者都欢迎这篇文章的发表，并渴望多交流、多研讨。为此，本报决定开辟这个《读者纵论世界大势》专栏，为读者提供议论世界大势、国家大事的园地。如同对待何新的稿件一样，我们对待选发的读者来稿，一律尽可能保留原貌。具体论点确当与否，留待读者评议，期待通过讨论求得共识，当然最终还有待实践来检验。希望读者写稿时能畅所欲言，读报时能独立思考。

- 先后编发于人民日报理论版的讨论文章篇目和刊发日期如下：
- 作为不发达国家寻求正义与自由的思想体系的社会主义——读何新《谈话录》后所思（北京经贸大学讲师、企业管理学硕士石中，1990.12.21）



- 来信选登（罗亚辉；周易。1990.12.21）
- 一点商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吴天波，1990.12.21）
- 位卑未敢忘忧国 炎黄子孙当自强——读者来信摘编（清华大学研究生学言；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冯京；石家庄市轻化工学院胡小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冯学惠教授；军事教育学院七队五班徐宝库等八名学员；河北宣化县洋河南中学教师赵振明；成都读者任宏璋；寄自美国的张立婷；浙江残联儿童康复中心黄晗；广西大学离休老干部唐国富；华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员胡云超。1991.01.07）
- 应从世界的大视野来观察思考（南京粮食经济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高亚东，1991.01.07）
- 武汉大学部分师生 认真评点《谈话录》（中共湖北省委高校工委供稿，刘青春整理，1991.01.07）
- 学术研究与爱国主义（北京大学青年教师、文学硕士赵杰，1991.01.07）
- 国际风云变幻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归宿（南京金融专科学校郭宏之，1991.03.11）
- 对《谈话录》的两点不同意见（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军旗，1991.01.30）
- 立场和方法上的启迪——谈《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甘霖，1991.01.30）
- 安定团结实在太重要了（北京大学本科生巩建党，1991.01.30）

13. 《人民日报》（1991.01.15）报导：何新与日本教授谈话录 本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4. 《人民日报》（1991.01.30）报导：何新《谈话录》单行本出版。

15. 何新政论文集《东方的复兴》出版

江江《人民日报》1991.07.1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年学者何新的政论文集《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第一卷·理论准备——1989年事件前后中国问题评论）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该书收录了何新1988年以来的政治性文章、演讲、谈话录等二十余篇，计三十余万字。这些文论，有的已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北京周报》、《博览群书》等报刊上，有的发表在海外报刊上，还有一些是首次公开发表的。作为一个以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善于独立思考而受到众多读者尊重的中国中年知识分子，何新在此书中并不讳言和文饰他在思考历程出现过的某些偏颇和错误，但也不向那些来自国内外的诽谤和攻击屈服。他重申：“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作者在此书中对当代世界与中国的

若干重大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的结论是：“东方将走向复兴”，“中国将走向复兴”。（江江）

16.《人民日报》（1991.03.20）报导：何新等34人增补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7.《人民日报》（1991.09.12）报导：

中宣部理论局和本报理论部今天联合邀请首都理论界人士，座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出席座谈会并发言的有：黄美来、吴大英、田心铭、李延明、何新等。

18.《人民日报》（1992.02.17）报导：《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出版发行

在当今世界处于急剧变革和动荡不安的情形下，多了解一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是大有益处的。由徐惟诚同志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展望世界》丛书为读者了解世界提供了方便。

该丛书第一批推出四本书。《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年学者何新与西方记者的谈话录。作者着眼于从世界大视野来观察中国问题，又着眼于从历史大趋势来分析世界的纷争，注重从经济利益去揭示世界各种势力的政治取向，对国内外重大热点问题做了独特的论析。本书的主要篇目有：《世界历史重心向东方转移》、《论海湾战争》、《关于1989年中国形势的谈话》、《中国的民主与未来》、《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美中关系的战略背景与对策》、《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问题》、《谈人权与民主》、《谈政治改革》等。

二、《新华文摘》上有关何新文稿摘录

（1980~1989）

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探讨

（总第14期 1980.2）

作者：何新

摘要：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恩格斯所说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应该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个规律，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它就是肯定否定规律；有的同志则根本取消了这条规律。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涵义的历史演变

（总第20期 1980.8）



作者：何新

摘要：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个哲学范畴，在欧洲哲学史上的本来涵义，与我们现今所了解的涵义很不相同。不弄清这一点，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史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本文对这两个范畴的本来涵义。

简论“历史概念集合”

(总第27期 1981.3)

作者：(原园)

摘要：

何新(《学术月刊》1980年第11期)

“历史概念集合”是一种新的逻辑范畴，是思维中一种特殊的概念系统，具有特殊的逻辑性质和逻辑规律。这种系统中的概念，是有发展、有历史序列的；概念的发展与客体本身的规律一致。

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与何新同志商榷

(总第30期 1981.6)

作者：徐庆凯

摘要：

看了《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上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觉得有些问题需要商榷。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启蒙思想

(总第31期 1981.7)

作者：何新

摘要：齐良骥(《哲学研究》1981年第3、4期)

《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两百年了。我们今天应能对这部著作做出更恰当、更全面的评价。正如海涅等人曾指出的，这部著作对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形而上学本义不是反辩证法的同义词

(总第45期 1982.9)

作者：何新

摘要：

《辞海》关于“形而上学”条目的释文认为：“从黑格尔开始，把形而上学用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笔者在前文（见《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3期）中指出，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不是反辩证法的概念。

何新“凝固的音乐”——读《中国古代建筑史》断想

（总第49期 1983.1）

摘要：

建筑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常常集中地通过一种代表性的伟大建筑物而得到象征性的体现。所以罗丹曾经说：法兰西精神就体现在巴黎圣母院的建筑形式中。

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究的尝试

（总第55期 1983.7）

作者：何新

摘要：

以中国来说，所谓近代科技的落后，必须注意，这绝不是就中国历史的自体而言的，而是对于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勃兴而起的欧洲近代科学技术体系而言的。

“五行说”形成于东周

（总第76期 1985.4）

摘要：

“五行说”形成于何时，众说纷纭。何新在《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期撰文明确指出，“五行说”形成于东周而不是东周之前。

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证。

传统美学理论可划为三大类型

（总第83期 1985.11）

摘要：

何新在《学习与探索》今年第5期撰文指出，将符号语言学、资讯科学和控制论的方法应用于艺术系统分析，可以将传统美学理论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形式美学、心理美学、价值美学。形式美学以艺术品为物件，研究其结构。

《九歌》应是《九天十神歌》

（总第102期 1987.6）



作者：张莉

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何新，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民族文化讲习班”上，作了《九歌十神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学术报告，披露了他近期研究《九歌》的一项重大发现。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新探索——读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总第 86 期 1986. 2)

作者：何新

摘要：

新的中国古代思想史是较为难写的。这不仅由于材料的浩瀚，而且由于许多材料的熟知性，更由于围绕着这种熟知的材料已有过那样多基本雷同的议论，使得初入这个领域的人甚至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已被前人探索穷尽的领域。

关于文化学研究的通信

(总第 88 期 1986. 4)

作者：何新

凤凰崇拜的起源与演变

(总第 114 期 1988. 6)

摘要：

何新在今年 3 月 16 日《中国文化报》上著文说，从甲骨文、金文记载考证，商周之际，凤凰是一种虽然罕见、但并非不存在的鸟类。这种鸟类，就是大鸵鸟。鸵鸟形体大，是鸟类中最大者。高约 7 ~ 9 尺，鸵鸟脖颈细而柔长。

李泽厚与当代中国思潮

(总第 117 期 1988. 9)

作者：何新

摘要：

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李泽厚无可争议地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这种地位，首先来自李泽厚思想的挑战性。自从 5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笼罩着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多方面影响。

危机与挑战：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之路——读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总第 119 期 1988. 11)

作者：何新

摘要：

最近读了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名著《美国与中国》第4版的中译本。这是国外汉学著作中的一本名著。自本书初版以来，此书一直是美国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和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从训诂学看《诸神的起源》一书不足

(总第123期 1989.3)

何新所著的《诸神的起源》(以下称《起源》)出版后，学术界的评价各异、毁誉参半。杨宝忠在《河北大学学报》去年第4期撰文，从文字训诂学的角度，指出《起源》中的谬误之处。

“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总第125期 1989.5)

作者：何新

摘要：

五四精神的真谛

80年代我们纪念“五四”，人们关注的似乎集中于这三点：民主、科学，以及反封建。但是，问题在于，对于这三点，我们今天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再做一番认真的反思！

首都部分专家座谈五四运动

(总第125期 1989.5)

作者：(赵清治)

摘要：

1989年1月16日，共青团中央邀集首都社会科学界部分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以纪念五四运动70年。与会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光远、丁守和、庞朴、何新、朱荫贵、杨百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沙健孙，中国人民大学彭明。

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

(总第146期 1991.2)

编者按：本报今天发表《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这篇长文，因为文中讨论的是人们普遍关注的国际大势、国家大事，讨论又是在坦率对话、据理辩诘中展开的，声情独具。

下卷

VOLUME III

何新著作年表



何新著作年表

书 名	出版社	年 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何新 任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 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rom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New Star Publishers	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续表)

书 名	出版社	年 代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同上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同上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辩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诸神的起源（韩文版）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同上	2001



(续表)

书 名	出版社	年 代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同上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同上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同上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同上	2003
圣与雄	同上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同上	2003
风——华夏上古情歌	同上	2003
孔子论人生	同上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同上	2005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15册)	同上	2007
我的哲学思考:方法与逻辑	时事出版社	2007
思与行·论语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天行健·易经新解	同上	2007
宇宙之道·老子新解	同上	2007
诸神的起源	同上	2007

(续表)

书 名	出版社	年 代
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14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华龄出版社	2008
哲学思考(上下册)	时事出版社	2010
反主流经济学(上下册)	时事出版社	2010
汇率风暴——中美汇率战争真相揭秘	中国图书出版社	2010
汇率风暴	中港传媒出版社	2010
谁统治着世界——共济会与世界战争	中港传媒出版社	2010
何新论美	东方出版社	2010
何新论中国经济	东方出版社	2010
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	中国图书出版社	2011

有关何新的评论与研究

何新批判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中国高层智囊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中国高层文胆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中南海幕僚和中国智库	香港哈耶出版社	2009



何新主要著作封面



培根论人生 (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培根论人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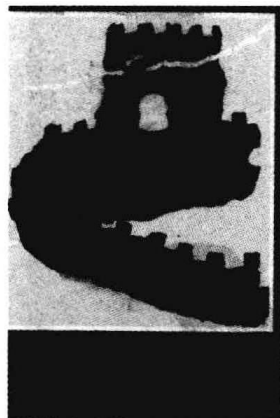
培根随笔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诸神的起源
三联书店,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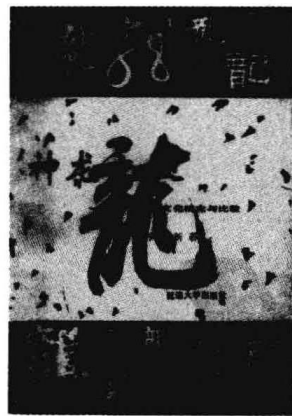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人生论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神龙之谜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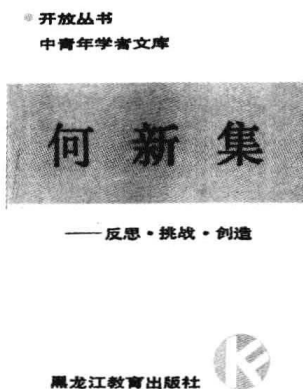
诸神的起源
台湾木铎出版社，1987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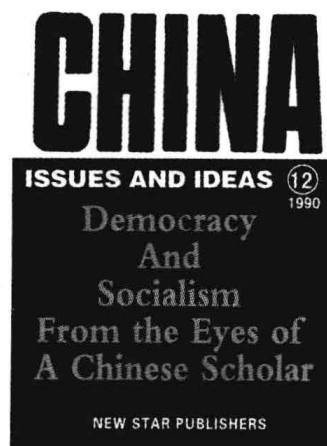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1989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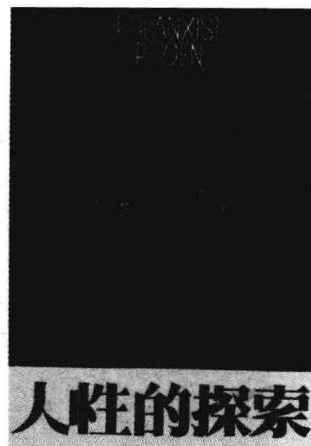
龙：神话与真相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New Star Publishers, 1989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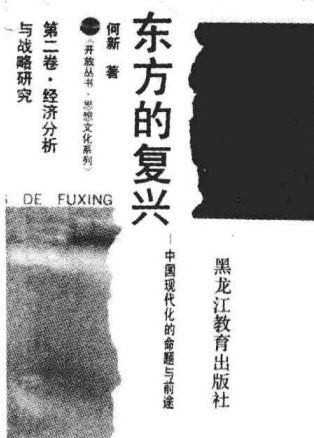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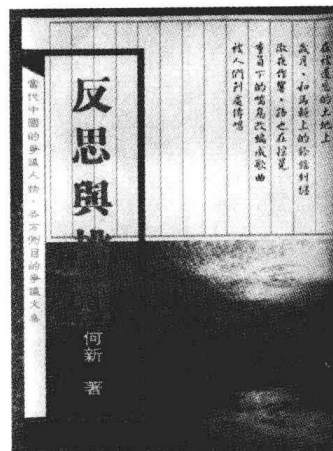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东方的复兴 (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
教育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 (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爱情与英雄——天地四季众神
之颂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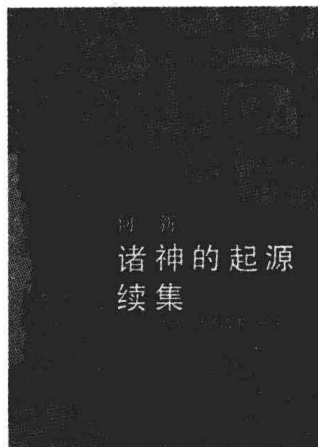
(内部研究报告)

一九九三年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 (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诸神的起源续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诸神的起源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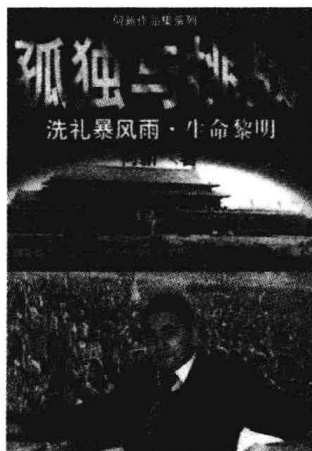
人生论
华龄出版社，1996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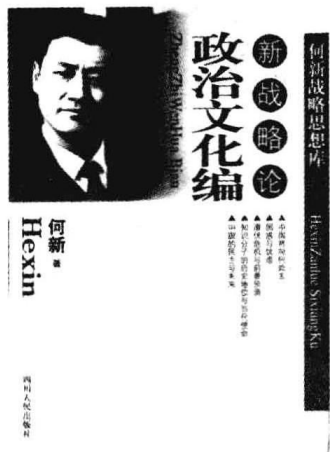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



孤独与挑战
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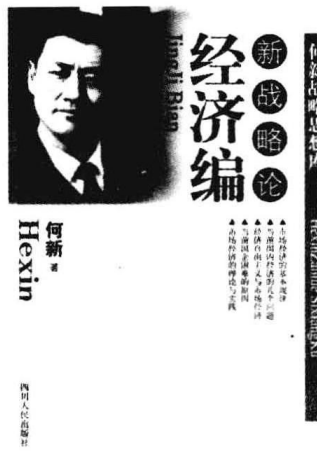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
日本东京树花舍，1998



新战略论·政治文化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新战略论·国际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新战略论·经济篇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诸神的起源 (韩文版)
韩国东文堂，1990



中华的复兴 (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 (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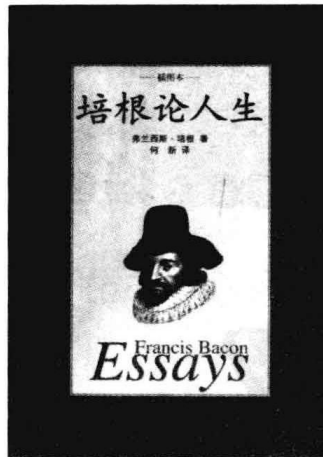
大易通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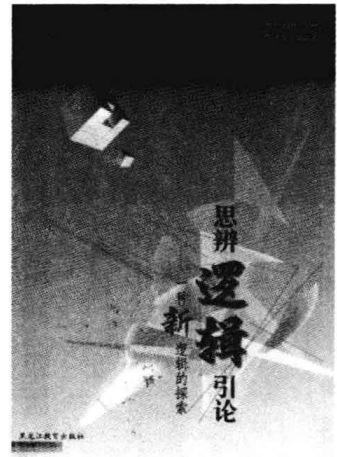
思考 (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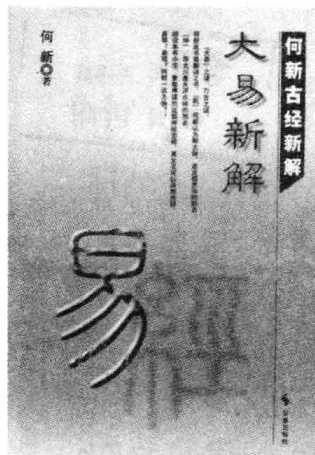
培根论人生 插图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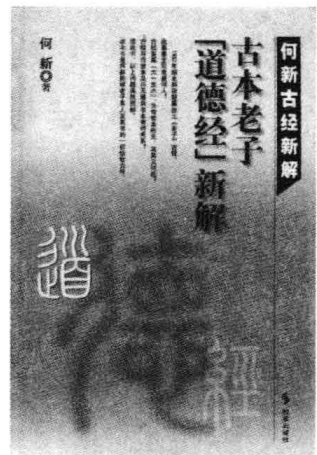
思辨逻辑引论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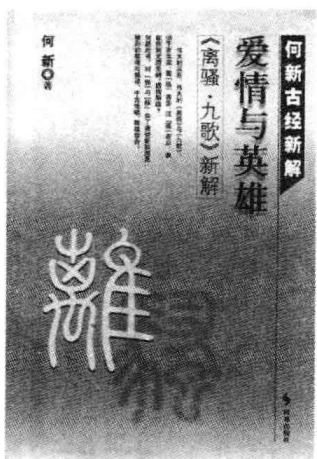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辩
时事出版社，2001



何新古经新解·大易新解
时事出版社，2002



何新古经新解·《道德经》
新解时事出版社，2002



何新古经新解·爱情与英雄
时事出版社，2002



龙：神话与真相
时事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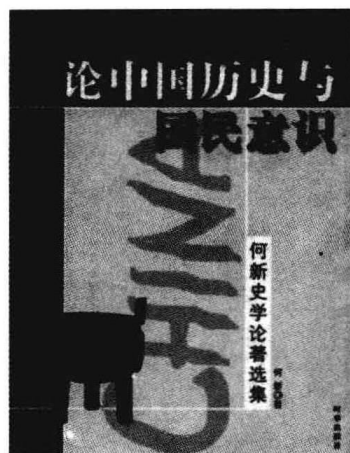
何新古经新解·诸神的起源
时事出版社，2002



何新古经新解·宇宙的起源、宇宙之间 时事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人生论 华龄出版社,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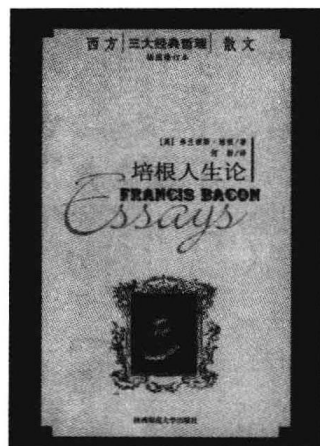
全球战略问题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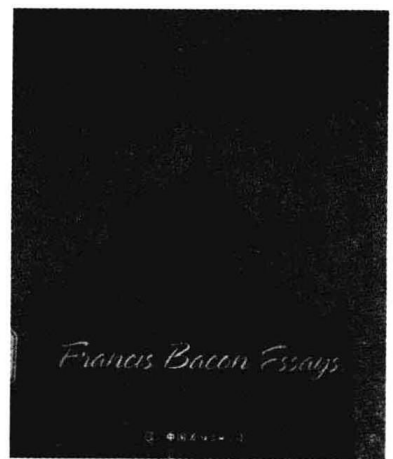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3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2003



圣与雄
金城出版社，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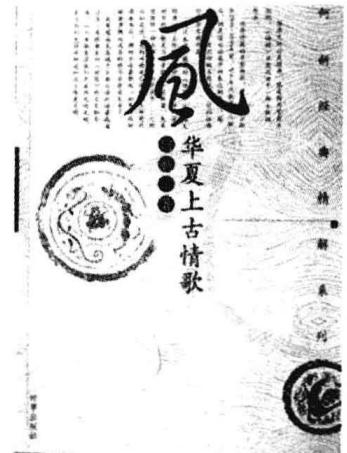
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



人生论经典
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2003



风——华夏上古情歌
时事出版社，2003



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2005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7



尚书新解·大政宪典
时事出版社, 2007



易经新解·天行健
时事出版社, 2007



论语新解·思与行
时事出版社, 2007



诗经(情诗)新解·风与雅
时事出版社, 2007



诗经(史诗)新解·雅与颂
时事出版社, 2007



老子新解·宇宙之道
时事出版社, 2007



天问新解·宇宙之问
时事出版社, 2007



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
时事出版社, 2007



楚辞新解·圣灵之歌
时事出版社，2007



孙子兵法新解·兵典
时事出版社，2007



孔子年谱
时事出版社，2007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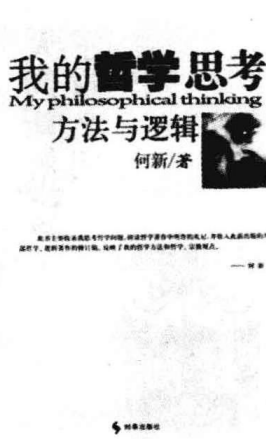
诸神的起源
时事出版社，2007



龙·神话与真相
时事出版社，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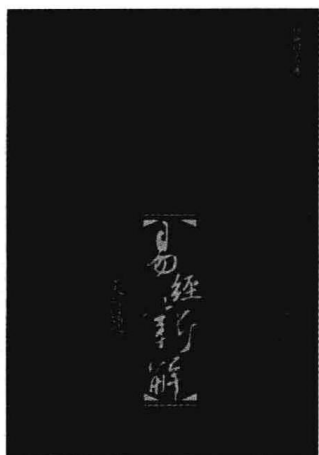
雄·汉武大帝新传
时事出版社，2007



我的哲学思考 —— 方法与逻辑
时事出版社，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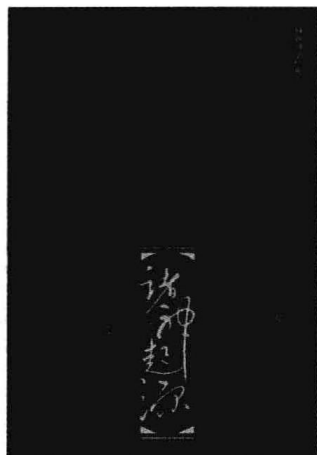
思与行·论语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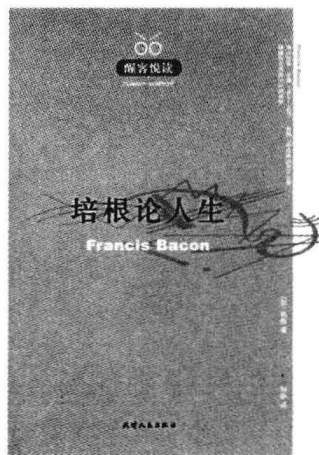
天行健·易经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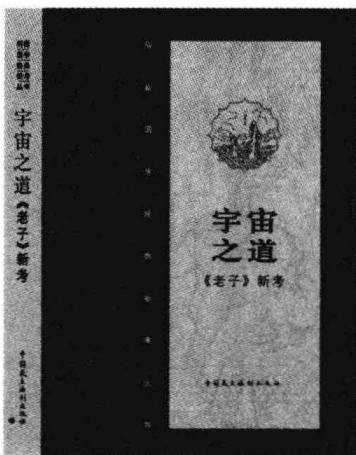
宇宙之道·老子新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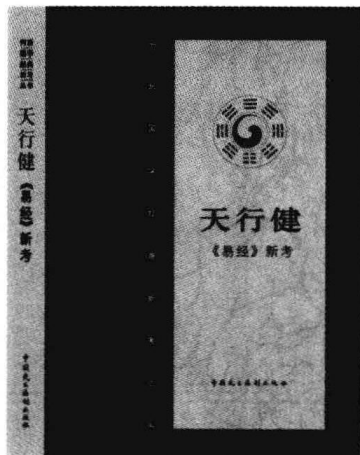
诸神的起源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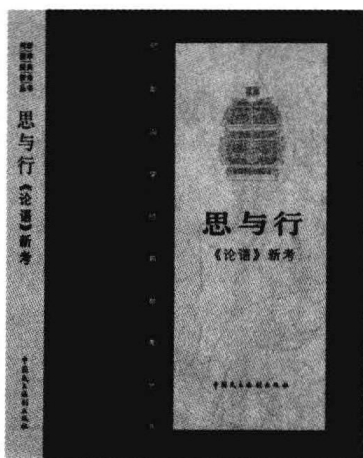
培根论人生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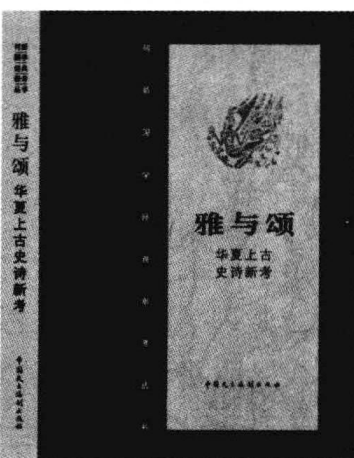
宇宙之道——《老子》新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天行健——《易经》新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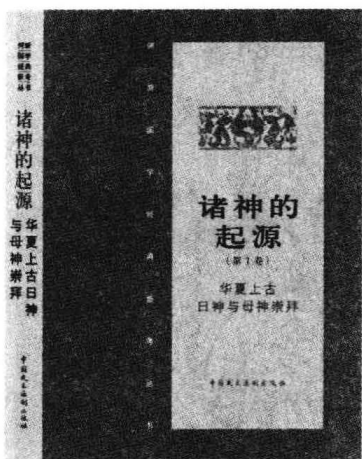
思与行——《论语》新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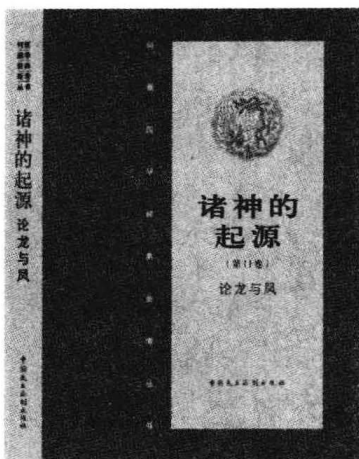
雅与颂——华夏上古史诗新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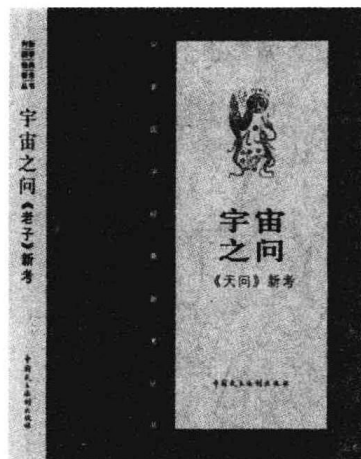
圣——孔子评传及年谱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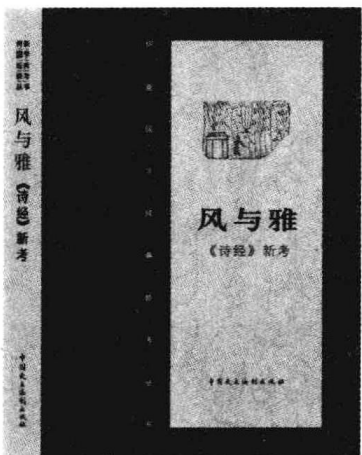
诸神的起源 (第1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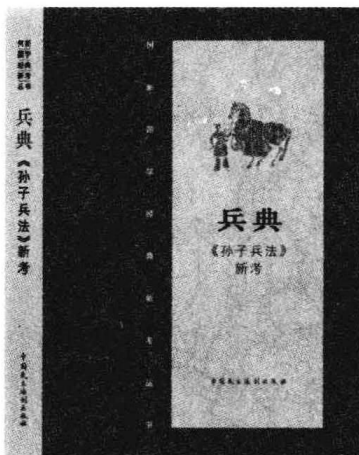
诸神的起源 (第2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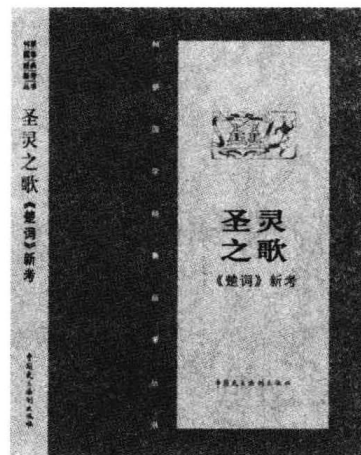
宇宙之问——《天问》新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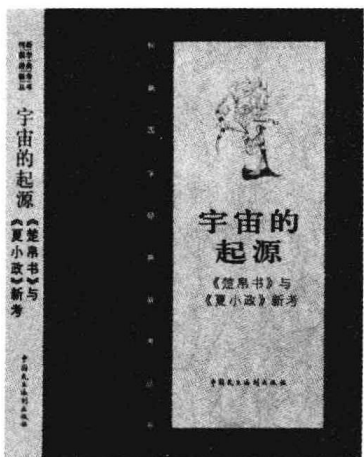
风与雅——《诗经》新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兵典——《孙子兵法》新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圣灵之歌——《楚辞》新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宇宙的起源《楚帛书》与《夏小政》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大政宪典——《尚书》新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雄——汉武帝评传及年谱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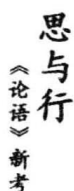
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
华龄出版社，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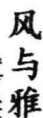
尚书新考·大政宪典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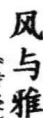
易经新考·天行健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论语新考·思与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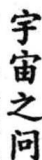
诗经新考·风与雅（上）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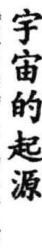
诗经新考·风与雅（下）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老子新考·宇宙之道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天问新考·宇宙之间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考·宇宙起源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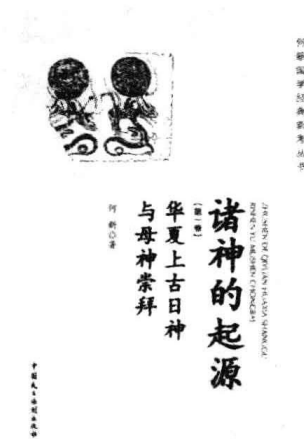
楚辞新考·圣灵之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孙子兵法新考·兵典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圣——孔子年谱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诸神的起源（第一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诸神的起源（第二卷）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华夏上古史诗新考·雅与颂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雄——汉武帝评传及年谱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人生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哲学思考（上下册）
时事出版社，2010



反主流经济学（上下册）
时事出版社，2010



匯率風暴——中美貨幣戰爭揭秘
香港中港傳媒出版社，2010



誰統治著世界？
香港中港傳媒出版社，2010



何新論美
東方出版社，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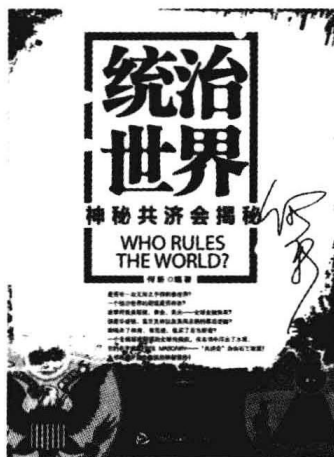
何新論中國經濟
東方出版社，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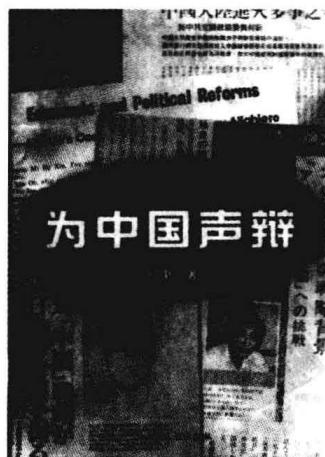
匯率風暴——中美匯率戰爭內幕
揭秘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



命運與思考
香港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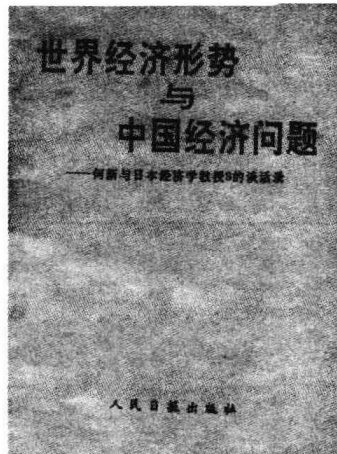
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密
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



為中國聲辯
山東友誼出版社，1996



统治世界
兴大大视野论坛，2011



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

海内外有关何新的部分评论集



何新批判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中国高层智囊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高层文胆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中南海幕僚和中国智库
香港哈耶出版社，2009